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稳扎稳打——蒙哥马利



《二战八大将帅》丛书编委会

主 编 程广中

副主编 接培柱 李一奇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建吉 刘文涛 李一奇
杜正艾 柯春桥 接培柱
程广中 傅雁南 蔡志强
樊高月

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在这场以法西斯轴心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为另一方的大战中，双方投入的兵力兵器之多、战场波及范围之广、作战样式之新、造成的损失之大、产生的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大战结束近 50 年来，物换星移，事过境迁，但它仍以其恢宏的气势、深刻的内涵、丰富的底蕴，磁铁般吸引着中外众多的军事家、历史学家去探究和著述。由军内外一批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军事史学工作者撰写的这套《二战八大将帅》丛书就是这方面的又一新作。

战争可谓人类所能参加的最惊险、最激烈、最残酷的较量，而将帅则堪称战争的灵魂。古人曾说，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观古今中外历史，王朝之擅变，国家之兴亡，莫不与将帅之优劣有关。当然，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战争的性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将帅作为战争（或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其作用也是决不容忽视的。可以说，无卓越之将帅，即不能创彪炳之功业，无优秀之指挥，则不能获辉煌之胜果。所以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子说：“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法国的拿破仑亦说：“攻略高卢者，非罗马之军队，而系恺撒，震动罗马者，非迦太基之士兵，而系汉尼拔，侵入印度者，非马其顿之军队，而系亚历山大。”将帅之于战争，永远是人们研究和了解战争的重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侵略者制造的巨大悲剧。在这场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的空前激烈的大厮杀、大搏斗中，站在前列披坚执锐、角力斗智的是同盟国异彩纷呈的众多将帅。他们或横刀立马、驰骋疆场，或羽扇轻摇、运筹帷幄，导演了一幕幕激越高昂、波澜曲折的活剧，使残酷的战争闪烁出人类智慧与勇气的火花。《二战八大将帅》丛书从中重点选收了苏联的朱可夫和崔可夫、美国的麦克阿瑟和巴顿、英国的蒙哥马利，他们都是二战中的风云人物，是同盟国所依赖的柱石，个个功名显赫。苏联元帅、苏军著名统帅朱可夫多谋善断、胆略过人，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具有组织实施庞大的坦克机械化兵团进攻和防御作战的杰出才能。正如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所说：“朱可夫确实是率领大批军队进行战争的统帅的统帅。”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战时荣任太平洋西南战区总司令，指挥美国陆海空三军力量，实行“蛙跳”战术，直取日军防线纵深地带的主要目标，从澳大利亚经菲律宾一直打到日本国上。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蒙哥马利制订作战计划十分细致彻底，善于稳扎稳打，是一位阵地战大师。巴顿作为坦克进攻作战的行家里手，则是一名“热血豪胆”的沙场老将。这几位将领不仅具有良好的战略战术素养，而且对国家的政治目标也有比较透彻的了解，二者的均衡发展，使他们在夺取一个个战役胜利的同时，能够在战略上高敌一筹、立于不败之地，从而在军事领域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当然，这些将帅并不是天生的神灵，从初上战场的新兵到登上军事“金字塔”顶端的著名将帅，他们无不经过了艰苦的磨炼和刻苦的学习。朱可夫还在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时就把事业、职责置千一切之上，房间里地图铺满地板，上面勾画得密密麻麻。他们普遍重视从历史知识中吮吸营养。麦克阿瑟说：“军事比其它大多数职业更需要依靠前人明智的决断作为制定未来

方案的参考。”巴顿则高声宣布：“你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军人，就必须了解历史。”他们对新事物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预见力，能够及时发现和研究武器装备的变化及其对作战方式的影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武器装备的迅猛发展呼唤着作战模式的划时代变革，在各国军事学术界守旧与变革的激烈争执中，这些著名将帅几乎全是敢走新路的勇者。朱可夫反对把坦克作为步兵支援武器的作法，积极主张建立苏军的坦克机械化部队。巴顿则是美军坦克部队的创始人之一。二战初期，他带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欧洲战争的发展，如饥似渴地阅读代表当时先进思想的有关人物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指导原则。此外，这些将帅均懂得任何灵巧的现代化武器系统都不能代替受过严格训练、富有经验和作战勇敢的士兵，只有平时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带出一支纪律严明、指挥统一、战斗力强的精锐之师。朱可夫、崔可夫、蒙哥马利、巴顿都以治军严明著称于世。这套丛书还收入了三位分属于德、日法西斯国家的将领，他们是山本五十六、戈林、隆美尔。这三位将领都是疯狂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罪犯，但是他们在战术领域的创造仍是值得后人研究借鉴的。日本武士山本五十六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缔造者，在偷袭珍珠港时首次把航空母舰编队投入实战，一举开创了世界海战史上的航空打击时代。开战之初，由他率领的日本联合舰队横扫了东南亚和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希特勒的心腹爱将隆美尔，在入侵法国、进军北非和抗登陆于诺曼底中出尽风头，尤其在指挥德军精锐坦克部队鏖兵北非时，他狡诈多变、以少胜多，一度进抵阿拉曼、兵临开罗城，撼动了英国北非防线的中枢神经，成为闻名遐迩的“沙漠之狐”。纳粹德国军衔最高的“帝国元帅”戈林，也在组建德国空军并使其密切协同地面部队进行“闪击战”中为希特勒立下汗马功劳。但是，这些将领远不能同上述五位同盟国将领相比，他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名出色的战术家，却不是什么战略家。他们缺乏通观全局、深谋远虑的战略才能，一旦在一个战略方向独当一面时便显得力不从心。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都死心塌地地为法西斯、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卖命。他们在战术领域的创造，只是将法西斯的侵略推向顶点。他们的才干不仅没有造福人类，反而阻碍和延缓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他们因此也就成了千古罪人，而且终于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所谓“二战八大将帅”，当然不是说二战将帅仅此八位，或说他们是最显赫的八位。一些同样或更加著名的将帅，如艾森豪威尔、马歇尔等，只是因为已有传记出版，这套书中未再收入。对已收入的八位，不论是反法西斯的英雄，还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犯，这套书的作者们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全面展示传主的生平事迹。不仅写他们的军事生涯、重要战绩，而且注意写他们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恋爱婚姻，揭示出他们成为将帅的人生轨迹；不仅一般地写他们的治军、作战，而且注意从政治上、战略上评价其成败得失，以使读者得到有益的启示，丛书力图融学术性与知识性、哲理性分析与生动的描述为一体，使之读来朗朗上口，引人入胜。当前的世界正处于大变动时期，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有可能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然而世界还远非伊甸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仍然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一切为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幸福立志从戎的热血青年，一切即将成为将帅或立志成为将帅的指战员都应该读读这套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这套将帅传记能够为有志者和广大的读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仁修桥
九三年十一月

稳扎稳打—蒙哥马利

作者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全球性浩劫,先后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 亿以上的人口卷入了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在反对法西斯侵略、保卫国家独立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同仇敌汽,与德意日法西斯军队进行了长期的浴血奋战,最后终于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各国都涌现出一批能征善战、足智多谋、敢打硬仗和恶仗的著名将领。英国著名军事家、政治家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就是这样一位声名卓著的战将。

蒙哥马利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1887 年 11 月 17 日,他出生在伦敦肯宁顿的一个牧师家中。不满两岁时,随其父亨利·蒙哥马利主教前往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1902 年一回到英国,就被送入圣保罗学校就读。1907 年 1 月,进入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908 年 9 月,被分到皇家沃里克郡团,驻防印度。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最初作为一名中尉排长随部队一起参加作战,在一次战斗中胸部和腿部中弹负伤,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伤愈后被任命为旅参谋长,又随部队再次奔赴前线。战场的枪林弹雨使他多次遇险,但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任第 3 师师长,率部赴法国和比利时抗击德军。英国从敦刻尔克撤退后,他在英国本土先后任第 5 军和第 12 军军长、东南军区司令。1942 年上半年,英军在远东战场节节败退,在中东战场丢城失地,不断后撤,战场形势对英国极为不利。在这危急的关头,蒙哥马利出任英国驻北非第 8 集团军司令,他不仅遏止了德军的攻势,而且在阿拉曼战役中打败德意非洲军团,取得决定性胜利,扭转了北非战场的危急局势。随后,蒙哥马利率部乘胜追击 1000 多英里,于 1943 年 5 月迫使德意军队在突尼斯投降。

北非战局结束后,他率部与美军一起转战西西里和意大利,并于 1944 年 1 月出任第 21 集团军群司令,负责计划、组织和实施诺曼底登陆战役。1944 年 6 月 6 日诺曼底登陆成功之后,他指挥第 21 集团军横扫法国北部、比利时、荷兰和德国北部。1944 年 9 月 1 日,他被授予陆军元帅军衔。1945 年 5 月 4 日在吕讷堡荒原接受德国北方军的投降,后任英国驻德国占领军总司令。1946—1948 年任大英帝国陆军参谋总长。1948—1951 年任西欧联盟各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委员会主席。1951—1958 年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副统帅。1958 年秋退役。曾荣获英国各种高级勋章和外国勋章。

蒙哥马利戎马生涯 50 年,服役时间超过了威灵顿、马尔巴勒和蒙克。退休之后他继续参加国际国内政治活动达 10 年之久,到 1968 年才完全退出公共生活。他把精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到各国访问,就国际关系发表见解;二是撰写历史著作和电视广播稿;三是参与国内政治。因此,他不仅会见过斯大林、赫鲁晓夫、铁托、毛泽东、周恩来、尼赫鲁等许多著名政治家,而且写下了《回忆录》、《正确判断的方法》、《领导艺术之路》、《三个大陆》和《战争史》5 部著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蒙哥马利元帅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分别于 1960 年和 1961 年两次应邀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接见。通过访问,他对我国有了较深刻的了解,认为中国革命“清除了内部封建压迫、腐败和外来侵略”,使 6 亿人民获得解放;公开宣称“我拥护新中国,摒弃旧中国”,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是错

误的”。1961年9月他在访问我国时，提出了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即：大家都应当承认一个中国；承认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应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这三项原则赢得了我国政府和人民的赞同与支持。

蒙哥马利能在同辈人中出类拔萃，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有别人无法同他相比的敬业精神。从他在圣保罗学校选择“陆军”班那一天起，他就把军事作为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无论是在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学习，还是在印度服役；无论是在训练场上，还是在坎伯利和奎达参谋学院；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无论是当连排长，还是任帝国总参谋长，他一心想的只是训练、作战和胜利。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爱交际，不好女色，除了军事以外，他没有别的兴趣和爱好。

蒙哥马利的一大才能是能够从大处着眼，纵观全局。他视野开阔，反应敏捷，善于把战略需要同战术和可能归他指挥的兵力联系起来考虑问题，他亲自制定总体作战计划，而将具体计划工作交给参谋人员去完成，以便能够集中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有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由于他对战争的全局胸有成竹，所以总是能够临危不惧，遇事不慌，不为局部或表面现象所干扰，而对作战的复杂情况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够像他这样想大事的人是比较少见的。有的人往往能打赢一次战斗，却打不赢一个战役。

蒙哥马利知人善任，敢于大胆使用新人。蒙哥马利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的工作时间也许有三分之一用于人员的考虑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蒙哥马利花了许多时间，采用各种方法来物色、选拔和任用有才华的军官。他每到一个新的部队，总有一批不称职的军官被罢免，总有一批优秀的军官被提升。他的这种做法难免引起一些人的怨恨，但却使部队充满生机，百貌一新。二战爆发后，他更加重视把优秀的军官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他不仅使自己身边有一个合格的参谋部，而且慎重地选拔下属将领，把一些表现极好的人提拔到军、师领导岗位上来。由于蒙哥马利知人善任，他的部队的各级指挥班子都坚强有力，斗志旺盛。

蒙哥马利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作为一个部队训练者的才能。无论是在参谋学院任教，还是在担任师长或后来担任更高职务期间，他都表现出一种卓越的训练才能：他能鼓舞自己所领导的官兵对战争产生兴趣。他不仅给部属灌输战斗精神，而且灌输事业心，使他们愿意掌握所需要的各种技能；他不仅能使那些厌烦战争的士兵愿意去打仗，而且还能鼓舞他们把仗打好。他带领的部队都训练有素、士气很高，战斗力很强。

蒙哥马利对作战计划周密，预测比较准确。隆美尔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对可能出现的偶发事件留有很大余地。蒙哥马利则正好相反，总是针对情况，周密判断，对每种可能性和每一种方案都要预先进行周密慎重的分析，在制定出最终计划时，对意外情况和偶发事件通常都能考虑到。周密的计划本身就包含着比较准确的预测。蒙哥马利在阿拉曼战役中按计划 in 战役的第12天就迫使隆美尔败退了，就很好他说明了这一点。

蒙哥马利进行战争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均衡”。“均衡”原则强调，绝不能被打得措手不及，绝不能没有预备队就实施攻击，绝不能因补给不足而影响部队战斗和机动的自由。这些要诀往往能迫使敌人失去平衡，而使己方保持常态。蒙哥马利长期大力宣扬自己的这一原则，坚持在每次出击之前必须在人力物力上做好充分准备，以致引起许多人的嘲笑。然而，他的许多部

属从将军到营长，都感到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下大家有一种愉快的安全感。在他指挥的几个集团军里，官兵们总是满怀信心地面向前线，而很少有后顾之忧。对于战争来说，他的这种“均衡”论可能延缓了进程，但却稳妥可靠，使他从未打输过一个重要战役，从而保证了他在部下中的声威。

蒙哥马利与部下保持密切的联系，对部队有巨大的号召力。蒙哥马利极端蔑视高级司令部人员不与前线士兵接触的现象，所以，无论是当营长、旅长，还是当师长、军长，或是当集团军司令、集团军群司令和参谋总长，他都经常到各部队视察、参观、访问、看演习、主持运动会、发表演讲，同各级军官和士兵会面、交谈，让每一个部属都认识他，了解他，从他身上获取力量和信心。经常接触部队使他在部属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增强了部队对他的信任和信心。不论是在北非，还是在欧洲，他的部队中都没有出现过信任的鸿沟。因此，每次重大战役之前他去检阅部队时，都能使全体官兵备受鼓舞，信心倍增，满怀必胜的信念和高昂的斗志投入战斗。

蒙哥马利在部属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十分关心部属。蒙哥马利认为，如果对于人的因素保持冷漠无情的态度，就将一事无成。因此，他总是尽可能使每一个士兵感到他在起到一个人的作用，而他的上司也在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加以关心；他，急是尽可能使每一个士兵都清楚地懂得他应当做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要那样做。此外，他还注意关心所属官兵的生活和娱乐活动，使大家在紧张的训练、工作或战斗之后，能有一定的物质和精神享受。

然而，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与许多伟大人物一样，蒙哥马利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

首先，蒙哥马利的好恶由己性格严重地影响了他的 interpersonal 关系。蒙哥马利对他中意的少数人，能够保持亲密愉快而又能相互体谅的同伴关系；在更大的范围内，他善于同广大士兵和民众建立良好的关系。然而，如果他断定某人不好，那就会走极端。在这种情况下，蒙哥马利会变得残酷无情。例如，他在 1942 年 8 月对待奥金莱克的态度就太粗暴，连那些最重视蒙哥马利的军事才能的人也不能宽恕他对待奥金莱克的行为。当他与美国人并肩作战的时候，由于其这种性格而不时出现的毛病，产生了不良后果。

其次，蒙哥马利我行我素的作风给他自己造成了重大伤害。蒙哥马利认为，任何一个权位很高的人，都应该像他那样明快地找出问题的明确答案。所以，他虽然善于把自己的意图和目的传给下属诸集团军的全体官兵，但却往往不注意向同级和上级通报。结果是他的上级和同级常常误解他的意图，特别是当他们认为应该发生的事并未发生时，就会焦急不安。例如，在阿拉曼战役前，蒙哥马利对部队重新进行编组，就引起很多人担心；在战役中，有几个师正在从前线撤退的消息，立刻在伦敦引起一片惊慌，但蒙哥马利却不以为然。如果他费点心机让上级确切了解他的想法，就不会发生这种误解，也可以大大减轻古德伍德战役后出现的那种混乱局面和不安情绪。

再次，蒙哥马利不善于进行机动作战。蒙哥马利是进行精心布置的阵地战大师，但却不大善于进行机动作战。同隆美尔的大胆突击，巴顿的有力推进，以及德、苏军队在东部战线进行的大规模装甲机动战相比，蒙哥马利自然是相形见绌。在阿拉曼和古德伍德战役中，他对坦克的使用虽然可以进行辩解，但肯定是有问题的。在这两大战役胜利后的挺进中，他没有及时地指挥部队向前机动，去扩张战果，结果丧失了取得更大胜利的机会。所以，机

动作战并不是蒙哥马利之所长。

最后，蒙哥马利根深蒂固的虚荣心使他难以自制。蒙哥马利青少年时期在家受母亲压抑，在校被富家子弟冷落，难免产生自卑心理。在他掌了权并达到一定地位之后，这种自卑心理就变成了虚荣与自负。毫无疑问，他的虚荣心与过分自负对他正确地选定作战方针产生了微妙的。有时甚至是直接的影响。昂菲达维尔战斗计划，他与艾森豪威尔进行的“单一冲击”和“设置单一的地面作战指挥官”的激烈争论，他在吕讷堡荒原接受德军投降的经过与表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他的虚荣心与自负心理的影响，产生了很不好的后果。

由于上述和其他一些明显的优点和缺点，国外许多作品在评价蒙哥马利其人及其历史功绩时，都带有截然不同的感情色彩，对许多历史事件持完全对立的观点，有的充分肯定，热情赞美，脱离历史事实地夸大他个人的决策作用，使人听了难以置信；有的蓄意贬低，歪曲事实，恶毒攻击与咒骂，令读者嗤之以鼻。总之，这些作品都歪曲了历史，背离了史实，使读者难以把握真实的材料来正确评价蒙哥马利其人及其历史功绩。当然，也不乏如实记叙各个历史事件、公正地评价蒙哥马利的历史功绩、同时也客观地揭示他的失误的作品。

虽然国外出版了许多有关蒙哥马利的作品，但译成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的仅有四部，而由我国作者撰写的蒙哥马利专著却一部也没有。这四部中文版著作是：《蒙哥马利元帅回忆录》、《领导艺术之路》、《蒙哥马利》和《蒙哥马利：一个将军的诞生》。前两部由蒙哥马利本人撰写，分别于1958年和1961年出版。在《回忆录》中，蒙哥马利仅用了三章来描写他1939年以前的生活，而把重点放在他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上，一直写到他1958年退休为止。《领导艺术之路》介绍了历史和现实中各式各样的领导艺术及其产生和运用，也是作者对自己一生领导实践的总结。《蒙哥马利》由罗纳德·卢因著，于1971年出版。该书仅用一章简述蒙哥马利二战以前的经历，而主要描写蒙哥马利从1939年9月到1945年5月4日在吕讷堡荒原接受德军投降的整个战斗经历。《蒙哥马利：一个将军的诞生》由尼格尔·汉密尔顿著，于1981年出版。该书从蒙哥马利的家世一直写到阿拉曼战役，详细地描述了蒙哥马利成长为将军的经历，上述四部书虽然各有所长，但读后仍然不能对蒙哥马利的一生有一个十分完整的印象。

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为了表彰蒙哥马利为反法西斯战争和为世界和平作出的伟大贡献，为了使我国读者对蒙哥马利的一生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了解，笔者根据自己从事外军研究工作积累的各种资料，撰写了《稳扎稳打——蒙哥马利》一书。在撰写过程中，笔者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地、客观地、全面而公正地描述和评价蒙哥马利和各个历史事件，但由于笔者的政治水平和历史知识有限，对有关历史问题研究不深，对许多历史事件又不能进一步作实地考察，再加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不妥或错误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樊高月
1993年5月于北京

第一章 主教之子

世代圣职名声望，主教尽职妻逞强；
儿违父愿从军去，祖传职业弃一旁。

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不禁会想起那些功勋卓著的战将。提起那些名声显赫的战将，人们自然会想起伯纳德·劳·蒙哥马利。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于1887年11月17日出生在伦敦肯宁顿圣马克教区的牧师——亨利·蒙哥马利家中。英国的蒙哥马利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创下了光辉的业绩。蒙哥马利家族的祖先罗杰·蒙哥马利伯爵，曾于1066年协助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入侵英国，因而被视为诺曼贵族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后来，他成为占领区的行政长官，直至1094年他逝世为止。罗杰·蒙哥马利在11世纪威廉公爵的朝廷中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名声显赫。尽管他的传记作者曾把他说成是一个睿智、温和和热爱正义的人，但他的成功完全是靠残忍、欺诈和武力。诺曼人的野心、贪婪和狡猾在他身上暴露无遗。他霸占了若干诺曼修道院作为私产，娶了声名狼藉的威廉·塔尔瓦斯勋爵的女儿梅布尔为妻。他娶梅布尔不仅是为了扩充自己的产业，也是为了拉拢一个气味相投的同党。他们狼狈为奸，排除异己，撵走了威廉公爵身旁大部分势单力薄的贵族。罗杰与妻子乘机用甜言蜜语取得公爵的宠信，并巧妙地进行挑拨离间，使公爵与身边的大臣失和。威廉公爵是位感情用事的人，盛怒之下，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削除了一些烜赫一时的重臣的贵族爵位，并将他们长期放逐。心狠手辣的梅布尔对此并不满足，企图把她的对手置于死地而后快。于是她设宴招待被放逐的阿诺德·德昌福尔，企图在宴会上将他毒死。梅布尔的举动引起了阿诺德的警觉，于是拒绝食用她的点心，使她的阴谋未能得逞。罗杰的弟弟吉斯利贝特不知内情，顺手拿过点心，狼吞虎咽地吞下，结果白白送掉性命。梅布尔一计未成，一计又起，不除掉对手，誓不罢休。最后，她买通阿诺德的侍从，将其害死。

1082年，梅布尔自己也大祸临头：当她浴后躺在床上时，被仇人斩首。梅布尔死后，罗杰·蒙哥马利娶性情温和的阿娣莉莎·甫雪特为妻，并洗心革面，努力改过，以赎前罪。他后来成为一个虔诚而热心的基督教徒，在英国和诺曼底捐赠了无数的修道院和教堂。

1094年，罗杰·蒙哥马利在自己的什鲁斯伯里修道院逝世。

1623年，罗杰·蒙哥马利的子孙从苏格兰西岸渡海，到达多尼格尔郡的基勒堤，赶走了当地的天主教徒，在那里安家立业。他们主要经商、当牧师或任行政官员。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的爱尔兰血统，便是从他们那里继承来的。

在爱尔兰，蒙哥马利家族中第一个有据可查的是塞缪尔·蒙哥马利。他是个酒商。当时的英国在英王五世的统治下，正是堆金积玉、笙歌旦旦和大兴土木的全盛时期。那种宴安逸乐和纸醉金迷的社会生活使他大发横财。他用赚来的钱在伦敦德里等地购置了大量产业。1768年他又购买了1000英亩农田，随即冠之以“新公园”的雅号，并在上面建立起自己亲手设计的别墅。他与附近的一位建筑师的女儿结了婚，生了8个孩子，但只有一个儿子长大成人。

那个儿子名叫塞缪尔·卢·蒙哥马利，曾就学于伦敦德里的佛伊尔学院

和都柏林的三一学院。

20岁时，他在爱尔兰基督教堂奉授圣职，被委任为教会执事。45岁时，成为莫维尔教区——“新公园”所在地的教区的教区长。他把“新公园”的房舍用作修道院，对宗教的信仰一心一意，如痴如醉。在其父去世的当年，他娶了莫维尔前任牧师的遗孀、38岁的麦克伦·苏珊为妻。他们共生了6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出生时，苏珊已53岁。为了修缮“新公园”的建筑，他把伦敦德里的产业卖得一干二净。到1832年他逝世时，他留给子孙的遗产只有从典押产业中得来。

塞缪尔·卢·蒙哥马利的长子继承了父亲的家产，成为“新公园”的主人。他也受领圣职，成为德里郡巴利纳斯克里恩的教区长，后来被家人称为“蒙哥马利叔叔”。他毫无财政金融方面的才能，一次废约，便损失了1200英镑。

1874年他去世时，负债13000英镑之多。“新公园”的产业已被抵押，抵押的金额，即使再过50年也无法偿还。蒙哥马利叔叔去世后，产业归他的弟弟罗伯特·蒙哥马利（塞缪尔·卢·蒙哥马利的次子）所有。

罗伯特·蒙哥马利是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的祖父，生于1809年。8岁时，他被送往佛伊尔学院就读。那里鞭挞体罚盛行一时，寄宿生与走读生之间打架斗殴司空见惯。好在罗伯特身强力壮，胆量过人，一般不受人欺负。他常常腰挂一支大口径短枪，骑着无鞍之马驰骋于“新公园”的产业之间，到处打猎。

14岁时，他入阿迪斯康军校受训，成绩出类拔萃。1828年5月末，他带着300英镑和他父亲的亲笔信，离开英国到印度任职。初到印度时，他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但他工作孜孜不倦，尽心尽职，深得阿扎穆加总督的赏识。24岁时，他便与阿扎穆加总督18岁的妹妹弗朗西丝·托马森喜结连理。弗朗西丝·托马森羞涩柔顺，厌恶应酬，不幸早逝，死时仅32岁。她死后，罗伯特带着3个孩子返回英国度假。1845年，他与美丽、聪慧的艾伦·兰伯特结婚。随后，他们一同回到印度。

1849年，罗伯特担任旁遮普省会拉合尔的都督。

罗伯特·蒙哥马利负责司法、警政、道路、财务、教育等事务。他勇如雄狮，静如羔羊，从不迫名逐利。印度发生起义时，他沉着机智，很快就解除了英军印度兵团的武装，使德里安然无恙。此项殖民成绩受到英国国会的高度赞扬，后来他被提升为旁遮普省的副省长，并一直任职到1865年他以爵士身份返回英国为止。罗伯特·蒙哥马利的第二次婚姻给他增添了4个儿子。长子阿瑟在20岁时不幸夭折，于是父母亲的荣耀都落在了他的次子亨利·赫钦森·蒙哥马利身上。

亨利·赫钦森·蒙哥马利便是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的父亲，1847年10月3日生于印度。8岁时，他被送到伦敦就读，先入幼年神学院，后入哈罗学校，17岁时才与其父重逢。在哈罗学校时，亨利的身高已超过一米八，他非常喜欢体育活动，在田径、足球、板球等运动中生龙活虎，出类拔萃。他认为这些运动是最有价值的成年准备活动。他说：“我从竞赛中得到的学问，并不比从其它任何活动中所学到的少。它们是人生中真正的教育，有助于培养一个人的品格，锻炼他在困境中奋斗，在逆境中坚忍，对自己的脾气加以控制，磨练个人能在一个共同目标下活动而不自私。”

1866年，亨利成为进入剑桥大学的蒙哥马利家族的第一人。在剑桥大学

期间，他曾获伦理学二等奖。

1869 年他离开剑桥大学，准备出任圣职。1871 年，在伦敦法学院院长沃恩博士的安排下，亨利到萨塞克斯的赫斯特皮尔角教区任副牧师。两年半后，他被派往伦敦有名的贫民区——黑僧路的基督教堂担任副牧师。罗伯特爵士感到，儿子未来会非常艰苦，于是便给了亨利 150 英镑，让他随兴所至，到处旅游。亨利利用这笔钱和其教父留给他的 100 英镑启程前往埃及、巴勒斯坦、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各国、土耳其等《圣经》发祥地旅游。四个月后归来时，囊中仅剩 10 先令。后来，亨利的旅游日记《东方四月游》出版，深受读者欢迎，流传数年，经久不衰。

亨利到黑僧路教堂后，立即投入新的工作：安慰 7000 名教友的心灵，禁酒，教学，作讲演，进行游泳训练……尽管工作烦琐沉重，但亨利从不叫苦，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1876 年，在沃恩博士的推荐下，亨利来到威斯敏斯特圣玛格丽特修道院，担任新任院长弗雷德里克·威廉·法勒的副牧师。

法勒 1831 年出生于孟买教会的一个副牧师家庭。他天资过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在神学上反正统，在教育上是十足的理想主义者。由于天资聪颖，法勒早年就锋芒毕露，在学业和运动中崭露头角。在伦敦大学入学考试中，他名列榜首，荣获学院古典文学奖学金、神学奖学金和伦敦大学奖学金，成为靠奖学金和奖金维持学业的完全自给的学生。他在伦敦大学、三一学院和剑桥大学所得的奖不计其数，并在 1856 年被选为三一学院的研究生，但他已于 1854 年离开学院去从事教学工作。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尤其喜欢文学。1858 年，他出版的长篇小说《埃里克》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小说，在他生前就再版 36 次，并被译成各种文字。后来，他又于 1859 年出版了《朱利安霍姆》，于 1862 年出版了《圣威尼弗雷德》。1860 年他发表论文《论语言的起源》，奠定了他作为语言学专家的地位，使他成为皇家学会会员。他在 1874 年出版的《基督传》成为读者喜爱的畅销书，在他生前就再版了 29 次。法勒一生出版的著述多达 75 种，包括古典文学、教育、哲学、神学、地形学、诗集、社会问题和传记等。

虽然法勒集作家、诗人、学者和教育家于一身，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名人，但他的仕途却坎坷不平，极为不顺。他渴望改革，以满腔的热情对英国学校教育和教会进行整顿，结果遭到英国社会和教育机构的纷纷抨击和反对。尽管法勒持有当时英国教师可能应有的最佳文件和推荐信，但到他当上校长，已是任教 16 年后的事情了。1871 年，莫尔伯勒学校突然流行猩红热，一时人心慌慌，学生纷纷退学。法勒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地接任校长职务。5 年后，他使这所学校成为英国首屈一指的学府。法勒于 1863 年领受圣职，但到 1876 年才被调往威斯敏斯特圣玛格丽特修道院任院长兼牧师会会员，并一直在那里任职达 20 年之久。当首相罗锡伯利爵士于 1895 年最终提名法勒为坎特伯雷主教时，他已年近 65 岁。那时，许多远不如他的人都已高居主教之职，许多仰慕他的人都觉得他早就该升到主教位置了。

尽管法勒牧师在布道和著述方面名声卓著，但对一般的牧师工作并不熟悉，尤其是在教区帐目管理方面，更是一塌糊涂，只好求助于妻子和副牧师们。亨利是个实干家，对教区的事务了如指掌，干起事来又总是一板一眼，实实在在，于是成为法勒院长的得力助手，深受法勒夫妇的青睐，并在后来以爱女相许。

法勒院长的寓所是勃朗宁、霍尔曼·亨特、汤姆·休斯、路易斯·卡罗尔等文学界、艺术界、宗教界和科学界的名人雅士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是亨利这样的年轻副牧师渴望的去处。法勒太太羞怯、温柔、善体人意。法勒的5个女儿天真无邪，活泼可爱。法勒本人热情好客。这使得法勒家中总是充满亲切友好的和谐气氛。亨利每天布道、演讲、写作，劳累一天之后，自然渴望在轻松的环境中消除疲劳。因此，亨利也就成了法勒家的常客。

随着交往的增多，亨利·蒙哥马利渐渐对法勒的三女儿莫德心生爱慕之情。亨利成为圣玛格丽特修道院的副牧师时，莫德只有12岁。他们开始恋爱时，莫德才14岁，而亨利已31岁。亨利个子高挑，头发卷曲，眼睛深蓝，富有幽默感，其父罗伯特·蒙哥马利又是曾驻印度的高级官员。在情窦初开的莫德看来，这正是她要寻觅的白马王子。

由于对亨利颇有好感，法勒夫妇不仅不反对亨利的追求，反而立刻允许他们订婚。但是，他们不许莫德戴订婚戒指，要求她保守秘密，即使对自己的姐妹也不例外。威斯敏斯特的院长斯坦利（亨利曾作他的秘书）也同意亨利与莫德的婚事，而且坚持两年后要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亲自为他们主持婚礼。

1879年，也就是亨利订婚的当年，他被派往伦敦郊区甘宁屯圣马克教堂任教区牧师，这是伦敦南面最重要的职位之一。当斯坦利听到这个消息时，他黯然泪下，肯求亨利不要离去，并许诺以后在宫廷替亨利安排一个光明的前途。但是，亨利还是去了圣马克教堂。一到任，亨利便按自己的“科学”方法开展工作。他把整个教区划分为3个分区，由3个副牧师分别负责，每周举行一次早餐协调会议，讨论全周的访问、礼拜、授课等各项工作。此外，他还同居民和学生直接通信，以沟通思想，交流看法，周日礼拜后，他举行“礼拜后的聚会”，对那些犹豫不决持观望态度的人们做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决心归主。在他的努力下，教区会众大增，周日礼拜通常超过1000人。

1881年7月28日，莫德满16岁，她和亨利的婚礼终于在威斯敏斯特第七教堂举行。结婚仪式由德高望重的大主教泰德主持，因为斯坦利院长在他们举行婚礼前一周不幸去世。

莫德天真活泼，长着一头瀑布般的黑发，高高的额头，挺秀的下颌，一双脉脉含情的大眼睛，是个迷人的美人儿。在订婚期间，她每周只能与亨利见两次面。她一从学校毕业，就迫不及待地同亨利结成伉俪。在蜜月期间，他们周游剑桥、约克郡、爱丁堡、格拉斯哥和爱尔兰等地，尽情地享受新婚的幸福与欢乐。

在肯宁顿，亨利成天忙于教务，他16岁的妻子也与他一样，孜孜不倦、全心全意地参与教区的事务。尽管很忙，但他们还是不让工作妨碍他们的天伦之乐。孩子们一日三餐都和父母同吃，亨利在书房工作时允许孩子们绕膝戏耍。每周六晚上，亨利夫妇都带孩子到康沃尔花园第七号，与罗伯特爵士夫妇共进晚餐。每周日晚上则在院长府邪与法勒共进晚餐。夏天，亨利夫妇带着孩子到爱尔兰“新公园”去度假，亨利在令人陶醉的群山间放松神经，恢复体力，孩子们却在那里学会喜爱爱尔兰老家。

从表面上看，亨利与莫德的婚姻是一帆风顺、美满幸福的，实际上，对莫德来说，他们的婚姻是没有多少欢乐可言的。当莫德结婚时，她正处在孩童嬉戏和在花园里捉迷藏的年龄，而婚后她则不得不过早地告别欢乐的青春，接受种种为人之妻的限制。刚到爱尔兰“新公园”时，她便觉得公婆家

的生活刻板拘谨，索然无味：每天全家两次团聚祷告，每晚婆婆庄重严肃地送新娘上床，然后丈夫才能跟着进去。一举一动，都有清规戒律，弄得她无所适从。在肯宁顿时，亨利每天早出晚归，她一人在家无所事事、冷冷清清、孤单寂寞，常常坐在客厅独自垂泪。

1882 年莫德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西比尔后，便不再感到清闲和寂寞。随后，她于 1883 年生下了哈罗德，1886 年生下了唐纳德，1887 年生下了伯纳德，1889 年生下了尤娜，到 24 岁时，她已成为 5 个孩子的母亲。此外，她还要照顾远房表亲的 3 个孩子，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在印度。莫德一面参与教区的工作，一面照顾 8 个孩子，确实使她忙得不可开交。为了使自己有时间去负起教区或教会的职责，她只好在家订下明确的家规，要求孩子们严格遵守，一有违反，立即惩罚。结果使孩子们对母亲畏之如虎。亨利对年轻妻子的日益专横，似乎也抱着基督的宽恕精神，逆来顺受，听之任之。

1889 年春，坎特伯雷大主教通过法勒院长邀请亨利担任塔斯马尼亚的主教。亨利·蒙哥马利当时 41 岁，已继承了爱尔兰的蒙哥马利产业，但他根本不是个有钱人。尽管当时他根本不知道塔斯马尼亚在什么地方，但还是立刻表示接受主教的职位，因为主教的职位可以使他有较丰厚的收入。

1889 年 5 月 1 日，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正式举行授职仪式，任命亨利·蒙哥马利为主教。亨利全家——新主教、妻子和 5 个孩子，经过 7 周的海上颠簸之后，终于在 10 月 23 日到达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当时，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还不到两岁。

到塔斯马尼亚后，莫德在那里建了一间教室，把孩子们的教育完全交给从英国请来的家庭教师，她要孩子们负责教室的清洁和保暖，所以孩子们不得不在课余去砍木柴。后来，莫德又进一步订下一条家规：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家里所有的人每天下午必须走出户外两小时，以使她不受任何声音的骚扰，安静地休息。主教可以留在屋内，但也只能呆在书房里。久而久之，莫德养成了一种习惯，无论对人对事，她都渴望加以组织和控制，她像男人一样威风凛凛，发号施令，稍有不合意之处，就鞭棍相加。

到塔斯马尼亚不久，西比尔不幸夭折。5 年之后，莫德在塔斯马尼亚生下第 6 个孩子，后来又生下第 7 和第 8 个孩子。1901 年底从塔斯马尼亚回到伦敦后，她又生下最后一个孩子布赖恩。在莫德所生的 9 个孩子中，有 7 个孩子长大成人，6 个移民异邦。

莫德除对孩子严加管教外，她还独揽家中财政大权，每周只给主教 10 先令，这还包括主教每天到图书室的午餐费用，如果主教在周末前客气地向她多要一两个先令，便会被她严加盘问。那么，亨利主教怎么会让年轻的妻子掌管一切呢？非常可能的是，他无法干预，因为他每年约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离开管辖区中心，身穿灯草粗布衣裳，脚登平钉靴，头戴宽边拓荒帽，蓄一把又大又灰的胡须，在塔斯马尼亚山区和荒僻的地方长途跋涉，去访问每个遥远的山区，另一种可能是，主教专心致志于宗教，已逐渐变成一个埋头于事业的超凡入圣的人，对于家庭琐事不屑一顾。

莫德那些奇特的管理方法虽然使母子间缺乏亲切感，使家庭生活毫无乐趣，但也确实起到了某些好的作用。她的孩子都学会了说实话而不顾后果，每个人都循规蹈矩，没有任何一个做出使她蒙羞的事情。家中没有飞短流长，闲言碎语，从没有人上过法庭或进过监狱，也从没有人诉诸法院要求离婚。

在塔斯马尼亚，亨利·蒙哥马利主教对自己的工作专心致志，对教友坦

诚忠实，深受人们的好评，所到之处颇受人敬重，不管男女都对他非常信任。1901 年他根据自己在澳洲土著、矿工、拓荒者和移民等人群中传道的经验，撰写了一份有关负责海外布道社团的部长所需素质和资格的报告，送往伦敦。当时，这个部长的职位虚悬未久。出乎意料的是，两位大主教和伦敦、曼彻斯特、纽卡斯尔等地的名主教联名致电亨利·蒙哥马利主教，问他是否愿意担任这个部长职务。起初，他想拒绝，因为他觉得这个职务有损于主教的尊严，而且案牍工作过于刻板，与他自己喜欢经常遨游荒野、在四方传道的个性相违。但是，他已 54 岁，再长此下去，可能体力难以胜任。经过一番函电往返，他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职位。1901 年 11 月，蒙哥马利一家离开墨尔本，途经苏伊士运河，于 1902 年春抵达普利茅斯。新的部长职位并不是什么进身之阶，亨利·蒙哥马利在这个职位上也没有显露出什么锋芒。1921 年，亨利从海外布道社团部长的职位上退休，时年 74 岁，后来他瘫痪在床，由莫德亲自照料。1932 年，亨利·蒙哥马利与世长辞，终年 85 岁。

对于母亲的家规和专制，哈罗德、唐纳德和尤娜都颇为顺从，没有给母亲添什么麻烦。可怕纳德却是反叛者，专门和母亲对着干。与母亲的争执，每次总是母亲获胜。每当伯纳德做错了事，要挨母亲的鞭子时，他便躺在花园的草丛中呻吟：“我是怎么搞的？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当他母亲看不见他时，便对其他孩子说：“去看看伯纳德在做什么，叫他不要做了。”

母亲的责骂和鞭打并没有吓住身材瘦小的伯纳德，反而使他变着法子同母亲作对。例如，当母亲在聚会中叫孩子们保持肃静，以宣布下一步的指示时，伯纳德头戴红色野战帽，竟然高声吆喝：“猪市的猪儿们别讲话，让老母猪先讲……”

自然，伯纳德被拖出去挨了一顿棍子。伯纳德的整个童年生活都是在自由和鞭子的夹缝中挣扎着度过的，吃尽了苦头。他欺负其他孩子，而自己也挨打；他学了一点澳洲口音，便被罚站在家人面前改正，直到莫德满意为止；他把别人送给他的一辆自行车卖掉，而用卖车的钱去购买邮票集邮，结果他的零用钱被母亲停发，直到他把钱全部还清、买回车子为止；他在屋内挥刀追逐一个女孩，被母亲一顿痛打……伯纳德对自己做的错事从不撒谎，甘愿受罚。惩罚之后，他仍然我行我素，不思改悔。他的哥哥唐纳德说：“伯纳德是家中的败类，天性顽劣，只顾自己，目中无人。”9 岁时，伯纳德拍了一张照片，他站在那里，歪戴着帽子，双手举起，握着拳头，作殴斗状。伯纳德儿时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在塔斯马尼亚，伯纳德的学习成绩使亨利主教夫妇非常难过。在英文作文方面，他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在神学方面，他的论文“十分差劲”；在数学方面，尽管稍有进步，但绝对赶不上其他同学；在拉丁文、法文、科学和艺术方面，成绩都在“尚可”以下。尤其使他的父母难堪的是，他曾在神学课中因散布歪诗而挨过校长的棍子。

大儿子哈罗德认为自己在英国前途暗淡，不会有大的作为，如果投入陆军，到海外服役，也许还有发展的机会。亨利主教也认为，哈罗德对社会不关心，个性独特，体壮如牛，骑术精湛，如果他加入陆军，到南非去发展，可能还有较大的希望。于是，主教给岳父法勒院长和父亲罗伯特·蒙哥马利写信，希望他们能助哈罗德一臂之力。结果，当主教一家在普利茅斯上岸时，哈罗德便被委任为陆军军官。哈罗德一上任，就随军出发，去参加已接近尾声的南非战争。随后便终生定居非洲。

亨利主教一家回到英国后，主教便把唐纳德和伯纳德送到离家不远的圣保罗学校就读。7月间，第一学期结束，唐纳德在圣保罗的功课突飞猛进，通过考试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免除了父母对其学费的负担。伯纳德也参加了奖学金考试，但却名落孙山。

1902年1月，伯纳德在上圣保罗学校的第一天便自己作主，选择了“陆军”班。当晚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父母，父母并未衷心接受。亨利希望自己的儿子当牧师，一听说他想当军人，不免大失所望。于是问他为什么想参加陆军，他无言以对，或许是受长兄哈罗德的投笔从戎的影响，或许是他觉得陆军班功课不会太紧。总之，他下定决心以后，便拒绝更改。主教明智地接受了他的选择，认为这是天意，便不再说什么了。可是，莫德却不那么容易让步，于是母子间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结果，伯纳德平生第一次赢得了胜利。

伯纳德当时14岁，凭他对付功课的本事，完全可以悠哉游哉地在学校里混过去。他体格强健，善于游泳，但对圣保罗学校新兴的板球和橄榄球运动却一无所知。入学后，他猛攻体育运动。第一年，他当上了学校游泳队队员。3年内，他便当上了第15橄榄球队和第11板球队的队长。他虽然身材瘦小，但却目光敏锐，具有一种天赋的竞赛和领导才能。他在家沉默不语，落落寡欢，但在学校里却生龙活虎，海阔天空，任意舒展。在球场上，他对对手凶狠毒辣，冷酷无情，充满野性，被人称为“猴子”。

1906年11月，圣保罗学校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我们不平凡的历史专栏一号：“猴子”》，对他在球场上的表现作了如下的描写：

“这头机灵的动物，穿着球衣，以橄榄球场和其它这种可去的地方为家。它剽悍凶狠，精力无穷，邻近的动物见之害怕，因为它会把它们的头发拔掉。这叫做‘擒抱’。经常可以看到它同它的一伙，一阵短跑，用一股动物的蛮劲，把一只椰子扔来扔去。它对异族决不留情，踩踏它们的脑袋，拧着它们的脖子，并且用许多难以想象的手段对付它们，目的无非是要证明它那颗爱国之心。

要猎取这头动物，是很危险的。它疯狂地直向你冲来，从不稍停，手里抱着椰子，由一个伙伴陪伴着。正当倒霉的运动员想干一家伙时，椰子却被传给它的伙伴了。这位扑空的好猎手还未弄清情况时，这两头动物早已过去了。

因此，大家还是不要猎取这头猴子为好。即便逮住了，也不见得好吃，它以食炸面饼圈为生。如果决心不听这个忠告，猎人最好先把自己的头皮剥掉，免得被做成肉卷。”

在人生的道路上，伯纳德平生第一次领略了什么是领导，什么是权威，并且不失时机地抓住它们，加以应用。他一次又一次地计划和组织自己的战役，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胜利。

伯纳德在运动场上叱咤风云，但在学习成绩上却令父母伤心。

1903年，他在拉丁文、物理、化学等科目方面有所进步，老师的评语是“尚可”；在神学和英文方面，老师的评语是“优异”。但秋季来临，一场大病又把这些乐观的希望变成泡影。此后，伯纳德的学习成绩便每况愈下，不可收拾。到1905年秋升到陆军班时，他通常得到的评语是“庸劣”，虽然他也能写情感丰富的文章，但毫无风格。

1906年7月，伯纳德面临家庭和学校之外的第一次考验。要想作一名陆军军官，就必须进桑德赫斯特英国皇家军事学院，而要进桑德赫斯特皇家军

事学院，又必须首先经过考试。从学术上讲，这种考试不算难，但却需要一些基本知识，而这些基本知识不是在板球场和足球场上可以学到的。当时，伯纳德已是 18 岁半，校方对他的评语是：“从年纪看，该生是个落伍者。如果他想上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就必须努力加油才行。”毫无疑问，当这份报告送到他父母手中时，一定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份报告也使伯纳德受到很大震动，使他认识到他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必须潜心学习才行。从此他便刻苦用功，奋力追赶。尽管如此，到 1906 年冬，学校给他的期中成绩报告单仍然难以使人高兴。化学：在掌握和使用原则方面，反应迟钝；数学：智力贫弱；法文：平庸。当然，这份成绩单对他已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 1906 年秋，伯纳德已参加了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在被录取的 177 名考生中，他排在第 72 位。正是：年纪虽小志气高，与母抗争不求饶；运动场上显身手，成绩庸劣进军校。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二章 从军校到郡团

各科成绩不一般，伤人险些前途完；
悔过自新苦用功，印度服役整四年。

1907年1月30日，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进入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位于英格兰伯克郡、建于1799年，旨在训练、培养英国陆军正规军官。学员从英国陆军以及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中学毕业生中选出，他们入学前须经过一项全面的入学考试。

那种考试虽然不需要很高的学术水平，但也并非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两次报考桑德赫斯特军校，但两次都名落孙山。他父母只好采取断然措施，把他送入詹姆士上尉主办的“家禽”补习学校。该校能准确了解军校可能对考生提出的所有问题，专门帮助那些才疏学浅的青年人能够凑凑合合地考取军校。“第三次报考时，丘吉尔终于如愿以偿，但考试成绩还是只够进入骑兵学科。

与丘吉尔相比，蒙哥马利却幸运得多。他第一次报考，便被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录取，并且在被录取的7名新生中名列第72。

在那个时候，英国陆军并不吸引全国出类拔革的学生。陆军生活开支相当大，靠个人薪水根本无法维持生活。一般认为，即使在不大讲时髦的郡团里，一个士兵每年至少需要100英镑才能维持生计。在骑兵和较新式的步兵团中，要求一个士兵在被接受之前得有300—400英镑的收入。但蒙哥马利在把军事作为自己事业的方向时，却对此一无所知。

一般说来，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伊顿、哈罗、切尔滕纳姆、惠灵顿、克利夫顿、贝德福德这样一些很有名望的学校，并且大多是陆军军官的子弟，只有一小部分来自牧师、律师和医生家庭。他们身穿鲜红色紧身短上衣和红条滚边紧身裤，头戴帆布防护帽，脚登长统靴，腰扎白色皮腰带，手戴白手套，看起来十分英俊和威武。他们的课程包括军事工程、地形学、管理、法律、战术、外语、数学、体操、骑术、击剑和操练。学校管理严格，生活艰苦，但仍有打架斗殴、酗酒和恶作剧等现象出现。

当伯纳德·蒙哥马利从一所毫无名气的学校走进这样一个特殊的军校时，他已19岁。他身高1米70，体重63公斤，胸围86厘米，完全符合要求。平民子弟在桑德赫斯特军校的学费每年为150英镑，这包括食宿和一切必要的花费，但不包括零用钱。莫德除了负担150英镑的学费外，每周还给伯纳德·蒙哥马利9先令零用钱。与给亨利主教的零用钱比起来，莫德似乎是够慷慨的了。但与其他同学相比，蒙哥马利却显得格外寒酸。蒙哥马利后来回忆说：“我很怀疑跟我一样穷的同学会有几个……外界的一切引诱，我都因囊中羞涩而不敢问津，我只好埋头于体育运动和学习。”

最初，蒙哥马利的热情和干劲简直是立竿见影——6个星期后，他便被提升为一等兵。这是一种很大的荣誉。经这样选拔出来的学生被公认为是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到第二学期时，一般都成为佩戴红肩章的中士，其中有1—2人则成为佩带军剑的掌旗军士。掌旗军士是学生的最高军阶。

蒙哥马利开始玩他从未玩过的曲棍球，被人称为“天才”。不久，他又被选入第15橄榄球队（校队）。

1907年12月，第15橄榄球队与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橄榄球队交锋，

结果大获全胜。

第一学期，蒙哥马利主要学习军事行政管理、法律、历史、地理、战术、工程、地形、印度文、射击、体操和操练。等课目。虽然他并没有十分用功，但学习成绩却令人满意。在期末考试中，他名列第 87，校长的评语是“成绩优异”。暑假期间他回爱尔兰的“新公园”与家人团聚。9 月份开学后，如果他运气好的话，那可能是他的最后一个学期了。事实上，蒙哥马利可以说是福星高照，一路顺风。

11 月初，有消息传来说，他所选择的皇家沃里克郡团刚好有个少尉空缺，他已被提名为递补，这使他兴奋不已。据说，他挑选这个团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该团有一个吸引人的帽徽，这是他所向往的；二是该团不仅是个历史悠久、战绩辉煌的英国郡团，而且该团有一个营驻扎印度，而在该营服役的军官都有一种特殊津贴，足以使他自食其力。

蒙哥马利只要在第二学期保持优异的成绩，便能如愿以偿。谁知在那学期快结束时，突然枝节横生，祸起萧墙。

在桑德赫斯特军校，蒙哥马利所在的连队是低年级 B 连，其中有一群相当强悍而暴躁的人。作为一等兵，蒙哥马利负责领导他们。但他们经常和住在楼上的低年级 A 连发生冲突。天黑以后，他们用拨火棍或类似的武器在走廊里激战，一直打到其他连队居住的地方，结果是不少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不得不去医院治疗。因此，他们连被大家称为“好斗的 B 连”。

在 12 月期终考试前，蒙哥马利对一个不受欢迎的同学恶作剧时，事情闹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当那位同学正要换穿蓝色礼服时，蒙哥马利一伙人闯入他的卧室，趁他身上只有衬衣内裤时，将他的手脚捉住，蒙哥马利擦燃一根火柴，点着他的衬衣下摆。不料这一恶作剧的后果十分严重，那位同学的臀部被严重烧伤，并被立即送往医院，有一段时间简直连坐都不能坐。受伤的同学表现得非常大度，拒绝说出烧他的人是谁。但人多嘴杂，这种事根本无法保密。

学生们于 1907 年 12 月 18 日返家度假。军校勒令学生退学是常有的事情。蒙哥马利的过错较一般违纪现象更为严重，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也许蒙哥马利当时并不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但他的母亲却比他敏感得多，先是与校长电话联系，随后又亲自到桑德赫斯特拜见校长。在与校长的交谈中，她得知学院曾打算让蒙哥马利担任 B 连的下一届掌旗军士，但现在一切都完了。莫德为儿子求情的事进行得很顺利，校长同意不公开宣扬蒙哥马利的恶作剧，以维护主教的名誉和不影响蒙哥马利的前途。

1908 年 1 月，学院贴出公告，宣布 50 名学生受罚，但蒙哥马利榜上无名，只是有一段文字说，一等兵蒙哥马利被降为普通学生级别，降级的具体理由未加说明。上学期蒙哥马利的考试成绩名列第 74，但他的表现仅得“良好”。在学校的档案和呈报陆军部的资料中，并未提及他烧伤人的事情。

1907 年 12 月，学院从他们那批学生中挑选一部分人毕业，蒙哥马利名落孙山，只得再留校学习 6 个月。这对他震动很大，决心在这 6 个月中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痛下苦功，争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由于蒙哥马利的经济状况和多少有些古怪的性格，他要刻苦用功的决心比别的人更易于付诸行动。每个月两英镑的零用钱，使蒙哥马利不可能经常参加学院里那些丰富多采的社交活动。晚餐、舞会、去伦敦旅行，这些对他来说，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他的气质已明显地表现出禁欲主义色彩。

他不抽烟，不喝酒，风流韵事更是与他无缘。对蒙哥马利来说，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个，那就是成功和成功带来的权力。

在桑德赫斯特军校时的经济上的窘境，对蒙哥马利来说，真可谓是刻骨铭心。50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那些日子里，手表刚开始出现，学院小卖部就有手表出售；大多数同学都有手表，我经常对那些手表投以羡慕的眼光。但那些手表不是为我准备的，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才有了一块手表。”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必然会对他的心理和职业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在毕业前夕，他一改过去的志愿而报名参加印度军队。他这样做可能出于两种动机：一是想永远脱离莫德的精神和心理枷锁；二是想在经济上永远独立，因为印度军队里的薪水高，靠自己的薪津也能维持生活。由于经济的原因，参加印度军队的竞争十分激烈。只有成绩在前30名的人才能获得机会。

35名以后的人要想参加印度军队，那是没门的事。

实际上，在那年夏季毕业的学生中，有36名军校学生要被派往印度陆军，蒙哥马利经过刻苦努力，进步很大，成绩刚好排在第36名。但是，另有8名学生却是指定的。尽管他们的成绩不如蒙哥马利，但他们都是来自印度陆军军官家庭，不管他们的成绩如何，都有参加印度陆军的权利。于是，蒙哥马利的希望落空了。

对于那些经常打蒙哥马利的小报告的人来说，对此却幸灾乐祸。他们讨厌蒙哥马利那种傲慢和刚愎自用的态度，讨厌他完全缺乏桑德赫斯特的修养和社交风度。一位军官以直率的语言对他说：“你这个人毫无用处，你在英国陆军中将毫无作为。”当然，他这样说完全是出于意气用事而不是出于他的预见能力。但蒙哥马利却对此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据我个人所知，当时成为全连之冠的学生，后来一个也没有晋升到陆军最高军阶。也许他们发展太快，终于失败了。”

参加印度陆军的希望落空之后，蒙哥马利还是选择了皇家沃里克郡团。1908年9月19日，蒙哥马利被分到皇家沃里克郡团，同批加入该团的还有3名高年级学生。

然而，蒙哥马利远不是一个典型的士兵。在沃里克郡团军官食堂见到他多少会令人感到诧异。在当时，很难说什么样的职业会更适合他这种性格的年轻人，或许殖民地警察部队会更好些。与沃里克郡团的大多数同事不一样，他缺乏修养，在军界没有关系，不怎么会骑马，对上级也只是偶尔表示尊敬，对社交不感兴趣，缺乏年轻人应有的朝气，与人争论时常常翻脸。在军官食堂里，大家不谈论军事，他感到迷惑不解。不管怎么说，他没有别的兴趣和爱好，选择军事这个职业后，他以全副身心投入进去。沃里克郡团第1营驻防印度，为了争得去印度服役的机会，他专门学了两门印度土著语言。同事们都认为他这个人有点稀奇古怪，让人费解。诚然，他的许多同事精通业务，工作效率高，但就敏锐而言，他们却远不及蒙哥马利。

12月12日，蒙哥马利被派往驻扎在印度西北边疆白沙瓦的第1营。当时他21岁，比大多数新来的尉官的年龄都大。

蒙哥马利对白沙瓦的军官生活是陌生的。当他第一次走进军官食堂的休息室时，已有一位军官在那儿，那位军官马上邀请他喝酒，并按铃叫侍者端来两杯威士忌和两杯苏打水。当时蒙哥马利并不会喝酒，但又不好拒绝，只好平生第一次举起酒杯，第一次品尝酒精的滋味。

军官食堂的早餐和午餐稍随便一些，但晚餐却很讲究。值班员和副值班员面对面分坐在一张长餐桌的两端。桌上摆着刻有团徽的银餐具。所有军官都身着深红色夜礼服。两位值班员得等到所有用餐的军官离开餐桌才能离去。有的老少校有时边聊天边喝红葡萄酒，一直喝到夜深才离去，而两位值班员却只好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傻等。蒙哥马利很不愿意那样干，但又不得不尊重传统，遵守纪律。

沃里克郡团第1营的运输工具是骡车和骡子，因此蒙哥马利被送去学习驾驭骡车及其有关知识。学习结束时，要通过外来考官主持的口试。据说那是位骡子专家，对骡子的习性了如指掌。考试开始时，那位考官用充满血丝的眼睛注视着蒙哥马利，问道：“骡子每昼夜大便几次？”

这个问题完全出乎蒙哥马利的意料之外，接着便是一阵尴尬的沉默。在绝望中，蒙哥马利飞快地开动脑筋：是不是上午3次，下午3次？晚上也许只有小便而没有大便？

只听见考官又问：“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6次。”

“不对，第一题不及格，零分。”

“那么，正确的答案是几次呢？”

“8次。”

“先生，我看6次8次没有多大关系。”

“不准无礼！第二个问题。”

尽管第一题得了零分，蒙哥马利还是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蒙哥马利认为，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精通他的本行业务。为了能使用和管理营里的运输工具，他把野战勤务条令背得滚瓜烂熟，对有关骡马的知识也作了深入的了解。为了同印度士兵沟通联系，他刻苦学习印度的乌尔都语和普什土语。蒙哥马利对成功的追求，终于使他在同僚中崭露头角：

1910年4月1日，他被晋升为中尉。

蒙哥马利特别喜欢运动，曲棍球、板球、边疆探险、打猎、赛马，样样他都参加，并且表现不俗。使大家吃惊的是，他竟然买了一匹印度骑兵团的战马，骑着它打猎和参加越野赛马。

蒙哥马利只花了100卢比（当时合8英镑）买来的马并不是纯种马，它在印度骑兵团主要是驮行李，没有受过理想的训练，不能作赛马。然而，蒙哥马利却一门心思地训练它，哪怕最初付出了最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在一次赛马中，当其它的马冲出去时，蒙哥马利却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要是换了别人，早就满脸羞愧地退出比赛。但蒙哥马利却不，他再次纵身上马，向前追去。使他自己，也使观众吃惊的是，他的马竟然很快就领先了！他使劲踢马，把脚蹬子都踢掉了。他把对手远远抛在后面，飞身驰过终点。正当他被宣布为胜利者时，他又从马上掉了下来。

一般人认为，蒙哥马利对自己的职责大认真了，但对那些不大愿意管事的人来说，他倒是一个很有用的人。蒙哥马利的干劲和热情大多是因为他想超过别人，想在世人面前证实自己的价值。但是，他窘迫的经济状况并非与此毫无关系。每月的薪水只有9英镑，而他每个月的伙食费就高达11—12英镑，他家里每年只能给他100英镑。在印度陆军中，进骑兵团的首要条件是每年有400英镑的个人收入，因此，蒙哥马利享受同僚那种昂贵消遣活动

的机会就受到了限制。显然，埋头于工作是打发他的空余时间的最好方法。

1910年10月，沃里克郡团第1营移防孟买。孟买的气候炎热、潮湿，使人总觉得困倦、疲乏、浑身无力。那里的训练设施非常有限，一切都让人心灰意懒。但蒙哥马利却仍然精力充沛，反应灵活。营副官托姆斯发现蒙哥马利仍然热心于各种事情，非常高兴，但也发现他个性倔强，争强好胜，喜欢争辩，对上级的指示，也偶尔打些折扣。托姆斯和蒙哥马利加入了皇家孟买快艇俱乐部，共划团里的“羚羊”号快艇，在孟买港参加周六快艇比赛，但没有什么大的建树。蒙哥马利还买了一辆摩托车，成为第1营唯一一个拥有摩托车的人。但当时都时兴自行车，认为骑摩托车有损于绅士的形象。

除许多其他职责以外，蒙哥马利现在还主管营里的体育活动。他率领的足球队实力雄厚，打遍南印度无敌手。

1910年12月14日，德国皇储乘战舰到孟买进行礼节性访问。德国人在港内停留约1周，双方交往频繁。后来德国人提出与营足球队比赛。于是营副官告诉蒙哥马利不要派一流球员上场，因为料定德国人不堪一击。比赛时，营足球队的精英倾巢出动。比赛结果一面倒——营足球队以40：0大败德国人。事后营副官责问蒙哥马利为什么不按指示办，他回答说：“嘿，对付这些混蛋，我可不能掉以轻心！”

1911年11月8日，蒙哥马利搭乘运输舰离开孟买，回英国休假6个月。他已有3年未与家人见面，不知家中有无大的变化。其实，在他离家这几年中，除了他弟弟德斯蒙德因患脑膜炎病故外，并没有多大改变。莫德依然是家中的主宰，主教越来越退缩到书房里，专注于各种典礼仪式的研究。

1912年初，蒙哥马利回到家中，但这位从印度归来的中尉并未被家人视为特别的游子。他一进门，便参加家庭祷告，准用餐，准时休息。他在家中沉默寡言，与他在外边或军营里的表现判若两人。蒙哥马利在《回忆录》中谈到他的母亲时说：“当我还是孩童的时候，她使我畏惧。到我长大了，她已不再行使她的权威，于是畏惧之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尊敬之情。”尽管如此，蒙哥马利在心理上仍然没有摆脱莫德的影响。

1912年5月3日，蒙哥马利回到孟买，返营销假。恰值团里的补给官回家休假1年，于是他被委任为代理补给官。许多资深的军官都想得到那个职位，对他的好运羡慕不已。

同年10月，蒙哥马利报名参加陆军通信专业测验。该测验主要检查军官是否掌握陆军的各种通信手段，要求十分苛刻。蒙哥马利全力以赴，把1912年版的《陆军通信手册》背得滚瓜烂熟，后来在为期5天的有关旗号、灯光信号等通信测验中名列前茅。为了纪念那次通讯测验，他一直把那本《陆军通讯手册》留在身边。

1912年11月6日，蒙哥马利随部队一起离开孟买回国，于圣诞节返抵家园。对于离开印度，他并不感到惋惜，因为孟买那个地方不仅气候令人难以忍受，而且训练设施简陋，使人无法认真地干事情，只好得过且过，敷衍了事，他很不情愿过那样的生活。

1913年1月2日，蒙哥马利被任命为皇家沃里克郡团第1营助理副官，驻防福克斯通附近的肖恩克利夫，在那里他度过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悠闲自在和无牵无挂的时光。就任助理副官后，他到附近的海特射击学校的步兵军官训练班学习。结业时，他的步枪射击优秀，机枪射击良好。那年他成为陆军曲棍球队队员，同时又参加网球运动。他买了一部福特牌汽车，毫无顾忌

地在附近风驰电掣般地兜风。

1913 年 1 月从坎伯利参谋学院毕业的勒佛罗伊上尉来到沃里克郡团第 1 营。蒙哥马利与他一见如故，俩人很快就成为知心朋友，他们常在一起谈论有关陆军的问题，谈论如何真正掌握军事艺术，勒佛罗伊上尉把蒙哥马利对军事问题的空想批驳得体无完肤，告诉他军事领域的知识浩如烟海，无边无涯；如果他想有朝一日在军中青云直上，就应精通战争理论，并从战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他俩常在一起并肩散步，海阔天空，畅谈学问，或者探讨有关陆军的一些问题，或者谈论如何真正掌握军事艺术。到 1914 年 4 月勒佛罗伊上尉从沃里克郡团调往陆军部时，他已在蒙哥马利心中撒下一把雄心勃勃的种子。

1914 年夏季来临了，蒙哥马利一家又像往年一样，计划返回爱尔兰“新公园”团聚。可是，费迪南大公被刺，战争的呼声甚嚣尘上。

1914 年 7 月底，整个英国人心惶惶，害怕一旦战争爆发，德军会在英国海岸登陆。于是，英国陆军部决定采取行动，指示各团随时准备担任东海岸的防御任务。接到指示后，皇家沃里克郡团马上下令所有休假官兵立即归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蒙哥马利同其他所有军官一样，于 1914 年 7 月 29 日下午 6 时回团报到。正是：局势突变起风雷，休假军官奉命归；全团上下忙备战，一切行动听指挥。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三章 初上战场

皇储遇刺战火燃，各为盟国把战宣；
随军渡海抗德去，死里逃生把乡还。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人普林西普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耶瓦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并于28日向它宣战。最初看来，除调解人外，其他欧洲国家不会陷入这场纷争。可是，塞尔维亚的保护国俄国为了对抗奥匈帝国，马上宣布战争总动员。俄国的举动在欧洲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7月31日，德国向俄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停止动员；同时又向法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法国答应在俄德战争中保持中立。俄国和法国对最后通牒置之不理。于是，德国下令陆海军全体总动员，于8月1日对俄宣战，8月3日对法宣战。

驻肖恩克利夫的英军部队为了防止德军入侵，决定用一个营的兵力监视海岸，防守施尔尼斯地段。他们从各团抽调350人，组成一个混成营，驻防施尔尼斯附近的雪壁岛。伯纳德·蒙哥马利被调往该营，升任营副官，负责对1000多名军官下达命令。该营营部驻扎在雪壁岛大教堂，部队分成许多小队，散布全岛，到处岗哨林立，一派战备景象。

1914年8月3日，伯纳德给他的母亲写信说：

“外边的情况，我们很难知道。舰队已经全部动员，完成战备；有许多战舰在离施尔尼斯不远处抛锚。昨日又有4艘巨型巡洋舰在附近停泊，甲板上一派战备气氛。陆军还未接到全体动员的命令，但我们认为动员令随时都会到来。我们现在只完成了戒备阶段，这便是我们在这里驻防的原因。我从今晨的报纸上看到德国对俄宣战的消息，我看，我们被迫参战大概已成定局……战争迟早总是要来的，倒不如让战争现在就来，早点结束了事。现代战争，是不会拖得太长的，但一定残酷可怕。经过这次战争，以后50年大概都不会再有战争了……一般人认为，德国将会被打败，我也同意这种看法。自然，德国若是战败，对我们是再好不过了；德国若真对我们几个国家一齐挑战，它一定难逃厄运。我希望，我们动员起来，厉兵秣马，严阵以待，等法国需要我们时，便可立即参战。法国所需要的主要是我们的舰队，而舰队现在已完成准备，升火待发。”

8月2日，德军进入卢森堡，要求假道比利时，3日夜间侵入比利时。英国由于对比利时的中立承担义务，便在4日晚上11时对德宣战。8月5日，蒙哥马利在雪壁岛给母亲去了一封短信：

“亲爱的母亲：

现在只有一点时间，够写一封短信。陆军已全部动员；明早，一个义勇民兵团将来接替我们的防务，部队直接返回肖恩克利夫去整备。我认为，部队大概要到比利时去参战。至少，部队也可能开到法国北部去。我们现在是属于第4师第10旅，你可从报刊上知道我们的行踪。

1914年8月5日于大教堂”

蒙哥马利的家人相信他的推断是正确的，于是决定立即返回伦敦，希望在他离开之前和他见上一面。可是，形势的发展急转直下。1914年8月6日，驻守雪壁岛的混成营所属部队纷纷返回肖恩克利夫的原属各团建制。返回沃

里克郡团后，蒙哥马利的营副官职务即告终止，于是他又回到连里任排长。7日上午，他将连里的新兵带到靶场练习射击。7日下午，他把车开到福克斯通，寄存在柯林斯夫妇处，打算打完仗回来时再去取。随后，他给母亲寄去一张明信片，请她给他寄一个坚韧耐用的皮包和一把指甲刀，因为他们都不准离开营房。谁知，当天晚上，他们突然接到出发的命令，但却不知道目的地在那里。于是他马上又给母亲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她部队将出发但目的地不详。

8月8日深夜2点半，蒙哥马利所在部队奉命出发。坐了一天火车，下午5时到达目的地。蒙哥马利在给母亲的信中说：

“我不能在信上告诉你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或做什么事，以及有什么行动。这都是不允许的……我也不能告诉你我的地址，但可以从邮戳或我的电报上看出我们部队曾到过的地方。你可将信寄到肖恩克利夫去，在起程去海外前，我们将回那边去取信。”

8月22日凌晨1时，蒙哥马利随营离开哈罗前往南安普顿，登上“卡利多尼亚”号运输舰驶离南安普顿，渡海前往波罗尼。蒙哥马利在舰上给父母各写了一封信。

23日早上，“卡利多尼亚”号驶进波罗尼港，蒙哥马利就在港内将信投寄出去。此后两个星期，蒙哥马利的父母再也没有收到他的信，也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

9月8日，蒙哥马利的父母突然接到英国陆军部发来的电报，电文说：

“蒙哥马利主教：

据报告，沃里克郡团的伯纳德·劳·蒙哥马利中尉现已失踪，本部深感遗憾。不过，这份报告并非表示蒙哥马利已经阵亡或负伤。尔后再有消息，当即电告。”

英国远征军每千人配备两挺机枪，浩浩荡荡攻抵企图包围法军的德军面前。但与德军相比，英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此外，英军既无摩托化运输部队和重炮兵的支援，又无无线电或野战有线电通讯设备。所以，英军的进攻仅仅是象征性的。当英军发现左右两翼的法军都已撤退时，便决定于8月23日开始从蒙斯撤退。这一天，皇家沃里克郡团第1营乘坐的“卡利多尼亚”号运输舰刚刚抵达波罗尼，所以来不及参战。部队上岸后，于当晚11时乘火车离开波罗尼。24日上午10时在勒卡托下车，在那里等待营后续部队。25日凌晨2时，该营从勒卡托火车站向西北行军，经过博蒙特到达圣皮东，准备在那里占领高地，掩护从蒙斯撤退的英军。在掩护了一支向南撤退的英军之后，他们于下午6时遭到敌炮兵的轰击，但无伤亡。7时，部队接到命令：“一俟第18旅通过”，立即撤退。

本来是赤日炎炎的天气，突然间乌云蔽日，雷电交加，大雨滂沱。晚上11时，全营开始向南撤退。部队冒雨行进，于凌晨4时30分抵达奥库尔村，累得疲惫不堪，就在一片玉米地里露营。

英军空中侦察发现，德军有几个师的步兵和骑兵正在向勒卡托前线集结。但这一情况似乎并未通报军部、师部或骑兵部队。英军原定于26日上午7时继续撤退，担任掩护的部队本应占领一处后卫阵地，用以阻击敌人，但第4师却没有这样做。骑兵师师长阿伦比催促军长史密斯·多里恩将军在日

出前将各师撤走，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兵力去夺占各高地。但史密斯·多里恩军长认为，部队人困马乏，且散布过广，要在上午9时前撤走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心暂时在原地固守，待对敌实施猛烈阻击后，再继续后撤。

但这纯粹是痴人作梦，因为英军当时的状况是：部队疲惫不堪，聊无斗志；工事不完整，部署凌乱；缺乏骑兵部队执行搜索任务，第4师没有重炮支援；甚至旅运输部队也陷于混乱状态，致使部队既无粮食，又无弹药。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敌发动猛攻，是完全不可能的。史密斯·多里恩军长于8月26日凌晨3时30分将其决心呈报英国远征军指挥官约翰·弗伦厅爵士。约翰爵士十分惊讶。他的副参谋长在电话中对史密斯·多里恩将军说：“你如在原地作困兽斗，色当之战将会重演。”史密斯·多里恩军长回答说：“现在已骑虎难下，无法脱身，因为战斗已经开始，炮火的声音已经传到我这里来了。”

此时已是清晨6时。德军早在45分钟之前便对第4师发动了进攻。第4师共15000人，防守正面宽5英里，没有粮食，没有弹药，也没有师炮兵和骑兵部队，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第12旅在清晨5时15分便弃守高地，撤退时乱作一团，只好靠皇家沃里克郡团所在的第10旅来收拾残局。

沃里克郡团第1营迅速梯次展开，第一梯队两个连，占领前沿地形；第二梯队两个连部署在数百码以外的后方。蒙哥马利所在连担任第一梯队。营长埃尔金顿中校骑着马飞也似的奔向第一梯队，大声命令部队立即向高地前坡上的敌人发动进攻。第一梯队的两个连在没有侦察、没有计划、没有火力掩护的情况下，冒着德军密集的枪弹和弹片向高地冲去，士兵就像“保龄球的九个木瓶”一样一排排地倒下。英军前仆后继，英勇无比，终于在上午6时攻占了山顶。德军的炮火对准高地猛轰，英军无法筑壕固守，只好退下高地。

在这次攻击中，蒙哥马利挥舞着指挥刀跑在队伍最前面。不幸的是，他只跑出六步远，便被自己的刀鞘绊倒，指挥刀被摔出老远。等他站起身来，再跟着部队往前冲时，他发现自己排里的大部分士兵已经阵亡。

上午7时30分，在克里斯蒂少校的统率下，第一线的部队再次向高地发起进攻。攻占山顶后，敌军火力太猛，无法固守，便秩序井然地退回发起攻击前的阵地，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坚守阵地。这两次进攻使英军8名军官负伤，约200名士兵伤亡。蒙哥马利所在连的连长受伤，官兵伤亡惨重。后来，蒙哥马利带领第3连的两个士兵，回到山上救回一名伤势很重的上尉。由于没有担架，无法抬他随部队行动，后来只好把他留在村中的神父处。

埃尔金顿中校把前面的两个连队送上屠场后，便独自回到第二梯队。下午3时左右，部队开始撤退，但第一梯队的两个连却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晚上10时左右，他们突然发现四周已无友军，同时发现大队德军正在向他们逼进。第一梯队两个连的残余部队和本旅的脱队散兵，才急忙开始撤退。资深军官普尔少校率领这群残兵败将，依靠指南针辨别方向，希望赶上退却中的英军。

埃尔金顿中校根本就不知道他的第一线连队的命运，他带着后面两个连队退到15英里外的圣昆丁市，在当地市长的要求下，埃尔金顿中校同意当晚向德军投降。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英国陆军部把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列为失踪人员，并通知其家属，完全是正常的。

3天之后，蒙哥马利他们才赶上本师部队。原营长埃尔金顿中校被撤职。

由普尔少校接任营长。蒙哥马利在给他母亲的信中对这次撤退作了如下描述：

“那次行军，我们称之为从‘莫斯科撤退’，是我终生难忘的。我们的位置处于自己部队的背后、德军的前面，有好几次我们都是死里逃生。有时我们不得不躲进树林，以躲避德军骑兵的巡逻。我们缺乏粮食，也无法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我们开始撤退时，大家都已经精疲力竭。到最后赶上部队时，我们那副狼狈样子，你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有许多人落伍离队，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落伍离队的官兵大多被德军俘虏，有些后来归队。你寄来的巧克力，有如奇珍异宝，因为我们没有一点给养，村里也没有食物。村民们早已跑得一千二净。我们的装具已全部烧掉，以便在车上留出空间，给伤兵们坐。我们除了身上穿的，简直是一无所有，我们经过烧装具的地方时，天空乌云低垂，大家士气十分低落。26日退却时，我们分为两队，各有300余人。后来天黑夜暗，两队在不知不觉间失去了联络。28日下午10时，我们赶上本部部队，被编入汽车运输队，29日下午3时抵达贡比涅。路上经过一些风景幽美的森林，全程约90英里。30日上午9时乘火车到达勒芒市，才得到好好的休息。那里远离前线，中午和晚上都上馆子。9月4日，我们在那里洗了最后一次澡……”

9月4日，战场的形势发生变化，德军被迫后退。蒙哥马利所在的营离开勒芒市，开始向德军追击。从9月5日到15日，他们每天都强行军，通常清晨4时出发，下午7—8时休息。他们每天都能看见敌人撤退的痕迹，如人马的尸体和遗弃的仓库等。他们常常在黄昏时刻到达的地点，便是德军当日早上离开的地方。经过几百英里的艰苦追击，他们终于在埃纳追上了德军。

德军在埃纳构筑工事，掘壕防守。英军到达后并未仓促发动进攻，只是抢占地形，构筑工事，准备进攻。两支军队彼此相对，虎视眈眈，但谁也不首先发起进攻，只用炮火轰击对方阵地。9月20日，蒙哥马利写信给他母亲，感谢她寄去的第一个包裹和妹妹给他的薄荷糖，并向她汇报了当时的情况。信中说：

“……我们在这种稀奇古怪的环境中收读来信，在战壕中嚼着薄荷糖，身边却躺着一个死人。到现在为止，我曾有几次险些丧命，但因我运气好，次次逢凶化吉。有两次，我身旁的同伴刚站起来，就被打死，而我却安然无事，他们说，法国的9月天没有三日晴，这几天的天气简直糟透了。现在的天气已开始寒气逼人，如果后方不尽快送些保暖衣物来，大家便要挨冻……昨晚我在战壕里受够了洋罪，整夜大雨下个不停，沟满壕平，尽是雨水，我通夜都要到各哨位巡查，使大家保持警觉。有些哨位远在前方，我只好在泥浆中匍匐爬行，有时几乎迷失方向。德军的前沿战壕离我们不过700来米，一不小心便会被德军的哨兵抓去，可我一直吉星高照，安然无恙。我浑身泥泞，所有衣服里外湿透，但这对我似乎毫无影响，因为过后我并未着凉。我穿着湿透的衣服回来，躺下便睡，什么也不脱。

“……到这时为止，一切都好。现在是下午2时，双方的炮火通常是每天早上5—9时最为猛烈。在最前方战壕里受伤的人，我们不能立即派担架兵去接运，因为白天派人去抢救，大多要挨枪弹。受伤的人只好作一点简单的包扎，躺在战壕里等待天黑。天亮时，我们可以看到德军从战壕里出来，伸着懒腰，揉着眼睛。我们等他们几个人聚到一起时，才开枪射击。有天夜里，德军企图偷袭我们的阵地，但被我们击退，我们真需要老天帮忙，给我们带来些好天气，好将战壕和我们的衣服晒干。除了那些炮火外，其它一切还算不错。今早的天气清爽宜人，可是枪炮一响，天就开始下起雨来。尽管我们的生活艰苦，精神紧张，但大家都心情愉快。部队的伙食不错，每天都有饼、糕、牛肉、火腿、果酱、乳酪等。我们军官的给养与士兵是一样的。

我留了一大把胡须，决定在这场战争结束前不刮胡须，希望你能看见我的模样……我在火线上指挥 250 人（此时蒙哥马利是代理连长），而且德军就在六七百米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少校级军官的责任，我因为运气好，所以这个职务便落在了我头上。我手下有两名军官，但责任是我的，我很高兴负起这种责任……”

从这封长信中可以看出，战场环境虽然艰苦，但蒙哥马利却仍然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而且对自己受到重用感到有些洋洋自得。

德军和英军就这样面对面地僵持在那里，互不相让，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蒙哥马利认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德军牢牢地钉在那里，好让法军迂回到他们背后去打击他们。

1914 年 10 月上旬，英国当局决定，将夹在两支法军中间的英国远征军抽调出来，转向北方，迂回德军翼侧。不幸的是，德军在攻陷安特卫普后，也抽出几个师的兵力对英军实施迂回包抄。结果，英军又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再次陷入苦战。

蒙哥马利所在部队从埃纳阵地移防出来后，搭乘火车转往比利时。随后调转方向，行军两天，再搭乘火车，开往梅特朗参加战斗。10 月 13 日，一位退休上尉从英国调来担任连长，接替指挥，蒙哥马利中止代理连长职务，再次担任排长职务。

伊琅尔的第一场战斗已在前一天打响。这次参战，蒙哥马利充满必胜的信心，因为这次是普尔少校指挥。普尔少校有作战计划，发出的命令也妥当。13 日上午 10 时，蒙哥马利所在营刚到达佛来特尔，便接到报告说，敌军据守着梅特朗前面一带高地。普尔少校将全营的 4 个连完全展开，把敌军赶回梅特朗。德军从高地退守村庄的边缘后，便在房舍、丛林、篱笆和墙壁间挖掘战壕，把泥土弄得到处都是，加之天下着绵绵细雨，雨帘低垂，乌云翻滚，英军根本无法看清敌军在何处。英军没有炮火支援，这便使德军可以毫无顾忌地把教堂塔顶作为观察位置。在那上面，德军对英军的部署和运动情况一览无遗。

尽管普尔少校指挥卓越，但全营在上午 11 时又奉上级指挥官的命令，在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夺取村庄。其结果与 8 月 26 日在勒卡托的战斗一样，部队伤亡极大。在伤亡了 100 多名官兵之后，先头各连进攻受挫。C 连和 D 连随后跟上，蒙哥马利高举着指挥刀，率领全排前进。这一回他总算没有被刀鞘绊倒，可是，当他一步冲进德军战壕时，却发现一名德军正举枪向他瞄准。作为一名年轻军官，他受过不少训练，知道怎样同敌人拼刺刀，而且还在单人对刺中获得过优胜奖。但眼下他既无步枪，又无刺刀。面对向他瞄准的大个子德国兵，他只有一把锋利的佩剑。但在他短暂的军旅生涯中，谁也没有教过他如何用佩剑杀死敌人。他懂得的唯一剑术是如何用它来行军礼。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蒙哥马利已来不及多想，便纵身向那个德国兵猛扑过去，用尽全身力气猛踢他的下腹部，正好踢中其要害部位，使他痛倒在地，成为蒙哥马利有生以来的第一名战俘。

蒙哥马利带领全排士兵与敌人展开英勇的肉搏战，一举夺占了敌人阵地。随后在离村庄约 90 米的壕沟和篱笆后面占领防御阵地，准备继续向村庄发动进攻，以肃清屋里的敌人。蒙哥马利布置好防御阵地后，跑到前面去回头观察布防情况，以了解从敌军的角度看他们阵地的情形。他刚从雨中站起来，就被守在屋里的德军狙击手一枪击中。子弹从他背后射入（因为他背对

着敌方），从前面穿出，穿透了右肺，但却没有伤着骨头。他倒在地上，血流如注。为了不引起德军的注意，他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名士兵跑过去，替他包扎伤口，结果他被一颗子弹射中头部，倒在蒙哥马利身上。德军狙击手继续向他俩射击，蒙哥马利的左膝又被击中一枪。但倒卧在他身上的那位士兵挡住了其余的子弹。排里的士兵以为他俩都死了，也就不打算去救他们。蒙哥马利在泥泞里躺了三四个小时，直到天黑以后，排里的人才去救他。但他们没有担架，只好用一件大衣把他抬到路上，碰巧遇上团急救站的担架兵，于是把他抬到皇家陆军卫生部队的前方急救站。医生们认为他不行了，又因急救站要转移，就给他挖了一个坟墓。但是，到转移时，他还活着，于是被抬上救护车，送往火车站。一路上汽车颠簸，他还勉强没有昏迷过去。但一上火车，他便完全失去了知觉。等他第二天完全清醒过来时，已经躺在伍尔维奇的赫伯特医院里了。

蒙哥马利在进攻梅特朗作战行动中的英勇表现，受到了上级的重视和表彰。他负伤的第二天，即 1914 年 10 月 14 日，他被晋升为战时上尉军衔。他还由于“身先士卒，奋不顾身，用刺刀将敌人逐出战壕而身负重伤”，荣获优异服务勋章。

日落前，德军从村庄撤退，其伤亡微不足道，但却将整个英军挡住，使之伤亡 700 多人，仅皇家沃里克郡团第 1 营就有 42 人阵亡，85 人负伤。曾在勒卡托身先士卒的凯里斯迪少校壮烈牺牲，蒙哥马利的同事季烈特少尉也不幸殉职。蒙哥马利几次大难不死，真是奇迹。

从整个情况看，英国远征军在人员、装备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能与敌军右翼打成平手，也属不易。但在蒙哥马利受伤后 4 周结束的伊珀尔战役，却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军伤亡最惨重的一役。英国远征军在一战中伤亡近半，每 10 个人中便有一人阵亡。而在阵亡的人员中，有 3/4 是在伊珀尔战役中捐躯的。

蒙哥马利住在赫伯特医院，膝盖的伤很快痊愈，但胸部的伤愈合较慢。尽管 20 多天后他胸部的伤口就已愈合、内出血已停止，右肺已开始扩张得很好，但他仍感到呼吸短促。医生认为，胸部的创伤对他的影响可能是永久性的。

12 月 5 日，蒙哥马利觉得自己已恢复得很好，于是请求出院。院方经研究后准许蒙哥马利先回家休养 3 个月，假期结束时，再考虑是否让他回军队工作。但两个月后，蒙哥马利便说服院方对他再作检查。结果是各方面都恢复得很好。

1915 年 2 月 5 日，陆军部宣布，蒙哥马利可以重任军职，但仍不能担任全部勤务，并且限在国内服役。2 月 12 日，蒙哥马利被派往驻防曼彻斯特的第 112 步兵旅，接替该旅参谋长 J·A·尼克松少校的职务。蒙哥马利当时的经历只不过是排长，在梅特朗负伤时仅是个中尉，1914 年 10 月 14 日才晋升战时上尉衔。但这个职位一般是由少校级军官担任的，于是陆军部同意将伯纳德·蒙哥马利的战时上尉衔改为正式上尉衔。从此，蒙哥马利便开始在旅一级的岗位上展示自己的才华。正是：战友死亡他脱险，长途辗转进医院；伤愈急盼把队归，荣升新职放手干。欲知蒙哥马利在旅部如何表现，请看下章分解。

第四章 吉星高照

东征西战多艰险，逢凶化吉报平安；
巧逢明将放手干，作战三年频升迁。

第 112 步兵旅是 1915 年 1 月组建的，由兰开夏郡的 4 个步兵营组成。旅长是皇家英尼斯基林燧发枪团的退休准将麦肯齐。麦肯齐将军是个睿智和宽宏大度的人，对旅部这位年轻的参谋长的能力非常赏识，什么事都放手地让他去干，并给予全力支持。蒙哥马利极力主张要有一处集中训练的场地。但是，在兰开夏郡找不到这样的场地。于是，该旅于 3 月初移到有良好训练场地的北威尔士。该旅组建不到 4 个月，英国陆军部便将其拆散，而将各营分派到各师去，准备开往法国。刚任第 112 旅参谋长不过 6 个星期的蒙哥马利便在曼彻斯特守着一个没有部队的旅部。

由于陆军伤亡率不断增加和德军的兵力日益增强，英国陆军部又恢复了第 112 旅的编制，并将其改为第 105 步兵旅。没过几天，又将第 105 步兵旅改为第 104 步兵旅，编入第 35 师，该旅辖第 17 兰开夏郡燧发枪团、新编第 18 和第 20 兰开夏郡燧发枪团以及第 23 曼彻斯特部队。6 月份，蒙哥马利的健康检查表明，他已适合担负全部勤务。这时，全师的部队都在约克郡的马索姆营房集中。8 月份，部队向南移防，到索尔兹伯里平原去完成赴法前的训练。

1916 年 1 月，第 104 步兵旅奉令开赴法国。“退休老兵”麦肯齐旅长率领全旅和刚满 28 岁的参谋长蒙哥马利上尉同赴战场。1 月 29 日，搭乘“阿基米得斯号”轮船，在两艘驱逐舰护卫下，从南安普敦启程，次日抵达法国勒阿弗尔。第 104 旅隶属于第 35 师，被编入第 11 军，受黑京中将指挥。

1916 年 2 月 11 日，第 1 军团司令查尔斯·门罗爵士陪同基奇纳侯爵前往第 104 旅视察。那天霪雨绵绵，泥泞深厚，天气糟糕透了，第 104 旅所在的地方全是农田，根本找不到一块草坪。部队只好在一片刚犁过的地里集合，请基奇纳侯爵检阅，基奇纳侯爵从车里出来，冒雨站在路上，部队列队从他面前通过。基奇纳侯爵对检阅十分满意，对该旅的工作大加赞许。

在那场战争中，大多数部队都从未见过自己的高级长官，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基奇纳侯爵到前线部队视察，大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1916 年 2 月 22 日，蒙哥马利借了一辆自行车，与托姆斯上尉一起回到梅特朗去看他受过伤的地方，当时冲锋陷阵的战场，现在已成为埋葬阵亡将士的墓地。在他中弹后躺了两三个小时的地方，除原来的一个稻草堆不见踪影外，一点也没有变。现在，那儿遍地是英军官兵的坟墓，克里斯蒂少校和季烈特少尉的墓也在那里，那些坟墓都有人照管，而且管得很好。

第 104 旅终于向预定作战地区推进，该旅将所辖的 3 个营配属给第 38 师，以便在接替其作战地区前尽量学会最新战法，从 1916 年 3 月 7 日起，该旅接替里奇堡附近的作战地区，所辖的 4 个营几乎一直都在参加战斗行动。上火线后不几天，部队奉命对敌战壕发动一次连规模的突击。此任务由第 17 兰开夏营承担。准备工作非常详细，突击部队曾在模拟的地形上反复演练。但是，突击结果却是一败涂地。蒙哥马利的表兄瓦伦丁在这次突击中头部中弹，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而死去。

法国的 3 月，逼人的寒气已逐渐消退，厚厚的积雪已开始融化，再加上

阴雨连绵，战场上泥泞满地，对于生活在战壕里的人来说，这种环境简直是糟糕透了。

每天上午 9 时半或 10 时，蒙哥马利同将军一起到各战壕和岗哨巡视，中午以三明治或糕饼当午餐而不回旅部吃午饭，一直到下午 4 时 30 分才回去更衣，享用午茶和讨论所发现的问题。蒙哥马利每天要负责提出三份状况报告：一次在上午 5 时，一次在上午 10 时，最后一次在下午 4 时，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用电报拍发，非常简短，例如：“状况正常”、“情况无变化”等。上午 10 时送出的书面报告，蒙哥马利一般在早餐前写好初稿，早餐时交付打字，早餐后呈将军签字，随后马上发出。

蒙哥马利思考缜密，反应灵敏，遇事沉着镇定，办事有条不紊，且能吃苦耐劳，深受各营和麦肯齐旅长的信任。因此，麦肯齐旅长向上级建议给他荣誉晋升和给他较高阶层的参谋职务。

从蒙哥马利给他母亲的信中看，他对晋升的可能性不抱太大希望，这说明他对此事的态度是明智的。虽然他工作勤奋，任劳任怨，实际上挑起了全旅的工作担子，但他所在的师并未参加任何重大的作战行动，只有一次由旅所辖部队发起的突击，还被打得落花流水。在这种情况下，要获得荣誉晋升是困难的。此外，麦肯齐旅长很快就被调离第 104 步兵旅，也对蒙哥马利的晋升有所影响。

对麦肯齐旅长的调离，蒙哥马利在 4 月 10 日给他母亲的信中谈了自己的感受。他写道：

“麦肯齐将军调回英国去了，我感到很遗憾，他们说，他在这里指挥一个旅，是稍嫌老了些。我认为，他们是对的。麦肯齐今年 56 岁，他的所作所为，大多太古板，跟不上时代的需要。我们真需要一个较年轻、较符合潮流的人。他的为人非常好，和蔼可亲，但这与调职毫无关系。我想你还记得以前我曾写信回去，说可能会发生这种事。麦肯齐一直对我很好，我与他处得不错，和他分手，我很难过。如果新来的人较年轻，头脑较新，我的工作便会有所减轻。迄今为止，有许多将军应该亲自动手的事，都要我做。当然，以上所说都是不必与外人道的。”

1916 年 4 月 14 日，第 35 师调往北边的弗勒贝克斯地区，接任第 8 师的防务。在那里，麦肯齐准将、麦克温尼中校和史密斯中校都被调职，由较年轻的军官接替他们。接任第 104 旅旅长的是桑迪兰兹，年仅 40 岁，金马伦高原人。在桑迪兰兹将军的指挥下，蒙哥马利的生活和工作习惯有所改变。他每天 6 时 15 分起床，7 时早餐，7 时 45 分出巡。有时，他随旅长出去；有时，他与旅长分头行动。他们中午 1 时回旅部就餐，下午处理公文。午茶后，在旅部附近走走，或去视察炮手或工兵的工作，并草拟计划。下午 8 时吃晚餐，晚饭后再办一点公，通常 10 点就能就寝。

麦肯齐将军曾给予蒙哥马利自由和鼓励，使他在旅里得以创造自己的地位，那种地位使蒙哥马利不知疲劳的秉性得以施展。但开始教蒙哥马利领悟旅长职务本质的人，却是桑迪兰兹将军。桑迪兰兹将军使他了解了旅长同其炮兵和工程兵之间的关系，这对于蒙哥马利上尉的前途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蒙哥马利在 4 月 10 日给他母亲的信中还谈到了他对托姆斯的印象和一些战场上的事情。托姆斯上尉与蒙哥马利是皇家沃里克郡团的旧同事，现任第 106 旅参谋长，该旅与第 104 旅在同一地区内作战。他写道：

“我曾同他长谈。我觉得他的身体不太好，他忧虑的事比大多数人都多得多……最近有些形迹可疑的飞机在我们的战壕上空飞过。所有的英国飞机在两翼下都有红、白、蓝三色圆圈连续相套的标志，使我们能从下方加以识别。德国的飞机，则在机翼的下面漆有黑色的马耳他万字标记。德国人很可能将俘获的英军飞机拿来使用，但他们必须将标志稍加修改，否则，便会受到他们自己炮火的射击。因此，德军便将那些圆圈改为方形，这样只有用好的望远镜才能识别，德军自己又对这些飞机射击，想欺骗我们。当然，他们会小心从事，避免射中。德军是很有发明天才的，其计谋之多，非同小可。德军在我们前线运用一种绵密的扩音系统，来侦听我们的信号和电话。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有线电话是用一种称为‘地面回路’的方法，不用双线，只用单线，另一条线则利用地面导电作为回路。因此，德国人便可以截取我们的通讯信号。现在，我们必用第二条电线，称为‘金属回路’而不再利用地面导电回路了。然而，即使如此，德军得到的有关我们的情报，也是多得惊人。在我们第一线后面不远的地方，住有许多法国难民和一些比利时难民。我相信在这些比利时人里面，一定有不少德军间谍。那些间谍可能用鸽子将消息传递回去……”

蒙哥马利在圣保罗读书时，教师可能认为他的写作能力已无可救药。但在战场上，蒙哥马利叙述经验的清晰与扼要，却不能不令人叹服。蒙哥马利似乎没有丝毫的忧虑，他对眼前的工作全神贯注，从不杞人忧天，使其长官和部属对他钦佩不已。蒙哥马利对事物的洞察，简单明了。这在教室里并不显得重要，但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禀赋。其他人可能对部下关怀过分，也可能观察战争的视野较宽，对盟军战略战术的得失更为敏感，但能像蒙哥马利那样对自己周围的环境观察得那么清晰的人，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但对战役和战斗的全局，蒙哥马利却看得不那么清楚，常常盲目乐观。1916年3月初，他给母亲写信说：

“法军在凡尔登的战况颇为顺利，法军一点也不担心。当然，若是情势不对，我们自会从旁支援。但事实上，法军对整个战斗都能妥为掌握，从未动用过预备队。我们的任务是坚守和巩固自己的阵地，让德国人自己前来送死。所以，我们不从这边发动进攻。德国人损失惨重，肯定是吃不消的……”

实际上，事实完全与此相反。法军在凡尔登浴血奋战，伤亡惨重，根本没有取得战略突破的希望。为了减轻法军的压力，英军不得不在法军的要求下，单独发起索姆河战役。这场战役原计划在夏天与盟军共同进行，现在却完全成了英军的事情。

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拉开序幕。在作战的第一天，英军就伤亡了57000人，其中阵亡者达19000人。为了把德军预备队引诱出来，远离英军主攻所在地的索姆河地区，英军决定在纳维沙佩尔地区实施佯攻。第104旅原本奉命对猪头山发动攻击，但上级在6月中旬决定将第35师从第一线调回后方休整，而把攻击猪头山的任务交由接防的第39师的一个旅担任。这样，第104旅便侥幸地逃过了这场浩劫。桑迪兰兹将军曾明确地对上级参谋部门和蒙哥马利说，预定的猪头山佯攻由于缺乏奇袭之利，势将难逃惨败的厄运。但他的意见并未引起上级的重视。

蒙哥马利没有正确理解英军在索姆河战役头一天中伤亡数字的含义，头几天一直保持着乐观情绪，甚至败象已十分明显时，他的乐观情绪依然不变。

7月4日，他写信给他的母亲说：

“……部队在星期日傍晚临时奉命搭火车开拔，现已移防到南方，作为总攻击的后方预备队，依情况需要，随时出动。攻击开始时，并不如我们预期的那么顺利。现在战况已经稳定下来，进展得很好……我们有充足的预备队，我们的部队必胜无疑……”

英军总司令黑格曾说，如果这次攻击遭受严重挫折，就予以取消。但是，开始的挫折却未能使黑格收回攻击的命令。于是，这种自杀性“进攻”便继续进行，第104旅也就不可避免地拖入泥潭。

7月20日，第104旅奉命参加那场自杀性进攻。第23曼彻斯特团刚刚抵达前线，就被第105旅调去攻击马尔兹霍恩农场。但第105旅却没有向第23曼彻斯特团下达明确的攻击任务。攻击行动十分仓促，前锋的两个连冲入德军阵地，肉搏厮杀，结果那两个连的残余部队不得不撤回来，上午11时30分，第23曼彻斯特团其余的两个连再次发动进攻，但遭到密集的炮火轰击，伤亡惨重。该团共阵亡军官9名、士兵162名。

下午3时，第104旅奉命接替第105旅的防务。在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进攻之后，第104旅于7月23日被抽调回来，重新整顿，补充新兵。英、德双方的大炮昼夜不停地轰击对方的阵地，所有的一切已被炸成灰烬，整个战场已是一片废墟。

从7月20日到27日，第104旅已损失近千人。就一个旅来说，这是个骇人听闻的数字。然而，黑格并没有从这些灾难中吸取教训，进攻仍在进行。7月31日，第104旅终于在支离破碎、疲惫不堪的状况下，从第一线撤了下来。

蒙哥马利一心盼望能有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休整。但从当时的情形看，他估计只能休整10天左右，可实际上，10天时间也太多了。黑格那徒劳无功而又不肯罢休的攻势，没有让部队休整那么久。四天之后，蒙哥马利给他母亲写信说：

“我们部队已经离开后方那快乐的住所，现在又回到了我们原来的老地方。只有4天的休息，大家自然一肚子不高兴。的确，把我们大家老远运回去，只休息4天，实在毫无道理。可是，不管我们高兴与不高兴，上级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得到哪里，我希望这回我们都能安然无恙。”

其实，在索姆河战役中，蒙哥马利几次险遭不测，但都侥幸逃脱。7月23日，蒙哥马利和一名军官出去执行重要的侦察任务，结果有4发8英寸炮弹在他们附近爆炸，随行的军官头部被弹片击中，而他却分毫未损。7月26日，蒙哥马利在阵地上协助一个营后撤回来时，不得不到处奔跑，因为那个营散布较广。结果被德军狙击手追踪射击，但都被他侥幸躲过。只有一块弹片击中他的手掌，但伤势并不重，稍作处理后便能正常工作。8月27日，蒙哥马利给家里写信说：

“……这几天，我曾有一次死里逃生，其凶险为前所未有的。那天凌晨5时，我和两名传令兵跟随将军到最前线。一枚8英寸炮弹在离我们4英尺远的地面上爆炸。我和将军被抛在两旁，两名传令兵也被轰倒在地。我们4人浑身上下全是泥土，被笼罩在乌黑的烟雾之中。

我们谁也没有受伤，因为我们距炮弹炸点太近，炮弹和破片都没有碰到我们。当一枚高爆炸弹爆炸时，所有破片均向上散飞，落在几百码以外，所以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离炸弹最近的地方，或离开炸弹很远的地方。当然，我们受了一点惊吓，但我们站起身来，继续前进。

半小时后，我们在归途中遇上猛烈的炮击。除了继续前进外，别无他法。结果，我们安然无恙……”

1916年11月18日，当黑格在损兵折将达100万人之后，终于放弃其攻势时，盟军的战线几乎原地未动。法军进行的凡尔登战役，结果也一样。

1916年英军阵亡、负伤或为毒气所伤者，高达125万余人。

1917年1月18日，第35师师长休假，桑迪兰兹准将代理师长。4天后，第104步兵旅的参谋长伯纳德·蒙哥马利上尉被调往第33师担任二级参谋。虽然他的职务晋升了，但他的军衔仍然是上尉，而接替他在第104旅的职务的却是一位少校。

1916年是英军浴血奋战的一年。1917年英军同样没有休息。

1917年4月，黑格下令发起一次新攻势，目标是夺取兴登堡防线。德军从1916年9月开始构筑这道防线，到1917年2月已完全井然有序地撤退到这道防线上，现在，人们一般将对兴登堡防线的春季攻势称之为“阿拉斯之战”。

阿拉斯之战始于1917年4月9日。兴登堡防线是德军用了6个月时间构筑的一道新防线，非常坚固，若从正面攻击，将不会奏效。因此，第33师奉命从兴登堡防线北翼突入，第33师将两辆坦克配属第100旅，令其首先发动攻击。可是，由于机械故障，两辆坦克未能到达攻击发起位置，没有参加那次作战，经过一番苦斗，第100旅终于突破德军的一线阵地。进攻的第一天稍有进展；但第二天却严重受阻，停止不前，黑格所指定的目标好似远在天边。原准备用于扩张战果的预备队，在最初的攻势受阻之后，即被逐次投入当前的战斗。结果，前线的部队精疲力竭，无法抵挡敌军的“反冲击”。于是，已编入第18军的第33师，在1917年4月11日傍晚奉命在斯卡皮以南投入激战，以援助艾伦比将军指挥的第7军。随后，第33师又被派往英国第3军团最右翼，去接替第21师。英军的攻势已被遏止，但黑格仍坚持继续发动进攻。结果，1917年4月23日的攻击被英国官方战史称之为“近来最艰苦的战争”。

4月23日天刚蒙蒙亮，成千上万的英军便冒着敌军密集的炮火，前仆后继地冲向德军阵地。第1皇后兵团在友军的两辆坦克未曾露面的情况下，照样攻击前进。甚至当皇后兵团发现自己的火炮未能摧毁敌人的铁丝网时，仍然毫不在乎地跨越而过，占领了兴登堡防线的第一道战壕。可惜他们被第二层铁丝网所阻，未能继续深入敌阵地。午后，德军发动反攻，皇后兵团差点儿连最初的战果也没有保住。第33师有一个旅配合第1皇后兵团行动，其它3个旅在其它地域作战，但情形也是大同小异。到1917年4月27日，第33师仅向前推进了一英里，其代价却是伤亡3000余人。整个英军在4月份的伤亡多达10.5万至12万人。

对于这种重大流血牺牲的真实教训，蒙哥马利并不十分清楚。他当时正把全部精力投入参谋工作，潜心研究统一指挥、集中使用师的炮兵火力、空中侦察和如何才能迅速得到战斗进展的准确情报等问题。

1917年7月6日，伯纳德·蒙哥马利晋升第9军的二级参谋，但其军衔

仍然是上尉。7月11日，蒙哥马利给他的父亲写信说：

“我非常喜欢我的职务。我能得到这个职位，是十分幸运的。第9军有3个二级参谋，当一级参谋不在时，当然应该由其他两人之中的一位负责。可是，尽管他们两位资历比我深，而且又都是少校，但上级却让我负责。我无疑是担任这种职务的最年轻的军官，也是唯一的上尉。在其他所有的军部，这种职务几乎是由清一色的参谋学院毕业生担任的。”

第9军隶属于赫伯特·普卢默爵士统帅的第2军团。普卢默将军不主张野心过大的全面攻势，而主张对重要战术目标作浅近攻击；主张使用纵深炮兵火力为进攻部队创造条件，强调步炮协同；主张部队要根据特定的作战任务进行训练。他的这些主张对年轻的蒙哥马利产生了最深刻和最持久的影响。

在黑格发动的北方攻势中，高夫将军的第5军团担任主攻，第9军在右翼担任助攻。第5军团虽然出动了117辆坦克助战，但因其炮兵散布于全线，又遇多年未有的8月霖雨，面对采取新战术防御的德军无计可施。到8月底，黑格十分不情愿地要求普卢默将军负责指挥攻击。普卢默将军下令攻势暂停三周，以便制定适当的攻击计划并根据作战任务训练部队。普卢默将军把夺取伊琅尔以西的重要高地和密林作为这次作战的目标。后来，人们将这次战斗称之为“伊珀尔之战的第3个回合”。

9月初，第9军发布秋季攻势的准备工作指示。蒙哥马利当时主管训练，指示是由他起草的。在那份60页的指示中附有40页附件和12张地图，内容包括：在部队之前，以弹幕掩护部队前进，以新锐部队交替跃进；准备应付德军的反冲击；与侦察机的陆空通讯；特种部队的训练；空中照相和情报的运用；弹药堆积站的安排等，完全体现了普卢默将军的作战主张。这些指示发布后，所有的作战命令都以该项指示为基础。

1917年9月7日，军部下令要求担任突击任务的旅。必须在博森训练区就进攻细节进行模拟演习。第9军主管训练的二级参谋暂归第19师师长代管，以协助部队完成训练。

经过相当的准备，普卢默将军分别于9月20日、26日和10月4日发动了三次秋季攻势，各部队不但攻占了所有的预定目标，而且在德军猛烈的反攻下，固守了阵地。英军的胜利，使英法盟军的士气大振，也使伯纳德·蒙哥马利上尉一鸣惊人。

10月底，蒙哥马利正式晋升为第9军一级参谋，主管部队作战，但其军衔仍然是上尉。

1918年1月，俄国宣布退出战争。美国虽然已于1917年4月6日对德宣战，但美军尚未大量到达战场。德军企图趁其兵力占相对优势之时发动春季攻势，以赢得西战场的胜利。

1月30日，第9军的防御被另一军接替，所属各师被抽调回来作为军团预备队，军部隶属第5军团。7周后，第9军的参谋部被派去研究德军发动进攻时，英军将如何接替或加入法军进行防御作战的问题。蒙哥马利等人不辞辛劳地跑到布尔、科明、容舍雷等地的法军战场去观察地形、熟悉情况，并于3月15日举行了一次参谋演习。不过，对德军发动进攻时，把哪几个英军师划归第9军指挥一事，并未达成协议。结果，当鲁登道夫于3月21日发动进攻时，大家议论纷纷，乱作一团。

3月22日，第9军军部奉命立即前往蒙地地耶。3月23日，英军南部防线在德军的猛烈攻击下溃散，第9军军部奉命建立一道新防线。3月25日，戈顿将军率领参谋人员从伯纳维尔出发，在距原前线约50英里处构筑新防线，称之为“总部防线”。在尔后的几周内，英军在这条防线上用了2.3万吨铁丝网，构筑了5000英里长的新战壕。德军第18军团突破英军的防线后，中止向南挺进，而在其北面的阿莱斯加倍用兵，结果使盟军的防线免于崩溃。等后来德军重新加强第18军团的攻势时，第18军团的锐势已经消失。

1918年4月1日，当第9军正在部署“总部防线”时，突然接到命令，要它向第2军团报到，接替澳洲部队的防务。正式接防时间是1918年4月3日。6天后，德军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在英、法两军的结合部攻入40英里。鲁登道夫打算从伊珀尔突出部下方向北挺进，把英、比军队驱赶到海峡区，但没有成功。

不过，这场战斗十分惨烈。德军施放的芥子毒气与晨雾混成一团，猛烈的炮火使英军的通讯一度完全中断。

1918年4月10日上午，德军在纳维沙佩尔将1个葡萄牙师打得丢盔弃甲，随后便长驱直入，直抵埃斯代尔，并向北延伸，进入第15和第9军防区。4月11日黄昏，德军挺进至梅特朗。在那里防守的第15军军长奉命调职，第9军被迫后退，但仍坚守俯瞰里斯平原的坎米尔山岭重地。第9军与敌人苦战10天，伤亡2700余人，但却挡住了德军的前进。4月20日，第9军将防务交给法军，蒙哥马利即获准返回英国度假。法军接防后不久，坎米尔高地即告失守。不过，这时德军的前进已后继无力。1918年5月3日，第9军奉命接替法军第38军的全部防务。5月10日，第9军接管了法军的弧形防线。该防线从于特比斯起，至埃纳河止，全长达15英里。第9军将支离破碎的4个师和一些法军重炮部署在这条防线上。5月26日，英军从德军俘虏口中得知，德军将于第二天对这个地区发动全面攻击。第9军惊惶失措，赶紧命令各部队进入战斗状态。次日凌晨1时，德军的3719门火炮猛烈轰击英法两军的防御正面，盟军两个军的部队瞬间即被击溃。德军从英法两军结合部的中央突破，4天内直抵埃纳河畔。对第9军来说，这是6周内进行的第二次浴血奋战。5月30日，第9军的战斗部队只剩下大约1个师的兵力，所剩部队全部由第19师统一指挥。伤亡之惨重，骇人听闻，但第19师仍坚持战斗，固守要点，并于6月6日发动反击。6月19日，第19师的防务终于被其他部队接替。第9军于月底开始向北移动，返回英军阵线。

1918年6月3日，紧接着主要的激战后，蒙哥马利被晋升为准少校。第9军军长对蒙哥马利等参谋人员在这种变幻莫测和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的卓越表现，赞赏不已。

第9军重返北部加入英军预备队行列时，蒙哥马利立即再度晋升，担任新职。

1918年7月16日，蒙哥马利被晋升为战时中校，在戈林奇少将的第47伦敦师担任一级参谋。

戈林奇将军是个单身汉，也是全陆军最资深的少将。在他服务过的各军中，所有军长的资历都比他浅。由于他人缘不好，一直没当上军长。早在1910年蒙哥马利就认识他，那时他在印度当旅长，蒙哥马利在其旅内服役。

戈林奇将军认为蒙哥马利是一位理想的部属：像他自己一样，是位单身汉，能专心致志地工作，有丰富的参谋经验，年轻力壮，周详缜密，不辞辛

劳，对目标、战术、训练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因此，他把这位 30 多岁的一级参谋视为心腹，把全师的行政事务交由他负责。一些必要的重大决策由自己作出，然后交由他去执行。这无疑为蒙哥马利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第 47 师隶属于第 3 军。蒙哥马利接管第 47 师的参谋部门后，没有浪费半点时间，很快就发出了他的第一道指示——第 47 师防御计划。蒙哥马利以简洁、明了的风格，阐述了师的防御正面、师的责任、总的策略、受攻击时应采取的行动——包括师部在预警各旅时所用的代号和呼叫信号、预备队的部署以及对步兵、炮兵、机枪、通信兵、坦克等的处置。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场的局势逐渐明朗化。埃纳的第二场战斗结束时，德军已暴露出战术退却的征候，这表明鲁登道夫的攻势已经受挫，败象已开始显露。同时，英军在成千上万生力军的支援下，开始准备向比、法国境地区发动进攻。

蒙哥马利在向部队发出防御指示一个月后，于 8 月 18 日向部队发出一套“进攻作战指示”，要求部队按照他的计划，切实加以演练。待发动攻击的最后命令到达时，蒙哥马利已对部队发出了 7 道预备命令。8 月 22 日凌晨，第 47 师的第一线旅开始向快活谷发起攻击，但最初的攻击受挫。由于参谋工作不细和部队缺乏在黑暗和烟雾中运动的充分训练，两个先头营将距离弄错了，尽管有许多德军投降，但攻击部队在离目标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致使德军有时间迅速组织反攻，威胁到第 47 师与第 12 师的结合部。同时，坦克不是出故障，就是攻错了方向，致使先头攻击部队到达预定地域后，不仅遇到铁丝网的阻拦，而且在近距离上遭到敌机、步枪火力的射击和空中的轰炸。部队只好立刻撤退。下午 2 时，德军在炮兵掩护下，实施大规模反攻。这时，师的防御训练起了作用，抵抗的力量足以阻挡德军前进。德军损失惨重，阵势大乱，入夜即开始撤退。第 47 师也损兵折将，人困马乏，当晚已无力继续攻击。8 月 23 日，第 47 师没有行动。8 月 24 日，第 47 和第 12 师奉命“夺取本军在 22 日未能攻克快乐谷以外的最后目标”。这一次，第 47 师较为得心应手，几乎攻克所有的目标，而且伤亡甚微。

1918 年 9 月 8 日，第 47 师调入第 5 军团第 13 军，进行休整。

54 天后，蒙哥马利向全师部队颁发小册子《从 1918 年 8—9 月的战斗中获得的教训》。小册子包括通讯、司令部、坦克、炮兵、迫击炮、骑兵、机枪、工兵运用、补给、一般注意事项等 10 个部分，特别强调利用无线电通讯，夺取战术主动权，对部队进行特殊训练，步、炮兵协同指挥，经常变更攻击发起时间以获得奇袭之利等内容。

蒙哥马利于 9 月 11 日发布的训练命令，已显示出他对实战训练独具慧眼。他在命令中强调：“必须牢记的原则是，我们务必从本师近来参加的战斗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且必须将这些经验教训传授给增援本单位的部队。”那次训练为期两周，第一周每天上午做短时间的操练，然后分组进行训练；下午开展各种体能活动和竞赛。蒙哥马利不仅要求士兵参加训练，而且要求所有营长、参谋和行政长官，尤其是旅属炮兵、皇家工兵和机枪排、连长，参加旅的战斗教练，并且要求至少在实施训练前 24 小时把训练计划交到他手里。第二周利用现有的训练场地进行操练和战术演练。师部已开办一个通讯训练班，开始从事新的无线电通讯训练。

在第 47 师期间，蒙哥马利开始潜心研究师指挥部门如何才能迅速得到战斗进展的准确情报。因为此类情报非常重要，可使高级指挥官根据发展中的

战术情况调整他的部署。后来，他终于设计了一种系统，即向各个先头营指挥所派遣携带无线电设备的军官，通过无线电把最新情况传回师部。在那个年代，要弄到便携式、具备所需要的通讯距离并且性能可靠的无线电设备是困难的。他们的系统大体上是临时凑合的，经常出故障，但总的来说，效果良好。这就是蒙哥马利在 1939—1945 年战争中加以发展的那种通讯系统的雏形。

1918 年 9 月 26 日，第 47 师接到命令，于次日开往圣波尔，9 月 30 日改为隶属第 5 军团，归伯德伍德将军指挥。第二天又回到纳维沙佩尔，拨归第 11 军，由理查德·黑京中将指挥。这时，大战已接近尾声，保加利亚于 1918 年 9 月 29 日投降。德军也准备且战且退，向德国边境撤退。

1918 年 10 月 3 日，第 47 师又重返火线。蒙哥马利不得不承认，德军的撤退无懈可击。现在，英军已离开原来的地区，由于运输不足和补给困难，难以像以前一样集中炮兵、坦克和步兵力量痛击敌人。种种迹象表明，德军已不准备据阵迎战，如对其后卫阵地进行正面攻击，则徒然浪费·千万人的性命。于是，盟军的进攻便被一道机枪防线所阻挡。

1918 年 10 月 4 日，第 5 军团停止前进。

10 月 14 日，又继续前进。第 11 军一步一步向里尔逼进，于 10 月 17 日攻占里尔。当天，第 47 师将任务交给第 57 师，改作预备队。

10 月 27 日，第 5 军团安排了一次胜利入城式。蒙哥马利和戈林奇将军骑马走在第 47 师最前头。到达广场时，他们下马和市长站在一起，检阅部队通过。与蒙哥马利和戈林奇少将站在一起的还有：第 11 军军长黑京爵士，第 5 军团司令伯德伍德爵士，里尔市的显贵和丘吉尔先生。第 47 师的一级参谋蒙哥马利中校和英国军需部长丘吉尔在 1918 年 10 月的里尔阅兵中，几乎并肩而立，但却彼此互不相识。10 多年后，他俩的名字成为英国抵抗德国侵略的象征，真是巧得不可思议。

这时，德国内部的反战情绪不断高涨。11 月 3 日，德国驻基尔的舰队叛变；11 月 7 日，慕尼黑革命产生了昙花一现的共和政府。11 月 10 日早上，奥国皇帝凯泽逊位，逃往荷兰。奥国王朝的解体，德国新共和政府的成立，给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上了句号。

现在疲乏的盟军在战场上已无敌手，即使有敌人，所有人员脑海里唯一的念头也就是回家。不出几周，经由法国撤离部队的行动开始。

1919 年：月末，第：军团顾问委员会到第 47 师师部访问，以评定幕僚的优劣。显然，所有军官都必须降级，以适应和平时期的陆军编制。许多人志愿到海外服役，而不问职位的高低。伯纳德·蒙哥马利被派往莱茵河英国陆军总部担任二级参谋，主管作战。

1919 年 3 月 24 日中午，第 47 师被撤销，蒙哥马利启程去科隆。正是：弹雨纷飞屡遇险，战火磨炼长才干；德军败退大战停，莱茵总部管作战，欲知蒙哥马利中校下步如何行动，请看下章分解。

第五章 坠入情网

刻苦练兵树样板，晋级调职心里欢；
追求少女遭失败，终与寡妇结良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伯纳德·蒙哥马利清楚地认识到，军事是一门需要终生研究的学问，要掌握它的全部奥秘，就必须把它放在首位，献身于它。于是，他决定把军事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但应该如何去做，却不甚清楚。不过，有一点他是肯定的，即必须进参谋学院深造。

1919年，参谋学院重新开办。但蒙哥马利却没有某些军官那么幸运，凭着作战纪录，不经考试就获准入学。第一期他的希望落空了，便寄希望于第二期。

1920年1月开办第二期，学制一年。这一期的录取名单公布时，他又落选了，究其原因，是他没有后台和靠山。蒙哥马利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对此他并不善罢甘休。

当时驻德的英国占领军总司令是威廉·罗伯逊爵士，但蒙哥马利并不认识他。罗伯逊爵士非常喜欢打网球。有一天，他邀蒙哥马利到科隆他家去打网球。蒙哥马利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于是决定要不顾一切地抓住这次机会。他了解到，罗伯逊爵士在1915年至1918年间曾任帝国参谋总长，是从上兵逐级升到元帅的第一人，他年轻时也经历了许多周折坎坷。对年轻人抱有同情心。打球休息时，蒙哥马利便向他倾诉了自己的苦恼和愿望。

那次网球聚会不久，录取名单上便有了伯纳德·蒙哥马利的名字。录取通知要求他1920年：月到坎伯利参谋学院报到。

1919年5月5日，蒙哥马利奉命担任皇家燧发枪团第17营营长。当时，那个营的营长刚刚离职，新兵想复员，新兵毫无作战经验，整个情况很糟。蒙哥马利一到这个营，便把局势控制住了。他用操练和体育运动使这个营振作起来。他为士兵们提供条件，使他们对运动会、竞赛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感兴趣。他亲自负责全部训练工作，把训练搞得轰轰烈烈、卓有成效。

11月份，这个营被裁减，于是，他得到了他夏天就想要的休假。在圣诞节与家人团聚之后，蒙哥马利于1920年1月22日进入坎伯利参谋学院。

蒙哥马利迫不及待地想对过去和现在的军事学作一番彻底的研究，因此并不热衷于学院的打猎和社交活动，不久，他便发现他对教官的期望过高，他所追求的目标超过了学院能够提供的范围。例如，让优秀的军官有机会把他们的经验纳入战史资料，并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制定出一套完成任务的途径。艾伦·穆尔黑德在描写蒙哥马利在参谋学院学习期间的态度时写道：

“对他以及一些曾到过法国的有作战经验的年轻人来说，参谋学院的课程‘全是胡闹’，是完全过时的不现实的东西。特别是蒙哥马利，学校当局把他看成一个好争吵和好辩论的人，‘有点布尔什维克的味道’。他认为自己比教官或其他人都知道得多。训练班为期一年。蒙哥马利和他的同学们是在互相揶揄、嘲笑和争论中度过的，最后他们都及格了。”

的确，蒙哥马利的许多同学都认为，他在这一段时间是“放言高论，口若悬河，固执己见，目空一切”。

1920年圣诞节的参谋学院刊物在谜语栏里，对这位喋喋不休的学员幽了

一默：“如果需要 10 卡车印度名牌水泥，才能堵住参谋学院二楼浴缸的缺口，那末，需要多少个乐团，在著名剧作家康格里夫的亲自监督下，才能压住蒙哥马利在早餐时的喋喋不休？”在“我们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栏内，则更为挖苦地写道：“在停战日，蒙哥马利是否有过两分钟沉默不语？有，在哪里？”

虽然蒙哥马利个性执拗，但他勤奋努力，十分健谈，从不放弃与同学讨论和切磋的大好机会。虽然他觉得参谋学院的教育和教官都不能令他满意，但他对学校的信心似乎从未受到影响。相反，六年后学校打算聘他为教官时，他欣然同意。

1920 年 12 月，蒙哥马利从参谋学院毕业。尽管没有人告诉他他的成绩是好是坏，但他自信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因为他被派往当时英国陆军最好的几个旅之一——驻科克的第 17 步兵旅，担任旅参谋长，并直接投入镇压南爱尔兰的新芬党争取独立的活动。

蒙哥马利是在爱尔兰动乱达到巅峰时被派到那里去的。虽然动乱的政治中心是都柏林，但英国人最难维持秩序的，却是南部诸邦。

12 月 11 日，科克市中心被人纵火焚烧，于是整个南部宣布戒严。

蒙哥马利的父母是爱尔兰基督教的子民。虽然他家的土地大部分已被爱尔兰强迫没收，但家族产业仍在“新公园”。一旦爱尔兰独立或被平分，蒙哥马利家人的地位和安全势必大受影响。此外，蒙哥马利特别喜欢的堂兄豪休·蒙哥马利中校，于 1920 年 11 月 21 日在都柏林被爱尔兰共和军谋杀。蒙哥马利在这种情形下到达科克第 17 步兵旅，可见他心头自然会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

第 17 步兵旅是爱尔兰境内最大的一个旅，开始辖 7 个营，后来增至 9 个营，由希金森准将指挥。开始，蒙哥马利与其旅长、师长一样，相信他们可以把爱尔兰共和军打垮，于是着手把那个 9000 多人的旅部署在可能是最有利的位上，又在城里设立了一个特别的“科克城情报单位”，并给各营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后来，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看法。他在给同僚琅西瓦尔少校的信中写道：

“我认为莱德。佐治的做法是对的。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武力，我们或许可以暂时将叛军打垮，但当我们将军队撤走后，叛军又会像溃疡一样死灰复燃。我想，那些叛军可能回避战斗，把武器藏起来，等待我们离开。所以，唯一的办法是让爱尔兰人组成某种形式的自治政府，自己去平息叛乱。他们自己才是唯一真正能够做得到的人。爱尔兰人目前仍在努力去做，就我们所知，他们似乎已有相当的成就。不过，本人现在与那边并无密切的接触，但我觉得爱尔兰人的成就，远比我们的大……”

他的态度的转变，表明早在 20 年代初，他已学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意见，并能根据客观事实的发展而加以修正。在其《回忆录》中，蒙哥马利对爱尔兰战争作了如下的评价：

“这场战争在许多方面要比 1918 年结束的大战糟得多。它发展成为一场屠杀，到最后军人们都变得擅长杀人甚于固守自己的阵地。这样的战争对官兵都是有害的，它使军人的品德和骑士气概下降。战争的结束使我感到欣慰。”

1922 年 1 月，爱尔兰省政府成立。它与英国签订条约后，南部的英军开始撤离。5 月 19 日，蒙哥马利与师、旅部的参谋最后撤离科克。5 月 24 日，

蒙哥马利从奇斯维克前往普利茅斯就任第 8 步兵旅参谋长。第 8 旅旅长汤姆·霍朗德准将很赏识他在训练方面的才干，一切都放手让他去干。

在第 8 步兵旅工作不到一年，蒙哥马利又被调到以约克为基地的地区自卫部队第 49 师担任二级参谋。新任师长是查尔斯·哈林顿，由于一级参谋的职位悬缺无人，蒙哥马利实际上成了他的一级参谋。

幸运的是，蒙哥马利和师长哈林顿都是首次到地区自卫部队任职。这样，蒙哥马利便能顺利地提出他对编组和训练的建议。他把第 49 师作为自己的各种战术观点的试验场，全心全意地拼命去干。

1923 年 7 月，蒙哥马利毫不迟疑地颁布了他在军旅生涯中的第二本刊印小册子《供西区部队和第 49 师用的战术教材》。在引言中，蒙哥马利写道：“本教材供各军官训练部队和准备晋级考试之用。”当然，当时英国陆军已颁发各种训练教材和野战条令，但蒙哥马利认为那些教材有缺点，因为它们仅订立作战的基本原则，却不提供为达成这些原则应如何训练部队的方法。

也许是由于裁减的缘故，当时的部队士气十分低落。蒙哥马利认为，唯一的办法是，以坎伯利参谋学院为启动枢纽，重振陆军士气。他认为：与其让年轻军官抱着越来越渺茫的升迁希望，在部队中年复一年地服役，不如让他们跳出眼前职务的框框，去憧憬未来，去准备参加参谋学院的考试；与其让他们在函授中自行摸索，不如让他们在一个熟悉而又可以当面交谈的军官指导下进修。于是，他在第 8 旅时就开始为希望进入参谋学院的年轻军官开办“进修班”。

1923 年，他又在德文郡港为年轻军官开“参谋学院预备班”。从蒙哥马利为预备班编的教材来看，他当时对陆军的编组、部署、运动和战术的理解已相当精到。他认为：战术“目标总是要迫敌应战，对敌攻击，并尽量把敌人歼灭”；土地之得失不是最重要的，自始至终认清军事上的战略目标，才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观念后来成为他的军事哲学的主要原则之一。

蒙哥马利兼有一级参谋的职责，既要制定训练计划，又要指导部队训练，还要为参谋学院预备班讲课，拟订习题，修改习卷。这一切使他成天忙个不停，较之在法国和爱尔兰的日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使第 49 师成为 1924 年暑期野营演习中首屈一指的部队，他又于 1923 年秋动手撰写一系列讲稿，打算在当年冬天亲自指导军官们实施沙盘训练。他一共写了四篇讲稿，结果弄得他筋疲力竭，但他却觉得那是非常值得的。后来，那些讲稿又印成小册子颁发。蒙哥马利在引言中说：“唯一的目的是使听讲的军官不必作笔记，这样他们就可以全神贯注地听讲和看着沙盘。特别重要的是，这些教材应与陆军部颁发的训练教纲互为补充，不应用教材代替教纲。请特别注意参考陆军部颁发的下列册子……”

英国陆军部对某些年轻军官擅自颁发指导部队训练的小册子越来越感到不安，于是发出一道命令，禁止使用一切非官方的小册子或训练书籍。蒙哥马利在教材和小册子上动了那么多脑筋，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很不愿意放弃那些小册子。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不得不忍痛割爱，停止使用所颁发的各种小册子。

蒙哥马利在执行第 49 师的公务和指导参谋学院预备班期间，经常写讲稿和小册子之类的东西，因此，他在写作方面已开始崭露头角，1924 年夏季的《陆军季刊》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他的原定题目是“地区自卫部队的训练”，发表时编辑将其改为“对地区自卫部队中新任副官的建议”。尽管这篇文章

下面没有注明作者是蒙哥马利，但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出现在军事杂志上。蒙哥马利对以这种形式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很感兴趣。

1925年1月，皇家沃里克郡团的杂志《羚羊》又登载了蒙哥马利少校研究战术史的第一篇文章“现代步兵战术的演进”。

《羚羊》是一份以刊登团内消息和娱乐为主的杂志，刊登这类学术文章引起了许多异议。但蒙哥马利以其独特的风格和见解吸引了读者。他开门见山地把自己对战术的看法摆在了读者面前：“从古罗马的密集队形起，战术的基本法则始终保持不变。这个法则就是：要想成功，就必须在准备实施决定性打击之处，”占有绝对优势。”

随后，蒙哥马利又连续发表了四篇研究战术史的文章，其内容涉及从1611年到1924年约300年间，现代步兵战术的演进和发展。这些论文表明，虽然蒙哥马利非常关心步兵训练，但他并没有忘记研究过去，并注意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供未来借鉴。

1925年春天，蒙哥马利前往法国去度每年春初的所谓“高尔夫假期”。他与当时的沃里克郡团第：营营长麦克唐纳中校一起到布里特尼海岸的迪纳德去旅行。在那里，这位严肃而且专心于事业的年轻少校，出人意料地爱上了一位比他小一半多的英国少女。那位少女名叫贝蒂·安德森，是一位高级印度公务员的女儿，她金发碧眼，皮肤白皙，美丽动人。

蒙哥马利当时已满37岁。在约克时，他总对预备班的学生说，陆军和天主教一样，一个人若对他的事业认真，就得保持独身。他的格言是：“你不可能做一位好军人，同时又是一位好丈夫。”在这之前，他显然对女性一直缺乏兴趣。大战期间，蒙哥马利在家休假时，喜欢为妹妹温莎安排舞会，自己却不去跳，只是坐在那里看，显得彬彬有礼。温莎不认为他哥哥这种独身思想是受母亲莫德的影响，而认为有些男人就是对女性不感兴趣。

可是，蒙哥马利对贝蒂·安德森的迷恋却来得那样突然，迷得那样深，又那样急于娶她，以至于把自己的格言都抛到了九霄云外，问题可能并不像温莎所说的那么简单。

也许可以认为，直到1925年，蒙哥马利在个人感情方面，一直完全生活在他母亲的阴影之中。一方面，他渴望得到母亲的爱，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向母亲表明自己的爱心，但却屡屡被母亲冷峻地拒绝，他那样专心致志于军旅事业，他满腔的激情，无疑会憋在心中，除自己的家庭外，便无处发泄。他的殷勤越被母亲拒绝，他就越渴望着证明自己深逮的爱心和孝心。过去，他把自己丰富的感情贯注在妹妹温莎的身上，但现在，妹妹已经出嫁。他曾负担弟弟布赖恩读书的费用，并把他调到自己的团里。现在，蒙哥马利显然需要在自己身旁有一个他可以宠溺和珍爱的人。

于是，这位美丽的金发少女便激起了他满腔的激情，使他把爱心和希望全部倾注到她身上。结果，这使他判若两人。布赖恩·蒙哥马利在回忆贝蒂·安德森时说，他们常常在圣马洛的围墙周围散步，然后又穿过松树林，走到海边的沙丘去，在那里，伯纳德在沙上描绘一些图形，向她解说他认为装甲战斗车辆在战争中应该怎样运用，伯纳德告诉她，在他所知道的未来战争中，将会怎样部署坦克同步兵和其他兵种协同作战，以克敌制胜。

尽管贝蒂·安德森还是位少女，而且可能对步兵战术毫无兴趣，但蒙哥马利却仍然滔滔不绝地对她讲解，可见他已对年轻而漂亮的少女神魂颠倒。后来，他竟毫不迟疑地向贝蒂的父母表白他对贝蒂的爱慕之心，并问他们是

否可以向她求婚。贝蒂·安德森的双亲很明智地把这个问题留给贝蒂自己去决定。

贝蒂没有立刻作出答复。显然，她特别欣赏伯纳德。蒙哥马利的坚强个性和品格，包括他的雄心壮志。但是，欣赏并不等于爱情。贝蒂尽管很年轻，但似乎已经感觉到她根本就不可能达到这位野心勃勃的准少校的理想。几周后，贝蒂在福克斯通的一个宴会上“很偶然地”遇上了布赖恩·蒙哥马利，并开始和他调情。以后，他们俩常常见面，一起去跳舞，但他们尽量避免伯纳德·蒙哥马利，不让他知道，以免他伤心。

贝蒂的拒绝使蒙哥马利很难过。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他才从感情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这是他第一次把深沉的情感灌注到家人以外的人身上，但却未获成功。不过，值得安慰的是，他的情感至少可以不必完全倾注在他母亲身上了。

1925年3月，蒙哥马利返回皇家沃里克郡团第1营任A连连长。男女私情丝毫没有影响他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当他到内皮尔兵营报到时，他已拟定一份步兵连训练计划，其中包括从3月18日至8月初的每日课目。他在计划前言中说：“我们的目的是在连训练结束时，使每一个军官和士兵在战斗中对每一种作战所应采取的行动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蒙哥马利的连训练，从一开始就准备作为全营其他单位的示范。这个训练在1925年3月18日上午正式开始。操场教练很少，有时根本就没有。当步兵战术的基本原则讲解清楚后，部队的演练随即开始。演练的课目包括利用地形地物、战地通讯、射击命令、战斗队形、排战术、巡逻侦察、夜间战斗、进攻、退却、防御、陆空协同、野战筑城、坦克支援等。这套计划的目标很高，是沃里克郡团历史上所没有过的。

10年的参谋职务和刻苦钻研，使蒙哥马利对英国陆军应该成为什么样子，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他认为，到了最后，一切战争都变成步兵的对垒，而这些步兵的训练、步兵配合行动的能力，以及同炮兵、坦克、工兵、飞机等协同作战的能力，将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他的这种见解始终未变。不过，是在当连长之后他才体会到，不仅要将自己的看法灌输给每一个军官，而且还要灌输给每一个士兵。

蒙哥马利这种与众不同的训练方式，惊动了第10旅旅长（沃里克郡团第1营隶属于这个旅）。3月30日，旅长亲自率领参谋长前来视察。当时，蒙哥马利正带着A连进行6英里越野前卫战术模拟演习。演习相当成功，旅长满意而归。

蒙哥马利训练计划产生的余波开始扩大，全神贯注于眼前工作的他却全然不知。不久，他奉命将连里的一个排派往第132步兵旅进行一系列的示范。从1925年8月初起，他的声誉开始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这种形势下，陆军部被迫于1925年7月26日将伯纳德·蒙哥马利晋升为正式少校。

两天后，陆军部参谋处一时没有察觉到蒙哥马利刚晋升正式少校，竟再一次发布他的人事命令。原来，坎伯利参谋学院有一名准中校教官的任期将于年底期满，7月28日的参谋会议决定，由准少校伯纳德·蒙哥马利填补这个职位，任期三年。查尔斯·哈林顿爵士曾在1924年10月的机密报告中对蒙哥马利大加赞扬，并提出如下建议：“伯纳德·蒙哥马利是位精明强干的军官，也是位优秀的教官和演说家，对本职的学识和能力远较一般水平为高，兹建议调任参谋学院教官。”显然，陆军部的决定是根据他的建议作出的。

任教官的命令使蒙哥马利兴奋不已，但他在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他照样带着连队参加示范、训练和演习。不管同事们对他的感觉如何，团里从来没有其他连把战术训练搞得像他那么有声有色。他在那里订下的战术原则，在他离开团队调到参谋学院以后，仍然保存不变。如果说他日后在官兵的心里赢得了一“席”之地的话，那不是由于他有天生的肩尚品格，或是关心官兵福利所致，而纯粹是由于他有一种自威灵顿以来，英国陆军中无人可比的敬业精神。

蒙哥马利曾写信告诉他的母亲，他接受了贝蒂·安德森作出的决定。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接受。相反，他觉得自从春季以来，情况改变了。他现在是正式少校，又在参谋学院当教官，保证很快便会晋升荣誉（准）中校。他在参谋学院任期3年，如果他需要，就会给他配住宅。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就买了一张车票前往瑞士伦科，因为贝蒂·安德森一家住在那里。蒙哥马利不是个花花公子，但他已是38岁的人了，而且在事业上已建立起坚实的基础。他也许感觉到，他目前的状况一定会使贝蒂·安德森的父母作出较好的反应。

安德森一家住在伦科的一家旅馆里，蒙哥马利也故意住进那家旅馆。然而，蒙哥马利的努力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贝蒂的决心已定，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改变她的主意。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谁能说贝蒂·安德森的拒绝，对蒙哥马利就一定是不幸呢？36岁的坎伯利参谋学院教官克罗迪·阿金勒，娶了一个21岁的美女为妻，结果甚为悲惨，使他受尽了屈辱；戈特也想在进入坎伯利参谋学院后，娶一个如花似玉的20岁女郎为妻，后来也在很没有面子的情况下分手；假如蒙哥马利的追求成功，贝蒂·安德森能与他白头偕老吗？这确实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经贝蒂父母的介绍，蒙哥马利认识了安德森家族中的其他人，其中包括爱德华爵士和夫人，以及罗伯特·霍巴特的女儿贝蒂·卡弗。罗伯特是位印度官员，已于1910年去世。他的女儿身材不高，容貌也不动人，但乐观快活，颇有人缘。她是个寡妇，有两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13岁。她的丈夫在大战爆发时从军，在加里波里阵亡。她与蒙哥马利同岁，是个艺术家，擅长油画和水彩画，雕塑也很拿手。她住在奇斯维克，离蒙哥马利家人曾住过的地方相距不远。她的祖籍也是爱尔兰，而且属于名门望族。她的弟弟斯坦利曾于1920年与蒙哥马利同在坎伯利参谋学院学习。蒙哥马利发现，他与卡弗太太情投意合，不过，他们当时只是朋友关系。

被贝蒂·安德森拒绝后，蒙哥马利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冬季运动，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帮助儿童学习滑雪。后来，这群人各自返回英国，孩子们回到学校，贝蒂·卡弗返回奇斯维克，蒙哥马利则返回坎伯利参谋学院就任新职。

尽管蒙哥马利不是大学教授，他对历史的兴趣也不是纯学术性的，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却是坎伯利和奎达参谋学院最出色的战术演讲家。究其原因，一是有作战的“普通常识”，二是他具有清晰而又合乎逻辑的表达能力，但更重要的是，他具备第三种气质：雄心。但他与同时代其他一些野心勃勃的有名之士显然不同，他觉得需要对自己的雄心加以控制，以保持平衡。像戈特那种人物，飞黄腾达，却没有真正精通本行学识；像富勒那样的坎伯利参谋学院的佼佼英才，却变成了法西斯主义者；像利德尔·哈特那样妄自尊大的军事理论家，却被赶出了军队；像帕特里克·霍巴特那样的坦

克兵团先驱，却因顽固、暴躁和不听命令，在战争前夕惨遭撤职。蒙哥马利却能始终抑制自己的野心，使其雄心壮志总是在目前任务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一味盲目地追求自己的最后目标；在漫长而又枯燥无味的和平年代，面对现实，认清环境，对自己本职工作的每一方面都狠下苦功，不断地充实自己，坚定地迈向成功的未来。

在坎伯利，蒙哥马利对资深教官、研究室主任艾伦·布鲁克佩服得五体投地。布鲁克比蒙哥马利大三岁，大战结束时是个荣誉（准）上校，曾获两枚优异服务勋章，是转移炮兵弹幕的专家。他思维敏锐，头脑灵活，能谋善断，眼光远大，常使蒙哥马利感到相形见绌。由于布鲁克似乎总觉得他的部属庸碌无能，这更使蒙哥马利自惭形秽。不过，布鲁克亦独具慧眼，认为蒙哥马利在许多方面都是未来帝国参谋总长的材料，所以在各方面都尽可能地给他帮助。

虽然蒙哥马利被研究室主任所震慑，但他对自己的演讲能力仍充满信心，在坎伯利，他成了沙盘的高手和想象力丰富的战术问题发言人。演讲时，他两眼注视着听众，极其清晰地阐明复杂的问题。他具有抓住问题并明确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本领，凡是听过他演讲的人，都会承认他讲话的精确性。从 1926 年开始当教官起，他的声誉便如日东升，越来越高。

1926 年底，蒙哥马利再次到瑞士伦科旅行。同行的有爱德华·克劳爵士及其一家和朋友们。卡弗太太和她的两个儿子又在那里。由于他们的父亲在战争中阵亡，两个男孩也就憎恨战争，憎恨一切与军人有关的事情。但这一次蒙哥马利对卡弗有了更多的了解，以致假期结束时，他已坠入情网。

贝蒂·卡弗原姓霍巴特，她的父亲罗伯特·霍巴特是甫爱尔兰人，年轻时在印度任公务员，40 多岁事业有成时，与 17 岁的北爱尔兰女郎珍纳达·斯坦利结婚。长子查尔斯到印度任公务员，次子法兰克加入海军，三子琅特里克和四子斯坦利成为陆军军官，分别于 1919 年和 1920 年入坎伯利参谋学院深造。

贝蒂·霍巴特在中学与爱丽生·卡弗相识，后通过爱丽生与其哥哥瓦尔多·卡弗相识。瓦尔多·卡弗是位英俊而机敏的孩子，入剑桥大学时才开始操舟，4 年后竟能代表国家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贝蒂·霍巴特貌不动人，但她的为人弥补了外表的不足，她和瓦尔多很快就双双坠入爱河。瓦尔多的父亲是富甲一方的棉花大王，但贝蒂的父亲却反对这桩婚事，认为那是贬低了霍巴特家的身份，因为当时盛行一种偏见，即“职业家庭的人决不嫁作商人妇”。最后，贝蒂的父亲勉强同意，但坚持以卡弗家负担“最庞大的结婚费用”为条件。贝蒂与瓦尔多的婚姻是幸福的，瓦尔多死后，她过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

当格温·霍巴特家的人得知贝蒂与蒙哥马利的恋爱关系时，颇感惊奇。他们认为：蒙哥马利一点也不出众，就算在军中已小有名气，但在外界却仍是无名小辈，既无丰富的学识，又羞怯拘谨，不能落落大方；贝蒂愿意与他结婚，也许是因为她感到孤单寂寞，并需要一个人来帮助她抚养那两个十来岁的孩子。

然而，贝蒂却较霍巴特家的人更能观察入微。从这位沉默寡言、貌不惊人、说话声音比别人高几度、习惯于用手扯自己耳朵的少校身上，她看到一种较她自己、甚至较她哥哥琅特里克更高一等的天才。若干年前，贝蒂写过一句话：“女人不过是个让男人将他丰富的创造力灌注进去的敏感透明体而

已。”对贝蒂来说，一个女人所有的创造性成就，都不过是她从男人身上所吸取的创造力的一种反映和翻版。蒙哥马利正是她所指望的那种男人。

不错，贝蒂与蒙哥马利的爱情与贝蒂和瓦尔多的爱情截然不同，但她却是同样重要。现在，贝蒂已经历过婚姻和生离死别，所以她的爱可能更深沉、更丰富。如果她的朋友私下觉得蒙哥马利配不上她，那似乎一点也不能阻止她。她的本能和直觉告诉她，她找对了人：这个男人的禀赋，在军队以外，只有她的慧眼才看得出来。尽管他的态度有点专横，但她仍可以爱他，而且可以像母亲般地照顾他。

从 1927 年春开始，贝蒂和蒙哥马利频频见面，但却一直没有提起婚事。贝蒂的哥哥逼她催促蒙哥马利表明意图，但贝蒂羞于启口，蒙哥马利却仿佛浑然不觉。

4 月中旬，蒙哥马利带着弟弟布赖恩和皇家沃里克郡团第 3 营的 3 个少尉，前往一战战场作一次十分勇敢的自行车旅行。4 月 27 日，旅行结束。回到坎伯利后，蒙哥马利又继续与贝蒂交往。

蒙哥马利就这样追求贝蒂，可是却一直不谈及婚事。那么，蒙哥马利为什么不提出求婚？是因为害羞？是不愿冒第二次被打击的危险？还是他没有把握能否负得起一个寡妇和两个十来岁孩子的责任？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

1927 年复活节那天，贝蒂提议与他一道去看看她儿子约翰的学校。蒙哥马利欣然同意。当走近手球场时，贝蒂让约翰和迪克到别处玩，随后便对蒙哥马利说，也许人们已开始对他们俩窃窃私语，因此提议暂时停止见面。蒙哥马利不同意，同她争辩，但贝蒂坚持不再见面。蒙哥马利一听急了，马上对她说：“别傻，贝蒂，我爱你。”贝蒂哭了，蒙哥马利紧张地松了一口气，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当孩子们冲进手球场时，迪克首先听到他们订婚的消息，但他觉得很不是滋味，急于要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一直把蒙哥马利看作朋友，而不是父亲，从未想到他们俩会结婚。

也许是为了这个缘故，贝蒂要求蒙哥马利不要急于宣布他们订婚的消息。他们通知了蒙哥马利的家人，又等两个孩子都回到了学校，才干 1927 年 6 月 25 日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则正式的结婚启事：

“坎伯利参谋学院的师级参谋官伯纳德·蒙哥马利中校与伦敦 W 四区奇斯维克林荫大道滨河第 2 号的卡弗太太订于 7 月 27 日在伦敦举行结婚仪式。”

1927 年 7 月 27 日，伯纳德·蒙哥马利与贝蒂·卡弗在奇斯维克教区教堂举行婚礼，喜结伉俪。正是：不惑之年迎喜事，刚升官职又娶妻。欲知蒙哥马利婚后生活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六章 驻防海外

年过四十得贵子，编撰教范手法奇；
驻防亚非无奇功，再任教官坐首席。

话说伯纳德·蒙哥马利在1927年7月27日的婚礼结束之后，等不及结婚酒宴，便带着贝蒂匆匆与家人道别，驾车而去。

蒙哥马利带着贝蒂风驰电掣般地驶向什罗浦郡的斯特雷顿教堂，并在什罗浦郡开始了他们幸福的蜜月生活。白天，他们一起玩高尔夫球，一起游山玩水；晚上，他们一起读詹姆斯·史蒂芬的《黄金罐》，一起欣赏音乐。几天之后，他们回到伦敦，看看两个孩子是否得到妥善的照顾，然后前往他们的罗曼史发祥地——瑞士，继续他们甜美的蜜月生活。

结婚时，蒙哥马利曾答应抚养贝蒂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儿子。从度完蜜月归来的时刻起，一个新的蒙哥马利家庭便诞生了。父母的婚姻“震撼”一消退，两个孩子便发现他们的假日生活与从前大不相同。以前贝蒂管家时那种杂乱无章的情形已不复存在，蒙哥马利的整洁与规律主宰一切。

蒙哥马利把新娘子视如至宝，把自认为是压在贝蒂身上的一切负担承担起来。每天早餐后，他让家里的全体工作人员排好队站着，听他给每一个人下达有关食物卫生等每一件事情的命令，但他的妻子却不参与，因为他要让她有充分的时间去绘画，做她所爱做的事情，而不让家务琐事给她增加负担。他认为，他们家有一个专门负责膳食和清扫的“机构”，而且他又善于利用它，为什么还要再麻烦她呢！他按照军事准则和军队的规矩管理全家事务，任何事情都必须按他的意思好好地做、有效地做，否则，他便不能忍受。

贝蒂本来是个无拘无束和富有浪漫气质的艺术家，对家庭琐事乐得由他去管。于是在表面上对他的“军事统治”处处让步，但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却并非如此。当着众人的面，蒙哥马利可能对她说“不”，可随后贝蒂就私下和他争论，结果多半是贝蒂占上风，最后如愿以偿。

他们俩的性格完全相反，但这种相反的性格却相互吸引着对方。贝蒂那种无拘无束和玩世不恭的性格深处藏着一种对规律的需要，而蒙哥马利那种完全自律的性格深处也暗藏着一种对不规律和赤裸裸的情感的需要。这种需要使他们彼此吸引、相互尊重、同时又相互迁就。结果，他俩形影不离，如胶似漆。

两个孩子以前被母亲宠坏了，根本没有纪律可言。因此，他们对蒙哥马利治家的专制和霸道颇感不快，并多少有些反抗，但后来都慢慢地适应了。蒙哥马利很关心他们，经常安排他们去军校骑马，到湖里划船，到游泳池游泳。此外，参谋学院附近还有一片树林可供他们去骑自行车或散步，他们的环境比以前好多了，生活也更有情趣，并且有更多的时间和母亲在一起。

1927年圣诞节，蒙哥马利不再是独自一人跑到瑞士去的寂寞光棍汉，而是率领妻儿前往的一家之长。一路上，贝蒂恶心呕吐，但这次不是晕车晕船，而是有喜在身。蒙哥马利像母鸡护卫小鸡似地护卫着贝蒂，因为她已40岁了，不得不处处小心。

1928年8月18日，贝蒂在坎伯利他们的平房里，在一大群医生和护士的照顾下，生下一个男孩。他们给孩子起名戴维·蒙哥马利，并请了一位保姆照顾他。自从生了戴维后，贝蒂的身体大不如往常，但她却总是精神饱满，

心情愉快，从不生病。

蒙哥马利虽然有了自己的儿子，但却没有减少对继子的关心和爱护。

1928年圣诞节来临时，为了保持和提高他们的滑雪技术，他留下贝蒂照顾戴维，又带着约翰和迪克去伦科旅行。他们3人住一间屋子，三张床排在一条线上，但他要求孩子们自己整理自己的东西，同时处处注意让他们玩得痛快。

这次假期使孩子们终生难忘，也使蒙哥马利有机会冷静地考虑自己的前途，因为到1929年1月，他在参谋学院的3年任期就将届满。经过认真的考虑，他同意回皇家沃里克郡团去工作。当时皇家沃里克郡团第1营已从肖恩克利夫调往英克曼营房，由他的旧同僚和朋友克莱门特·托姆斯指挥。1928年1月，伯纳德·蒙哥马利晋升准中校。

1929年1月21日，他在坎伯利参谋学院的任职正式结束。休假1个月后，他于1929年2月21日回到沃里克郡团第1营报到。不幸的是，营里只有一个本部连，而且没有连长。本部连仅管理鼓乐队、通信兵和文书人员。给他一个本部连指挥，托姆斯营长感到很不好意思，但蒙哥马利好像并不在乎。他处理本部连的工作就像处理艰深的军事问题一样热心，一样有效。

1929年夏天，陆军部打算调蒙哥马利去担任步兵训练教范编写委员会的秘书，他赶紧抓住了这个机会。1929年10月15日，蒙哥马利准中校暂时从团里调出来，成为陆军部的“配属”军官，每天多领5先令的特别津贴。

那本《教范》的作者已几易其人。1921年版大部分由利德尔·哈特负责；1926年版则由戈特子爵编撰。蒙哥马利觉得，就编写训练教范而言，在英国陆军中没有任何军官较他的经验更为丰富。于是，他决心把它编成一本供步兵军官阅读的内容广泛的作战论著。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蒙哥马利在名义上只不过是编写委员会的秘书而已，它的真正负责人却是戴维·康贝尔爵士。当蒙哥马利向委员会提出草案时，当即引起激烈的辩论。委员会对草案提出了无数修改意见，但蒙哥马利却认为那是“挑剔细节”；委员们要把教范写成本有关战术的手册，蒙哥马利却采用战术的最广义的解释，要把它写成一部有关作战的论著；委员们要求教范反映陆军部的观点，蒙哥马利却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双方意见分歧很大，又互不相让，僵持不下。6个月的编写期满，双方仍然无法达成协议。于是，蒙哥马利使出巧妙的一招：建议解散委员会，由他自己利用时间（不领津贴），把委员们所提意见一并纳入手册，完成原稿整理工作。委员会一方面考虑到对草案争论过久，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如果不解散委员会，陆军部的成本负担就会过大，于是接受了他的建议。可是，蒙哥马利在写出最后一稿时，却把委员会所做的修改全部删掉，结果，该书出版后深受好评，蒙哥马利也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

1930年7月10日，蒙哥马利又回到沃里克郡团第1营。几周后，他成为托姆斯中校的副手。托姆斯中校预定当年底调往陆军部工作。

蒙哥马利在编写训练教范的工作上得心应手，踌躇满志，又自信将在托姆斯中校之后继任营长，一时情绪高涨，得意忘形。他在家中为团里的年轻军官及其友人举办舞会。舞会中，他三番五次地爬上桌子，高声下令“交换舞伴”，弄得在场的人个个尴尬不安。但那些可怜的尉官又不敢不服从他的命令。

蒙哥马利尽管对托姆斯中校忠心耿耿，但却渐渐显露出处处与众不同，

有时难免给人一种他在当年秋天已当定第 1 营营长的印象。

1931 年 1 月 17 日，伯纳德·蒙哥马利在初到皇家沃里克郡团第 1 营 12 年之后，正式晋升为该营营长。

皇家沃里克郡团第 1 营在国内驻防已有多多年，现在应该轮调海外服务，地点是巴勒斯坦。蒙哥马利主教听到他的第三子将率领一个营前往圣地戍防，非常高兴。贝蒂也很高兴，不过，她的长子约翰正患重病，她只好过些日子再去。

1931 年 1 月初，皇家沃里克郡团第 1 营从南安普敦启航，前往塞德港，再从那里搭乘火车前往耶路撒冷。

到达巴勒斯坦后，蒙哥马利实际成为所有驻巴勒斯坦英军的指挥官。除自己的沃里克郡团第 1 营外，他还负责指挥驻在海法的一营御林军。由于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英军总司令约翰·伯内特-斯图尔特将军的基地在开罗，所以蒙哥马利实际上成了那个国家的督军。他不仅要指挥驻巴勒斯坦的英军，而且还要与驻叙利亚、外约旦和黎巴嫩的外国军队保持接触和联系。因此，他要跑的地方很多，要办的事很多，整天忙得不亦乐乎，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理自己营里的事务。

1931 年 6 月，贝蒂带着戴维来到巴勒斯坦，约翰·卡弗则在暑假时赶来。蒙哥马利带着一家跑遍了佩特拉、杰拉什、大马士革和巴勒贝克等地，到处观光游览。贝蒂非常喜爱这个国家，过得十分愉快。她不时拿起画笔，画下她感受最深的景色。在她所画的作品中，有一幅描写巴勒斯坦人在这路撒冷一间清真寺的阶梯前取水的水彩画，现在已成为她的重要代表作。

沃里克郡团第 1 营在巴勒斯坦执行了一年的警察性质的任务之后，于 1931 年底奉命移防埃及亚历山大港。在那里，它派出一支骑兵分队，作为苏伊士运河旅的部分，担任城防任务，归弗雷德里克·派尔准将指挥。

蒙哥马利中校因为在巴勒斯坦服务优异，于 1932 年 3 月 1 日晋升准上校。伯内特-斯图尔特将军在送往陆军部的考核报告中写道：

“伯纳德·蒙哥马利中校聪明，有活力，有雄心，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官。他有个性，有学识，对军事问题能把握要点，迅速进入情况。以其才能，理应晋升较高职位。但若晋升，伯纳德须加强机智、忍耐和审慎等方面的修养。本人对他的才能极为赏识，特作这点善意的建议。”

蒙哥马利显然承认了伯内特-斯图尔特将军对他的批评的正确性，因为他把考核报告抄录下来，夹在私人文件中，保存了 40 年。

在巴勒斯坦，蒙哥马利第一次真正体验到当高层指挥官的责任和权力，并且被这种体验所陶醉。因此，在其后的几年中，曾有人想调他去任各种高级参谋职务，但他都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他已尝到权力的滋味。与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发现权力非常合他的胃口。

移防亚历山大可能使他感到失望，因为他的权力范围缩小了。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驻防亚历山大后，部队集中一地，执行单纯的任务，这使他又有了又一次显露看家本事的机会。他可以按照十几年来来的研究成果去训练部队，去创造一种新型的正规陆军营。

蒙哥马利要求连队在开始训练前先作好训练计划，送给他过目。计划批准后，就让连长带着连队远远地离开亚历山大，随你在什么地方都行，但必须有充足的水和其它补给。蒙哥马利特别强调夜间训练，要求训练士兵在黑

暗中运用作战技巧的能力，尤其是使用机关枪和支援火炮的能力。因此，连队大都在夜间离开营地出去训练，而且每次出去不得少于 48 小时。他经常不定时地到连队检查训练工作，可能在半夜，也可能在白天，连队根本不敢掺假。

连训练之后，接着就搞营训练。蒙哥马利要把全营带到沙漠中去训练，但旅部说，天将下雨，不能同意。蒙哥马利便和他们争吵，最后终于把部队带了出去。旅部不提供运输工具，蒙哥马利就带着全营步行，白天走路，晚上露营，两天之后终于到达目的地。

蒙哥马利拟定了对抗演习计划。部队一出去就是两三天，不是攻击敌村庄，就是防守某一要地，他本人则担任裁判。为了鼓舞士气，部队每次回来他都要举行康乐竞赛，每个连都要表演一套节目，表演最精彩者可以在亚历山大休假两天。部队对蒙哥马利的新训练方法很感兴趣，训练热情不断高涨。

后来，驻埃英国陆军在沙漠中举行战术演习，蒙哥马利的部队表现相当出色。在那次演习中，伯内特-斯图尔特将军让蒙哥马利充任旅长，德·甘冈充任旅参谋长，将军和旅长则是实际的裁判。蒙哥马利打算大显身手，于是完全不按传统沙漠作战方式策划作战，一心要在夜间，甚至连“敌军”的准确位置都还不知道时，便要发动先制攻击。为了确保胜利，参谋长德·甘冈不得不使他的进攻节奏慢下来，于是说：“旅长，等一等，我们手上还没有足够的情报资料可以说明‘敌军’的准确位置……”然后，德·甘冈马上找到一位在开罗的皇家空军朋友，请他到“敌军”上空去飞一次，拍些照片回来。照片很快就送来了，上面精确地标示了“敌军”装甲车在沙漠中的集结地点。于是，蒙哥马利指挥部队兼程赶去，在黎明前将“敌军”包围起来，彻底打败。

这次“胜利”部分是由于德·甘冈的智慧，但主要还是由于蒙哥马利对部队的精良训练，是那种训练使部队能够完全在夜间运动和搜索“敌军”目标。

蒙哥马利的工作效率极高，亲自控制着营里的一切，因此显得专制和霸道。尼尔·霍尔迪奇中尉在 45 年以后回忆说，从战术的观点看，这个营是顶尖的。甚至那些下士们也开始像在战场上一样，满脑子战术思想。可是那些连长却并不特别精明。带着那样的庸碌军官，蒙哥马利只好把全营的一切事情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决定一切，任何人与他争辩都无济于事。不经过他批准，任何人都不能从一个排调到另一个排去。副营长、副官等，全都是些唯唯诺诺的人，他亲自决定所有人的升迁，结果弄得谁也不知自己的处境如何。第 1 营是个正规、刻板的战前陆军营，蒙哥马利的方法，官兵们不一定都能适应，因此他也并不因此而更得人缘。

在营以外的情形也是一样。旅长弗雷德里克·派尔是炮兵军官，不懂步兵业务，蒙哥马利就告诉他应该做些什么，但由于方法不当，弄得两人的关系很不融洽。

尽管如此，在蒙哥马利后来调离埃及时，派尔还是在给陆军部的报告中写道：“蒙哥马利的能力肯定超出了他的军衔，他应当在陆军里获得更高的军衔。只有当他偶尔会犯的专横毛病变得太严重时，他才达不到这个目的……他具有丰富而独创的思想，并且能用无与伦比的方式把它们表现出来。他真正为士兵所喜爱的，是他关心他们，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孩子。也许第一步应该派他去军事训练总监部服务，他的知识和工作方法必定使陆军在效率方面

获益最大。”伯内特—斯图尔特将军表示同意派尔的建议，他写道：“伯纳德·蒙哥马利当营长的时间已经是够长的了，是应该让他担任高级职务的时候了。我希望能派他去训练总监部干一两年。”

可能是由于这一类的建议，才使得蒙哥马利在埃及服务期间，至少有两次担任参谋职务的机会。但是，他已把自己的前途全部盘算好了，不会让任何事物来妨碍他的计划。当他在埃及指挥他的营参加演习时，有人建议调他去任参谋职务，但他拒绝了。他的一名连长P·J·格辛少校对他说：“长官，这一着儿聪明吗？这是你第二次拒绝参谋职务了，也许以后不会再有这类机会了。”他回答说：“什么？我要回去，要到陆军部去拍桌子。你听着，今年年底，我将带着这个营去印度。然后，我将晋升准将，再去指挥一个师，最后成为帝国参谋总长。”

蒙哥马利的自信心迅速增长，这或许与其快乐的家庭生活不无关系。贝蒂现在与他在一起，对他的雄心壮志处处鼓励，而不是使他分心。大家发现，贝蒂·蒙哥马利是一位贤淑的“上校夫人”，她仁慈、宽厚、诚恳、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从不炫耀，从不耍手腕，并且乐意帮助其他眷属。贝蒂虽然有艺术家的气质，但在穿着和仪态上丝毫没有特异之处，她的衣饰是朴实而得体的。她为人风趣，富有幽默感，和她交谈不会使人感到沉闷。她也常常开蒙哥马利的玩笑，逗得他大笑不止。

蒙哥马利记得，有时一个小小的事件也能逗得贝蒂欢乐无比，例如，在埃及时，为了使军人们快乐和满意，蒙哥马利鼓励各种嗜好，其中一项就是放养鸽子，就连他自己也养了一些。一天，一位军需官指控一名下士偷了他的一只鸽子。下士否认，说那只鸽子是他的。于是，蒙哥马利出场裁决。他对军需官和下士说，如果把这只鸽子放掉的话，它总会直飞它自己的鸽房，对此双方表示同意。于是，他命令把那只鸽子送往营文书室饲养24小时。第二天上午10时他将亲手把鸽子放掉。这件事早已惊动全营官兵，大约有800人站在各个有利的位置观看放鸽结果。当鸽子被放掉之后，它在兵营上空盘旋了几分钟，然后直飞蒙哥马利的鸽房，并呆在那里不走了！这一结果为双方所接受。军需官撤回了他的指控。

蒙哥马利平时稍饮一点酒，抽一点烟，偶尔赌赌钱，经常玩桥牌，并且督促办事人员确保亚历山大的部队使用清洁的“军中乐园”。伯奇中尉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那些妓女是由我们自己的军医检查的。士兵们不必说出他们的名字，只说出他们的部队番号，并填写一张小纸条，说明他们已经使用过规定的预防药。结果，我们患性病的比率极低。我是说，亚历山大是个最有名的地方。那里什么都有，赛马、网球、打鸭子——只要你说得出来的，那里一应俱全。你没有办法阻止官兵们去找女人，但你可以保证他们找的女人都是健康的。蒙哥马利鼓励这种活动，并使这种活动继续保持着。事实上，他把这种活动当作一种笑料——他常常和士官们开玩笑，谈论他所谓”的‘平面娱乐，。”

虽然蒙哥马利认为，对一个士兵的真正考验不在于他能否很好地站岗放哨或不逛窑子，而在于他在战场上怎样行动，但他决不会让部下无限度地纵欲。当时营里有一位叫恩××的单身军官，不仅嗜好杯中之物，而且常常拈花惹草，贪恋女色。后来，他终于显露出疲乏不堪的样子，被蒙哥马利发现。蒙哥马利不忍心办他，但却逼他说出实情，并要他答应以后过一种间心无愧

的生活。

“不准再贪杯！明白吗？戒色！如果你真耐不住，先告诉我。”蒙哥马利警告他说。

有一天晚上，蒙哥马利正在家中举行宴会，电话铃忽然响了。他拿起电话问：

“哪一位？”

“长官，我是恩××。”

“什么事？”

“长官，我非找个女人不可。”

“唔，好吧，——只一次，记着！”

许多年后，麦克唐纳少将回忆说，蒙哥马利给自己定的标准很高，如果别人不能同他配合，他是冷酷无情的。但是，他也能体谅人，甚至是很重感情的，从不会忘记每一位朋友或每一位好部属。当年他营里的年轻中尉伯奇感染了小儿麻痹症，他从开罗请来最好的医生给他诊治，并和贝蒂经常到医院去看他，直到他返家调养为止。瘫痪了的伯奇中尉的病情虽有好转，但根本还谈不上履行军职，可蒙哥马利仍要他回到营里，又坚持把他的破格提升为皇家沃里克郡团一个地区自卫部队营的副官，致使另外两个候选人落选。

蒙哥马利废除营里的周末教堂阅兵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举行营音乐会。在一次营音乐会上，有两位列兵惟妙惟肖地模仿蒙哥马利和团士官长。蒙哥马利在一片吵闹中大声吼道：“有这种本事，怎可以让他当列兵，升他下士！”蒙哥马利的幽默在部属心中赢得了好感。

1933年底，皇家沃里克郡团第1营离开亚历山大，移防印度南部的浦那。当他们于1934年1月到达那里时，得到的却是异常冷淡的接待。

原来，浦那是以注重传统的制式操练、仪式和各种社交活动而闻名的“懒人地带”。皇家沃里克郡团第1营重视战术训练，不注重礼仪训练，其营长又以在亚历山大支持合法的“军中乐园”而闻名。这样一支部队的到来，自然不会受到印度陆军南方指挥部的欢迎。

南方指挥部指挥官乔治·哲弗雷斯将军曾参与第一部步兵训练教范的编写工作，对制式基本操练十分“着迷”。蒙哥马利编写了第三部步兵训练教范，对战术训练热衷得“发狂”。结果，这两个训练教范作者在训练问题上的对立，变成了一场旗鼓相当的争斗。

1934年1月的某天早上，蒙哥马利带着部队在浦那跑马场上训练，哲弗雷斯将军来到训练场，在蒙哥马利还未喊出“敬礼”或其他任何口令之前，哲弗雷斯就说：“你早，蒙哥马利，你应该站在你的营前面××步，你站的位置错了。”接着，他坚持要看这个营做他最喜欢的连会操。蒙哥马利本应下达一连串的口令，可他一点也不动。结果，部队弄得七零八落，乱成一团。蒙哥马利灵机一动，马上大喊：“皇家沃里克郡部队，成四路纵队，跟我来！”话毕，策马而去。全营官兵终于找出一个头绪，紧紧跟在他的后面，乱作一团的局面才告结束。

哲弗雷斯尽管在操场上羞辱了沃里克郡团第1营营长，但在其他事情上，他却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南方指挥部坚持说，1857年的印度起义，是在星期日上午英国人全都在教堂时发生的，因此要求第1营在星期日必须集体携枪进入教堂。蒙哥马利不愿那样做，因为那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每支枪取出来时要签字，交回去

时又要签字。但指挥部坚持必须那样做。结果，蒙哥马利便在每个星期日派出一队武装士兵站在教堂外面，“以防爆发第二次叛变”。

蒙哥马利的态度等于是不服从命令，令哲弗雷斯将军非常生气。因此，当蒙哥马利请假和妻子去远东旅行时，立刻如愿以偿。他们预定从孟买启航，途经科伦坡、新加坡、香港、上海，最后到达日本停留两周。蒙哥马利和贝蒂早就盼望进行这次完全脱离军营生活的旅行，于是5岁的戴维由一名保姆带回英国。

1934年3月底，当邮轮抵达香港时，蒙哥马利收到一份驻印陆军司令部发来的电报，推荐他到奎达参谋学院担任首席教官。得到这个消息，蒙哥马利并不怎么高兴。因为他曾对他的连长格辛拍胸脯说，他下一步将要指挥一个旅，然后指挥一个师。他已经有在参谋学院任教的经验，没有必要再任教官。他现在46岁，等到首席教官任期结束时，他将是49岁。会不会因为走了这一步而耽误他当旅长的3个重要年头？陆军部于1934年3月19日发给驻印英军总司令的电报说：“同意对蒙哥马利的推荐。但你应该告诉他，如果他不接受，明年则可能派他回国任参谋。”最后这句话很可能促使蒙哥马利下了决心。

在奎达当三年教官可能是他军旅前程中的一条岔路，可再在浦那多熬一年，然后回到英国去担任参谋工作，岂不是更浪费时间？在与贝蒂商量后，蒙哥马利即回电表示接受首席教官的职务。接受这个职务，便表示在1934年6月上任时，即晋升为上校。不过，蒙哥马利似乎总有一种担忧：自己可能会成为一条“误了期的船”，等最后战争爆发时，自己可能已年纪太大，不适合担任指挥职务了。

实际上，蒙哥马利离开沃里克郡团第1营的时机是恰到好处。他刚离开后，便有一个谣言传出来。在埃及时，皇家沃里克郡部队曾夸口该部队头等射手之多，非一般部队可比。但在印度，打靶是由其他营验靶。结果，沃里克郡部队全都是三等射手！实际情况是，在亚历山大时，蒙哥马利要求各连好好训练射击，各连长由于害怕成绩不好而挨训，便暗地里用尖铅笔将成绩记录卡上的数字加以篡改。不过，印度的93毫米步枪也可能是打得不好的真正原因。

不管真实原因如何，皇家沃里克郡团第1营的名声只好留给继任营长去挽回了。1934年6月29日，伯纳德·蒙哥马利前往奎达参谋学院就任首席教官。正是：朝思暮想当旅长，谁知再把教官当。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七章 妻逝夫悲

夫妻十载多恩爱，妻赴黄泉夫悲哀；
练兵演习传捷报，幸运厄运一起来。

话说蒙哥马利一到奎达参谋学院，便引起一专小小的风波。那是星期日上午，蒙哥马利前往参谋学院正式报到，但他穿的不是中校军服，而是上校军服，超过了原来在那里的两位教官。大家对他第一天报到就以上校身份出现感到气愤，认为那是十足的虚荣和炫耀。于是，人们私下议论说：“蒙哥马利从浦那来时，一定是在火车上就把上校的服装和徽章换好了。”

可是，当这位新上校开始讲课时，大家那点怨气便消失了。蒙哥马利开始被派去作二年级的首席教官，但院长盖伊·威廉斯觉得蒙哥马利的优长在作战和训练方面，于是改派他为一年级首席教官，主教一年级的作战指挥技术和参谋职责。

蒙哥马利的讲课方法独树一帜。他带着笔记本走进教室，先在自己的桌子上看三四分钟的笔记，大家静静地坐着等他。然后，他走到讲台前侃侃而谈，说得头头是道。然后，他又走回自己的桌子研究三四分钟笔记，再回到讲台一口气讲十多分钟，表达清晰、流利，十分精彩，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

蒙哥马利对那些他认为是“废物”的学生毫不留情。例如，他有一次在一个学生的试卷上批示：“一大进步——蹩脚到家。”但他对那些他认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人，却煞费苦心，鼎力相助。例如，在埃及的沙漠中演习时会担任他的营参谋长的弗朗西斯·德·甘冈足智多谋，被人称为“智多星”。蒙哥马利特别赏识他的发展潜力，一直极力帮助他进入坎伯利参谋学院。

1934年，德·甘冈终于获准进入坎伯利参谋学院，于是写信向蒙哥马利致谢。蒙哥马利在回信中以他特有的口气说道：“对那些不走正道请求长官为自己谋取职位的人，我是不愿意帮助他们的。这只会把一个人毁了……我支持的人，一向都不会错。万一错了，是他自己不肯好好干。你在坎伯利应该干得很好。”蒙哥马利对德·甘冈的提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报偿——德·甘冈成了他最得力的参谋长。

布赖恩·蒙哥马利和达德利·沃德将军在回忆中都觉得，在奎达参谋学院这个时期，蒙哥马利的战术观念已经完全成熟。这倒不是说他的战术观念新颖惊人，而是说他的战术观念绝对清晰和完整。虽然战术的分支课程是由一般教官担任的，但就整个战术教学而言，则完全是按首席教官的思路进行的。沃德将军回忆说：“我们大家都感到，能听蒙哥马利那种学识渊博的人讲授军人行业中较高层次的学识，是十分荣幸的。后来我们个人在军事能力方面的发展，都有赖于蒙哥马利的教导和他的战术原则。我认为，一般人对利德尔·哈特的评价都过高。一般人都迷信机动能力。当然，如果你有机动能力，自然不错，但往往并非如此，你在战场上取胜的唯一途径，就是把想要剥夺你的机动能力的敌人打败，而教我们怎样去打败敌人的正是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与院长盖伊·威廉斯少将相处得十分融洽，院长对自己的首席教官推崇备至，不到一年时间，即1935年4月，他便在写给陆军部的机密报告中说，伯纳德·蒙哥马利博览群书，富有作战经验，具有坚强的性格，对

自己的行为和工作，高标准，严要求，是位优秀的训练人才和颇有说服力的教官，因此推荐他“早日担任常备部队的旅长或晋升准将参谋”。

威廉斯的报告与陆军部日益增多的对蒙哥马利的评核材料大体一致。5月8日，陆军部人事评议委员会一致通过：一旦有缺，即任命蒙哥马利为常备军步兵旅旅长。

这消息传到蒙哥马利耳朵里时，一定使他信心大增。可是，他不敢高兴得太早，如果他当首席教官期满时仍无空缺，他的前途便不容乐观。

在奎达，蒙哥马利的帽子也是一大趣闻。学生们全都戴孟买常礼帽，而他却戴一顶陈旧的白色遮阳帽，大家都叫它“站长帽”。“站长帽”很不时髦，但却大受学生欢迎，因为每次演习，你总可以看见蒙哥马利在什么地方（奎达是一片开阔的平原），你可以看见那顶白色遮阳帽到处晃来晃去。后来，有人问他，“长官，你为什么喜欢戴那顶白色遮阳帽，它太不时髦了，当然，我们并不反对。”他回答说：“哎，人都喜欢戴特别的帽子，帽子是他们的性格的标志。丘吉尔老是喜欢戴特别的帽子，我也是！”当时丘吉尔相当消沉，蒙哥马利却与他相比，是很不寻常的。

1935年2月，蒙哥马利对一年级新生说：“你们每个人都会请我去吃晚餐，但是，我不会去，因为你们一共30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我要请你们每一个人吃晚餐，你们全体都要到我家里来。”自然，学生们后来都去了。一位年轻军官记得：“贝蒂的肤色黝黑，身高和年龄同蒙哥马利相仿；她活泼愉快，笑口常开，她的衣着朴实无华，不特别显眼，但却令人看着舒服，她有相当好的教养和天赋，是位水平很高的油画和水彩画画家，也是小有名气的雕塑家。贝蒂和蒙哥马利都有一种敏锐的幽默感，爱互相开玩笑。他们都是慷慨的好主人，我有好几次被请去参加他们的晚餐。有一次晚餐结束后，当我们准备出发去进行为期一周的野外演习时，贝蒂说，‘女士们，趁着蒙哥马利和男士们到野外去演习当丘八，请跟我来，让我们讨论一下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蒙哥马利喜欢这一套，他们彼此相爱，毫不隐瞒。”

1935年5月31日，奎达发生大地震，一夜之间，死亡约3万人。这场灾害比蒙哥马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见过的任何屠杀都更为可怕。为了防止霍乱等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驻军司令下令用铁丝网把全城围起来，实行封锁。奎达参谋学院位于层层岩石之上，在地震中幸免浩劫。两天后，奎达河谷又震了一次，学院的大钟响了17下。为了预防万一，贝蒂带着戴维回伦敦去了。

奎达的地震使蒙哥马利和贝蒂分离了8个月。

1936年1月，贝蒂把戴维安排在欣德黑德上预备学校后，又回到奎达，与丈夫生活在一起。贝蒂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对丈夫百依百顺的人。事实上，贝蒂在蒙哥马利面前总能够随心所欲。例如，蒙哥马利说，你今天下午不可到那里去。她却说，哦，我的确要去啊。结果，她去了，蒙哥马利很有雅量，不但容忍了，而且还很愉快。贝蒂是位骄傲而坚强的女性，蒙哥马利不仅钟爱她，而且敬重她。

在奎达期间，贝蒂画了许多油画和水彩画。当她在1935年和1936年返回伦敦时，她把许多画赠送给友人。托奇·巴克准将便是那些友人之一。他回忆说：

“1935年，贝蒂在回伦敦前，把她所绘的画统统挂在她的画室里，邀请她的朋友，也包括我和我的太太去看，然后说：‘请各位挑选，喜欢的就拿

去。’蒙哥马利便对我说：‘哦，对啦，托奇，我告诉你应该挑哪张。’我说：“不，不，我要自己挑选。”但蒙哥马利很固执，说：‘不，不，我带你去看。’他把我带到一幅画有花和彩虹的画前面，说：‘就是这张！’我抗议说：‘不，不，我自己挑挑看。’于是我到处转，到处挑，自然，我挑选了他推荐的那幅，那确实是最好的！”

1937年2月20日，陆军部致电蒙哥马利说，在朴次茅斯的第9步兵旅旅长在本年8月5日出缺，准备派他接任。3月3日，蒙哥马利回电表示愿意接受，从接任新职务起，蒙哥马利将晋升准将，但从6月29日他的现职终止时起，他将被减至半薪。

1937年5月22日，蒙哥马利在返回朴次茅斯去接任第9步兵旅旅长的途中，写信给利德尔·哈特说，他希望在伦敦与他见面，讨论有关野战部队等问题。

蒙哥马利在与利德尔·哈特的通信联系中断7年之后，再次给他写信，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时，利德尔·哈特已成为新任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一贝利沙的私人顾问，实际上成为最高军事当局的幕后力量。哈特从未在战场上担任过陆军中尉以上的职务，但他现在不仅能影响霍尔一贝利沙对一般军事的态度，而且能影响他对高级军官的任免。多年从事军事新闻工作而感到抑郁不得志的哈特肆意运用他的影响力，竟说服霍尔一贝利沙撵走帝国参谋总长，而委派仅指挥过旅级部队的戈特去占据那个职位。虽然戈特对军事史下过很大功夫，但他缺乏将帅的经验和气魄。如果按正常程序晋升，他能否升到师级职务都是个疑问。

蒙哥马利于1937年5月回伦敦后，是否与利德尔·哈特会过面，不得而知。但他决定利用这两个月的假期和贝蒂驾车邀游兰开夏北部湖区，并顺道看看朋友。在北方旅游期间，贝蒂的身体似乎比以前更虚弱，更容易疲劳，但她还是如往日一样的欢乐。

蒙哥马利将于8月5日前往朴次茅斯就任旅长，但他的半月堡式官邸要到9月才能装修完毕。此外，第9步兵旅8月下旬要在索尔兹伯里平原进行野营演习，蒙哥马利要与部队住在一起。因此，从北方返回后，蒙哥马利便让贝蒂和戴维到“新公园”与母亲同住，然后在8月下旬再住到滨海伯纳姆的一家旅馆去，让戴维度过剩余的假期。蒙哥马利安排他们到滨海伯纳姆是因为那是贝蒂最亲密的朋友南茜·尼可生的家乡，同时也离索尔兹伯里的营房较近；此外，戴维还可以自己在沙滩上玩，让贝蒂过得悠闲点。

第9步兵旅辖4个营，隶属于第3师，而第3师则隶属于南方军区。当时的南方军区司令是伯内特-斯图尔特将军。他30年代早期曾在埃及任英军总司令，对蒙哥马利特别赏识。

蒙哥马利刚上任就着手实施他的前任雷克斯旅长作出的演习计划。雷克斯是训练部队的好手，但他的训练方法与蒙哥马利的完全不同。旅参谋长F·W·辛普森少校记得，蒙哥马利拿起训练计划说：“这计划不行。在一日之内实施3个演习，我看毫无道理。我一共只要4个大演习，每次三天，部队要有3个夜晚在野外，一定要习惯在夜间行动。”于是，辛普森少校赶紧修改演习计划。

根据演习计划，结束时有一第9步兵旅对第7步兵旅的对抗演习。演习裁判由师长担任，演习目的是考验双方旅长和他们的参谋的能力，预计有两昼夜在野外。第9旅的任务是夺取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一座小土冈。第7

旅由威廉斯·裴勒特准将指挥，当时驻索尔兹伯里平原，其任务是防守那个地区，并尽可能使进攻者遭受最大的伤亡。

蒙哥马利让参谋长制定进攻计划。辛普森的计划大体是按照在参谋学院所学的，在正面发起3个佯攻，而将最强有力的攻势放在其中一个的后面。蒙哥马利看过计划后说：“这样根本不行，太正规了。你要给裴勒特来个出其不意。我很了解他，你采取太正规的方法，他会猜得到并设法对付。你如果从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去攻击他，就将使他防不胜防。”接着，蒙哥马利说出自己的计划。辛普森觉得部队在进入攻击阵地前可能会被第7旅发现，因此不同意进行翼侧攻击。但蒙哥马利仍然决定就那么办，并说：“我还要采取一些敌人意想不到的行动，我要在敌以为战斗还未开始时发动攻击。”

演习计划在第一天午夜开始，但一般人总以为在日出前没有人会真正采取行动。但蒙哥马利却下令：“所有部队在下午喝茶时间到晚上11点提前睡觉，午夜时分开始行动。”结果，部队第二天进入了一处非常有利的阵地而没有被发觉。

许多高级军官都很重视这次演习，第二天就有帝国参谋总长、南方军区司令和南方军区的所有高级军官前来观看。

战斗的进展对第9旅非常顺利。到第二天黑夜快过去时，蒙哥马利的部队已在索尔兹伯里平原的铁屋镇进入十分有利的阵地。那是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为了防止第7旅偷袭，蒙哥马利煞费苦心地在防御阵地的所有通道上设置了障碍物和哨兵。但敌方似乎并无偷袭的企图。

次日清晨，蒙哥马利利用已经转好的天气，实施强行军，直扑预定夺战目标。于是，师长下令停止演习。

这次演习的成功进一步显示了蒙哥马利的作战才能，对其继续晋升是十分重要的。在那年秋季的机密报告中，第3师师长和南部军区司令给予蒙哥马利很高的评价，并且建议提升他为少将。伯内特一斯图尔特司令还特别强调他最适合当师长。

对蒙哥马利来说，除部队演习外，最重要的就是忙着把那座半月堡式住宅装修好，以便贝蒂迁入。在去爱尔兰“新公园”前，贝蒂已选好他们想在半月堡式官邸中使用的大部分窗帘和地毯材料。在军营生活了许多年之后，他们现在终于真正有了自己的家。这是伯纳德·蒙哥马利自己的“新公园”，是他和贝蒂共享的大厦。

8月下旬，贝蒂带戴维离开“新公园”，来到滨海伯纳姆。一天下午，当贝蒂和戴维在沙滩上玩耍时，贝蒂的脚被虫叮了一下。她说不上是哪一种虫子，因为这种虫子她从未见过。当晚，她的腿开始肿痛。于是去请医生，医生立即把她送进当地的乡村医院，并派人去叫蒙哥马利。

当时，大家以为她只是有点感染，比较疼痛，没有危险。蒙哥马利觉得他在索尔兹伯里平原进行的第一次旅演习对他的前途至关重要，不愿提前离开。于是征得贝蒂的同意，打电话给未来儿媳的父亲休·特威迪海军上将，问他可否让其女儿乔丝琳到滨海伯纳姆的旅馆去照顾戴维，直到贝蒂好一点为止。

乔丝琳的父亲说：“她从未自己住过旅馆！”

蒙哥马利说：“噢，她现在正应该去经历一下！”

安排好后，蒙哥马利便赶回索尔兹伯里平原去了，约翰·卡弗那21岁的

未婚妻便来到滨海伯纳姆的旅馆照顾戴维。

据乔丝琳说，在其后的两周内，蒙哥马利只回来过一次。贝蒂的腿从表面上看，什么毛病也没有，但里面却痛得厉害。也许，蒙哥马利认为那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吃过午饭，他帮戴维收拾好东西，给他换上整洁的衣服，便离去了。乔丝琳认为那是贝蒂要他这样做的。

在戴维返回学校前，乔丝琳带他去向母亲告别。当时贝蒂在床上痛得翻来覆去说不出话来。戴维带去一枚小小的金剑胸针，作为送给母亲的礼物，看见母亲不能说话，他便把胸针放在她的床单上，然后回到旅馆，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并让乔丝琳在他走后读给他母亲听。戴维当时不过 9 岁，但他仿佛已经知道，那实际上是永别了。

乔丝琳一直呆在那里，等贝蒂的表妹凯蒂·霍巴特来接替她。凯蒂来后，乔丝琳继续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星期。贝蒂的病时好时坏，她苦苦地和命运抗争，没有请其他任何人来照顾她，也不让别人去看她。

蒙哥马利几次计划把贝蒂送回朴次茅斯，但都不得不改期，因为她的状况太糟，经不住途中的颠簸和劳累，医生禁止那样做。

贝蒂的病情不断恶化，越来越痛，实在痛得太厉害了，就给她注射镇痛剂。贝蒂的神志开始昏迷，有时处于病危状态。蒙哥马利经常深夜被叫去，驾车往返滨海伯纳姆 200 多英里。毒素沿着贝蒂的腿慢慢向上蔓延。有一天，医生们断定，唯一的希望是截肢。既然还有希望，蒙哥马利便同意了。截肢之后，病情并未好转，毒素继续蔓延，最后影响到肺部，已经无法阻止病毒的蔓延。亲人们束手无策，医生们尽了一切可能，护士们也是精心护理，但是败血症已使她病入膏肓。1937 年 10 月 19 日，贝蒂在蒙哥马利怀中逝去。在她病痛期间，蒙哥马利经常为她诵读，内容大部分选自《圣经》。最后一次是在她临终前几分钟，读的是赞美诗第 23 首。

英国的死亡法律规定，尸体埋葬前要进行解剖和验尸。贝蒂的验尸记录上写的是“败血症”。

蒙哥马利把贝蒂安葬在滨海伯纳姆的墓地里。只有 4 个吊唁的人：他默默地站在贝蒂的墓旁，身旁站着他的参谋长，一个上尉参谋和军车驾驶员。他既不让儿子戴维到场，也不让继子约翰和迪克从印度飞来参加。没有亲属被邀请，不论是蒙哥马利家的人，还是霍巴特家的人。蒙哥马利现在静静地 toward 贝蒂告别。

葬礼后，蒙哥马利亲自到学校去把这个消息告诉戴维。随后，就回到朴次茅斯的住宅，写信把贝蒂死亡的消息告诉他的继子。两天后，他开始记叙贝蒂的葬礼：

“那是一个明媚的艳阳天。迪克·谢泼德来主持宗教仪式，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坐在医院的房间里，一直等到他们来装上棺盖的螺丝。贝蒂的容貌很好，极为平静……在他们盖上棺盖前，我在她可爱的脸上最后一次亲吻。房间里摆满了所有朋友送来的美丽的鲜花。旅里各营都送有花环，还有一个是皇后部队官兵送来的，尤其令我感动。我在仪式中和坟墓旁曾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实在忍不住，恐怕当时我已完全崩溃。迪克·谢泼德太好了，当所有的人都离去时，我们一起跪在墓旁，迪克做了一个很好的家庭祷告，我们默默地跪在那里。我说，我不相信要她受那么多痛苦后才死去是上帝的旨意，如果她非死不可，应该在那些痛苦之前。迪克说，上帝的处理方法是十分神秘的。我想，那大概是对的。

但是，迪克，唉，这是很难忍受的，我每次想起她，都黯然泪下。但我必须极力忍受，现

在我已独自回到这座空虚的大房子来定居；我极为寂寞和忧伤。我想，过一些时候我会恢复正常的。可是，现在我不可能。”

蒙哥马利和贝蒂婚后 10 年，一直相亲相爱，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约翰·卡弗认为，他们这段婚姻对双方都合适，对孩子、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容易精神紧张和激动的贝蒂，被一位有条不紊的人所关心、所钟爱、所尊重，乃致所安排，使她有时间去绘画，使她可以做她愿意做的事情，使她的生活充满笑声。同样，贝蒂以其独特的幽默感，使这位死心塌地的单身汉变成一位最快乐和有室家的人，并给予他两种他母亲所不肯给予的东西：无穷的爱和对其才华的信心。

约翰·卡弗后来写道：“一般人猜测，假如我母亲还活着，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却有一个更有趣的猜想，那就是：假如蒙哥马利没有遇上我母亲，又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认为，他少时所受的教养所产生的潜在精神分裂倾向，有主宰他的性格的可能。我的意思是说，他那种专钻牛角尖的意念，会发展成一种狭隘的心理；他那种离群脱俗的意识，会使他缺乏人类情感和怀疑别人的动机。如果这些性格发展下去，他便不适合于担任高层指挥职务。如果说，国家至少欠了我母亲的一份人情，那可不完全是一句梦话。”

毫无疑问，在蒙哥马利节节上升的道路上，贝蒂曾帮他乘风破浪，履险如夷。贝蒂的死，是不是也会给蒙哥马利的事业打上句号？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贝蒂去世后，蒙哥马利把自己关在家里许多天，谁也不见。他好像堕入黑暗之中，心灰意懒，万念俱灰。他已经走到绝望的边缘。然而，他后来写道：“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懂得上帝是按他自己的方式行事的，这一定是他的旨意，看来一时虽然不幸，然而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作为朴次茅斯驻军司令，我要对人们、对我的旅负责。我体会到必须继续工作。这也是为了戴维着想。目前我们在世界上是孤独的，就只我们父子俩人。我得经常去学校看望他，在假日里要好好地关心他。”

几天后的午夜一点，辛普森被电话吵醒，只听见蒙哥马利在电话中说：“是你么，辛普？恐怕过去几天我把所有的事务都留给你去照料了。明天上午 9 时，请将所有的公事都放在我桌子上，我要开始工作。”

过了相当一段时间，蒙哥马利才逐渐恢复了平静，他那天生的倔强劲和活力才又逐渐显露出来。他从军官训练着手，对全旅进行严格的训练。他分别于 1937 年 11 月和 1938 年 3 月举办军官研讨会，对现代战争的有关问题和训练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效果良好。他要求各营长训练所属资浅军官去指挥较大的单位，甚至本营的部队，以适应未来作战的需要。他亲自监督部队的训练，但士兵们没有什么怨言。他的士兵很快就在几次演习中证明他们是非常能干的。

蒙哥马利在《回忆录》中写道：“也许我过于自信，并且太外露了。但是我经受过许多挫折，这无疑对我是有益的，这些挫折使我经常警惕自己不要不受约束，不要太专横。”

1938 年 7 月，第 3 师在斯拉普顿海滩进行有陆、海、空三军参加的登陆作战演习。举行这类演习多少年来还是第一次，而且是规模较大的一次。第 9 步兵旅被指定实施这次演习。蒙哥马利与驻朴次茅斯的海军司令科克和奥雷里共同策划这次演习，其计划之详细，以至于第 9 旅的参谋人员用掉了

30000 张大页书写纸。

1938 年 7 月 5 日，蒙哥马利向新闻记者和军事观察人员介绍说：“这次演习的目的，是要探讨海上接敌运动的战术和技术问题、部队在敌岸登陆作战问题、舰对登陆部队的火力支援问题以及飞机协同地面作战问题。”

参演部队主要是东区陆军的两个军，由第 9 步兵旅的三个营扮演；陆军的支援力量包括一艘战列舰，两艘巡洋舰，一艘航空母舰和一个支队的驱逐舰。演习指挥机关为“陆海空联合指挥部”，由蒙哥马利担任指挥；部队登陆后，蒙哥马利即担任远征军指挥官，继续指挥陆上作战。

演习于 7 月 6 日拂晓开始。各营先分别搭乘“兰开夏”和“克兰马卡利斯特”号运输舰，后换乘小船在达特默斯附近登陆。帝国参谋总长戈特子爵和新任南方军区司令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前来观看。就整个演习的构思和陆海空的协同来看，这次演习比以往任何一次演习都更富想象力，是成功的。但它确实存在许多问题。韦维尔认为，这次演习对英军完全忽视登陆作战作出了可悲的评价。他评论道：“虽然有一艘所谓的登陆艇，但它是以前建造的试验性登陆艇，而且是为这次演习而从破铜烂铁堆里找出来的。我想它在这次演习中沉没了。至于其他情况，部队是坐敞开的划艇登陆的。就像 200 多年前的登陆部队那样。”当他登陆时，蒙哥马利热情地迎接了他，并向他说明演习是如何进行的。韦维尔只说了声“知道了”，就向自己的车子走去。但蒙哥马利却给他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蒙哥马利是一个奇怪的家伙，是我所见到的最能干的军官之一。”

斯拉普顿海滩演习刚刚结束，陆军部便选派第 9 步兵旅去索尔兹伯里平原执行秘密的毒气试验任务。蒙哥马利的毒气试验表明，如果士兵穿上某种防护装具，如眼罩、袖口侦测器等，并随身携带防毒油膏，便没有遭受感染的危险。如果部队训练有素，同时适当地散开，就很少有感染的可能。利用飞机对部队喷洒毒气所产生的效果，远没有飞机本身所冒的危险大，因为它必须飞得很低。在前线与敌人处于胶着状态的部队，危险更小；在较易受伤害的后方地区，大家又可以穿上防护装具，而不致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9 月 24 日，蒙哥马利写完了毒气试验报告。报告对陆军部提出的详细问题一一作答，有事实、有分析、有对策、还有建议。陆军部对这份“极其出色而清晰的报告”非常满意，很侠就向蒙哥马利表示祝贺。韦维尔在写给陆军部的报告中也说：“蒙哥马利准将是我们所拥有的头脑最清楚的军官之一，是一个卓越的军队训练者。他无论干什么，都表现得十分积极，他今年在毒气试验中所做的工作具有很高的水平。”

但是，蒙哥马利在朴次茅斯任职期间，也同陆军部发生过严重的矛盾，并且一度“地位不稳”。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已婚军人的家庭福利需要改善，于是蒙哥马利决定把克拉伦斯足球场出租给准备在 8 月银行休假周举办展销会的发起人。此人愿出 1000 镑，最后以 1500 镑成交。朴次茅斯市政当局风闻此事后，拒绝批准在那里举办展销会。于是，蒙哥马利去见市长，提出只要他在市政府里通过那个计划，他愿意出资 500 镑，支援市长推行的一个小型计划。市长同意了。他便把收入的 1500 镑，给市长 500 镑，另外 1000 镑用于驻军的各种福利，很快就用完了。陆军部得知这一消息后，指出他出租陆军部的土地违反了陆军条例，并说如果他立即交出 1500 镑，将不予追究。蒙哥马利说 1500 镑已全部花掉，并出示所有收据。接着，麻烦接踵而至。南方军区负责后勤的少将对他说，这一事件已断送了他在军中晋升的机会。但

南方军区司令韦维尔却对蒙哥马利不顾陆军部的条例，去改善驻军福利感到高兴，并支持他。陆军部与南方军区之间公文来往，卷宗越堆越厚。结果，蒙哥马利却突然被提升。

1938年10月，伯纳德·蒙哥马利被提升为少将，奉命接管巴勒斯坦北部的军事指挥，并把当地许多分散的部队组建成第8师。蒙哥马利在1931年驻防巴勒斯坦时，用一个营足以警卫整个地区，但后来那里的形势恶化了。当蒙哥马利在1938—1939年冬天负责管制这个地区时，某种类似战争的事态正在发展中。旅行必须有军队护送；主要的公共设施经常遭破坏；实行了宵禁，但经常有人违犯；秘密武装团体和非法移民很多。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情况比蒙哥马利帮助平定“爱尔兰动乱”时要糟得多，因为这一次英国人没有什么朋友。

蒙哥马利很喜欢这个任务，但他的巴勒斯坦之行却意味着要与戴维别离。在10月28日离英前，他把戴维送到好友卡休·约斯通少校家中，请他代为照管。

蒙哥马利把第8师司令部设在海法，将分散的部队编成3个旅，他把他所负责的地区分成几个地段，每个地段指定一名指挥官负责。他还建立了一套良好的情报系统，并与警察加强合作，通过一些办法及其他措施，他开始感到“平衡”了。接着他便开始进行反击。英军在夜间不发出任何警告就包围了那些对政府不满的地区，迅速没收所有的武器，逮捕一切可疑分子，公正但毫不留情地惩罚做坏事的人。几个月后，他就控制住了那个地区。到1939年春，最危险的时期过去了。

刚到巴勒斯坦不久，蒙哥马利就接到陆军部秘书处的通知说，他已被选中在适当的时候接任第3师师长，因为现任第3师师长已被任命为百慕大总督。这个消息使他非常高兴，因为第3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牌“钢铁师”，是全国最优秀的师之一，而且还包括他指挥过的第9步兵旅。他清楚地知道，战争就要来临，这个师肯定要在英军中打头阵，能够指挥这个师，是再快意不过的事了。

然而，他却一点也不知道他是怎样被选中的。实际上，这个职位是南方军区司令韦维尔给他安排的。韦维尔描述说：“在选拔委员会上，当问到我想用谁来接替第3师师长时，我立即回答说由‘蒙哥马利’来接替，其他司令官听后宽慰地舒了一口气，立即默认了。以前，蒙哥马利的名字曾经在选拔委员会上提出过好几次。每个人都同意他应当晋升，但是每一个有少将空额的司令官又都提出种种好听的理由，说是要找一个比他更合适的人。我从不怀疑他的能力，而且我也喜欢他，我不害怕他的独立思想和作风，这些我能控制。”

但好事多磨。蒙哥马利预定在8月接管第3师，可他在5月却突然患了重病。开始他感到眩晕，呕吐，胃部有点不适。后来他感到剧烈的头痛，发烧，胸痛，呼吸困难，两腿乏力。于是，他被放在担架上抬往海法的陆军医院。经多次X光检查，发现他的肺部有一个阴影，被怀疑是肺结核。巴勒斯坦的医疗设备很差，他的病情日益恶化。于是，医院安排男女护士各两名，把他送回英国。当飞机把他送到苏伊士运河时，他已不能走动，人们用担架把他抬到一艘开往英国的客轮上。看来他已没有活的希望了。

然而，蒙哥马利又一次奇迹般地活过来了。海上的航行恢复了他的健康，当船抵达蒂尔伯里时，他竟像没有病的人那样走下船去。他直接到伦敦的米

尔班克医院，要求彻底检查。花了3天时间，医生说什么病都没有，肺部的阴影已经消失。蒙哥马利一直有这样一种奇怪的下意识感觉：只要他能够返回英国，他就能康复。看来，他这种感觉是正确的。

经过一段休假之后，蒙哥马利去问陆军部他现在是否可以接任第3师的指挥职务。但他被告知说，在战争动员期间，过去的任命一概无效，现在在工作岗位上的那些人继续留任。于是，他便要求返回巴勒斯坦指挥第8师，但回答是“不行”，因为一个新指挥官已接管了那个师。他们让他同其他少将一起等待任命。此时，蒙哥马利过去争取进参谋学院学习的顽固劲又表现出来了：他一连10天缠住陆军部不放，提出许多理由来证明他是陆军部所需要的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当时南方军区司令艾伦·布鲁克中将的帮助下，陆军部最后终于派那位将军出任百慕大总督。

1939年8月28日，优异服务勋章获得者伯纳德·蒙哥马利少将正式接任第3师师长。正是：战云密布将远征，“铁师”师长急上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八章 敦刻尔克

二战爆发再远征，抓紧战前苦练兵；
危难之时堵缺口，敦刻尔克救众生。

蒙哥马利接任第3师师长3天后，英国陆军于9月1日发布全面总动员令。这一天德国入侵波兰，英国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1939年9月3日上午11时，英国正式向德国宣战。同日下午5时，法国也向德国宣战。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序幕。

第3师经过战争动员后，开始向克鲁干地区集结。9月12日举行通讯演习，13日举行不带实兵的司令部机关演习，19日国王乔治六世检阅全师，20日举行师前进指挥所与师情报演习。9月20日，由5名军官组成的先遣队前往法国。次日，师运输部队向福茅斯进发。

9月26日，蒙哥马利召集全师营以上军官训话，宣讲他的攻防策略和对机动作战的看法。为了使预备人员有机会进行实弹射击，全师已使用了10万发步枪弹，但蒙哥马利仍坚持，全师在启航之前，每人至少还应投3枚手榴弹。9月29日晨，一列列火车将全师官兵送到南安普敦，10时30分开始登船。当日午夜，船队启航，驶向法国。

英国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在议院宣布英国远征军到达法国时说，我们刚派遣到法国的军队是以“尽可能好得不能再好的方式”装备起来的，“我们军队的装备比得上其他任何一支类似的军队，即使不算更好的话”。但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蒙哥马利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在1939年9月，英国陆军可以说完全不适宜在欧洲大陆进行一场第一流的战争……野战军的通讯系统不完善，没有后勤支援，没有设立高级指挥机构，所有这些都是在总动员时临时凑起来的，运输能力很差，临动员时靠向民间企业征用车辆才得以完成……我师的反坦克装备有发射两磅炮弹的炮。步兵的反坦克武器是0.8英寸口径的步枪。还有一些安装在小推车上发射1磅炮弹的小炮，是急急忙忙从法国买来的，其中有一部分分发到各步兵营。除了这些以外，我师炮兵有一定数量发射25磅炮弹的大炮，是打算用来发射实心炮弹打坦克的……在法国某地有一个直属总司令指挥的陆军坦克旅，但我本人在整个冬天或那年5月的作战中从未见过该旅的坦克参战。而我们是发明坦克的国家，并早在1916年就首先使用于战斗中。”

蒙哥马利认为，精锐部队装备精良武器是必要的，但劣势装备的部队也不是没有作为的，如果经过高标准训练，又有根有能力的指挥官和控制机构，劣势装备的部队也是能够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然而，英国远征军的指挥机构从一开始就令人感到没有希望。按惯例，英国远征军总司令一职是由英国海外部队监察长艾恩赛德将军自动出任。如果他不能出任，也应该是奥尔德肖特指挥部司令官迪尔将军出任，军界的人大都希望迪尔能够担任最高指挥官。可是，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却不按规矩办事，而任命帝国参谋总长戈特勋爵任远征军司令，军事作战和情报长官亨利·波纳尔少将任远征军总参谋长，地方部队长官道格拉斯·布朗里少将任远征军副官长。英国远征军由第1军和第2军组成。第1军军长是约翰·迪尔爵士，第2军军长是艾伦·布鲁克中将。蒙哥马利的第3师隶属于第2军。英国远征军总的集结区在里尔以东。

戈特是个很开朗的人，为人诚恳，不做小动作和卑鄙的事，堪称第一流团级军官的典范。关于军人的事，从服装、靴子一直到战地的小部队战术，他都了如指掌。但他并不聪明，不太注意部队的行政后勤，而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作战上，尤其关注真空地带巡逻队的前哨战。他把他的总司令部设在哈伯克附近，各下属部门的司令部分别设在面积达 50 平方英里的 13 个村庄里。司令部分散设置，对于通讯联络十分不便，从一开始就遇到不少麻烦，要知道某人在什么地方，或要下达命令，都很困难。最重要的是，他对英国远征军根本就没有太大的信心。据说，戈特本人在 1939 年冬获悉德军有 10 个装甲师配置在西线准备攻击时，曾说，“如果情况属实，那我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蒙哥马利及其上司布鲁克则认为，如果部队经过良好训练并善于使用灵机应变的防御手段，坦克并不是不可阻挡的；如果让得力的指挥官运用巧妙的战术，将德军诱入不利地形陷入旷日持久的作战，无论在物质上或政治上，对德军都将是不利的；如果把远征军训练成能够抵抗德军步兵和装甲兵进攻的部队，并由有相当才干的军官指挥，抵消德军的优势，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 1939—1940 年的冬季里，英国远征军的任务实际上是训练和自卫。反坦克障碍、掩体、战壕和铁丝网，都必须修建。虽然军队里和国会里有许多人反对希特勒即将发动进攻的观点，但对英国军人来说，由于必须对付希特勒的坦克部队，他们至少应该假设希特勒可能发动进攻。

1939 年 10 月，各种情报资料表明，某种事件正在酝酿中。

10 月 29 日，布鲁克和迪尔试图提醒戈特勋爵注意局势的严重性。但戈特把它当成了耳边风。就在那一天，希特勒曾指示他的陆军总司令说，入侵低地国家（即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黄色战役”将于 11 月 12 日开始。但由于那年冬天天气恶劣，希特勒不得不再推迟进攻日期。到 1940 年 1 月 10 日，希特勒又下达了 1 月 17 日发动进攻的命令。但由于盟军事前在比利时偶然俘获了一架迫降的德国飞机，机上载有有关“黄色战役”的全部材料，才迫使希特勒把入侵行动暂时搁置起来。不管乐观派怎样认为希特勒不可能很快发动进攻，但蒙哥马利及其同事们还是处在必须对付德军进攻的现实危险中。

德军推迟进攻，使盟军在西线有了从事战争准备的机会。然而，从 1939 年英国远征军在法国登陆的那天起，一直到 1940 年 5 月积极行动开始的那天为止，戈特统帅的远征军司令部却从未举行过行政、通讯、情报、运动等演习，甚至也未进行过沙盘模拟演习。理由是服从无线电静默的需要，不便举行。其实，这不过是个借口，因为室内沙盘模拟演习是很容易举行的，与无线电静默没有什么关系。结果，英国远征军完全缺乏共同的对策和战术原则，出现意见分歧后，又久久得不到解决。

相比之下，布鲁克却具有真正的大将风度。他看问题能够从大处着眼，全面衡量，遇事坚定而有决断。他以真正军人的敏锐眼光，正确地预见到数月之内，英国远征军将陷入“千钧一发”的险境，同时，他也看清了蒙哥马利是一个优秀的训练者和组织者，于是放手让他去干，大多由他自己作主。

蒙哥马利很清楚自己的职责：必须在可供使用的极短时间内使第 3 师处于高效能状态。第 3 师在进入阵地位置，筑好防御工事之后，蒙哥马利使出浑身解数，对他的部队进行严格的训练。他亲自计划和指导了 5 次大规模师演习和许多小规模演习，使第 3 师成为英国远征军中最训练有素的机动师。

第一次师演习于10月30日举行，称之为“进入防御阵地演习”，时间4天。演习内容包括夜间汽车输送、昼间行军、封锁交通要道、实战状况下各级指挥部的报告和命令传送以及营、旅的电话通讯等。远征军总部派军官前来观看演习，布鲁克对演习很感兴趣，并在日记中写道：“蒙哥马利自从当师长以后每天都有进步，看到这些进步是最高兴的事。”

由于最初4天的师演习十分成功，蒙哥马利转而注意部队的福利问题。从1939年10月开始，部队官兵可以在周末分批到里尔度假。该地的妓女向来清洁无病，而且是定期予以检查的，但到11月15日，蒙哥马利获得的报告说，发现性病患者40多例，而且可能急剧增加。查询这下，发现士兵与当地乡下女人在甜菜地里进行交易。为了防止性病，蒙哥马利召集医生来协助，甚至要求随军牧师也来帮忙。但毫无效果，患性病的人数急剧增加，于是，他写了一封密信发至所有下级指挥官。信中说，“本人认为，如果男人需要玩女人，他可以玩而不予禁止。但他必须用常识判断，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传染。否则，他便由于自己的行为不慎而成为病号，这样无异于帮助了我们的敌人。”密信要求营长告诉士兵，找女人应找里尔城里较干净的妓女，应教会士兵认识避孕套的法文名称，以便在法国商店中买到，等等。他还在密信的结束语中说：“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认真对付，尽可能帮助士兵解决这一十分困难的问题。”

不幸这封信落到了总司令部的高级随军牧师手中，他把这事报告给总司令戈特。戈特让副官长通知第2军军长，要求蒙哥马利收回这封冒失的信，并解除他的职务，遣送回国。布鲁克知道，要蒙哥马利收回成命会使他在师里失去威信，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第2军又不可能没有蒙哥马利。于是，坚持要由他亲自处理这一事件。他为蒙哥马利解了围。布鲁克后来写道：“我始终要感谢上帝，让我能在蒙哥马利军旅生涯的这一危险时刻挽救了他。”

蒙哥马利非常感谢布鲁克的帮助，他一定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不会辜负布鲁克的信赖。虽然当时天寒地冻，各种条件很差，蒙哥马利照样执行其训练演习计划。11月21日，第3师与皇家空军联合举行通讯演习；11月26日，全师举行铁路输送演习。12月，第3师举行第二次大规模演习。演习内容主要有：“以汽车运输进行快速运动，夺取并固守一河川线，等待援军到达；准备并发起步、炮及空军协同的反冲击，将敌人逐退至一地障后，如敌人超越此地障则可能成功地建立桥头堡。”这次演习与1940年5月第3师进入比利时的任务十分相似。

1940年3月7日至8日，第3师举行第三次大规模演习。这次演习为48小时连续不断的作战行动，但明确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师由集结区实施夜间行军，翌日天亮前攻占60里外的一处河川障碍；第二阶段，实施夜间脱离战斗，撤退至后方阵地，以机动部队、炮兵、空军阻滞敌人次日的追击。实际上，这次演习就是7个星期后要求第3师实施的作战行动，那次行动解除了英国远征军被包围的危险，被布鲁克认为是“完成了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月29日至31日，第3师举行第四次大规模演习。1940年4月11日，盟军部队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要求各单位在接到命令6小时内出动。警戒状态保持了一个星期仍未撤销。这样一来，第3师原订的第五次大规模演习计划只好取消，但为了保持部队战斗力，蒙哥马利于4月22日命令各单位实施夜间训练，步兵部队每人每周至少行军20英里。

面对即将到来的恶战，如果说蒙哥马利对自己和自己的士兵充满信心的话，那么，他对盟军却不那么有信心。当时的习惯做法是，英国的旅要轮流到萨尔前线与法军一起服役。在那里，面对齐格菲防线的德军阵地，至少还有一点战争的气氛。蒙哥马利在1月份视察了驻在该地的他的一个旅，顺便看了看那里的法军。他对他所看到的法军情况感到担心，回来后向军长作了汇报。布鲁克本人也去视察过，与他有同感，但他俩一致同意不要向下级谈论这些事。

布鲁克对自己指挥的军感到自豪，总是孜孜不倦地研究和评价所属各部队。当然，他最满意的是蒙哥马利及其指挥的第3师，认为蒙哥马利自当师长之日起就天天在进步，而蒙哥马利所指导的一些演习则使他大开眼界。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战斗考验了。

5月10日凌晨3时，德军入侵荷兰和比利时，考验的时刻到来了。正如布鲁克早就预见的那样，英国远征军立即向东疾速前进。第2军以蒙哥马利的师为先头部队，以第4师和第50师殿后，前进至迪尔河一线。第3师的前进运动进行得像时钟一样准确，当他们于10日夜间到达规定地区时，发现比利时第10师仍然据守着分派给他们扼守的防线。也许因为附近没有德军，当时比利时军中绝大部分人都在睡梦中。于是，蒙哥马利去见比利时将军，请他撤出部队，允许英军防守前线。但他拒绝撤出部队，并坚持说，他奉命防守卢万，没有国王的命令叫他让出防区，他绝不离开一步。布鲁克第二天来到第3师，并立即去与比利时国王协商，以便能够重新调整战线。但比利时国王在其侍卫长的影响下，不同意让英军接防卢万。戈特总司令却没有采取任何类似的措施，而是于11日下午6时建议第2军将第3师挤到第1军的左侧，不敢反对比军。

蒙哥马利认为，卢万是通往布鲁塞尔的要塞，这个城市及其附近的高地太重要了，不宜交给只使用骡马运输的比国师防守。当时前面的比利时军队正在迅速溃退，德军正在逼近，这一地区的部队太多，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师撤到比利时师的后面，作为预备队而不移动到第1军地区。为了使比利时人撤走而让英军进驻这一地区，蒙哥马利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拍一点马屁。于是他对比军师长说：“将军，我的师将毫无保留地接受你的指挥，我建议加强你的防线。”比军师长听了非常高兴，同意了蒙哥马利的安排。这消息传到总司令部，立即引起震惊，布鲁克马上来到第3师弄清情况。蒙哥马利请军长不要担心，因为他即将把比利时人撵走。当德军进入大炮射程之内时，炮击开始了。蒙哥马利毫不费力地从比利时人手中接管了前线。比利时师退为预备队，然后向北进发，与其主力会合。布鲁克后来写道：“这一插曲突出地表现了蒙哥马利的才能。当时必须做出某些安排，因为德军在什么时候都可能到来，而他确实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记得我当时对他这样说道：‘可怜的比利时指挥官，竟然一点也不知道他怀里抱着一条毒蛇。’”

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鹿特丹遭到轰炸；荷兰要求停战；德军装甲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过默兹河上的桥梁；比利时军队撤到了阿尔贝运河；英军右侧的法国集团军垮了。然而，第3师却只能注视和等待。这是一个令人焦虑不安的时期，但蒙哥马利却异常镇定。这一时期，他养成了一种晚餐后不久即入睡的习惯。白天他外出，整天在前线转，会见下级指挥官，听取他们汇报，作出决定并给予口头命令。大约在进茶时间，他总是回到师指挥部，会见参谋班子，发布当晚和第二天的命令。然后进餐、就寝，除紧急情况外，他睡

觉时是不许被打扰的。5月15日夜，一位参谋军官由于不知道蒙哥马利睡觉时不许别人打扰的习惯，便把他从梦中叫醒并报告说，德军已进入卢万。蒙哥马利勃然大怒，嚷道：“走开，别打扰我，叫驻卢万的旅长把他们赶回去。”参谋听了，为之愕然，而他却继续睡。

德军在对第3师进行猛烈的炮轰和冲击之后，于5月15日夜渡过迪尔河，攻入卢万车站。第3师奋勇反击，把德军赶出城去。在这次反击战中，近卫掷弹兵团和皇家北爱尔兰兵团表现得非常出色。在整个盟军战场情况越来越令人不安的形势下，第3师却像一块屹立在汹涌急流中的磐石，巍然不动。后来由于南翼侧面暴露，蒙哥马利才不得不于16日下午2时下令撤退，向登德尔河转进。在炮兵弹幕的掩护下，全师干净利落地与敌人脱离了接触。黄昏前，全师除担任后卫的第8旅外，顺利抵达登德尔河。

由于右翼的法军被击溃，仓惶后退，而左翼的比利时军队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英国远征军只好全线后撤。当潮水般后撤的部队已经从第2军旁边过去很远时，第3师才最后撤退，5月17日，第3师到达布鲁塞尔西面，但该城运河上的桥梁已被炸毁。

18日，第1军出现行动缓慢的迹象。这主要是由于该军军长年龄较大、过于紧张、疲倦和慌乱造成的。为了减轻他的负担，布鲁克接管了他的第1师，师长是哈罗德·亚历山大少将。就这样，后来指挥英军在非洲取得胜利的三员大将（帝国参谋总长布鲁克，中东总司令亚历山大和第8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那时就在一种毫无希望的形势下结合在一起了。

5月19日，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部开始讨论敦刻尔克环形防御的优点。实际上，戈特的副参谋长李斯准将在5月18日，就根据各种情况报告得出了英军必须撤退的结论，拟订了将英国远征军撤退到敦刻尔克的应变计划。通过敦刻尔克港，可以撤退英军的人员以及一部分补给品和装备。总司令部讨论这个问题为时并不过早，因为在那天晚上，德军第2装甲师已进抵阿布维尔，第1装甲师已进抵亚眠，而其他德军部队则向东北面的蒙特勒伊和埃塔普勒疾速推进。英吉利海峡的海岸已被敌人控制，英国远征军实际上已被包围了。

迫于丘吉尔首相的压力和法国方面的要求，戈特不得不调集第5师、第50师和第1皇家坦克团，于5月21日对德军侧翼实施反冲击。由于力量太弱，反冲击被德军瓦解，但第50师却在阿拉斯俘获了400余名德军战俘。英国报刊对此大肆宣传。这次反冲击虽然对盟军战场没有产生什么直接影响，但从长远的观点看，却对希特勒及其指挥官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影响。

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部原计划英军向南突围。到索姆河一线与法军主力会合。5月24日，第8步兵旅缴获德军部分机密文件，其中一份说，德第6军预定在英国远征军最北端实施钳形迂回包围，从北面把英国远征军全部卷入口袋。布鲁克带着这些文件去见戈特。同时，消息传来说，法军在南面的攻击完全失败，左翼比利时军队的抵抗也被粉碎。如果德军对伊琅尔的攻击奏效，英国远征军向海岸方向的退路将亦被切断，从而完全陷入包围之中。此时，英军的弹药存量已降至极低限，而不得不靠空投补给；给养不得不减半发给，且仅够维持两日半之需。如果比军在一两个小时后投降，德军两线大军则可全部转而攻击口袋中的英国远征军。

尽管戈特缺乏远见，但他还是根据英军和法军当时所处的危急情况，敏锐地看到只有一个结局，即法军将被打垮，他应把尽可能多的英军撤回英国。因为他对这一点看得十分清楚，所以他既没有与英国政府，也没有与盟军最

高司令部磋商，便于5月25日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决定：英国远征军停止向南攻击，改为向敦刻尔克撤退。自此以后，他从不犹豫动摇，拒绝改变他认为是唯一正确和适当的方针。蒙哥马利在《回忆录》中写道：“正因为他看得十分清楚，即便看得并不远，我们才能从敦刻尔克全部撤走。换个更聪明的人可能不那样做，也许可能试图返回索姆，同法军保持接触。如果他这样做的话，那末英国远征军的士兵们可能已发觉他们现在在法属北非，既无武器，也无装备……对此，我给他满分，并期望历史将给他以同样的评价。”

在此期间，食品供应情况变得困难起来，整个英国远征军只能获得一半的定量。但蒙哥马利决不让他的士兵饿肚子。他命令军需官向当地村长征用粮食和菜牛。由于他的师赶着牛群行军，因而他们有“活的配给牛肉”，从来不缺肉吃。他建立了屠宰场和面包房，并劫掠了一列被抛弃的弹药车，因此，第3师从未缺过吃的和用的。

如果要摆脱追击，英国远征军就必须不断地采取完整的环形防御把自己保护起来。但环形防御建成以后，却面临着两大威胁：一个威胁来自西面逼近的德军装甲部队；另一个威胁来自从东面向比利时军队猛冲过来的冯·博克的德军集团军群。第一个威胁被希特勒本人解除了。因为他命令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停止前进。第二个威胁则使布鲁克和他的军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布鲁克的军扼守着鲁贝—阿吕安—伊佩里—科明运河一线。在博克的德军重兵集团与一片混乱的英军环形防御之间，这条战线是唯一有防御工事的战线。如果这条战线被突破，其灾难性后果将远比隆美尔攻占图鲁格及该港设备要严重得多。布鲁克在27日视察防区时，突然发现左翼侧的比军和法军已不知去向，这样，他的防线上便出现了一个缺口。这天，富兰克林将军指挥的第5师虽然受到了巨大压力，但战线仍安然无恙。最使布鲁克焦虑的是翼侧的缺口，因此他命令蒙哥马利把当时在鲁贝处于危险境地的第3师脱出身来，前去堵住这个缺口。

这是一个迫使蒙哥马利进行强行军的艰巨任务。从纯军事的观点看，这次强行军可以和后来蒙哥马利所取得的任何一项重大成就媲美，因为他奉命执行的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战争中最困难的战术机动，即从己方摇摇欲坠的防御正面后仅几千码的地方实施横向运动，在一夜之间，他必须使全师在鲁贝当面同敌人脱离接触，从第5师岌岌可危的战线后方仅几千码的地方，向北转移约25英里，在拂晓前占领未经侦察的阵地，挖好战壕，筑好工事，准备迎接德军的进攻。如果这一行动计划是由一位参谋学院的学员提出来的，大家一定会认为他发疯了。但在危急时刻，不合情理之事还是不得不做。整个晚上，布鲁克都在焦急不安地注视着第3师的行动。但是，他的担心是多余的。5月28日凌晨，第3师完全进入预定位置，缺口被填上了。布鲁克在5月28日的日记中高兴地写道：“我发现他已经像往常一样完成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与此同时有消息传来说，比利时国王已命令比利时军队在5月27日午夜向德军投降。于是，从第3师的防区至纽波特之间已经没有盟军部队，而且这空隙长达15英里。蒙哥马利赶快采取补救措施。

5月28日，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部已移驻拉庞，并在那儿一直留到最后，因为那里有良好的通讯设施，可一直与多佛尔和伦敦保持电话联系。总司令部当时只剩下戈特和少数几个参谋。

5月29日到30日夜间，第3师进入敦刻尔克桥头堡左侧的阵地，负责

扼守菲尔纳和纽波特之间的运河线。蒙哥马利把指挥部设在拉庞郊区的一片沙丘上。

自从决定向敦刻尔克撤退后，英国远征军每天的作战行动就是击退德军的进攻，向敦刻尔克和海滩逐渐退却。他们不得不丢弃大量重型武器和军械装备，以便尽快从海上撤退。海军的舰只和其他“小船”在海上往返不停，英国远征军的规模逐渐缩小。随着部队的减少，大多数高级将领便被断然地命令返回英国。虽然这样做违反他们的意志，但却是明智的，因为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对于布鲁克这样一个热情而容易激动的将军来说，要丢下他所珍爱的军不管，是很痛苦的。然而，命令已经下来，他不得不于5月30日夜乘船回国。

临行前，他作了一些必要的安排。他决定让蒙哥马利接管第2军，尽管他是3个少将中资历最浅的一个。蒙哥马利的第3师师长职位由第4师的肯尼思·安德森准将接替，而安德森准将的职务则由蒙哥马利的师属机枪营营长布赖恩·霍罗克斯中校担任（他在晋升为旅长之前只当了17天营长）。当霍罗克斯被召到师部时，他看到一个动人的场面。他写道：“我被召唤到第3师司令部。当到达时，我看到沙丘上站着两个人。我认出他们是我的军长布鲁克将军和我的师长蒙哥马利将军。前者情绪很激动，他的脊背佝偻着，好像在哭。蒙哥马利轻轻拍着他的背。接着他们握手道别，布鲁克将军慢慢地走向自己的轿车，驱车走了。”

布鲁克是个严肃、自制而深藏不露的人，居然在他的师长面前感情失控，使霍罗克斯感到不可思议。但蒙哥马利则认为布鲁克不是一时感情失控，而是他表达深厚友谊的一种方式。他在《通向领导的道路》一书中写道：“当一个英国人伤心到要开怀痛哭之时，大多数都愿意独处。因此，当艾伦·布鲁克伤心地伏在我肩上哭泣时，我知道他对我有深厚的友情，我很喜欢这种表示友情的方式。那一次在比利时海岸沙丘的情景，使我终身难忘。”

蒙哥马利的任命将于30日下午5时生效。下午2时，他召集全师各部队长官开会，对全师的防御作了最后一次安排，并发表告别演说。下午6时，蒙哥马利以军长身份参加了戈特在敦刻尔克海滩前线总司令部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军长有两个：一个是4月份接任第1军军长的M·G·H·巴克中将，另一个是刚刚接任第2军军长的蒙哥马利。在会上，戈特宣读了政府发来的关于最后阶段撤退的指示电报。随后，他命令蒙哥马利率第2军于5月31日和6月1日撤退；命令巴克率第1军最后撤退。他告诉巴克说，最后不得已时，可率部队向德军投降。

会议结束后，蒙哥马利留下来要求与戈特个别交谈。他对戈特说，巴克不适合担任这种最后指挥职务，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必须是一个镇静而头脑清醒的人，第1军第1师师长亚历山大正是具有这种品质的人。他应该立即把巴克送回英国，命令亚历山大指挥第1军。蒙哥马利写道：“我深知戈特其人，所以说得直截了当，并坚持这是应该采取的正确措施。”作为一个刚上任的军长和资历很浅的少将，蒙哥马利能看到这一点并毫不隐讳他说出来，是非同寻常的。

戈特没有装腔作势他说蒙哥马利傲慢无理，而是马上接受了他的建议。巴克被送回英国，亚历山大于5月31日下午接任第1军军长。亚历山大表示，他决心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把第1军全部撤回英国，绝不投降一兵一卒。事实果真如此，亚历山大沉着镇静、充满信心地撤出了所有的人。毫无疑问，

正是由于蒙哥马利这种勇敢和“无礼”的行为，才使得许多英国士兵得以保全性命，或者至少免于在德国战俘营中受罪。

5月30日晚，蒙哥马利召集第2军师级指挥官会议，发布第二天从海滩一带撤回英国的命令，并指示，任何来不及从海滩上乘船撤退的人必须沿海岸奔向敦刻尔克，在港内上船撤退。

敦刻尔克海滩一片忙乱：海上波涛汹涌，岸边车水马龙，滩头上成千上万的英军官兵，急急忙忙拥上大艇小船，德军不停地炮击，空袭和空战频频发生……尽管显得慌张忙乱，但第2军在31日白天的撤离进行得非常顺利。到晚上11时之后，一方面由于德军的轰击已把码头炸毁，另一方面由于潮汐太低，码头无法使用，没有来得及从海滩撤走的部队，只好马不停蹄地奔向敦刻尔克港。

6月1日清晨，第2军最后一批环形防御部队撤退，进入敦刻尔克港的环形防御之内。蒙哥马利一直站在沙丘上指挥部队进入敦刻尔克港。凌晨3点30分，蒙哥马利和参谋长、侍从官一起走下沙丘，朝敦刻尔克港走去。6月2日黄昏时刻，亚历山大已经设法将英国远征军的后卫部队全部撤离敦刻尔克。在驱逐舰上，他们向敦刻尔克看了最后一眼，只见全城火起，浓烟冲天，海面上全是救生衣和沉没舰船的烟囱与桅杆。正是：信心百倍杀敌去，全军将士弃甲归。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九章 自信的军长

大刀阔斧斩“朽木”，刻不容缓变部署；
训练演习练精兵，哪管前任怨与怒。

话说蒙哥马利于6月1日晚回到伦敦后，第二天一早便到陆军部报到，要求晋见帝国参谋总长约翰·迪尔。在迪尔的办公室，蒙哥马利向他汇报了戈特在拉庞召开最后一次总司令部会议的情形，并说过去数周的情况表明：某些指挥官是不称职的，应令其退休。迪尔对他所说的情况大多表示同意。第二天，蒙哥马利收到迪尔的一封信，要他不要再谈论此类事情，但蒙哥马利所指的那些无用的将军却一个一个地消失了。

在敦刻尔克，蒙哥马利已是军长，但他请求官复原职——当“钢铁师”师长，以便尽快整编第3师，为以后的任务做好准备。迪尔接受了他的请求。

英国当时的车辆和其他必要物资刚够重新装备一个师。于是，迪尔让第3师重新装备后，即渡海返回法国作战。蒙哥马利认为，这是对第3师的信任，是莫大的光荣。当他得知布鲁克，而不是戈特，将担任英国这支新远征军总司令时，更是高兴万分。他马上写信给布鲁克，恭贺他荣升总司令，并盼望在法国与他重聚。

此后，第3师就在萨默塞特进行整编，重新装备。蒙哥马利规定，任何人不得请假。他跑遍全师每一个单位，几乎与每一个人见面，并且都对他们说同样的话：第3师出类拔革，现已被选定重新装备，将很快返回法国作战，这是多么光荣的事情，等等。

第3师的官兵在经历了敦刻尔克的危险后，都想回家对家人炫耀一番。因此，他的规定和讲话不仅没有激起广大官兵的热情，反而使大家感到气愤。于是，他们开始在背地里称他为“疯将军”。

巡视完各部队回师部后，他召来参谋长和行政处长，问他们部队可能在什么时候重新装备。行政处长回答说，装备已拨出，但等到卸载、验收等手续全部完成，至少需要48小时。经讨论后，蒙哥马利说：“好，全师每一个人至今晚起给假48小时。”他对下属指挥官说：“补给品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迅速拨到，所以，你们全体必须自今晚午夜起休假48小时。”他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赢得了全师官兵的钦佩和信任。一夜之间，全师散开了。

48小时之后，全师又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决心准备回法国去。

经过十多天的紧张整编，到6月中旬，第3师已做好重渡海峡的一切准备。然而，法国却于6月17日宣布投降，第3师不必再到法国去了。

这样一来，一切轻重缓急顺序都改变了。英国孤立了，德军对英国的入侵迫在眉睫。因此，第3师奉命立即转移到南海岸，据守包括布赖顿及其西面乡村的海岸地区。到达防区后，蒙哥马利为了使部队了解到也许在48小时内英国就会遭到入侵，马上命令各部队长官采取下列措施：

一、自7月1日起，全部海滩、海滨的空旷地和游乐场地，每日17时实行清场，翌日5时再行开放。

二、官兵眷属于7月1日离开师防区，不再回来。

三、尽可能使所有妇女、儿童和学校迁走。

他的这些措施不仅使第3师的人员感到惊慌，而且使当地居民惊奇不已。与此同时，第3师开始在海边挖沟掘壕，在一些最好的地点设立机枪阵

地。记得有一次蒙哥马利在巡视中指着—栋部分遮挡机枪阵地的房子说：“谁往在这栋房子里？霍罗克斯，把他们赶走，将房子炸毁，一切都是防卫第一。”第3师的行动遭到了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对，市长、议员、业主等纷纷找到部队，要求第3师停止工作。蒙哥马利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这样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拒绝停止工作。

尽管蒙哥马利热心防御工作，干劲十足，但他对分配给第3师的任务是不满意的。他认为，第3师是英国唯一一个装备齐全的师，擅长于打运动战，不应该让它执行静止的任务，即在海滨花园里挖沟掘壕和在布赖顿码头上站岗放哨，而应该让它担任机动反击任务。

因此，他要求把第3师向内陆后撤一段距离，并为其提供车辆，使其成为机动能力较强的预备队，以便对登陆之敌实施迅速有力的反突击，从而阻止其建立保障后续师源源登陆的桥头堡。

7月2日，丘吉尔首相到第3师视察。蒙哥马利决定抓住这一机会，为第3师争取装备。为了确保第3师给丘吉尔留下最佳印象，蒙哥马利在兰辛学院附近的一个小机场安排了一次反击演习，假定机场已被德军占领。丘吉尔对演习很满意，随后便邀请蒙哥马利到布赖顿皇家阿尔比恩饭店与他共进晚餐。

席间，蒙哥马利陈述了他的防御理论。他说，应在海滩上设置一道由轻型装备部队组成的警戒幕，他们拥有良好的交通工具和充分的火力，能阻止敌人的任何登陆行动，而将主要部队撤回内线，组成强大的机动预备队，准备对入侵者进行反击和攻势行动，把敌登陆部队赶下大海去。丘吉尔对控留机动预备队极感兴趣，并把机动预备队称为“花豹，等待着突然跃起进攻敌人”。

他的战术思想得到丘吉尔的赞同之后，蒙哥马利接着说，他的师是唯一从敦刻尔克完整撤回来的师，同时也是唯一经过高度训练成为摩托化部队的师，为什么却得不到汽车，也不被留作机动预备队呢？丘吉尔答应过问这件事，并且说到做到，第二天就给了陆军大臣一份备忘录。其中一段说：“我看到第3师沿着30英里的海岸线展开，而不是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在海岸后方集结作为机动预备队，以对付大规模入侵的敌先头部队。对此，我深感不安。更使我惊讶的是，这个师的步兵缺乏必要的车辆将他们运往作战地点，否则它一定是一个完全机动的师。对任何机动部队来说，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要有随时作好准备在附近待命的运输车辆。对沿着海岸展开的第3师来说，尤为必要。”

一个小小的师长竟敢反对总司令部的决策，这使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部非常不满，于是决定不予理睬。7月4日，战时内阁军事秘书复函首相说，必要时师长有权雇用“运送一个旅”所需要的运输车辆。丘吉尔并不满意，拿起红笔在复函上划了一个叉，写道：“最重要的是，第3师的各个旅均应完全保持机动。这件事做到了么？这个师什么时候退为预备队？”

在这种来头的压力下，总司令部最后不得不低头。第3师很快就退为预备队，机动性百分之百。

1940年7月19日，布鲁克接替艾恩赛德任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第5军军长奥金莱克接替布鲁克任南方军区司令，成为蒙哥马利的顶头上司。7月21日，蒙哥马利接替奥金莱克任第5军军长。7月23日，蒙哥马利晋升中將。

布鲁克对英军防御的看法与蒙哥马利相同，他也用蒙哥马利几天前在布赖顿对丘吉尔说过的语言强调指出：“在我看来，我们的防御应当更加机动，更具进攻性。我主张沿海滩设置一条力量薄弱的防线，以最大限度地牵制和阻滞敌人登陆；而在后方则部署高度机动的、能够立即投入进攻战斗的部队，以便在敌人登陆部队尚未站稳脚跟之前对其实施集中的打击。”因此，有人认为，蒙哥马利任第5军军长很可能是布鲁克促成的。

第5军辖第4师与第50师两个师，辖区为汉普郡和多塞特郡。奥金莱克在掌管第5军时采取的防御方针是：制止德军使用南部海滩。他在6月29日致帝国副总参谋长的信中说：“我确信我们应尽一切努力防止敌人在海滩登陆。……敌人在重装备未登陆之前，并无多大作为。所以，我们应尽一切可能阻止敌人将重装备推送登陆。……缺乏装备与运输车辆，使我们不可能在内陆地区打机动战。因此，把我们所有的货色全部放在前面的橱窗中，乃是正确的政策。”第5军的防御就是按这种方针进行的，蒙哥马利也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从奥金莱克手中接过第5军的，而他们之间的不幸龌龊也就从此时开始，终其一生都未能和解。

蒙哥马利从奥金莱克手中接过第5军后，马上按自己的战术思想大刀阔斧地行动起来，似乎决心把奥金莱克的形象完全从第5军官兵心中洗刷掉。7月22日，蒙哥马利一早来到军部，既没有请示军区司令，也没有报军区司令备案，便发布了一系列新命令：海滩防御工事立即停工；取消奥金莱克要一个装甲师作为机动预备队的请求；第5军立即改编，以抽出兵力担任机动预备队，傍晚时分，他发布第一批撤免命令，同时向陆军部请求派遣摩托联络军官7人，并要求增加情报军官。

蒙哥马利对第5军军部作了一番大扫除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到第4师视察。7月23日，他呈送军区司令一份报告，使他与奥金莱克发生正面冲突。他的报告指出：“师的一般状况很难令人满意。”他列举了六大不足，并指出那并不是因为部队不热心，而是因为上级指导不当造成的。他的改进措施简单明了：许多“朽木”必须砍掉，一批军官必须免职。

7月24日、25日，蒙哥马利视察第5军的朴次茅斯守备区，他对该守备区的评语简直近乎咒骂：“朴次茅斯的状况尤其恶劣。担任守备者共8000人，并且包括众多武装水手，足够防御之需。但组织行政工作则十分差劲；补给物品集中存放，而不是各单位分存二至三日的份量；医疗设施或计划全无；已故之警备指挥官似乎毫无作为。守备指挥官没有进行监督和指导，亦未采取纠正措施。”他毫不犹豫地命令免除守备指挥官和若干幕僚的职务。然而，威特岛防守部队汉普夏团第8营的状况却几乎使他不相信：营长63岁；副营长59岁；他所召见的数位排长，年龄都是55岁；而他们指挥的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士兵。他指示对全营军官加以检查，情形最糟糕者应派较年轻的军官接替。从朴次茅斯回来后，蒙哥马利又向军区司令送发了一份评语不佳的报告。

7月28日，蒙哥马利再向奥金莱克呈送一份关于第50师的报告。这份报告虽然措词较谨慎，但可以说是对奥金莱克防御战略的直接攻击：“师的训练标准甚低。一切力量均放在防御工事的构筑上……其结果是，将如何在战场与德军一搏的技术置于脑后。有的士兵在其一生中发射的步枪弹不超过5发，有的人从未打过轻机枪，运兵车的使用从未演练，各级指挥机构均无训练，从德军所学得的观测与狙击技术亦未进行深入研究与吸收……本人曾

视察若干连，均驻同一地达一月之久，除挖掘防御工事之外，无所事事，士兵既不进行操练和体能训练，也不进行一般的训练，部队似乎一点警惕性都没有，我看不到他们眼中发出战斗的光芒。”他还在报告中警告道：“世界上最好的防御工事，本身并无重大价值，除非在防御工事里的部队，个个精神抖擞，保持警惕。”最后他说，如果奥金莱克让他放手去干，他保证在“两个月”内将这些不足纠正过来。所谓“放手去干”，是指改变在海滩上抗拒敌人的防御政策，不准把师内训练有素的军官和士官调走，并缩短该师的80英里防御正面。

奥金莱克对蒙哥马利的几份报告大为光火，于是让传令兵带去了他给蒙哥马利的回信。他在信中感谢蒙哥马利的报告，并同意“贵官所说的大部分，但坚持海滩的防御工事构筑工作继续进行……要求防御工事从速及早完成，以便能把部队抽调下来从事各种训练。我将发布同样的防守区训练指示”。他认为蒙哥马利不可能在两个月内恢复第50师的进攻作战能力，他自己估计至少需要6个月，虽然他承认陆军部在这紧要关头将训练有素的人员从师里调走是不对的，但他强调，“命令就是命令，当然要服从。”

在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这两位将领就这样彼此不和。后来，历史证明，即使是有良好防御的海滩，也难以抗拒集中全力的突击。从这一点看，奥金莱克的宽正面海滩防御思想是错误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以来，蒙哥马利就是反对分散配置兵力的干将，极力主张通过集中和机动增强战斗力。在当营长、旅长和师长时，他将这种作战思想运用于实践，结果相当成功。

也许奥金莱克和其他将领曾向新任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布鲁克诉过苦，因为布鲁克曾于1940年8月5日给蒙哥马利写了一封亲笔信，告诫他不要鲁莽从事，不要任性而行，而不顾别人的感受如何，否则，有时也觉得难以支持他。信中还说：“我曾经极力支持你，以后亦一如既往，只求你不要做傻事，以免使我失望。”

但是，布鲁克的信并未达到目的，因为蒙哥马利趁第二天到白金汉宫参加授勋典礼并接受巴斯勋章时，会晤了陆军部副官长，对奥金莱克的“命令就是命令”的训示表示抗议。他明确地向副官长表示，如果具有英国远征军作战经验的人员被陆军部抽调走，他便无法把所属各师训练成第一流的劲旅。当奥金莱克后来得知蒙哥马利直接向陆军部副官长申诉时，相当恼火。他于8月15日给蒙哥马利写了封又长又严厉的信。他在信中指出，蒙哥马利到陆军部当面找副官长商谈从他的军里调人到其他部队的问题，严重地逾越了权限。他写道：“我十分清楚，陆军中各级军官通常是可以上访陆军部的，但是这次你会见副官长谈的是与我的司令部直接有关的问题，结果他们已发出了一些调动命令。我认为，这不是处理这一问题或其他这类问题的正当方式……”奥金莱克还断然指出，他不同意蒙哥马利发布备忘录的做法，“这样，你向你的部属表明，你已越过军区司令部去直接同陆军部打交道。”

蒙哥马利认为，奥金莱克不是他所能效劳的长官，因为他容忍“无能”的部属，对军队训练没有远见，不知道如何对付像德军那样的敌人。他不仅对奥金莱克的回信置之不理，而且又直接与副官长办公室交涉，试图从南方军区的部队里调某些军官到他的军里去。因此，奥金莱克不得不在10月19日又给蒙哥马利写了一封信：“我要你明白，不管你认为这种做法多么正确，它可能使有关部队和单位的指挥官十分烦恼。特别是，在他们看来，你选中的人并不是他们心目中最适合任职的人。”这一次，奥金莱克还给副官长发

去了一份充满外交辞令的控诉书。

对于奥金莱克的指责，蒙哥马利不予理睬，他要按自己的想法改编他的防区。他赋予第4师较宽的海岸线正面，以接替第50师的防务；他规定各单位构筑工事的兵力不得超过50%，余下之兵力则从事训练或休假；他主张地方警卫部队担任海滩防御任务，军直属部队与两个师则抽调到地方警卫部队后方，集中力量进行冬季训练，包括进行从排至军的各级实兵演习，着重演习进攻，而不是防御。这些改变未经南方军区司令官核准和认可即付诸实施，并获得明显的成功。结果，蒙哥马利的防御思想得到了军事当局的确认。这样一来，奥金莱克“在海滩上拒止敌人而以装甲预备队反击歼灭之”的防御战略就全完了。

蒙哥马利大刀阔斧地对第5军军官队伍和作战部署实施手术之后，便把工作重心转到了部队的训练上。他很快就制定出从1940年8月到1941年春的训练计划，具体实施方法是，首先进行单兵或小组训练，然后是模型演习和旅通讯演习，最后是集体训练。在集体训练期间，每周至少举行营和旅演习1次，每月至少举行师野外实兵演习1次。

蒙哥马利决心把第5军训练成一支能在各种气象条件下作战的部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命令第5军进行艰苦顽强的训练；训练必须在各种各样的天气和气候下进行，无论是好天气还是坏天气，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军必须比德军善战。如果德军只善于在好天气和白天作战，那么我们就应该在任何天气，在白天黑夜都能发挥最大的效率。这样我们才能打败他们，我们的所有训练，必须向高水平发展；所有演习都必须根据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进行。”他用万无一失的原则来检验他的部队。任何一级军官，不论是团队的，还是参谋机构的，只要不能经受紧张和艰苦的生活，或表现得厌倦无力，都必须免职。军官的妻子必须离开可能遭到入侵的海岸地区，因为一旦遭到攻击，军人就会情不自禁地首先考虑到家属的安全，从而忽视自己的战斗任务。

蒙哥马利认为，战场的胜利需要部队从上到下都处于完全健全的状态。健全的精神来源于健全的体魄。所以，他不仅重视团队士兵的体能训练，而且重视机关参谋人员的体能训练。

10月23日，他正式规定各司令部的全体参谋人员，每星期都必须抽一个下午进行一次七英里长跑锻炼。这一规定适用于40岁以下的人，无一例外。那些不想跑全程的可以走或者小跑，但他们必须完成全程。这一规定遭到许多军官的反对，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全都照办了。有些40岁以上的人也参加跑步，以增强体质。蒙哥马利当时已53岁，照样与大家一样坚持长跑，后来在参谋长辛普森的劝告下，才改为快走七英里。

关于七英里长跑，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军里的一位胖上校去找医生，说如果要他跑步，那就等于要他的命。于是，医生带着他去见蒙哥马利，建议让他免了。蒙哥马利问他是否真认为跑步就会让他送命，那位上校回答说：“是的。”于是，蒙哥马利就对他说，如果他现在就想到会死，不如现在就跑步。这样他的职务就能容易而且顺利地被人接替。如果军官们在战斗打响、一切都是闹哄哄的时候死去，那总是件麻烦事。结果，那位上校参加了跑步训练，不仅没有死去，而且活得更好。

虽然蒙哥马利对部属要求十分严格，但他决不是个不近人情的人。在不准军官家属随军的情况下，他让军官们通过正常方式请假，经常探望家庭。

他要求部队在紧张严格的训练之后，能住上舒适的营房，吃上可口的饭菜，并能洗上热水澡。对于部属的某些嗜好，他也并不一味地反对。例如，第5军军部有一个高级军官餐厅，军直属部队的资深上校和准将们都在那里与军长共进餐。由于蒙哥马利在1939年那场大病后滴酒不沾，并且习惯于把喝晚酒的人都看作是酒鬼，没有人敢在饭前当着他的面公然喝酒。但是，他们在餐厅外的通道上装置了秘密小房间，晚餐前偷偷溜进去喝上一两杯。他的参谋长辛普森觉得这样干不太好，于是对蒙哥马利说：“报告军长，你知道我喜欢在晚餐前喝上一两杯酒。如果我在前面接待室摆一个酒吧，你会不会介意？”他看了辛普森一眼说：“我当然不反对。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不过，你可别拉我同你们一起喝。”听到军长的回答，周围的面孔都泛起了兴奋的红光。片刻之后，接待室里就摆起了酒桌。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蒙哥马利决定于12月初举行全军规模的大演习。

11月25日，他在朗福德堡举行模型示范，出席的指挥官和贵宾达150余人。毫无疑问，那是自敦刻尔克之后，在英国所举行的最大最重要的演习。无论从哪方面看，该演习都是开创性的。蒙哥马利宣称：“本演习的目的，是研究一个军向沙漠地区之敌进行攻势作战的运用与处置。该军兵力包括1个装甲师，1个机械化步兵师，1个陆军坦克旅，空降部队以及近距离支援飞机。”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艾伦·布鲁克在模型演示致词时预言，这次演习“必然极其有趣”。

布鲁克对蒙哥马利计划和进行超过30000人的大演习并从中吸取教训的专业才能感到吃惊。一年前，蒙哥马利的第3师在法国举行演习时，着眼于摩托化部队夜间运动，夺取防御阵地和有计划地撤退。这次演习预演各兵种在战斗中的运用，实验新战术，强调进攻作战和充分发挥现代化部队的全部潜力。蒙哥马利对轰炸机进行近距离空中支援尤其感兴趣。这两次演习的明显差异表明，蒙哥马利的战术思想正在不断地完善。

韦维尔将军拒绝英国向他提供更多的非正规部队，而只希望他的正规部队得到补充。蒙哥马利则一视同仁地对待正规军、地方部队和新征召来的部队。当多次演习之后，他对第5军的战备状态颇感满意时，就立即着手整训辖区内的地方部队，力求达到与正规军同等水平。蒙哥马利认为，要打败希特勒，就必须依靠全体武装部队的协同力量，而不能只依靠战前训练出来的精锐部队。

1940年12月2日，奥金莱克调任驻印英军总司令。奥金莱克调离南方军区，使他与蒙哥马利的冲突暂告一个段落。奥金莱克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完全不喜欢蒙哥马利，“我常去听他训话：‘不准咳嗽，不准吸烟，早餐前跑步。’这一切听起来很鼓舞人心，但我却觉得有点欠妥当。我怀疑早餐前跑步是否能培养出打胜仗的人。”对于奥金莱克，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不记得我们在任何问题上有过一致意见。”

奥金莱克离任后，第1军军长亚历山大，而不是第5军军长蒙哥马利，接任了南方军区司令。亚历山大是蒙哥马利在坎伯利参谋学院的学生。现在，学生变成了老师的顶头上司，这对蒙哥马利来说，多少是一种有点难为情的事情。

亚历山大沉着镇定，经历过敦刻尔克大撤退，对战争的看法比较切合实际。他同意蒙哥马利的防御思想，反对奥金莱克固守海岸线的作战思想。他虽然自己不能组织大规模演习，但对蒙哥马利的全军演习却由衷地感到高

兴。由于这些原因，他赢得了蒙哥马利的敬意，使第5军军部和南方军区司令部的关系融洽起来。蒙哥马利曾说：“亚历山大是唯一一个能使陆海空军的将领都乐于在其属下服务的人。”

1941年4月7日，蒙哥马利奉召来到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部。总司令布鲁克告诉他，他将接任第12军军长，负责防卫东海岸，保卫肯特和苏塞克斯地区的安全。

蒙哥马利想把他的参谋长辛普森带走，于是建议第4师师长特迪·施赖伯升任第5军军长，第210旅旅长但普勒升任第5军参谋长。这样第5军就可以继续贯彻他的作战思想和训练原则。他的推荐十分成功，施赖伯和但普勒不久便分别就任第5军军长和参谋长。

4月24日，蒙哥马利亲自向所有准将告别。

25日，他到朴次茅斯向海军总司令辞行，到南方军区司令部向亚历山大中将道别。第二天，他召集全体幕僚与校级军官，作告别讲演。对于那些行前不能见面的人，他则用书信向他们告别。1941年4月27日，伯纳德·蒙哥马利接任第12军军长。当时在肯特郡指挥第44师的霍罗克斯说，蒙哥马利到来所产生的影响，“就像在不列颠的这个乡村角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一样”。蒙哥马利在第12军巡视一遍后，认为部队过于松散，过得过于舒适，于是立即采取措施，军官太太被送上火车撤走；指挥官和参谋们被赶出办公室进行越野长跑；不称职的军官被撤换。一周之内，蒙哥马利撤换了3位旅长和其他6名“长”字号人物。自然，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但是，蒙哥马利对第12军的改造决不仅仅限于这些方面。他很久以前就认为，第12军把3个师并列部署在肯特海岸线上，企图利用掩体和工事固守每一寸海岸，是错误的，因为这种防御配置，一无纵深，二要反击时又兵力不足。在内陆方面，却到处挖掘“阻遏线”。但却没有兵力去防守，因为当时已没有多余的部队来担当此任务。尽管原第12军军长可以升任军团司令官，但蒙哥马利对他的部署、战术观念和训练，不屑一顾。他决心立即按照正确的作战思想改造第12军。

1941年5月2日，蒙哥马利到职不满一周，便发布他的第一号训令，推翻其前任的战术原则，提出自己的防御作战原则，三天后，他又把第12军的全体机关人员集合起来，详细说明自己的防御作战思想，并要求大家彻底铲除前军长的“海滩防御”思想。他认为，德军的任何入侵，必然包括空降和海上突击，而且后者有装甲部队支援；因此，应集中防御海岸上可以固守的地区据点，等待预备队加入战斗；要不惜任何代价固守可能被德军用作桥头堡的主要港口、机场和通讯中心；要集结经过充分训练的机动预备队，用来迎头痛击突破海滩的敌人，使其无法承受强大的步兵和装甲部队的协同攻击。根据这种思想，他在6月份组织实施了名为“醉汉”的全军大演习，并在演习讲评会上指出，战争的胜利有三大重要因素：第一，正确的攻击；第二，低级指挥官的勇气，主动性和战斗技术；第三，部队的战斗精神。缺少任何一种因素，部队都会打败仗。

在蒙哥马利对其属下的2000多名军官作演习讲评的同时，奥金莱克抵达开罗，从韦维尔手中接过了中东总司令的指挥权。尽管奥金莱克具有指挥官的才智，拥有准确的情报，并且在坦克、炮兵、车辆、战斗机、轰炸机、补给品等方面占有优势，但在以后的14个月里，他仍然是一事无成，一败涂地。

1941年8月4日，第12军进行名为“大醉汉”的第二次大规模演习，

主要演练反空降和抗登陆作战，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

在蒙哥马利指导的第 5 军和第 12 军各次大规模演习的推动下，国内武装部队总司令文伦·布鲁克决定于 1941 年夏季举行一次名为“保险杠”的陆军全军大演习，以检验陆军自敦刻尔克以来进行训练的效果。蒙哥马利奉命出任裁判长。该演习从 9 月 29 日开始，到 10 月 3 日结束，有 4 个装甲师和 9 个步兵师参加了演习。“保险杠”演习基本上是追随蒙哥马利所创造的演习形式，这使蒙哥马利异常高兴。

10 月 10 日，他对 270 名高级军官作演习讲评，对演习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分析得头头是道，令人叹服。连布鲁克后来也承认，“蒙哥马利的讲解精彩绝伦，值得赞美”。

“保险杠”演习结束后，蒙哥马利回到第 12 军，开始计划名为“大大醉汉”的第三次大规模演习。演习计划于 11 月 24 日开始，到 27 日结束。但演习还没有开始，蒙哥马利便于 11 月 17 日接到命令：接替佩吉特中将担任东南军区司令。正是：论兵布阵辟蹊径，练兵场上扬威名。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十章 集团军司令

盟军演练防与攻，英加两军战术同；
袭击敌港遭惨败，临危受命赴中东。

1941年11月17日，布鲁克接替迪尔提任帝国参谋总长，佩吉特接替布鲁克提任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蒙哥马利接替佩吉特担任东南军区司令。

东南军区辖第12军、加拿大军和一些地方部队，现在，蒙哥马利在职务上可以和亚历山大平起平坐了。不过，亚历山大还拥有新英国远征军司令选定人的头衔，而蒙哥马利却没有。但蒙哥马利也有很大的机会，一旦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他就会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

为了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蒙哥马利把东南军区改称为“东南集团军”，把自己列入“集团军司令”之林。这样，不仅能使他属下的官兵习惯集团军指挥部的指挥程序，而且能使他易于向两个野战军及东南地区其他部队灌输他的作战思想。

蒙哥马利到任后，首先访问所属各部队长，然后下达集团军司令个人备忘录，订出冬季训练计划。他的训练计划包括士兵的各种训练、部队的野外演习和不带实兵的各级司令部演习。集团军将组织五次指挥所演习，日期定在12月、元月和2月。此外，每支本土防守部队必须归属于一支野战部队之下进行训练，因为他认为，要击败德军的入侵，决非野战部队单独所能，“本土防守部队的有效合作极为重要。所以，我们必须提高本土防守部队的训练水平”。

然而，蒙哥马利第一份个人备忘录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仍是军官训练。他写道：“我认为今冬我们必须特别致力于军官训练，以提高其专业知识水平。此项训练可在室内以模型进行，不会干扰第一节甲项所规定的主要训练目标。”而军官训练的核心问题，又是军举办的作战研究周。蒙哥马利决定第12军于12月15—20日举办作战研究周，邀请加拿大军的指挥官参加；加拿大军于1942年元月举办作战研究周，邀请第12军的指挥官参加。后来，这两次作战研究周都如期举行、英、加两军都感到颇有收获。

对蒙哥马利来说，指挥第12军是毫无问题的，但指挥加拿大军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加拿大军军长克里勒曾任加拿大参谋总长，他自以为不仅是加拿大军军长，而且是加拿大国家军事利益的保护人。这种态度使他多次同蒙哥马利发生冲突。到1942年春季，加拿大军不再对东南集团军行文，而只称之为东南军区指挥部。

1942年2月，蒙哥马利拟订一套预备队计划。以备德军入侵时调动辖区内的总部预备队时使用，但克里勒对此计划提出抗议说，加拿大预备队的部署，除非得到加拿大政府或其授权之代表的同意，否则不能调动。克里勒的迂腐表现，使他和蒙哥马利的关系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处得很不融洽。

蒙哥马利认为，加拿大部队坚强而自信，所欠缺的只是良好的领导。于是，他决心让他们获得他们所缺少的，加拿大军参谋长盖·赛蒙兹是位具有卓越能力的军官，蒙哥马利决定把他拉到自己一边。于是，他在晚上将东南集团军、第12军和加拿大军的参谋长召集在一起，秘密协调工作。他从抓加拿大军的训练和作战计划入手，在盖·赛蒙兹的协助下，他的战术理论被加拿大全军采用，而加拿大军的“击溃入侵计划”，则完全以他为第12军拟定

的计划为蓝本。尽管蒙哥马利对加拿大军的指挥并非一帆风顺，但最终还是将它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蒙哥马利认为，固守英国海岸决不能击败轴心国，只有把军队训练到能在外国的土地上以攻势行动击败敌人，盟国才能最后取胜。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随后又侵占菲律宾，夺取香港；1942年2月8日登陆马来亚；一周之内迫使英军驻新加坡司令官阿瑟·珀西瓦尔率领约70000人的部队放下武器；2月27日，日海军在爪哇海战中获胜，次日登上爪哇，并于3月初占领苏门答腊。更糟糕的是，日军正向缅甸仰光推进，直捣印度大门。2月23日，在西塘的唯一桥梁被炸毁，第17师的退路被切断……丘吉尔已经感到厄运的黑手在向他伸来。在向全国呼吁团结的同时，丘吉尔决定派一名新陆军指挥官到缅甸去阻止日军的胜利推进，并适时举行反攻。东南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很可能觉得自己是最符合逻辑的人选，但拍给远东战区总司令韦维尔的电报里，被提到的名字却不是蒙哥马利，而是亚历山大。

丘吉尔选定亚历山大到缅甸去接替赫顿，实际上只不过是同意帝国参谋长布鲁克的提名而已。布鲁克在1942年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午餐后我被首相召见，首相告诉我他同意派亚历山大去。由于缅甸的情况危急，他只希望亚历山大能及时赶到。”

布鲁克为什么没有考虑派蒙哥马利去缅甸而选定了亚历山大，始终是一个不甚清楚的问题。尽管亚历山大曾在西北前线指挥过一个旅，但却不能把日本人同山岳土族等量齐观。因此，人们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尽管布鲁克对蒙哥马利在整训部队和作战方面的才能十分欣赏，但对让他指挥一个野战集团军仍感犹豫，尤其是有盟军部队在一起作战时更是如此，他怕蒙哥马利会做出傻事来。

如果蒙哥马利有再一次被忽视的感觉，他至少没有明确表示出来。他预见在长期的战争中，他的才能总有一天会被用到战场上，同时他也知道，他对军队的统驭方法和形式，使他的长官们即使不怀疑他，也不会欢迎他。因此，他当时作了他能唯一能做的事：把精力完全集中在对他忠诚敬仰的东南集团军官兵身上。这虽然不是指挥作战部队，但他却决定把它当作一个野战集团军，并利用全部时间去学习如何指挥更大的部队。依照他的看法，他的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使他的两个军跟着他的“击溃入侵计划”走，在整个集团军奠定连贯一致的作战思想；二是使两个军都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能以必胜的信念随时执行集团军司令的作战命令；三是如何在头脑清醒和目标明确的条件下，授予他们足够的权力。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没有一个英国陆军指挥官能够解决的问题。

奥金莱克接任中东总司令后，马上把西方沙漠部队改编成第8集团军，但他对指挥官的选择却暴露出他的最大缺点：没有能力选择优良的部属，结果他在中东毫无作为。在蒙哥马利看来，选择部属是最为重要的，集团军司令的首要任务是了解部属，铲除庸劣，悉心提拔人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工作时间也许有三分之一用于人员的考虑上。在处理下属问题上，强烈的公正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对他们的全面评价。我亲自掌握包括营团级军官在内的指挥官的任用权。唯一的选择标准是，过去的成绩、领导才能与工作能力。我的任务就是要了解所有指挥官，坚持高标准。优秀的高级指挥官一经选定，一定要加以信赖，并给以最大限度的‘支持’。任何指挥

官都有权得到他的直接上司的帮助与支持。得不到时，他可以把这归结为导致失败的一个因素。假如他获得了他所指望的帮助而失败了，那么他就应该离开。”

为了了解部属，蒙哥马利经常访问下属部队，其影响渗透到东南集团军的各个层次，他的这种访问并没有因为他成为集团军司令而有所减少。

1942年1月的东南集团军的作战日记就有如下记载：

1月2日：集团军司令访问第43师辖区，并向加拿大官兵讲解“海獭演习”。

1月8日：司令官访问第44师辖区。

1月9日：司令官访问第46师辖区。

1月10日：司令官访问加拿大军军部。

1月11日：司令官访问西萨塞克斯本土防卫部队。

1月13日：司令官在高级军官学校演讲。

1月14日：司令官在坎伯利参谋学院演讲。

类似的活动还有：参加演习、战术讲座、加拿大军研究周、新武器示范等等。这种无休止的活动，似乎表明东南集团军司令部充满了狂热的工作气氛，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与伦敦佩吉特的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部相比，东南集团军司令部的气氛显得极为平静。从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部调到东南集团军的少校情报官戈伦韦·里斯回忆说：

“当我到赖盖特（东南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向集团军司令汇报情况时，觉得一切情况都与佩吉特的总司令部大不相同。要见集团军司令没有任何困难，一经约定时间，他就会准时在那里等你。他总是让人觉得，除了已掌握的事情之外，他根本无事可做。桌上永远没有任何文件，也没有任何干扰；人们会想到眼前坐的是个闲人，要不是有客人来访，简直不知道做什么来打发他的时间。我个人认为，最了不起的是他真正在郑重而有礼貌地倾听我说的话，而那些话我常常觉得是不值得一听的。如果他提出意见，或是下达指示，人们会觉得他曾经利用清凉平静的傍晚时间，在花园里对这些问卧都作过冷静的思考。我开始感到他与我所知道的其他指挥官不同的是，他真正地‘想’过，而他这个‘想’的含义与科学家或学者的‘想’是相同的……当思考战争的时候，他的思路流畅而集中。”

凡是与蒙哥马利共事或为其服务过的人，都会觉得里斯的印象是准确的，因为这种情况符合蒙哥马利的指挥原则：高级指挥官绝不应埋头于琐事。蒙哥马利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极端紧要的是，一个高级指挥官绝不应埋头于琐事中。我总是注意这一点。我经常花不少时间考虑，思索主要问题之所在。在战役中，一个指挥官必须考虑如何击败敌人。假如他陷入事务堆中不能自拔，而对于真正的大事却视而不见，他就做不到这一点。不抓大事，而把注意力花在对战役无关紧要的次要事情上，他就不能成为参谋人员的坚强靠山。琐事细节是参谋们的份内事。指挥官整天忙于琐事，没有时间静心地深思熟虑，决不可能制定出高水平的作战计划或者有效地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到1942年，蒙哥马利已成为闻名遐迩的训练专家，他的作战思想也更为成熟。奇怪的是，尽管当时英国在远东和中东战场吃紧，国家处于危难时刻，但蒙哥马利却从未被列入高级将领的候选人名单。更奇怪的是，虽然蒙哥马利对远东和中东的战事颇有异议，但他却从来没有表示出他必定会有当野战

指挥官之意。按照蒙哥马利的自负个性来看，这确是出乎意料之事。不过，他的继子约翰·卡弗的看法也许能提供较为合理的解释。卡弗认为，蒙哥马利的雄心并不像一般人那样，一味地追求较大的权势。从在坎伯利参谋学院作教官或草拟步兵训练手册时起，他的作战思想就已包含师、军、集团军指挥部的正常演练。不论成功与否，他都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现在国家委托给他的部队上，务求其有最佳的训练和具备最强的战斗力。对在敦刻尔克与他同为师长的亚历山大的多姿多彩的晋升，他似乎完全忽略，而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部队的训练和演习上。第12军和加拿大军的军研究周结束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一连串营、旅、师级和军级演习，其目的是为了在野外演习场上验证在模型演习中所研讨的各种战术理论。蒙哥马利决心把部队训练到不仅能进行纵深防御作战，而且能成功地进行反攻作战。第12军的“加拉哈德”演习、“征服者”演习、“胜利者”演习、“兰斯洛特”演习以及加拿大军的“海獭第三”、“海獭第四”演习，都体现了蒙哥马利的这种决心。

但是，东南集团军所举行的最重要的一次演习，是蒙哥马利去非洲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之前所进行的、“猛虎”演习。该演习的目的，旨在表达蒙哥马利与日俱增的信念：要夺取战场主动权并战胜德军或日军，盟军部队就必须训练到能在真正复杂的情况下作战，并至少能坚持10天之久。演习从5月19日开始，5月30日结束，由第12军对抗加拿大第1军（第2军正在编成中），双方兵力超过10万人。参观演习的人蜂拥而至，包括华盛顿派来的首席参谋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演习中，蒙哥马利第一次遇见了艾森豪威尔，并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艾森豪威尔在1942年5月27日写道：“蒙哥马利将军是位果决型人物，精力充沛，干练非凡。”

从许多方面看，“猛虎”演习都是蒙哥马利在英国本土训练部队的顶点，也可被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彩排。20年后，蒙哥马利在演习讲评稿的档案本上，用笔补注说：“至今在加拿大仍为人所乐道。”

从敦刻尔克回到英国到1942年8月离开英国去埃及指挥第8集团军这两年中，蒙哥马利把他训练军队以及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观点固定了下来，并且把它一贯地应用于他所指挥的规模不等的部队。蒙哥马利说，他于1941年至1942年在英国发展的作战理论，“就是我于1942年带到非洲，1943年带到西西里和意大利，以及1944年带到诺曼底的一套理论”。

在任东南集团军司令期间，蒙哥马利最引起人们争论的一件事便是对迪耶普的袭击了。许多加拿大人认为这场灾难是他造成的，因此对他恨之人骨。但事实上，蒙哥马利只能负很少一部分责任。

在1942年最初的几个月里，由蒙巴顿勋爵领导的联合作战部的参谋长们、美国人以及英国首相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名为“围捕”和“大锤”的两项大胆的作战计划是否可行，或者可否实施其中的一项。“围捕”是大规模进攻欧洲大陆的代号，而“大锤”则是在俄国人陷入极端困难境地时，或在德国人显露出垮台迹象时，对法国进行小规模突击的应急计划。到4月份，“大锤”计划被认为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实行，但“围捕”计划则仍作为1943年4月的远景计划予以保留。到7月份，“大锤”计划被取消，“围捕”计划也逐渐消逝，注意力转向了英美军队将在西北非进行的登陆。这一登陆行动的代号为“火炬”。

在“大锤”计划和“围捕”计划的讨论过程中，参加讨论的人一致认为，要顺利地返回欧洲，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预先夺取一个良港，并且必

须在敌人能够摧毁其设施以前全部占领这个良港。由于主要计划不是被取消就是被逐渐忘却，在 1942 年，大家越来越感到必须对横渡英吉利海峡作一次尝试，以便从实践中发现夺取一个港口究竟需要做些什么。对许多可供选择的港口进行的周密研究表明，迪那普位于战斗机的航程之内，并有一些合适的军事目标：一个雷达站，一个机场，各种炮兵连，还有港湾和船舶。

联合作战司令部制定了一个计划草案，包括若干选择方案。经过反复考虑与研究，最后选定了一个方案，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于 5 月 13 日予以批准。到这时，才决定指派参与袭击的部队。由于所选目标港口正对着东南集团军管辖区，于是决定由东南集团军的加拿大部队来实施这次袭击。蒙哥马利是东南集团军司令，自然要直接负责这次袭击的指挥与协调。

蒙哥马利向加拿大第 1 集团军司令麦克诺顿将军和加拿大第 1 军军长克里勒将军进行交涉，并征得他俩同意，决定。

由罗伯茨少将所指挥的加拿大第 2 师实施对迪那普的袭击。其理由是、由英、加联合部队进行袭击难字统一指挥。

蒙哥马利是这个时候才上场的，他的部分责任也应当从这个时刻开始追究。6 月 5 日，参与袭击的部队的指挥官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是否按计划预先用重型轰炸机轰炸迪那普的防御设施。皇家空军少将利·马洛里和加拿大的罗伯茨少将反对这个建议，于是预先轰炸被放弃了。蒙哥马利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反对“取消从空中预先轰炸敌防御设施”。然而，著名军人作家伯纳德·弗格森爵士却在其著作《水的迷宫》一书中评论说：“蒙哥马利根本没有不同意这种改变。他是作出这个决定的会议主持人，而且会议记录上也没有关于他表示不同意的记录。”

7 月 1 日，蒙哥马利报告说，在他看来。“这次作战颇夸成功的希望，如果天气良好，能见度达到一般水平，而且皇家海军能运载部队在规定的时刻和正确的地点登陆的话”。因此，蒙哥马利直接或间接地对代号为“拉特”行动的第一次袭击负有一定的责任。

作战部队于 7 月 2 日和 3 日上船，定于 4 日或以后的某一天进行袭击。部队二上船就向他们充分交代作战任务，然后把他们“封闭”在船上。7 月 3 日晚上，天气不好，不宜进行袭击。这种恶劣天气一直持续到 7 月 8 日原定可以袭击的最后一天。于是部队下船分别返回营房。袭击被取消后，蒙哥马利立即写信给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佩吉特将军，建议“永远”取消袭击迪那普的计划。因为他认为，由于袭击多次延期以及参与其事的部队大多，秘密已无可挽回地泄露出去了。他说：“如果要对欧洲大陆进行袭击的话，无论如何应让他们选择迪那普以外的其他目标。”8 月 10 日，蒙哥马利离开英格兰，到北非沙漠指挥第 8 集团军去了。

蒙哥马利的建议未被采纳。夺取迪那普的血战终于在 8 月 19 日发生。蒙哥马利于当天晚上听到袭击迪那普的消息时，他正在第 8 集团军司令部以司令官的身份款待丘吉尔。

加拿大军同与他们合作的突击队员作战十分英勇，海军也是如此，但加拿大军损失惨重。加拿大军的正式战史记载如下：“在迪那普，一支不足 5000 人的加拿大军队，仅战斗了 9 个小时，被俘人数就超过了尔后在西北欧战役整整 11 个月中的被俘人数，也超过了加拿大军在意大利作战的 20 个月中的被俘人数。更可悲的是，阵亡总数达军官 56 人，士兵 851 人，合计各类伤亡人数为 3369 人。”对于加拿大军的惨重损失，蒙哥马利是没有多大责任的。

假如他的建议被采纳，迪耶普袭击根本就不会发生。甚至对于他所默许的从第一个计划中取消使用重型轰炸机一事，人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争论。人们会说，难道不可以进行一次卡恩（法国地名）式袭击或一次卡西诺（意大利地名）式袭击？如果轰炸机把街道都炸得堵塞起来，那么让坦克登陆还有什么意义呢？

1942年5月26日，德、意军统帅部发动了代号为“泰西”的进攻战役，其最终目标是占领托卜鲁克并挺进到埃及边境。6月11日前，从加柴拉到比尔哈凯姆之间的第一线支撑点全都落到德、意军手中。6月11—12日，英国坦克兵团在中心据点奈茨布里奇地域被击溃。在昔兰尼加的抵抗也遭到失败，于是零星部队开始乱哄哄地撤退到阿拉曼地区的后方防御阵地。6月19日，托卜鲁克被包围，第二天德军坦克部队立即在空军掩护下开始攻城。守军尽管储备有大量食物、技术装备和武器，却在6月21日投降了，33000名英军官兵被俘。

在这种形势下，布鲁克不得不作出决定：他必须到开罗去，并以帝国参谋总长的身份亲自调查直布罗陀、马耳他和波斯—伊拉克地区的情况，最后与驻印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就印缅边界的防御问题进行秘密磋商。但关于第8集团军，布鲁克则指出：“很明显，在那里有些事从根本上搞错了，但不容易判明这些事是什么，以及错到什么程度……危机已经来临，我必须去看看错误究竟在哪里。为此，我要单独去。”然而，7月30日，即在他动身的前一天，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却突然接到通知说，首相也决定去。就这样，代号为“手镯”的丘吉尔调查组的人员于8月初在开罗集中了，他们是来决定第8集团军的命运的。丘吉尔是绕道来的，于8月3日到达。布鲁克因为是直接到开罗，所以比丘吉尔早到。

8月3日晚丘吉尔召见布鲁克，并与之会谈至次日凌晨1点30分。会谈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奥金莱克不能再同时担任中东总司令和第8集团军司令这样两个职务了。第8集团军司令这个职务是奥金莱克于6月25日下午从里奇手中接过来的。布鲁克当然同意这个建议，但关键问题是，谁来指挥第8集团军呢？丘吉尔建议由戈特来指挥，当时戈特正在指挥第13军。布鲁克争辩说，戈特衰老了；丘吉尔则回击说，那就让布鲁克干好了。第二天一早，布鲁克就去做奥金莱克的工作，奥金莱克当天下午就同意派蒙哥马利去第8集团军任司令。布鲁克并不认为奥金莱克能和蒙哥马利很好地共事，但他是如此地需要蒙哥马利，以至于他已经在考虑必要时把奥金莱克调走一事了。

第二天，丘吉尔、布鲁克及其随员们于早晨5时45分从开罗出发，途中他们与许多下级指挥官见了面，最后才来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丘吉尔尖刻他说：“我们在一个满是苍蝇和军事要人的大笼子里用早餐。”这个大笼子当然就是一战斗司令部”了。丘吉尔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过这种司令部了，因此他对这种不舒服的环境感到十分恼怒。

早餐后，丘吉尔在作战指挥篷里与奥金莱克及其助手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争吵。丘吉尔像往常一样要求“进攻、进攻”。军人们则提出了许多推迟进攻的理由，丘吉尔感到很沮丧，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并命令戈特开车把他送往他的飞机停放的地方。在途中，戈特意味深长他说他很疲倦，想回英国去休个长假。当天下午，布鲁克来到第13军指挥部与他进一步交谈，发现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戈特说，他的智谋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需要补充新的人员。

第二天（8月6日），对前线负责人作了变动。正当布鲁克起床穿衣服时，“几乎是光着身子”的丘吉尔突然闯进了他的卧室，并告诉他说，他的主意已经拿定了。在早餐后的一次谈话中，丘吉尔表示，他打算把中东司令部分成两部分，即分成波斯—伊拉克司令部和近东司令部，前者由奥金莱克负责，后者由布鲁克负责，而蒙哥马利则指挥第8集团军。布鲁克虽然十分喜欢作战司令部的工作，但他认为自己在驾驭首相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如果继续担负目前的艰巨任务，就能为英国做出更大贡献，于是他拒绝了这个建议。

然而，就在这一天当中，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布鲁克被召到英国大使馆，丘吉尔把一份准备发给艾德礼的电报给他看。艾德礼当时是副首相，丘吉尔不在伦敦期间，他担任战时内阁主席。该电报除了建议将中东司令部划为两部分外，还建议亚历山大出任中东司令部总司令，戈特任第8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负责“火炬”行动（即进攻北非的战役）。布鲁克同意这个方案，尽管他对戈特仍有疑虑。他这样写道：“我可能很软弱。但不管怎样，在我们作出这个决定后还不到24小时，命运之神又插手了。”

战时内阁举行会议，同意了各项任命，但对划分两个新司令部的建议提出了若干疑问，丘吉尔对这些疑问作了答复，然后于8月7日下午离开开罗去视察刚刚抵达的第51高地师。但是，命运之神开始干预了。当戈特乘坐的运输机沿阿拉伯堡—赫利奥波利斯航线飞行时，一架从高空追赶下来的德国战斗机遇上了它，把它击落了，戈特不幸遇难。这条航线被认为是百分之百的安全，就连丘吉尔使用这条航线时，也没有给他提供护航。谁知这不幸的一刹那却偏偏被戈特碰上了。

丘吉尔和布鲁克当天晚上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和陆军元帅史未资一起商量，最后决定由蒙哥马利接替戈特。布鲁克用电话通知奥金莱克他们的这个决定，奥金莱克表示同意。于是，丘吉尔向战时内阁发出一份关于举荐蒙哥马利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电报。次日凌晨，战时内阁认可蒙哥马利为第8集团军司令的回电到达。剩下要做的事，就是由伊恩·雅各布上校带一封丘吉尔的亲笔信给奥金莱克。告诉他，他所担任的两个司令职务已被解除。

蒙哥马利对上层的这些活动一无所知。

1942年8月初，苏格兰将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佩吉特将军让蒙哥马利与他一起前往观看。他就和佩吉特一起乘总司令的“轻剑”号专列北上。演习的第二天，陆军部打电话给蒙哥马利，要他立即返回伦敦，去接替亚历山大任第1集团军司令，并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着手制定将在1942年11月进行的代号为“火炬”的北非登陆计划。亚历山大已去埃及担任中东总司令。他立即返回伦敦，并在陆军部获悉了详细情况，随后便回到设在赖盖特的司令部，准备开拔。

然而，第二天（8月8日）早晨7点钟，当蒙哥马利还在刮脸的时候，陆军部又来电话说，任命他为第1集团军司令的命令撤消了。现在要他到埃及去指挥沙漠中的第8集团军。那是早上晚些时候，蒙哥马利才知道戈特被任命为第8集团军司令，但他已阵亡，所以要他去接替那个职务。

蒙哥马利被任命为第1集团军司令还不到24小时，就被调任第8集团军司令，这是他军旅生涯中最走运的一件事。凭借第8集团军，他能够在首相和世界新闻记者的注视下，打败一个著名的敌人，赢得一次巨大的胜利，成为一颗光芒四射的明星。如果他参加“火炬”战役，却不可能赢得什么荣誉，

因为不管蒙哥马利可能做些什么，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至少在“火炬”战役的初期阶段，英国部队的数量要比美国部队少得多，人们注意的中心人物是艾森豪威尔，而不是他麾下的各集团军司令官。同时，德军力量的增强，排除了英美军队在冬天降临之前迅速取胜的可能性。

蒙哥马利十分愉快，信心十足地做好赴非洲作战的准备。但他为他儿子戴维的事烦恼。蒙哥马利很少见到戴维，但他不要蒙哥马利家族的人去探望戴维，更不要他们照顾他。在任第5军军长期间，他严格遵守眷属探亲办法，卡修斯家只好继续替他照顾戴维。

1942年该是戴维进公学的时候了，蒙哥马利就于5月初把他送入温彻斯特学院。他准备启程去埃及时，戴维正在和朋友们一起度暑假。于是，他决定写信给雷诺兹少校（戴维所进预备学校的校长），请他们夫妇替他收留和照顾戴维，直到他打完仗回来。蒙哥马利在信里还附上他的遗嘱副本：“我所有的一切，包括一张200英镑的汇票，都留给戴维。我请你替戴维付学费，买衣服，事实上在我离英期间，作戴维的监护人。”

蒙哥马利的东西很少，离英准备工作很快就完成了。1938年离开朴次茅斯时，便把他的家具、书籍、银器、文件、照片和纪念品等，都寄存在一家信托公司里。1941年1月10日夜，德军轰炸朴次茅斯，信托公司全部被毁。他得到了993英镑的赔偿费，但那些纪念贝蒂的物品却是赔偿费无法补偿的。

蒙哥马利预定8月8日启程的飞机由于天气不好被取消。8月9日，他又给雷诺兹写了一封信，强调他家族的任何人都无权过问戴维的问题。他在信中写道：“如我昨天的信（长信）还没有写清楚，我要再说一遍：我托你对戴维进行完全而绝对的管理。假如我家族中任何人想插手过问，让他们马上走开。有关管理戴维的所有事情，你拥有独特的权威。我请你在我离开英国期间，担任戴维的官方监护人。如我阵亡，戴维的法定监护人将是约翰·卡弗。但我不会阵亡。”

8月10日晚，蒙哥马利飞离英国，第二天黎明抵达直布罗陀。在直布罗陀呆了一整天后，当晚起飞去开罗。旅途中，他反复考虑面临的各种问题，对于如何着手工作，终于想出了一些主意，至少已初具轮廓。正是：苦练两年战法定，从容上阵扭乾坤。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十一章 初战告捷

公然违令先接管，决不后退忙备战；
坚守不出设陷阱，哈勒法山捷报传。

1942年8月12日一早，蒙哥马利到达开罗郊外的一个机场，然后被接到金安塔附近的米纳·豪斯饭店，住在奥金莱克包下的一个房间里。在洗澡、进早餐之后，他驱车前往开罗的中东司令部。他10点多钟到达那里，立即被带去见奥金莱克。

奥金莱克把蒙哥马利带进地图室，关好门，室内别无他人。在告诉蒙哥马利他即将离任之后，奥金莱克向蒙哥马利解释了他的作战计划：应不惜任何代价保存第8集团军，而不使它在战场上遭到歼灭性打击，如果隆美尔很快发动全力攻击，第8集团军将退到尼罗河三角洲；如果开罗和尼罗河三角洲不保，将继续向南退却至尼罗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撤退到巴勒斯坦。副参谋长约翰·哈定少将已经制定了把第8集团军司令部后撤至尼罗河的计划。

听到这个计划后，蒙哥马利感到十分惊讶，于是提了一两个问题，但很快感到奥金莱克讨厌那些涉及立即修改他的既定方针的问题，蒙哥马利只好沉默不语。

奥金莱克还让蒙哥马利第二天就进沙漠，在第8集团军司令部呆上两天，熟悉熟悉情况，等到8月15日才正式接任。同一天他要亲自向亚历山大办理移交，他希望这两件事同时进行。他虽然已经命令拉姆斯登代理他，但他本人仍旧指挥着第8集团军，万一敌人发动攻击，或者发生了什么危机，他可以立即从拉姆斯登手中再接过直接指挥权。这种做法简直太奇特了。如果亚历山大同意奥金莱克推迟移交指挥权，蒙哥马利决不会同意。谈话一结束，他立即有礼貌地告辞了。

蒙哥马利当即去找亚历山大，向他提出为第8集团军建立一支后备军的计划。这支队伍应该同隆美尔的部队一样，拥有较完善的装甲武器。亚历山大同意了，但当时他还未接任总司令。接着，蒙哥马利就去找他坎伯利参谋学院的学生、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哈定，向他说明了整个计划，并请求他用分散在埃及的零星力量组建一个装甲军。哈定答应想想办法。那天下午，蒙哥马利买了一些在8月的沙漠中急需的衣服。下午6时，蒙哥马利与亚历山大去见哈定。哈定说他可以组建一个装甲军。它将是第10军，包括第1、第8、第10装甲师和新西兰师。每一个师包括一个装甲旅、一个步兵旅和师直属队。新西兰师包括两个步兵旅和一个装甲旅。这使蒙哥马利非常高兴。

那天蒙哥马利还找到了一个随从副官约翰·波斯顿。波斯顿曾跟随过戈特，是从第11轻骑兵团来的一个年轻军官。蒙哥马利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不能再有更好的选择了。我们从阿拉曼到易北河，转战了十个国家。我很器重他。他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星期在德国牺牲了。”

8月13日上午5时，蒙哥马利乘车离开英国大使馆向沙漠进发。在亚历山大港以西的十字路口，他碰到了如约前来接他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作战情报处长德·甘冈。开罗大道从那里向左转弯，开始沿着海岸延伸。德·甘冈是蒙哥马利的知交，并得到过蒙哥马利的帮助和提携。为了尽早了解情况，蒙哥马利请德·甘冈与他同车。车上，他们靠紧坐着，膝上铺一幅地图，德·甘

冈向他介绍作战形势、最新敌情、各个战区的指挥官、部队士气、奥金莱克关于今后的行动命令，以及他自己对这一切的看法。

通过一路的交谈和观察，在到达第8集团军司令部之前，蒙哥马利已选中德·甘冈作他的参谋长。蒙哥马利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对这一决定从未后悔过。弗雷迪·德·甘冈和我从此一起经历了这场战争。无论我到哪儿，他总是担任我的参谋长。从阿拉曼到柏林，我们始终在一起。在我们共事中，由于他的才干日益增长，我感到我是多么幸运。在英国陆军中，我以为像他这样卓越的参谋长，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大约上午11时，他们到达第8集团军的沙漠司令部。一下车，发现眼前的景象足以使任何人泄气：在满目荒凉的沙滩上，只有几辆卡车，没有进餐帐篷，绝大部分工作都得在烈日之下的卡车内或露天里完成，到处都是苍蝇。蒙哥马利虽然不是一个生活奢侈的人，但却有这么一条原则：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应当有合情合理的生活享受，哪怕只是为了工作效率的缘故。他和丘吉尔一样，对这里到处脏乱不堪感到厌恶。

第8集团军代理司令拉姆斯登中将在1938—1939年间曾在蒙哥马利领导下当过营长。德·甘冈在车上介绍情况时，曾把他称为“该死的废物”。蒙哥马利一到，他便来向他介绍形势。蒙哥马利盘问他有关隆美尔如发起进攻，英军将计划后撤的事，他回答说，关于撤退，曾发出过一些命令，但命令是含糊的。总之，蒙哥马利发现“战线上的一切都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气氛”，情况十分危险。于是，他决定采取行动。按照命令，他要到8月15日才能接管第8集团军，当时还只是13日，但是，他不能再等了，决心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他马上解除了拉姆斯登的职务，让他回第30军去当他的军长。拉姆斯登颇感惊讶，但他还是去了。就这样，蒙哥马利在8月13日14时，即在授权之日的前两天，就任第8集团军司令。随后，他向总司令部发去一份说明他已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电报。他这种做法完全违背命令，但总司令部并未回电。接着，他取消了这以前有关撤退的所有命令。。

接管第8集团军后，蒙哥马利马上开始处理他认为必须立即予以注意的四项任务：一是在集团军内树立他的形象并恢复全军官兵对集团军本身及其高级军官的信任；二是审查指挥机构并砍掉那些他认为普遍存在的“朽木”；三是建立一个与他的性格和作战理论相适应的指挥系统；四是对付隆美尔。迫在眉睫的将是他指挥的第一场战斗。这场战斗必须打赢，而且是决定性地打赢。

蒙哥马利决定迅速暂离司令部，免得总司令部对他擅自接管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提出异议。但在离开之前，他让德·甘冈当天晚上6时召集全体参谋人员，他要向他们作一次重要的讲话。

由于他已会见过第30军军长拉姆斯登，便直奔南翼的第13军司令部。在那里他同代理军长弗赖伯格将军进行了一次长谈，随后又同澳大利亚第9师师长莫斯黑德谈了话。这两人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当他回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时，已经相当晚了，参谋人员都在离他的指挥车几码远的地方等他。在傍晚的一片凉意之中，他开始向第8集团军全体参谋人员讲话：

“一、首先，我要向你们介绍我自己。你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们。然而我们必须在一起工作，因此彼此必须相互了解，并应相互具有信心……我们今后要像一个团队一样，在一起工作；我们将共同获得这个伟大军团的

信任，走向前方，直到最后胜利。

“二、我认为指挥官的首要责任之一，是创造一种我称之为‘气氛’的东西……我不喜欢这里现有的气氛。这里的气氛是疑虑，是回头选择下次退却的目标，是失去了我们打败隆美尔的信心，是让预备队在开罗和三角洲地区准备防御阵地。所有这些必须停止，让我们有一种新的气氛。

“三、埃及的防御就在阿莱曼，而且就在阿拉姆哈勒法山脊上。在三角洲挖掘战壕有什么用？毫无用处。如果我们失去这里的阵地，我们就失去了埃及。所有现在在三角洲的战斗部队必须立刻到这里来。就在这里，我们要站住脚，要战斗，不会再有进一步的退却。我已经下令，所有关于退却的计划与指令都要烧掉，而且是立刻烧掉。我们要立足在这里战斗。如果我们不能在这里生存，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死去。

“四、……首相的命令是摧毁在北非的轴心国部队……这里如果有人认为办不到，就让他立即走开。在我们这个团体里，我不要任何持怀疑态度的人……

“五、我现在了解隆美尔可能随时发动攻击。好得很……我只怕他不来攻击。

“六、同时，人们自己要计划一次大型攻势……我们将会受到来自多方的压力，要我们快一点攻击，但直到我们完成准备前，我不会攻击……

“七、我要告诉大家，我的工作系统将采取参谋长制。我已任命德·甘冈准将为第8集团军参谋长，授权他管理整个司令部，他发布的任何命令都应立即贯彻执行。

“八、……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把司令部迁移到像样的地点，使我们享有合理的舒适生活，使军团参谋人员能和沙漠空军司令部的人员并肩工作。这里是个可怕的地方，使人泄气而不利于健康，并且是全非洲所有苍蝇的集合地。在这里我们做不出好的工作。让我们迁到邻近海边的地方，那里将是清新而卫生的……”

他讲话时，全场寂静，细针落地，可闻其声。当他讲完话走下阶梯时，全体起立，向他敬礼。他的讲话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和乐观情绪，很快就传到了前线。这对于澄清大家的认识，稳定全军官兵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

蒙哥马利在第8集团军度过的第一天虽然漫长而劳累，但收获不小，十分成功，他感到非常高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天晚上我上床时，可真是累了。但我知道我们是在迈向成功的道路上前进。我怕我入睡的时候脸上还带着不服从的微笑，因为我正在向一个别人认为是由他指挥的第8集团军发布命令！”

第二天早晨，一个军官把蒙哥马利唤醒，交给他一份情况报告。蒙哥马利非常生气，说他从来不需要什么人带着情况报告去见他。那个军官再三道歉，并解释说奥金莱克总是很早就被唤醒，接受早晨的情况报告，蒙哥马利告诉那个军官说，他不是奥金莱克，如果出了什么事，参谋长会向他报告的。那位军官非常不安，于是蒙哥马利请他共进早茶，聊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才让他心情舒畅地离去了。

接着，蒙哥马利对他所谓的“朽木”进行了处理，他迅速而公正地撤换了一些人，补充了一些人。科贝特和多尔曼·史密斯被撤职了。拉姆斯登被撤职了。不久，第7装甲师的伦顿也被撤职，原因是他和集团军司令官第一次见面就犯了一个错误。他说，在即将发起进攻时，唯一需要决定的问题是，

由谁率领装甲部队向隆美尔进攻。蒙哥马利告诉他，“我们的坦克将不发起进攻，而是让隆美尔自己撞上来。”这时，伦顿竟坚持己见，与蒙哥马利争辩起来……结果，在哈勒法山战役后，他就被约翰·哈丁接替。随后，又有一些指挥官被撤职。

蒙哥马利采取措施清除了被他诊断为“朽木”的那些人，并以晋升或从英国调进的手段引进了一些年富力强的人。他从英国调奥利夫·利斯来接管北面的第30军，调霍罗克斯来接管南面的第13军，调柯克曼准将任炮兵指挥官，调休斯任第8集团军高级牧师，调英王龙骑兵警卫军的威廉斯少校任情报参谋处处长。他本来还打算把迈尔斯·登普西调来指挥计划成立的新装甲军，但亚历山大劝他说，一下子调来三个新军长，未免太过分了。这样，他才放弃更好的选择而让拉姆斯登来当新装甲军军长。

这一切绝不是毫无目的的清洗。历史记录表明，蒙哥马利是一个精于选拔部属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何一个集团军的参谋机构恐怕都不能同蒙哥马利的媲美。

蒙哥马利的自我宣扬和一些人的被解职，对第8集团军产生了普遍的有益的影响。优异服务勋章和军事十字勋章获得者弗拉基米尔·佩尼亚科夫中校在其自传中写道：“我认为，一个有勇气把一些准将从集团军的参谋机构里解职的将军，一个知道怎样在军士长的心中激发起热烈的献身精神的将军，是不难打败隆美尔的，或者说，是不难赢得胜利的。”

8月19日丘吉尔从莫斯科返国途中，视察了第8集团军。蒙哥马利陪他视察前线，并向他报告了准备打败隆美尔的计划。那天晚上丘吉尔在第8集团军设在海边的新司令部里下榻。晚餐前，他在地中海里洗了一个澡。由于他没有带游泳衣，当他穿着衬衫走向大海时，蒙哥马利花了不少力气才让记者走开。丘吉尔对远处一群士兵很感兴趣，他说：“多滑稽呀，他们怎么都穿白色的游泳裤呀？”蒙哥马利马上解释说，在第8集团军，是没有人穿游泳裤游泳的。军人们整天穿短裤，经常连上衣也不穿，他们的身体被太阳晒得黑黑的。但由于穿短裤的缘故，他们身体的那一部分没有被太阳晒到。从远处看去，就好像穿着白色游泳裤一样，而实际上那是他们白色的肌肤。晚餐时，德·甘冈为首相安排了合适的酒和陈年白兰地，大家吃得兴致勃勃。

第8集团军司令部和他所视察的部队所表现出的气氛使丘吉尔惊喜不已。他在拍回国内的电文中指出：“在前任司令的指挥下，我非常确定地认为，我们正在走上灾难之路。但现在的气氛已完全改变：任何阵地都在加强，原来分散过广的部队，现已重新编组成坚利的单位；第44和第10装甲师已到达前方地域，道路上是连绵不断的部队，坦克和炮兵在向前方地区运动。”

第二天离开时，丘吉尔在蒙哥马利的纪念册上留言。由于蒙哥马利于8月13日接管了第8集团军，而那一天正好是布连汉姆战役纪念日，于是他题道：

“值此布连汉姆战役纪念日，也是新司令接任之际，我祝愿第8集团军司令官和他的部队战果辉煌，威名远扬。

温斯顿·S·丘吉尔
于1942年8月20日”

蒙哥马利感到，目前迫切需要的就是按自己的想法去打一仗。这一仗要

打在英军发动攻势之前，而且必须战果辉煌。这样，才能恢复全体官兵对高级指挥官的信心，以高昂的士气投入未来的严峻战斗。

根据当时战场的情况看，隆美尔最明智的方针是实施“兴登堡路线”式的撤退，即向西撤退到某个适当的防御阵地上，以缩短过长而危险的交通线，更加靠近自己的基地，因为当时隆美尔的人员和物资都严重短缺，而他的各个师总共缺 16000 人，他的运输工具有 85% 是缺少备件的缴获车辆；他的战斗装备的数量比编制规定的少 210 辆坦克和 175 辆装甲运兵车；他的弹药十分缺乏；他的士兵的口粮质量极差；他的燃料储备已经很少而补充又没有把握。此外，有计划的撤退将使英军精心构筑的工事完全失去作用，对德军十分有利。

但是，蒙哥马利却正确地判断隆美尔一定会进攻，因为不管支持他撤退的理由多么充足，撤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 8 月份，德军的大战略计划看来仍然是可行的。在德军实施的大钳形运动中，苏联方向的大量德军将经过小亚细亚南下与向前进攻的非洲军团结合起来，向盛产石油的地区和印度洋突进。对隆美尔来说，在德军向高加索的大规模攻势仍在顺利进行的时候，就把这一巨大钳形攻势的另一端后撤，等于是令人不快地承认失败。因此，他只能进攻，不能撤退。

第 8 集团军的情报人员肯定敌人的进攻方向在南侧，然后向左迂回，调装甲部队攻向阿拉姆哈勒法和鲁瓦伊萨特山地。蒙哥马利同意这种看法，并以这个预测为基础制定了作战计划。

蒙哥马利给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设计了一个英国军队从未设想过的陷阱，使隆美尔的进攻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结果。蒙哥马利以新西兰师箱形阵地的南翼侧为基础，在箱形阵地与阿拉姆哈勒法山之间的缺口内部署了第 22 装甲旅，该旅坦克都在隐蔽阵地上掘壕固守。他把从尼罗河三角洲匆匆调来的第 44 师的两个旅配置在阿拉姆哈勒法山脊上。第 23 装甲旅作为预备队配置在第 22 装甲旅后面。第 8 装甲旅配置在哈勒法山脊以南一个靠后的阵地上。第 7 装甲师则配置在哈勒法山脊南面，向西保持一个宽大的正面，当敌人袭击时，马上撤退；当敌人袭击转向左面，逼向阿拉姆哈勒法山地时，就从东面和南面进行骚扰。

不管隆美尔采取什么样的进攻方法，这样的部署都能将他堵住。如果他朝正东方向进攻，那他将被第 8 装甲旅堵住，而第 22 装甲旅和两个师的炮兵将从其左侧猛击。如果他突破地雷场后向左侧出击，那他将面临配置在隐蔽阵地上的第 22 装甲旅，而在他的右面则是严阵以待的第 8 装甲旅。总之，不管隆美尔朝哪个方向运动，都将被困住，当隆美尔被困时，英国空军的飞机将以密集队形对其轮番攻击，实施“地毯式轰炸”。此外，蒙哥马利还将以空前集中的方式使用炮兵，把他在英格兰用无线电同时指挥大量火炮射击的试验用于实战。

对付隆美尔进攻的计划一经制定，就开始进行各项准备。在战役开始前几天，第 8 集团军官兵都有一种特别镇静的感觉。当时的新西兰第 5 旅旅长霍华德·基彭伯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蒙哥马利）向我们详尽他说明了整个战役计划。我非常喜欢这一计划。我觉得它比以往任何一次战役计划都高明。更令人高兴的是，我有了一种主意已定、镇静自若的感觉，这种感觉无疑是从集团军司令部那里感染来的。这是第一个典型的蒙哥马利式战役，一切准备活动都是在不慌不忙、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完成的。当德军进攻

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了。”

然而，蒙哥马利的对手隆美尔却并不镇静。当时，隆美尔不仅疲劳不堪，而且有病。他的医务顾问曾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说：隆美尔患有胃溃疡和鼻病，血液循环也不好，不宜再担任指挥职务了。隆美尔本人也建议让古德里安来替换他，但遭到拒绝。实际上，在哈勒法战役之前和战役期间，隆美尔的身心都不是处于最佳状态。拜尔莱因将军回忆说，隆美尔曾对他的医务顾问说：“教授，我昨天作出的进攻决定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其结果要么是我们在俄国的德军能够抵达格罗兹尼，而我们在非洲能够抵达苏伊士运河，要么是……”

蒙哥马利判断隆美尔可能在8月25日晚发动攻击，但隆美尔当夜并未攻击，第二天也无行动。到27日，蒙哥马利根据最新情报，判断德军的攻击将在两夜之后。隆美尔的进攻延期，使第8集团军有了较充裕的时间进行战前训练演习，进一步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

8月31日晚，蒙哥马利像往常一样，到了时间就上床。当隆美尔在半夜后发动进攻时，他早已睡着了。德·甘冈决定叫醒蒙哥马利，把消息告诉他。蒙哥马利答了一句“好极了，不能再好了。”马上又睡着了。

事情完全像蒙哥马利预料的那样发生了。简直可以说，在阿拉姆哈勒法山战役的最初几个小时内，隆美尔就打输了。实际上，英国空军在8月30日黄昏就开始出动，用“威灵顿”轰炸机轰炸了隆美尔的装甲车停车场。当非洲军团在地雷场奋力开辟通道的时候，他们发现地雷场比预计的要宽得多，复杂得多。第一个通道直到8月31日凌晨4点30分才开辟出来。早上8点，隆美尔接到报告说，进展仍然十分缓慢。第21装甲师的冯·憐斯麦将军被地雷炸死，而非洲军团指挥官涅林也因受伤而不能指挥。拜尔莱因接管了涅林的指挥，并和隆美尔一起决定继续进攻，企图在夜间迅速向东猛冲。其结果是德军坦克纵队在雷场中进展缓慢而英军第8集团军和空军则已完全做好准备：坦克已开到战斗位置待命，炮兵也已做好开炮的准备。由于坦克在松软的洼地上行进非常浪费汽油，隆美尔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命令他的装甲部队向北作预定的左包抄运动。这样德军坦克就朝着英军第22装甲旅的隐蔽着的坦克开过来了。第22装甲旅旅长罗伯茨准将后来写道：

“它们开上来了，排成令人难忘的阵势……现在它们全都向左转了，面对着我们，开始慢慢地推进……我用无线电预先通知了各部队，在敌人的坦克进入1000码距离以前不允许射击。不久它们就进入这个距离了。几秒钟后，C·L·Y的坦克突然开火，激战随之而起。你一旦处于战斗当中，就很难判断时间，似乎只过了几分钟，C·L·Y的所有‘格兰特’式坦克都开火了。德军的新式75毫米炮坦克给我们造成了很大伤亡。敌人的坦克也遭到了重创，停止了前进。但情况仍然严重，我们的防御阵地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我立即命令苏格兰龙骑兵第2团尽快离开他们的阵地来堵这个缺口。这时，敌人的坦克又开始慢慢前进，已经开到了离步兵旅的反坦克炮很近的地方。当德军坦克进入几百码距离以内时，反坦克炮仍然保持沉默，接着突然开火，敌人遭到重大伤亡。但由于寡不敌众，一些反坦克炮被敌人的坦克碾碎了。我请求炮兵紧急支援，炮兵立刻就向敌坦克开炮。由于炮兵的威力，加上敌人已受到严重伤亡，进攻被挡住了……”

隆美尔迫于燃料短缺，在那天傍晚就停止使用坦克了。这样，非洲军团就在皇家空军的照明弹和炸弹以及第13军炮兵的轰击下停止了活动。翌日，

敌人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攻击，但远不如 31 日那样猛烈。6 时 40 分，敌第 15 装甲师对阿拉姆哈勒法山脊进行了短时间冲击。7 时 5 分和 8 时 30 分，又分别进行了两次小规模局部攻击。在此期间，敌人还与第 8 装甲旅进行了一次剧烈交战。霍罗克斯牢记着蒙哥马利不允许第 13 军的坦克从事近战的指示，在损失了几辆坦克后就把第 8 装甲旅撤回了。

9 月 2 日，隆美尔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撤退，并在 3 日加快了撤退速度。迫使隆美尔撤退的重要原因是沙漠空军轰炸了隆美尔用以发动攻击的后方基地托布鲁克，使他得到补给的可能性消失了。缺乏汽油意味着他无力重新发动攻击。但蒙哥马利拒绝了一切要求坦克发起进攻的请求，并且实际上禁止霍罗克斯继续追击敌人和占领希迈马特高地。他说，要让隆美尔保留下那里的观察哨，以便德军能够看到英军准备下一个大战役时将要采取的各种欺骗措施。到 9 月 7 日，非洲军团已在英军原来的地雷场及其后方站稳了脚跟，于是蒙哥马利下令停止这次战役。

在这次战役中，德军损失了约 2900 人和 49 辆坦克及装甲车辆；英军损失了 1700 余人和 67 辆坦克，其中 13 辆“格兰特”式坦克尚可修复。但英军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第 8 集团军司令部充满了兴奋与喜悦的气氛。但对蒙哥马利而言，这种兴奋的顶峰则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温德尔·威尔基的光临。蒙哥马利亲自陪同威尔基到前方地区视察。正当盟军在挪威、法国、希腊、远东等战场遭受挫折之时，能向美国总统特使展示德国军团大撤退的景象确是一个令人自豪的时刻。

有时人们批评蒙哥马利在隆美尔撤退之后没有命令第 8 集团军进行追击，而失去了消灭非洲军团的大好机会。然而，应当看到，当时存在着许多起抵消作用的因素。首先是心理因素。蒙哥马利在他的第一个战役中需要一个干净利落的胜利。这种心理再加上他天生的小心谨慎，促使他避免冒险。他不愿意让他的装甲部队像过去那样乱七八糟地撞上隆美尔著名的防坦克屏护队。其次，他认为第 8 集团军的训练状况还不够好，第 132 旅和第 50 皇家坦克团在截断敌军退路时所遭受的严重伤亡，便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多尔曼一史密斯在他 7 月间写的备忘录中评论说：“在第 8 集团军中，没有一支部队受过充分的进攻作战训练。”而奥金莱克本人则在 7 月底用电报向伦敦报告说：“他预计他的集团军在 9 月中旬以前不能进行进攻作战，需要进行相当大的改编和新的训练。”再次，蒙哥马利决心在阿拉曼彻底打败隆美尔，但他准备等到确有把握时才动手，而不愿意仓促行事。

实际上，英军不追击才是最令隆美尔伤脑筋的事。由于他既缺乏汽油，又无制空权，便只有诱使英军离开阵地，才能实施有效打击。英军不追击，使他的计划落空，气得他大骂英军为“猪仔”，说他们胆小怕事，不敢进攻。由此可见蒙哥马利不准追击的命令是正确的。

在奥金莱克可能遭受失败的地方，蒙哥马利却获得了成功，这不能不说明他具有高超的指挥艺术。总起来看，蒙哥马利在这次战役中的指挥特点主要表现在：一、他摆脱了英军沙漠作战的传统，在战役前对坦克进行了正确的部署，在战役中对坦克实施了严格的控制；二、他认识到了制空权的重要性，主动与空军合作，使陆军与空军为同一计划同心协力，紧密配合，在整个战役中牢牢掌握了制空权；三、他大量使用火炮作为对敌人实施猛烈轰炸的一种补充手段，给敌人造成更大伤亡。

在沙漠空军的协助下，蒙哥马利在阿拉姆哈勒法山着实教训了隆美尔一顿，并使他对此教训铭记终生：“谁要是被迫同完全掌握了制空权的敌人作战，即使他拥有最新式武器，也将像原始人同现代欧洲军队对阵一样，处境十分艰难而绝无胜利的可能。”

阿拉姆哈勒法山这一战是蒙哥马利在一定作战条件下进行防御战的典范，是阿拉曼进攻战役的必要准备。没有阿拉姆哈勒法战役，阿拉曼战役可能不会那么成功。尽管阿拉姆哈勒法山之战只是一次成功的防御作战，但其意义不可低估。隆美尔当时的作战参谋冯·梅伦廷就在《坦克战》一书中把阿拉姆哈勒法山之战描述为“沙漠战争的转折点，是各个前线一系列败仗中的第一个败仗，预示了德国的战败”。

对英国来说，阿拉姆哈勒法山之战的胜利是北非沙漠传回的第一个捷报，它预示着第8集团军将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战役结束后，蒙哥马利写信给英国的友人说：“我与隆美尔的初次交锋是饶有兴味的。我幸好还有时间收拾这个摊子，进行筹划，因而毫无困难地把他解决了，我感到我在这场球赛中赢得了第一轮，这一轮是他发的球。下次该轮到我发球了，现在的比分是一比零。”正是：首战告捷信心增，准备再战定乾坤，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十二章 扭转乾坤

“轻步”不轻多愿战，“增压”再把顽敌歼；
乘胜追击上千里，德军惨败乾坤转。

阿拉姆哈勒法战役的胜利，犹如一针兴奋剂，使第8集团军的士气空前高涨。9月7日，战斗刚刚结束，蒙哥马利便总结出那次作战的经验教训，一共10条。9月10日，蒙哥马利向整个集团军发布训练指示——第8集团军第一号训练备忘录，并且亲自监督所辖3个军进行训练。9月14日，蒙哥马利制定出代号为“轻步”的阿拉曼战役计划。

这个计划准备同时进攻敌人的两翼。由利斯指挥的第30军在北面主攻，在敌防线与布雷地带打开两条走廊。由拉姆斯登指挥的第10军通过这些走廊后，在敌供应线两侧的重要地带布下阵地，准备消灭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在南面由霍罗克斯指挥的第13军将攻入敌阵地，与第7装甲师联合行动，把敌装甲部队吸引过来。这将有助于第10军在北方展开攻击。第13军不应遭受严重伤亡，特别是第7装甲师必须保持“完好”，以便在完成向内陆突进之后进行机动作战。蒙哥马利既不计划在左翼进攻，也不准备在右翼进攻，而准备在中央偏右处突破。这样，部队打进去之后，便可根据情况，朝最有利的方向（向左或者向右）发展战果。蒙哥马利的计划没有得到总司令部参谋班子的普遍赞同，因此他们向德·甘冈施加压力，要他让蒙哥马利改变主意。但总司令亚历山大却没有反对蒙哥马利的计划。

9月17日丘吉尔拍电报给亚历山大，要求第8集团军提前发动攻势。于是，亚历山大带着丘吉尔的电报来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对蒙哥马利说：“首相要求你一定在9月进攻。”蒙哥马利回答说：“我不能在9月进攻，若让我在10月进攻，我一定会打胜仗。”有关这件事，蒙哥马利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在我到达时，我曾对第8集团军的官兵许了愿，在没有作好准备之前我不会发动进攻。从目前情况看，要到10月才能准备就绪。月圆期是10月24日，我认为应在10月23日夜发动进攻，并报告了亚历山大。白厅当即复电。亚历山大接到首相的电报说，进攻必须在9月发起，以配合俄国人的某些攻势以及盟军于11月初在北非海岸西端的登陆（‘火炬’战役）。亚历山大前来看我，商量怎么答复。我说如在9月份进攻，我们各项准备来不及，攻了也要失败；如果延至10月，我保证可获全胜。我认为9月动手简直是发疯。难道真要照办吗？亚历山大一如往昔全心全意地支持我，因此，就照我所要求的那样答复了白厅。我曾私下告诉亚历山大，由于我对官兵们许诺过，因而拒绝在9月发动进攻；假如白厅命令我在9月行动，那么就让他们叫别人来干好了。阿拉姆哈勒法山战役之后，我的身价提高了。此后就再也没有听到9月发动进攻的事了。”

蒙哥马利挫败了首相的干扰，从而获得了必要的时间来解决训练和重新编组这两个棘手的问题。之所以需要训练是因为未经过训练的第44师又在一次战斗中遭到了惨重损失。该师的131旅在9月29日夜对穆纳西洼地进行第二次袭击时，一个营遭受重大伤亡。原因是由于缺乏经验而忽视沙漠战规律。该师的两个旅由于遭到失败和损失已经被解散了，而第3个旅，即133旅，则被调去为第10军组建一个车载步兵旅。该旅不得不学习沙漠战的必需

知识，同时又要学习在装甲师中充当步兵所需要的新技术。因此，第 44 师是最不幸的。

另一个新步兵师是第 51 高地师，它的运气较好。它拥有自己的训练场，进行过好几次演习，还把所属各师配属给北面的澳大利亚师，以使后者每周能抽出一个旅来进行紧张的训练。

在第 7 装甲师里，第 4 轻装甲旅在 10 月 18 日以前担负着作战任务，不能进行训练；但第 22 旅承担的任务要少一些，因而进行了三次演习。

在第 10 军里，由于新装备到达缓慢而进一步加剧了训练的困难。图卜鲁格陷落后，罗斯福慷慨提供的 300 辆“谢尔曼”式坦克实际上在 9 月份已经运抵尼罗河三角洲，但由于某些原因，却迟迟不能装备部队。

鉴于隆美尔防御工事的性质，训练大纲中最重要的训练项目是扫雷分队的训练。这种训练是在第 8 集团军工程指挥官基希准将的监督下进行的。他挑选英国陆军工兵第 3 连连长彼得·穆尔少校来负责训练工作。

基希搜集了资深的军官们对扫雷的看法，然后把这些看法告诉了穆尔并指示说：“我肯定地认为，我们应当进行一次扫雷训练，正像我们进行火炮的装弹和发射训练一样。去吧，一星期后再带着你的建议来找我。当你制定出你的训练计划，并由我批准后，你就可以成立第 8 集团军扫雷学校了。”在穆尔和后来的新西兰人柯里少校的领导下，这个扫雷学校制订出了一套训练方法，并且在 10 月 23 日以前训练出 56 组扫雷人员。

他们还制造了一些机械工具来帮助工兵执行孤独而危险的扫雷任务，有 20 多辆“马蒂尔达”坦克被改成了扫雷装置，这种扫雷装置在向前运动时能够用它的旋转轴上的旋转链条鞭打前面的土地。这种被人叫做“蝎子”的扫雷装置主要供第 7 装甲师在南面进行佯攻时使用，但它们实际上没有起什么作用。不过这是野战条件下对扫雷装置的一种极有价值的试验。后来，这种装置在英国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改进，在诺曼底登陆战役和以后的战斗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阿拉曼战役中，用处较大的是发给 3 个军的 500 个地雷探测器，用这种探测器探测地雷比用传统的手戳法探测地雷速度更快，因而也更安全。在这次战役中，为了在布雷区开辟通路，给地雷工兵发了长达 120 英里的标示带和 88775 盏灯。

蒙哥马利密切地注视着部队的训练情况，感到尽管训练正在尽快地进行着，但部队的训练水平，特别是装甲部队的训练水平，还不足以进行干净利落的突破，并在坦克大决战中取得优势。由于没有达到训练标准，分配给各师的任务可能会以失败告终。第 8 集团军自组建以来，伤亡官兵约 80000 人，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充和训练。

10 月 5 日，第 8 集团军情报单位对隆美尔的防御计划提出最精确的分析。隆美尔的防御计划是他在 9 月 23 日回德国休养前制定的。隆美尔用大约 50 万枚地雷，设置了一系列地雷带，特别是在蒙哥马利试图突破的北部和中北部防线上，设置了两条大致平行的地雷带，并以防御据点形成的“分割墙”连接南北两面的主地雷场，其间隔为 4—5 公里，造成一连串的空白地区。设置空白地区的目的，是为了给突破部队设置陷阱，因为攻击部队突破第一地雷带之后，将被迫向“分割墙”左边或右边运动。

第 8 集团军的整个训练情况和这份新情报，迫使蒙哥马利重新考虑他的作战计划，10 月 6 日，他放弃了第一个“轻步”计划，而提出一个基于完全不同原则的计划（代号仍为“轻步”）。他说：“过去一般公认的原则是，

现代战役计划应当首先着眼于消灭敌人的装甲部队，一旦这个任务完成了，敌人的非装甲部队就很容易对付。我决定把这个原则颠倒过来，先消灭敌人的非装甲部队。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暂不打他的装甲师，留待以后再收拾它们。”他准备让坦克屏护队向前推进，堵住敌地雷场通道的西部出口，而用“粉碎性”打击法有条不紊地消灭敌防区内的步兵。敌装甲部队不可能眼巴巴地看着非装甲部队被逐步消灭而按兵不动。它们将进行猛烈的反突击。这样，便正好撞上第8集团军严阵以待的装甲部队。蒙哥马利说：“粉碎性作战行动是在一系列坚实的基础上周密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在我军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及早组织坦克屏护队显然是这种作战方法的关键。蒙哥马利甚至在地雷场的通道清扫完毕之前，就命令第10军的各装甲师紧跟着第30军各先头步兵师进入通道。此外，他还命令，假如在总攻击日后一天，即10月24日，通道之敌尚未完全肃清时，各装甲师必须自行扫清道路，进入开阔地带。

拉姆斯登和他的师长们认为，按这个计划打，步兵很可能受阻，而坦克如执行命令在地雷场上打出一条通路则可能带来灾难。于是，他的3个师长向第30军军长利斯报告说，他们都对坦克执行任务的能力缺乏信心。利斯把这报告了蒙哥马利。德·甘冈也表示他怀疑拉姆斯登是否坚定。但蒙哥马利不理睬这些“无端的抱怨”，坚决要求各装甲师严格执行命令。后来事实证明，他这样做是正确的。

为了使敌人摸不清第8集团军发动进攻的时间和地点，达成进攻的突然性，蒙哥马利决定实施代号为“伯特伦”的欺骗计划。这个计划是8—9月间设计和制定的，是沙漠战中迄今为止最精巧的欺骗计划。计划的总意图是，在北方，不暴露第8集团军的真正意图和实际行动，而在南方，则要有意识地显示正在准备进攻的假象，使敌人摸不清第8集团军发动攻势的意图，进攻日期和主攻地带。

整个欺骗活动是在集团军范围内进行的。除了采取谨慎地传播有利于敌人的假情报等措施外，主要是从视觉上欺骗敌人。首先是伪装前沿地区的巨大的弹药和其它作战物资堆集所。例如，离阿拉曼车站不远，就设立了一个很大的堆集所。它可储存补给品600吨，油料2000吨和工程器材420吨。场地在露天，伪装得很好，除了偶尔有一些坑坑洼洼之外，看不出有堆集所的样子。

其次是用假车辆扮演坦克和其它车辆的运动，使敌人对大量部队在作战阵地上集结逐渐习以为常。

10月1日，这些必要的假卡车、大炮、武器牵引车等都要进入阵地。到了发动进攻前一天，当进攻的各师集结时，要在夜间把假卡车换成真的作战用车。在准备进攻的各师开来的后方地区，表面上仍应保持全部的车辆密度，用假车辆替代开走的真车辆。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对付敌人的高空照相侦察。

早在总攻日前一个月，就为参加突击的步兵挖好了细长的战壕，供他们在10月23日昼间躺卧用，而且这些战壕都伪装得丝毫不露破绽。同时，为了表明主要突击可能来自南面，还在那里铺设了一条假输油管。铺设工作于9月下旬开始，施工日进度表明到11月初才能竣工。假输油管长约20英里，在三个地方建造了假油泵房，并在其中两个地方建造了给水站与储油罐。此外，还用通信分队模拟将在甫面发动主攻的无线电通讯。为了把伪装搞得天衣无缝，只向下层军官传达将要发生什么事，而且是在9月28日至10月21

日期间按军衔高低分批传达。在最后一天，传达到了普通士兵，并且停止了一切休假和进城活动。这些措施产生了这样一种结果：“在黄昏来临之前，23日那天过得像阿拉曼前线上的任何一天。”（隆美尔语）

隆美尔在评述阿拉曼战役时指出：“这一仗在射击开始之前，就由军需官们打了并且决定了胜负。”蒙哥马利在前沿地区的后勤安排以及他从基地得到的后勤保障，使他的野战火炮在阿拉曼战役的12天里，一共发射了100万发炮弹，平均每门炮每天发射102发，而他的中型火炮每天的发射量比这还要大。在其它各方面，蒙哥马利也得到了充分保障。

关于英国军队和轴心国军队在这次战役中的相对实力，就师的数量而言，双方大致相等。德意军队集团有8个意大利师和4个德国师（其中4个坦克师，2个摩托化师）以及1个空降旅，但各部队的人员和装备都不满额。英军第8集团军辖3个满员军（第10、13和30军），共10个师和4个独立旅（其中3个装甲坦克师、2个装甲坦克旅）。编入第8集团军的有英国、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南非、希腊和法国的师和旅。但就人与装备的数量而言，英军占有决定性优势。1942年10月23日，双方在埃及的兵力兵器对比情况如下：

兵力兵器	英军	德军	比率
人 员	230000	约 80000	2.8 : 1
坦 克	1440	540	2.6 : 1
火 炮	2311	1219	1.9 : 1
(野战炮和反坦克炮)			
飞 机	1500	350	4.2 : 1

上述数字表明，蒙哥马利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比他的对手强。此外，他还拥有短而不中断的交通线。

因此，蒙哥马利对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充满信心。

10月19日和20日，他分别召集第13军、第30军和第10军所有中校以上的军官训话，告诉他们他的计划的细节，他如何指导战争以及各个局部怎样与总体计划配合。他虽然坚信敌人将无法抵抗这次进攻，第8集团军必将取得胜利，但也警告军官们说：“这个仗将是一次艰苦而持久的战斗，我们的部队绝不可以为了有良好的坦克和强大的炮兵支援，敌人就会投降。敌人是不会投降的，激战就在前头。”他预期“整个战役大约需要12天”。

10月23日，蒙哥马利向第8集团军官兵发表了一份私人文告。他在该文告中说道：“我们马上要打的战役将是决定性的一仗。它将是战争的转折点。全世界将注视着我们，关心这一战役的进展。……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必须下定决心投入战斗，以战斗和杀敌的实际行动把战争进行到底，取得最后胜利。……要求每个官兵怀着只要一息尚存就必须坚持到底的决心投入战斗。在未受重伤尚能作战的情况下，决不允许任何人投降。”他的私人文告使士气高昂的集团军官兵信心倍增。

10月23日上午，蒙哥马利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战地记者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表现出来的必胜信念，使许多战地记者大为震惊，都纳闷他怎么会那么自信。当天下午，他和参谋长德·甘冈一起进驻位于第30军和第13军军部附近的集团军指挥所，准备在那里控制作战。为了能随时访问军长们和

部队，他特地调来一辆“格兰特”式坦克备用。

沙漠空军的科宁厄姆也在作战指挥所里，在那里有一个专供他使用的常设帐篷，这与战争早期陆、空军互相隔离的情况已大不相同。大战前夕，第8集团军从上到下的气氛都是轻松而镇定的。利斯将军后来对此作了较详细的描述：

“作战开始前的最后一天，我坐汽车慢慢巡视战场一周，尽可能与各排、炮兵及坦克兵交谈。车开得很慢，以避免扬起沙尘，引起敌人注意。我们取下了挡风玻璃，以免日光反射。士兵们多在沉静或思考状态中，很多人在写信，不少随军牧师在为他们举行作战前的最后一次布道。到处你都会感到大家士气高昂，期待着投入战斗，并且也了解眼前任务的重要性。每个人都知道他需要做些什么，我想我们都知道赌注很大。集团军的士气很高，到处都显而易见地存在着备战的信心和成功的意志。

“作战前夜，我和集团军司令共进晚餐。餐后，他问我要做什么。我告诉他我想去看看炮兵阵地。他问我能看到些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然后说现在我没有足以影响战局的事可做。他说，我所能做的事，是早点上床睡觉，以便明日早晨以整洁的仪容出现，给部队更多的信心……”

10月23日晚上，蒙哥马利看了一会儿书，很早就睡了。那天傍晚，接替隆美尔的斯图姆将军发给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情况报告是：“敌情无变化。”但是，到晚上9点40分，英军阿拉曼防线上的1000多门大炮，同时向德军炮兵阵地轰击。刹那间，地动山摇，沙尘满天。

20分钟之内，英军炮火已重创敌军炮群。然后，这1000多门大炮调转炮口把暴雨般的炮弹倾泻在敌前沿阵地上。接着，第30军和第13军的士兵，借助天空中的探照灯光和轻高射炮对固定战线发射的曳光弹，冲进战场上令人窒息的烟幕尘雾，向敌人展开进攻。一排排头戴钢盔的步兵，随着尖厉急切的风笛声，队列整肃地向前挺进，月光下，刺刀寒光闪烁，高高端起的步枪杀气逼人。

当第30军的4个步兵师在一个最初宽6英里、后来逐渐扩大到8英里的正面上以横队前进时，他们前面有3个主要目标地带。第一个目标地带叫做“醉浆草”，它沿米泰里亚山脊的西斜面延伸，然后向西北转向腰形山脊的边缘，接着转向正北。“轻步”计划规定于次日凌晨3点10分占领这个目标地带。其次是“皮尔森”目标地带，该地带从腰形山脊的西端向东南延伸，规定于拂晓时由3个装甲旅占领。最后是“小气鬼”目标地带。它在“皮尔森”目标地带的正西，大致是从拉赫曼车站到泰勒阿卡基尔以南的一个区域，这是装甲部队夺取的目标。

在北面，以第51高地师为左翼侧的澳大利亚第9师应夺取直到米泰里亚山脊的“醉浆草”目标地带。山脊本身则由以南非第1师为翼侧的新西兰第2师来占领。供第1装甲师使用的走廊应通过高地师的正面直抵腰形山脊，而供第10装甲师使用的第二条走廊则应通过新西兰师的地域，到米泰里亚山脊北段的反斜面为止。开始时由步兵师负责清除地雷，但后来每个装甲师都必须用扫雷分队为自己开辟4条狭窄的通道。最初，每一条通道仅几码宽，但要求尽快扩展。然而，夜间的战斗并没有实现这个意图，装甲部队不但没有到达“皮尔森”目标地带，甚至连“醉浆草”目标地带的范围也没有超出。

由于蒙哥马利实施的压制敌炮兵火力的射击和随后的拦阻射击使敌步兵的重武器和通讯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到24日凌晨前，敌人的防御射击都未能

对英军构成实际威胁。这样，英军就能够突破德军的前哨防线向纵深推进。第 23 装甲旅的“瓦伦廷”坦克团和 3 个步兵师一起推进，而新西兰第 2 步兵师则在整个第 9 装甲旅的协助下向前推进。这些部队要在必要时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桥头堡。

但夺取桥头堡的任务却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夜深后，敌人的抵抗加强了，越来越多的大炮向正在雷区摸索前进的英军士兵、车辆和装甲车射击。除了在地雷场开辟通道碰到困难外，各处散布的地雷也给英军造成了严重延误与大量伤亡。由于沙漠中没有什么地貌特征，烟尘滚滚能见度差，英军在前进中遇到越来越多的进行顽抗的敌防御阵地。

10 月 24 日，蒙哥马利进攻部队的态势大致如下：右面是澳大利亚第 26 旅；中央是新西兰师的大部分部队，高地师第 154 旅配置在他们旁边；而左面远处的南非第 3 旅则还处于“酢浆草”目标地带。另一个澳大利亚旅、高地师的另外两个旅和一个南非旅仍然没有到达目标地带。第 23 旅和第 9 旅还没有建立桥头堡。到拂晓时，第 1 装甲师的扫雷分队仅在澳大利亚师的作战地域内开辟出一条通道，而第 10 装甲师所开辟的 4 条通道，没有一条超出米泰里亚山脊顶峰。

从南面第 13 军传来的消息也令蒙哥马利不怎么放心。第 7 装甲师本来应该像北面的第 30 军那样于 23 日 22 时开始。进攻，突破“一月”和“二月”两个地雷场，建立一个桥头堡，以便进一步向西扩大战果；而第一自由法国旅则应占领希迈马特山西边山脚下的纳克布赖拉高地。但一切都不顺利。“蝎子”扫雷装置被毁，部队伤亡惨重，白天获得的战果仅仅是拥塞在“一月”地雷场两侧，“二月”地雷场尚未突破。法国人的运气更坏，地面松软，前进速度缓慢，反坦克炮运不上来，又在 7 点 30 分遭德军反突击。结果，两个上校阵亡，损失了全部车辆，却连一寸土地也没有攻占。当时第 13 军的处境是，要么突破“二月”雷场，要么在两个雷场之间陷于崩溃。

蒙哥马利逐渐明白了这一总的形势后，于 9 时以后发布了 24 日的新命令：一、彻底打通北部走廊；二、新西兰师从“酢浆草”目标地带和米泰里亚山脊向南扩张战果。

24 日中午，蒙哥马利在弗赖伯格的司令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下令盖特豪斯的第 10 装甲师必须在第 30 军全部炮兵的支援下，于当天晚上打到新西兰师的战线之外，进入开阔地带。为了强调这一命令，蒙哥马利还给拉姆斯登参谋长打电话重申：第 10 装甲师必须推进到“皮尔森”目标地带，以便为新西兰师的进攻提供保护，为此他准备接受重大伤亡。由此可见，在 24 日那天，蒙哥马利已开始怀疑他的装甲部队指挥官的积极性了。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坦率他说：“第 10 军军长在情况危急时没有魄力，也未当机立断；第 10 军的装甲师又普遍缺乏旺盛的进攻意志，可见这不是他们习惯打的仗。”

在此次作战中，沙漠空军持续地发挥作用，给敌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空军不仅在进攻前对敌人的防御工事实施了猛烈轰炸，而且在整个战役过程中都对第 8 集团军进行了不停顿的战术支援。10 月 24 日，沙漠空军大约出动了 1000 架次，主要用于直接支援集团军。“台风”式战斗轰炸机痛击了曾把自由法国旅击溃的敌基尔集群。敌第 15 坦克师和利托里奥师的坦克集团遭到了轻型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的穿梭轰炸，敌着陆场遭到了攻击，而英军战线则有空中保护伞的保护。

当夜幕降临时，为保障第 10 装甲师向前推进的准备工作已在进行。但第

10 装甲师却说，“还没有作好进攻的准备”。利斯向拉姆斯登查问时，发现拉姆斯登对这次作战的可行性表示怀疑，因为山脊上地雷场的纵深比预计的要大，炮轰猛烈，情况混乱，而且英军的掩护炮火越来越远离这支停止前进的装甲部队。为了避免因炮轰而遭到更多伤亡，装甲部队必须马上分散。因此，第 8 装甲旅旅长卡斯但斯 25 日凌晨向盖特豪斯建议说，他的进攻应当取消。盖特豪斯向拉姆斯登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拉姆斯登同意这个建议并上报集团军参谋长德·甘冈。

这样就发生了蒙哥马利称之为“战役中的真正危机”，而德·甘冈称之为“第一踏脚台”的事件。德·甘冈认为危机就在眼前，因此决定叫利斯和拉姆斯登于凌晨 3 点 30 分到集团军作战指挥所开会。然后，他叫醒了蒙哥马利，把开会的事告诉了他。

利斯和拉姆斯登准时到达，并逐一向蒙哥马利汇报了情况。简单说来，情况是这样的：第 10 装甲师的一个装甲团已经通过一条通道，进入开阔地带，并且在拂晓前可望有更多的装甲团出击。但盖特豪斯担心，进入西斜面开阔地带的坦克在拂晓时容易被敌人逐个瞄准消灭，他要求退回到东斜面比较安全的地带，而拉姆斯登同意他的观点。蒙哥马利认为，任何迟疑或动摇都会使整个战局毁于一旦。因此，他十分清楚地向拉姆斯登和盖特豪斯表明，他的计划必须贯彻执行，绝不允许撤退。他对拉姆斯登的一切怀疑现在都得到了证实，于是他把拉姆斯登留下来，但白地对他说，如果他或盖特豪斯不赞成继续推进，他将找别人来代替他们。

当盖特豪斯把拉姆斯登开会后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卡斯坦斯时，第 8 装甲旅已经有两个团越过山脊了，第 3 个团也正沿着走廊跟上来。但在早 7 时，打出去的 3 个团又退回到山脊下隐蔽起来，而在他们左边的第 9 装甲旅和新西兰师的装甲部队则处于困境。早 8 时，北面的装甲部队全部出动，进入开阔地带。他们所进入的阵地，正是蒙哥马利要求在前一天晨 8 时应该到达的地方。英军以极大的代价粉碎了敌人企图摧毁英军突出部的作战行动。由于装甲部队楔入敌军防线时建立了用以对付敌军反突击的阵地，蒙哥马利现在开始指挥步兵部队实施“粉碎性”打击。

一支支部队投入进攻，战场上人山人海。数以千计的炮弹和炸弹不断爆炸，滚滚的沙尘遮天蔽日，烟雾笼罩着整个西南面战场。新西兰师陷入了异常激烈的苦战。中午蒙哥马利在新西兰师司令部召集军长开会。会上，蒙哥马利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新西兰师进一步向南推进将付出太大的代价，因此他把进攻矛头转向北面，命令澳大利亚师开始进行“粉碎性”作战行动。现在的形势很明显，只有北面战线有获胜的希望。

24 日夜至 25 日黎明前，南面第 13 军对“二月”地雷场实施的第二次进攻已经失败。实际上，在第 50 师的一个旅企图突破穆纳西卜失败后，蒙哥马利在南面战线的所有部队就全都处于守势了。

在 25 日夜至 26 日黎明前，澳大利亚师进行了一次干净利落的进攻，而且迅速获得成功。但第 1 装甲师和高地师却没有取得什么重要进展，第 8 集团军的进攻势头逐渐减弱。此外，隆美尔在 10 月 25 日夜又回到了前线指挥所，这必然会增强轴心国部队的反攻力量和势头。

在 23 日至 26 日拂晓这段时间里，整个第 8 集团军的伤亡和失踪人数估计为 6140 人，被打坏不能使用的坦克约 300 辆，但却远远没有达到蒙哥马利预定在 24 日要达成的目标。蒙哥马利已面临步兵短缺的问题。因此，他在

10月26日不得不用一整天的时间来周密地思考战场的形势。

隆美尔也有许多问题要考虑，并为许多问题所困扰。他有127辆坦克被摧毁，并且修理设备不如英军好，现在只剩下148辆德国坦克和221辆性能较差的意大利坦克。他的燃料短缺，而运送石油和弹药的轮船又在海上被击沉。他的部队进行反突击，却收效甚微。他已经感到绝望，于是向元首司令部报告说：“除非供应情况得到改善，否则这场战役就要输掉。”

蒙哥马利经过一番周密考虑后，他的头脑清醒了，行动计划明确了。

26日中午他发布了第一组命令：命令高地师继续在第一目标地带内扫荡；命令澳大利亚师准备在28日夜向向北发动第三次进攻；在此期间，第30军除了帮助第1装甲师推进到腰形山脊以外，将不实行重大作战任务；第7装甲师则继续休整。但更重要的是，他已决定实施大有希望获胜的机动，并通过重新部署部队来建立一支强大的预备队，以实施猛烈的最后打击。晚上，他召集了一次会议来讨论如何完成这项称之为“增压”行动的任务。作为第一步，他把本战役中尚未参加过激烈战斗的南非师和印度第4师从翼侧调到右边，从而让新西兰师撤到休整地域。然后，他向第7装甲师发出预先号令，让它作好准备向北开进。在此期间，第10装甲师应继续努力作战，以取得新的战果。

第10装甲师于26日夜至27日黎明前向腰形山脊西北面的“山鹑”防御阵地和西南面的“沙锥鸟”防御阵地发动进攻。在第30军和第10军的炮兵的协助下，第7摩托旅的两个营应在夜间夺取这两个阵地，以便拂晓时第2装甲旅能够越过“山鹑”，第24装甲旅能够越过“沙锥鸟”向前推进。这次战斗未能按计划进行，但却变成了整个阿拉曼战役中最英勇的一次战斗，给了隆美尔装甲部队又一次沉重打击。

到28日，蒙哥马利已把他的新计划准备停当。这个新计划很快就能给他和盟国带来决定性胜利。早上8时，他给利斯和拉姆斯登下达了命令：腰形山脊地区必须转入防御；第1装甲师必须撤出战斗，重新编组。中午时分，他告诉弗赖伯格说，澳大利亚师在北面占领更多的地盘后，经过休整的新西兰师必须沿着海岸打下去。这项任务不是由弗赖伯格单独完成，他将得到几个步兵旅的支持，第9装甲旅也将再次归他指挥，该旅可优先补充坦克。同一天早上第7装甲师受领了向北进攻的任务，它将把第4轻装甲旅留下来，但带上第44师的133步兵旅。这样就为“粉碎性”打击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预备队。那天夜里，澳大利亚师采取了第一个步骤，进一步攻占德军突出部的阵地。

有几个师从前线撤走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开罗和伦敦，引起了很大的恐慌。

29日上午丘吉尔问道：“我的蒙蒂在干什么呀，是不是让战斗停下？近三天来，他什么事也没有干成，现在却要从前线撤走他的部队。如果他打算使一场战役半途而废的话，为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他能在7天内突破敌人的防线呢？”

12时30分召开了参谋长委员会会议，会上艾伦·布鲁克不得不针对丘吉尔以及其他内阁成员的责难为蒙哥马利辩护。但在史未资无条件支持布鲁克以前，他的辩护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而且布鲁克自己内心也有怀疑。他曾这样写道：“返回我的办公室后，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被一种绝望的孤独感折磨着。”

蒙哥马利万万没想到，他认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军事行动，竟会以截然不同的面貌呈现在伦敦的焦急不安的上司面前。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

29日上午，亚历山大·凯西（驻开罗的国务部长）和亚历山大的参谋长麦克里少将来到蒙哥马利的指挥所，这使蒙哥马利马上明白白厅在惊惶不安。当凯西问要不要发一封电报给首相，使他在思想上对挫折有所准备时，蒙哥马利回答道：“如果你发那样的电报，那你一定会被撵出政治舞台！”在蒙哥马利向视察者讲明自己的意图后，客人们才愉快地走了。凯西和亚历山大都向伦敦发去了让白厅放心的电报。

接着，特德也找上门来。空军也对蒙哥马利的缓慢行动感到十分着急，担心既定的进攻发动太迟，他们便不能夺取机场来救援马耳他。蒙哥马利让特德看了“增压”作战计划，但特德觉得这个计划还不够大胆，并为此进行争论。蒙哥马利回答说：“这是一次猛烈的较量。”特德只好耸耸肩膀说：“好吧，这是你们的战役。”随后，他们一起去吃午饭。饭快要吃完时，蒙哥马利对特德说：“有一些关于隆美尔部署的新情报，这意味着一个变化。”

这份情报具有头等重要意义：澳大利亚师在上一夜的进攻中，发现与之交战的德国部队是第90轻装甲师的第155战斗群。这不仅表明隆美尔的全部精锐部队已投入了北面作战地段，企图堵住英军沿海岸向西迪阿卜杜勒拉赫曼的进攻，而且表明隆美尔现在手头已没有德军预备队了。在这次战役开始之前，蒙哥马利的情报处长威廉斯就向他指出，德国部队和意大利部队是交错地配置在一起的，如果能把它们分隔开，那么突破完全由意大利部队构成的正面就不成问题了。威廉斯所说的情况现在看来已经出现了，于是他和德·甘冈建议把“增压”作战的出击线更向南移动一些，以使新西兰师能够进攻德意部队的接合部。蒙哥马利立即改变计划，决定澳大利亚师在30日夜间至31日黎明前，以相当大的力量向海边发动第三次攻击，但在第二天夜里，“增压”作战的矛头应对准轴心国部队的接合部，主要打击意大利部队。

澳大利亚师打得很出色，该师虽然遭到顽强抵抗，进展困难，未能一直打到海边，但他们夺取了公路和铁路沿线的许多阵地，俘获了500名德军，并在隆美尔发动的许多次凶猛的反突击中守住了阵地。

“增压”作战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但蒙哥马利又把发起总攻的时间推迟了24小时。推迟总攻时间是弗赖伯格建议的，其理由是：步兵感到疲乏；需要进行侦察；把不同的参战部队及其支援兵器结合在一起尚有困难。根据计划，他将统率他的师和两个步兵旅，即151旅和152旅（每个旅由一个“瓦伦廷”坦克团进行支援）向前推进。当时第9装甲旅已加强到拥有79辆“谢尔曼”式和“格兰特”式坦克、53辆“十字军”式坦克。该旅跟在弗赖伯格师的后面推进，越过步兵的目标，夺取泰勒阿卡基尔和拉赫曼车站以远的地方，从而形成一个屏障来保证第1装甲师在拂晓以前编成战斗队形，以进行预期的决定性坦克会战。蒙哥马利接受了弗赖伯格的意见，于10月31日6时30分将“增压”作战的总攻时间改为11月2日1时5分。

当“增压”作战行动在11月2日开始的时候，步兵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51旅和152旅在规定的时间内夺占了目标，在他们的右翼侧和左翼侧的第28毛利营和第133车载步兵旅也都夺取了能保证执行翼侧保卫任务的阵地。至于第9装甲旅，它的任务异常艰巨。

据了解，德军在拉赫曼铁路线上以及在泰勒阿卡基尔周围筑有坚固的防坦克壕和工事。弗赖伯格在进攻前召开的一次会上说：“我们全都明白，用

坦克去攻击一堵由火炮构成的墙壁，听起来真像是天方夜谭。这应当是步兵干的事，但我们再没有多余的步兵可供调遣，只好由装甲兵来于。”第9装甲旅指挥官约翰·柯里说，他的旅这样打可能遭受50%的损失。弗赖伯格回答说：“损失可能比这要大得多。集团军司令说，他准备接受100%的损失。”该旅进行的11英里接敌运动使人灰心丧气。新补充的坦克效能很差，摆来摆去地开进时所卷起的滚滚沙尘使能见度变得极差。炮击使坦克和士兵遭到损失和伤亡。一个分队迷失了方向，不得不掉过头来再往前赶。结果，该旅三个团的坦克中只有94辆在发起总攻时可以使用，而发起总攻的时间根据柯里的请求还推迟了半个小时。这一推迟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它使敌人赢得了30分钟的时间。

但是，第9装甲旅所实施的自杀性冲击绝不是一场灾难。从统计的数字看，该旅的伤亡是骇人听闻的：

94辆坦克中有74辆被击伤，伤亡官兵230人，而拉赫曼铁路线上的敌火炮防线仍未突破。但另一方面，该旅摧毁了敌防线上的35门大炮，而且该旅幸存的坦克还坚持战斗了一段时间，使第1装甲师的第2和第8装甲旅得以爬出走廊，在开阔地上展开。但这两个旅的进攻也被阻挡住了。但相对来说，非洲军团的损失更大些：德军有14辆坦克被击毁，40辆坦克被击伤；在这一天里，非洲军团共损失坦克70辆，而它的坦克本来就所剩无几。虽然蒙哥马利有理由为他的雄心勃勃的“增压”作战计划未能最后解决问题而感到懊恼，但他所不知的是，在8时15分的时候，非洲军团指挥官冯·托马将军向隆美尔报告说，他的战线只是勉强地维持下来，如果英国人再继续进攻，就将不可避免地被突破。如果说，胜利的实质在于敌军士气的溃败，那么，蒙哥马利通过“增压”作战已经获得了胜利，因为隆美尔在分析了他的处境后，已经决定撤退到防卫力量薄弱的预备阵地——富凯。但是，甚至这样做也不会带来什么希望。隆美尔在呈送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形势报告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这支军队将逐步毁灭。”

而这时蒙哥马利必须做的事则是结束这场“事先精心布置的战役”，并组织追击。希特勒帮了蒙哥马利一个大忙，因为他在11月3日发给隆美尔的电报中命令：“在你目前所处的形势下，除了坚持战斗以外，不能有任何其他想法，不得放弃一寸土地，要把每一门大炮、每一个士兵都投入战斗。”

当时非洲军团只剩下30辆坦克。隆美尔知道，这是一道要部队去送死的荒唐命令。然而他是个军人，军人的天职乃是服从命令。他把希特勒的电报给冯·托马看，冯·托马愤怒地声称，他不可能“不放弃一寸土地”。这时，英国装甲部队已突入德军南部战场。冯·托马驱车前往察看战场情况，结果被英军坦克包围，被迫投降。

11月3日夜，印度师和高地师实施了两次猛烈的冲击，于次日凌晨突破了非洲军团的阵地。紧接着，成百上千辆坦克和装甲车通过突破口，进入开阔地带，向西面和北面猛冲而去。尽管隆美尔并没有下达撤退的命令，但非洲军团已开始溃退。隆美尔要求部队坚决抵抗，但根本没有人再听他的。隆美尔后来悲哀地写道：“我们曾竭尽全力地加以避免的那件事终于出现了：我们的战线崩溃了，全部摩托化的敌军已经拥进了我们的后方。上级长官的命令再也不能算数了。我们必须挽救还可以挽救的东西。”

11月4日9时15分，蒙哥马利发布文告说：

“目前的战役已持续了12天，在此期间全体官兵英勇作成，使敌人遭到

了很大损失。现在敌人已达到了崩溃点，正企图撤退。皇家空军正在袭击沿主要的海岸公路向西移动的敌军部队，使之遭到重大伤亡。敌人已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崩溃在即。我号召全体官兵继续对敌施加压力，不得有片刻松懈。我们有可能擒获敌人整个装甲集团军，我们一定要做到。我为已经取得的一切成就向全体官兵祝贺。彻底胜利已经在望。我已代表你们向皇家空军发去一份贺电，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巨大支持。”

11月4日上午，隆美尔接到他的参谋长韦斯特法尔打来的电话说，他右面的意大利师已经瓦解。

13时，当时已接管了非洲军团的拜尔莱因又报告说，冯·托马将军在前线失踪了，可能已被打死（实际上是当了俘虏），而他本人则徒步逃脱了敌装甲部队的攻击。隆美尔认识到，他的战线已无可挽回地崩溃了，于是只好不顾希特勒的命令，于15点30分发出了全面退却的命令。次日凌晨，希特勒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发来电报，认可了隆美尔的退却命令。

11月4日晚，蒙哥马利与被俘非洲军团司令冯·托马共进晚餐，他们一起谈论9月间的战斗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事。晚餐方毕，蒙哥马利立刻令人收拾餐桌，然后拿出一幅埃及沙漠地图，摊在桌上。他对冯·托马说：“我的部队今晚将接近富凯，你有何想法？说说，你将如何处置，冯·托马？”但是，冯·托马不露声色，只是说：“非常之严重，确实非常之严重。”实际上，英军推进的距离连那一半都还不到。

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真正的追击于11月5日开始……我的最终目标是黎波里；它曾经是第8集团军所经常考虑的目标。”蒙哥马利命令拉姆斯登指挥的第10军担任先头部队；利斯指挥的第30军留在出击地带以西进行整编，霍罗克斯指挥的第13军负责打扫战场和收集敌我遗留下来的所有军事物资。

11月5日凌晨，隆美尔本人到达富凯并在那里建立了司令部，在这一天昼间，非洲军团的大部分部队、第90轻装甲师和若干意大利摩托化部队也到达了。隆美尔原打算在富凯停留一段时间，以便让正在行军的步兵（特别是南面的意大利步兵）摆脱困境，但他很快就认识到停留是没有希望的。

11月5日夜，当隆美尔认清必须抛弃步兵让他们听天由命后，就命令机动部队向马特鲁港撤退。撤退途中，德军的交通严重阻塞，为英国空军提供了良好的攻击目标。尽管英空军对德军造成的实际破坏可能不如预期的那么大，但德军档案却一致认为，英国沙漠空军似乎在昼夜不停地进行空中监视，给轴心国退却部队的士气造成了很大损害。在“十字军”行动中，大雨曾拯救隆美尔，而现在大雨又来营救非洲军团了。新西兰师正向富凯冲去，第1和第7装甲师则向马特鲁分进合击。这时，天突然劈头盖脸地下起暴雨来，几分钟之内就使坚硬的路面变成了无法通行的沼泽。11月7日，整个追击部队都被迫停止前进。虽然沙漠空军继续给德军以沉重的打击，但德军还是充分利用这24小时的喘息时间，使绝大部分的残余部队都能沿海岸公路撤走。

11月8日，蒙哥马利进入马特鲁港时，发现隆美尔已于头天夜间离去。在马特鲁港，蒙哥马利险些遇难。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他派遣一个侦察组为他在马特鲁港一带选择司令部的地址。侦察组中有他的继子迪克·卡弗。当接近马特鲁港时，侦察组取道前往马特鲁港以东的“走私湾”海岸。不料，那里还有德军，于是这个侦察组被德军后卫部队俘虏了。要不是蒙哥马利的

警卫队因为一场小遭遇战而停止前进的话，他很可能走上那条通向“走私湾”的路。如果那样的话，他就可能被敌人俘获。

11月8日上午，盖特豪斯向蒙哥马利报告说，第10装甲师“是埃及最强大的师，拥有完整的日梯队”，已经作好战斗准备，要求允许该师向萨卢姆和图卜鲁格推进。但蒙哥马利不愿冒“猛冲”之险，不愿意冒被隆美尔踢回之险。他觉得隆美尔可能作困兽斗，可能创造另一个奇迹。把英军从“杰别尔障碍”（有时也叫做“班加西障碍”）向相反的路线猛推回去。蒙哥马利这样写道：“正像一位军官对我说的那样，‘我们过去常到班加西度圣诞节，然后回埃及过新年。’我决心让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其实，蒙哥马利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被隆美尔踢回，因为到11月10日前后，德军主要部队仅剩剩下大约4000人，仅有11辆坦克和少量野战炮和反坦克炮。凭这种实力，德军是无法将强大的英军踢回去的。

当第8集团军还在肃清马特鲁港的残敌时，11月8日传来了蒙哥马利一直在盼望的消息——“火炬”战役开始了。这个消息对隆美尔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致命打击，它“宣告了非洲德军的灭亡”。与拜尔莱因商议后，隆美尔得出的看法是：他必须迅速往西撤退……轴心国甚至现在就必须撤离北非。他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场激战，并且打算撤离昔兰尼加，尽快地沿苏尔特湾海岸往后撤退。但与此相反，墨索里尼却企图在东面尽可能远的地方保留一个立足点，而且保留的时间越长越好。于是，希特勒下令坚守阿盖拉隘道。

11月12日，蒙哥马利把敌军赶出了埃及。他向第8集团军发布文告说：“今天，11月12日，在埃及土地上，除了俘虏外，再也没有德国和意大利士兵了。……我们击溃了德国和意大利军队，追击了约300英里，到达并越过了边界，把残敌逐出了埃及……但北非还有残敌。至于再往西，在利比亚，我们还大有可为，而我们的先头部队现在已准备在利比亚动手。我们此次到班加西及其更远的地方，将不再回来了。”

从文告的落款中，我们看见蒙哥马利已不再是中将而是上将了。阿拉曼战役之后，蒙哥马利因为“战功显赫”在11月11日被提升为上将，同时被授予巴斯骑士勋章。

蒙哥马利得到了亚历山大的坚决支持并且不断赢得丘吉尔的赞许，因此对更大的胜利充满信心。11月15日，蒙哥马利夺取了迈尔图拜附近的几个机场，接着又夺取了德尔纳附近的机场，进一步赢得了首相的好感。虽然暴雨使迈尔图拜在11月19日以前不能使用，但重要的护航船队于11月20日到达马耳他岛，使该岛复苏了。同一天，第8集团军进入了班加西，两星期后，第二个护航船队到达马耳他岛。从那以后，该岛再也没有出现过严重危险。

11月23日夜，隆美尔撤退到布雷加港和阿盖拉地区，开始建立阵地。蒙哥马利用少量部队予以阻止，自己则停下来检查所面临的形势。这是自10月23日发起阿拉曼战役以来，首次出现的大的战斗间歇。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蒙哥马利完成了他应该完成的任务：在预定的期限内突破了阿拉曼防线，击溃了隆美尔部队，连续追击敌人上千英里，按要求的时间到达迈尔图拜，解放了马耳他岛。

在阿拉曼战役中，尽管蒙哥马利缺乏明确的追击计划，没有抓住最佳追击时机，并且有时用兵过于谨慎，但他的指挥却是非常成功的。在他的正确

指挥下，阿拉曼战役在人员伤亡方面付出的代价只相当于黑格的部队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所付出的代价的 1/4。然而，与黑格不同的是，蒙哥马利在自己所规定的时限内决定性地赢得了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

第 8 集团军在阿拉曼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扭转了盟国反法西斯战争在北非战场的危急局势，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英国首相丘吉尔说：“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再没有打过一次败仗。”

1942 年 11 月，欢庆阿拉曼大捷的钟声在英伦三岛上空骤然响起，经久不息。正是：浴血征战获大胜，举国上下齐欢庆。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十三章 横扫北非

千军万马向西征，道道防线被荡平；
闪电攻击奏奇效，敌军覆没战事停。

隆美尔自己明白，他已输掉了非洲的这场战争。但蒙哥马利却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

尽管隆美尔奇迹般地把溃散的部队结合起来了，但他对当时的形势感到绝望。要是他能够自由行动，他会立即从阿盖拉向西撤退并在加贝斯隘口建立一个坚强的防御阵地。该地离突尼斯边境和另一支德军只有 120 英里，并且车辆只能在大海与杰里德盐沼之间的宽仅 12 英里的地带行进。但隆美尔是不自由的，期望希特勒同意他退却是痴心妄想。此外，他还受到意大利人的两种限制：意军最高统帅部驻非洲代表团和巴斯蒂柯元帅所领导的“超利比亚”司令部。与作战初期的情况一样，他现在成了巴斯蒂柯的部属。因此，他被迫采取一种双重行动方针：把布雷加港和阿盖拉的阻击线构筑得尽可能坚固，同时以直言不讳的方式与他的上司谈判撤退的权利。

在谈判方面，他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墨索里尼已下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这条防线。

11 月 22 日，隆美尔与意大利将军纳伐里尼一起，同巴斯蒂柯进行了一场辩论。隆美尔和纳伐里尼说：“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或是早 4 天放弃阵地而保住部队，或是晚 4 天既丢失阵地又丢失部队。”但巴斯蒂柯丝毫不让步。

11 月 24 日，南线德军总司令凯塞林元帅和意军参谋总长卡伐列洛元帅到非洲来与他们举行会议，会上隆美尔再次遭到驳斥。会后不久，墨索里尼就要求隆美尔向英军发动进攻。

在绝望中，隆美尔采取了最后的步骤：飞回德国向希特勒呼吁。

11 月 28 日，希特勒以极不友善的态度接见了。隆美尔得到的结果是，希特勒派遣戈林作为全权大使和他一起到罗马进行另一轮毫无成果的谈判。隆美尔这样写道：“在飞回非洲的时候，我明白现在只能依靠我们手头的资源了。”然而，在物资方面，特别是在油料方面，德国装甲集团军已经处于饥饿状态。

相比之下，蒙哥马利却掌握着主动权并拥有优势的兵力。然而，他却并不完全了解隆美尔当时的处境和心态。当第 8 集团军逼近阿盖拉阵地时，他发现官兵中有一种焦虑情绪，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到这里来过两次，并且两次都因隆美尔作了准备，把部队前出至开阔地带而将英军赶了回去。因此，蒙哥马利“决定必须很快攻下阿盖拉，以免拖久了士气可能低落”。

当时，第 30 军已接替第 10 军担任先头部队。蒙哥马利与利斯一起侦察了阿盖拉的阵地后，决定于 12 月 5 日发动进攻。蒙哥马利计划由弗赖伯格率领新西兰师迂回到敌人的南侧，奔赴马腊达北面的阵地，再从那里袭击隆美尔部队的后方，同时由第 51 高地师和第 7 装甲师从阿盖拉正面发起进攻。他把制订具体攻击计划的任务交给利斯，自己则飞往开罗去度周末，去看望亚历山大，去购置一些新衣服，去参加大教堂星期日的早礼拜。

阿盖拉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很难攻的阵地，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南翼侧是开放的。虽然南翼侧通行困难，但毕竟是可以通行的。尽管隆美尔

十分清楚他的右翼侧所面临的危险，但可悲的是，他缺乏汽油，以至于不能用坦克去攻击蒙哥马利可能向南面纵深开进的任何部队。由于这个原因，不管他的上司有什么样的指示，他在心理上已作好一有借口就放弃阵地的准备。现在所需要的就是英国人的进攻了。

当蒙哥马利返回班加西以东的司令部时，发现阿盖拉之战的准备工作需要大大提前，因为第8集团军的巡逻报告表明，隆美尔从12月6日夜间起，就开始把他的非摩托化的意大利部队向后撤了。为了防止隆美尔不打一仗就溜掉，蒙哥马利决定提前发动进攻。下令第51高地师从11日晚上起，就对主阵地猛烈袭击，而全面攻击则定于14日开始。

第51高地师所进行的最初几次袭击以及炮兵的火力支援，很快就使隆美尔深信“末日”到来了。隆美尔后来写道：“很快一切都清楚了，敌人的进攻已经开始。”因此，他急忙把残余部队从阵地上撤出，向暂时还安全的埃尔穆格达的防坦克壕开去。

当时，一切都取决于新西兰师的进展情况。新西兰师当时驻在离英军前线很远的地方，它受领的任务是从埃尔哈塞特进行一次200英里远的包围运动。它应于12月15日夜间到达迈拉代一线，在第4轻装甲旅的配合下，与正面攻击部队形成夹击敌军之势。尽管弗赖伯格率领全师昼夜兼程，但却由于油料缺乏和第4轻装甲旅迟迟不到而无法采取行动。到12月15日傍晚，弗赖伯格才把他的两个步兵旅调到了海岸公路区域。但遗憾的是，它们依然相隔6英里。结果，包括坦克在内的小股敌军很快从这两个旅旁边绕过，急急向西撤去，很难截住它们。

12月16日，战斗较为激烈，有的地方整天混战，形成拉锯局面。隆美尔的坦克部队最后突围到了西面，但又遭到英空军的袭击和新西兰师的重创，伤亡惨重。英军在阿盖拉之战中俘获敌军450名，大炮25门，坦克18辆。

阿盖拉之战结束后，蒙哥马利命令新西兰师在努菲利阿进行休整，由轻装甲部队跟踪隆美尔的部队，自己则把前方作战指挥所移往靠近迈尔杜马机场的大理石拱门，紧靠第30军司令部，以便于侦察布埃拉特阵地和制订向的黎波里推进的计划。

现在，第8集团军已经深入到的黎波里塔尼亚，连续追击敌人达1200多英里。隆美尔的部队已被决定性地击败了。为了使部队振作精神为最后“跃进”到的黎波里作好准备，蒙哥马利决定让第8集团军就地休息，圣诞节后再发动攻势。他要求部队在沙漠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以最愉快的方式度过圣诞节。当时气候寒冷，火鸡、葡萄干布丁、啤酒等全都要到埃及订购，但在参谋人员的努力下，这些东西全部按时运到。

蒙哥马利向第8集团军全体官兵发布了圣诞文告，祝大家圣诞快乐。在文告中，他引用了约克郡一位名叫赫尔的姑娘寄给他的圣诞贺信，使文告充满了亲人般的温情，令全体官兵倍感高兴。圣诞节过后不久，他收到第8集团军一名士兵的信。这封来自普通一兵的信，使他非常高兴。他一直珍藏着这封信，并将它一字不拉地引用在他的《回忆录》中，因为它最真实地说明他在第8集团军官兵心目中所树立的形象和他的演讲在士兵的精神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圣诞节之后，蒙哥马利的先头突击部队于12月29日逼近了敌人在布埃拉特设置的阻击线。开罗的广播电台说，隆美尔的集团军已被装进蒙哥马利

的瓶子，瓶塞即将盖上。但隆美尔却对参谋人员说，只要坦克能加满汽油，瓶子里的军队很快就会跑掉。实际上，无论是隆美尔还是巴斯蒂科元帅，都不认为布埃拉特阵地能够长期坚守，隆美尔甚至已经在考虑往突尼斯撤退，以及考虑英美部队可能通过夺取加贝斯隘口来切断他的退路的危险了。然而，墨索里尼对德意军申请撤退的答复却是：“要尽力抵抗。我再重复一遍，要用布埃拉特阵地上的全体德意军队尽力抵抗。”这正中蒙哥马利的下怀。

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不要敌人撤退，我要敌人坚持在原地打。假如敌人这样做，他多半会被我消灭……当我袭击布埃拉特阵地时，我的计划必须是：我军能长驱直入的黎波里，不能让敌人延迟或阻止我军行动。”

然而，隆美尔是一个强有力的雄辩者，他终于迫使意军最高统帅部在 12 月 31 日授予巴斯蒂柯这样的权力：如果他受到严重威胁，可自行决定是否撤退，实际上，隆美尔已开始撤退他所指挥的意大利军队了。当英军后来向布埃拉特发动进攻时，德意装甲集团军已经多少有点分散了，并且由一个仍然企图保全加贝斯隘口的人负责指挥。

蒙哥马利认为，突破隆美尔的布埃拉特防线需要速度，而进军的黎波里，关键则在于后方勤务。从班加西到的黎波里为 675 英里，从布埃拉特到的黎波里为 230 英里。因此，进攻前必须集结足够的供应物资，以保障部队进军的黎波里的需要。蒙哥马利下令尽快备足供 10 天战斗用的汽油、弹药和供应物资。参谋人员报告说，必要的军需品的集结可望在 1 月 14 日前准备就绪。于是，蒙哥马利决定于 1 月 15 日凌晨发动攻势。

蒙哥马利对布埃拉特防线的突破计划是：由第 30 军发动进攻，进攻矛头有二：第 50 和第 51 师沿海岸进攻；第 7 装甲师和新西兰师迂回隆美尔防御阵地开放的右翼侧，然后径直向的黎波里推进。蒙哥马利把留在后方的第 1 装甲师的坦克全部调了出来，共集结坦克 450 辆，要求通过 10 天的连续猛攻，拿下黎波里，结束整个战役。

不巧的是，1943 年 1 月 4 日，地中海狂风大作，给班加西港带来了严重破坏。船只脱缆，在港内冲撞，恶浪冲坏防波堤，猛击内港。拖船、驳船与码头遭受极大损失。港口的吞吐量立即从每天 3000 吨下降至 1000 吨。风暴还在肆虐，所有船只必须离开港口。到 1 月 12 日，它的吞吐量减少到每天 400 吨。

开罗总司令部为此感到焦虑，问蒙哥马利是否需要改变行动日期。蒙哥马利决定进攻时间不变，而把第 10 军的所有运输工具调来，让霍罗克斯去执行运输任务，从托布鲁克和班加西运送 1 月 14 日所需的作战物资。

攻向的黎波里的行动按计划于 1 月 15 日开始，蒙哥马利最后选择了沿海岸推进的方案，并亲自指挥，结果一切顺利。先头部队于 1943 年 1 月 23 日凌晨 4 时进入的黎波里。当天中午，蒙哥马利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意大利副总督处正式受降。

第 8 集团军攻占的黎波里之后，为防止部队沉湎于大都市的物质生活而腐化变质，蒙哥马利禁止使用宅邸、大楼等作为指挥部和营房，所有人员必须住在沙漠或田野里，以使部队保持坚韧不拔的战斗力。

要完成下一个重要任务——突破马雷斯防线，第 8 集团军必须依赖的黎波里港供应作战物资。因此，一占领的黎波里后，蒙哥马利便致力于使港口畅通，以便船只进港，每天能卸下大批物资。在第 8 集团军的协助下，海军

创造了奇迹。虽然港口设施被彻底破坏，港湾口完全堵塞，但由于海军的努力，第一艘船于2月3日到达，第一个护航船队于2月9日到达。到2月10日，港口日卸货量就超过了2000吨。

2月3日和4日，英国首相和帝国参谋总长到第8集团军视察。蒙哥马利为他们举行了阅兵式。参加检阅的有苏格兰师、新西兰师、皇家装甲部队和皇家陆军后勤部队。部队精神饱满，威武雄壮，给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相的视察使部队士气更加高昂。

隆美尔把他的集团军从黎波里周围的复杂地形中解脱出来以后，到2月初，德军大部分已在马雷斯防线站稳了脚跟。隆美尔与突尼斯德军指挥官冯·阿尼姆之间的责任界限正好定在加贝斯隘口的北面。第21装甲师已经进入冯·阿尼姆的辖区之内，这样，两条战线互相交错起来，而它们彼此靠得越近，就越能从“内线”的运用中得到好处。但不幸的是，由于隆美尔撤出的黎波里过于突然，使意大利人十分不满，因此，意大利人、凯塞林和希特勒的参谋机构全都反对他。这样，德军的力量反而被微妙地削弱了。

“火炬”作战行动从开始之日起，就一直有利于蒙哥马利。盟国对隆美尔的后方的这一威胁是长期存在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增大。但此时德国人却把物资供应重点从第8集团军当面的德军转向第1集团军当面的德军，因而使德国非洲军团在最危难的时刻得不到物资供应。这样，这两个以前独立的战场便开始相互产生直接的影响。

2月17日，亚历山大被任命为在法属非洲作战的盟国部队副总司令。3天后，他一接管新指挥职务，就使第8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2月20日，隆美尔发起卡塞林战役，在卡塞林隘口大败美军，使总的战况显得胜负未定。蒙哥马利说，在那一天，“亚历山大给我发来一份紧急求援的电报，强烈要求我采取行动以减轻敌军对美军的压力”。当时，蒙哥马利的部队已经进入了突尼斯，第7装甲师和第51师的1个旅已经到达了本加尔丹。因此，蒙哥马利在其《回忆录》中说，“我加快了行动的速度，到2月26日，我们施加的压力明显地使隆美尔停止了对美军的进攻。”

隆美尔从第1集团军的正面撤走后，蒙哥马利估计他很可能转过身来向第8集团军发起攻击。在2月28日至3月3日这段时间，蒙哥马利感到十分焦虑，认为他在前线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对付隆美尔可能发动的反攻。马雷斯战役很快就要打响，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进行十分复杂的准备。但那时他主要考虑的却是离他很近的梅德宁。梅德宁是他的集团军的前哨，他估计敌人任何时候都可能向那里发动进攻，果然，蒙哥马利很快就得到了敌人向第8集团军正面调动军队的情报。但是，蒙哥马利并没有慌乱。到3月4日，他的忧虑消除了，又恢复了自信。他的参谋长这样写道：“我们兴奋地工作着，以便作好一切准备……隆美尔丧失了他的机会，我们现在又可以自由呼吸了。”蒙哥马利本人则决定用阿拉姆哈勒法山战役的战法对付隆美尔。他把新西兰师从黎波里调来，负责保卫梅德宁地区。第7装甲师则部署在该师的右翼。第201近卫步兵旅暂时置于第7装甲师的指挥之下，占领了一座叫做塔杰拉基尔的小山，来填补第7装甲师与新西兰师之间的缺口。

3月5日晚上，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隆美尔将于明晨发起进攻。果然不出所料，英军在3月6日清晨的薄雾中看到两群德军坦克从马雷斯防线内陆一端的群山中开出来了，沿着梅德宁与图坚之间的公路摸索前进。大约在同一

时刻,第 51 高地师面临着德军第 90 轻装甲师和意军斯皮齐亚师步兵的攻击。接着,又发现一支敌装甲部队(第 10 装甲师)从哈卢夫隘口向梅德宁冲来。

英军的野战炮和中型炮向推进的轴心国部队进行了无情的轰击,而反坦克炮则尽可能地直到最后一刻才开火。英军发现,敌人的坦克和步兵之间的协同很差,非洲军团已丧失了它往常所具有的冲劲。实际上,英军的阵地没有遭到任何突破,到中午时分,敌人就向后撤退重新编组了。但重新编组并没有给敌人带来什么好处。敌三个装甲师指挥官在一起协商后,决定派步兵在坦克前面推进。这是一种绝望的行为。敌人的步兵被英军的炮弹打得焦头烂额,人心慌乱,敌人的坦克进攻也是半心半意的。于是,隆美尔在下午 8 时 30 分下令结束他在非洲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在这一天的断续战斗中,英军损失轻微,而隆美尔则伤亡了 653 人,更为严重的是,损失坦克 50 多辆。

与打阿拉姆哈勒法战役一样,蒙哥马利只在自己选定的地点迎敌,而拒绝在既定的地点以外应战。隆美尔撤退时,他也不迫击,以便战斗一结束就继续筹划马雷斯战役。正如阿拉姆哈勒法战役有助于阿拉曼战役一样,梅德宁战斗也必将有利于马雷斯战役。

马雷斯防线是法国人在兴盛时期修建的,用来防止意大利人入侵突尼斯。它从大海向内陆延伸 22 英里到达迈特马泰山麓,而荒凉高耸的迈特马泰山则把防线向西延伸直到沙海。这片显然无法通过的沙海提供了强有力的翼侧保护。德国人接管防线后,先后进行了改造和加固,结果使这条小型的马其诺防线即使不能说坚不可摧,至少也可以说很难突破。因此,马雷斯防线对蒙哥马利的指挥艺术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

蒙哥马利认为,要对如此坚固的阵地作正面进攻是不大可能成功的,因为在迈特马泰山和大海之间的回旋余地不大。因此,他计划在迈特马泰山以西的地区作包围运动,同时进行有限度的正面攻击,以资策应。但问题是,能否找到一条通过沙海的道路呢?早在 1942 年 12 月当他的司令部还在“大理石拱门”的时候,他就派遣了一个“沙漠远程侦察组”前去沙海侦察了。大约在 1943 年 1 月下旬,沙漠远程侦察组报告说,他们在沙海找到了一个可以实施翼侧包围运动的隘口,即怀尔德隘口。通过怀尔德隘口,可以到达沙海那一边的泰拜盖隘口。通过泰拜盖隘口,可以到达哈迈平原、加贝斯和大海。

于是,蒙哥马利的计划也就具体化了:一、第 30 军以 3 个师的兵力进攻东翼,其目的是把敌军预备兵力吸引到防线的东翼上去,二、抽调其他部队,组建新西兰军,从西翼迂回,打入迈特马泰山后方,攻取泰拜盖隘口,尔后直扑哈迈平原。三、保留第 10 军作为预备力量,以便一有机会就可投入无论哪一翼的战斗。四、整个作战行动需要空中攻击部队给以集中而持续的支持。

有关马雷斯防线及其周围地区的大量情报,使蒙哥马利认为,沿海岸大规模进攻而在内陆进行佯攻的作战方案是可行的,这几乎是在非洲海岸作战的必然方式。如果两方面的进攻都能够发展到把敌人击溃的地步,而不是其中一个仅仅是佯攻的话,那就具有更大的优势。蒙哥马利的马雷斯战役计划使他在右翼的猛攻没有奏效时能够迅速转移兵力,在左翼进行猛烈的、决定性的打击。

3 月 14 日,亚历山大下达了一项命令,要求美国第 2 军向米克纳西和加贝斯发起攻击以威胁德军的交通线,而第 8 集团军则夺取马雷斯防线。蒙哥马利早已为夺取马雷斯防线作好了准备,现在只等把计划付诸实施了。

新组建的新西兰军共计 25000 余人，150 余辆坦克，由弗赖伯格指挥。3 月 11 日深夜至 12 日黎明前，新西兰军开始在位于梅德宁与怀尔德隘口中途的富姆泰塔温集结。3 月 19 日，它已到达泰拜盖隘口的西面。到 20 日，已作好突破隘口、向哈迈和斯法克斯进击的准备。

第 30 军对右翼发动的进攻定于 3 月 20 日 22 点 30 分开始，蒙哥马利在 3 月 20 日向第 8 集团军发布文告，号召全军将士：“向突尼斯前进！把敌人赶到大海中去！”

马雷斯防线的主阵地由第 30 军来突破。该军的第 51 高地师扼守战线，第 50 师和第 23 装甲旅在 3 月 20 日 23 时 15 分越过战线向敌人发起冲击。第 50 师的 151 旅企图在济格扎奥干河上获得一个桥头堡，便在云梯的帮助下，不顾敌人猛烈的防御火力，渡过了干河，夺取了敌人的两个大据点。但当轮到支援坦克强渡时，事情却搞得…团糟，参加那天夜里攻击的是第 50 皇家坦克团，坦克携带着大柴捆前进，以便把柴捆扔在干河里，连成一条简易道路。然而，坦克废气的热度把许多柴捆点燃了，同时领头的那辆坦克又淹没在三英尺深的水里，堵塞了道路。工兵们修了一条旁道，使三辆坦克到达了对岸。但后来旁道也堵塞了，直至该坦克团接到撤退命令时，渡过河的坦克只有 4 辆。

第二天夜里，第 151 旅得到第 69 旅第 5 东约克团的加强，又进行了一次强渡，有 42 辆坦克渡过于河到达对岸，与前一天渡过去的 4 辆坦克会合。但这仅仅是一次表面上的胜利，因为这些坦克在强渡时把道路都搞坏了，以致任何运输工具 and 任何反坦克炮都不能随同过河。这一点是致命的。次日下午，敌第 15 装甲师就进行了凶猛的反冲击，消灭了 30 辆“瓦伦廷”坦克，并把第 151 旅驱赶到干河的边缘。到 3 月 22 日 2 时，蒙哥马利看出这次攻击已经失败，就命令幸存的部队撤下来，及时地终止了部队的伤亡。

右翼的攻击遭到了挫折，蒙哥马利便马上把进攻重点转到左翼，用增援力量把弗赖伯格的军变成进行突破的主要工具。第 30 军被留下来以便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在马雷斯阵地上，而印第 4 师则受领了向迈特马泰山进击的任务。这一任务看来是适当的，因为在 3 月 19 日夜至 20 日黎明前，敌第 164 师就开始撤离其山中阵地，向泰拜盖隘口开拔了。英军观察到了敌军的这一调动。

3 月 20 日早晨，当蒙哥马利得知敌人已发觉新西兰军正隐蔽南侧时，马上命令它不必再隐蔽了，而应拼命北进，以完成任务。但是这些新西兰人在进行了出色的接敌行军后，动作却缓慢起来了。虽然蒙哥马利给弗赖伯格发来了电报，要求他尽快到达哈迈，然后再向加贝斯地区和马雷斯防线后方推进，但弗赖伯格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紧迫感。在 3 月 21 日午夜至 22 日黎明前，第 8 装甲旅和新西兰第 6 旅的旅长都想尝试一下突破泰拜盖隘口，但没有得到弗赖伯格的支持。弗赖伯格没有迅速采取行动，倒不是因为他缺乏斗志，而是因为他认为他的部队会处于可能招来敌人猛烈反击的暴露位置。还有一个使他经常感到恐惧的问题，就是他既要使用又要保存新西兰部队，因为这支民族部队代表着一个人力有限的小国。

3 月 23 日，蒙哥马利给弗赖伯格发来一封电报说，第 1 装甲师连同霍罗克斯的第 10 军司令部将开来增援他。由于弗赖伯格错过了一次突破的机会，他的军的力量显然已不足以对付德军必然要紧急调到泰拜盖隘口来的增援力量。蒙哥马利很了解弗赖伯格，知道怎样掌握他。在阿拉曼战役中，为了保

证弗赖伯格进行“增压”作战行动，蒙哥马利曾额外地多给了弗赖伯格几个步兵旅。这次蒙哥马利也觉得有必要给弗赖伯格以“鼓舞”，而热情的霍罗克斯正好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然而霍罗克斯却机敏地指出，弗赖伯格对于把一个军司令部置于他之上这种做法不会感到舒服，因此他向德·甘冈建议，一切电报和命令都应当同时发送给两位军长。德·甘冈同意了 this 意见，后来写给他们的信件都是以“亲爱的将军们”开头。

霍罗克斯率领第 10 军军部和第 1 装甲师于 23 日 20 时出发，24 日下午赶上了弗赖伯格。虽然受到了冷淡的接待，但他和弗赖伯格都是久经战火的军人而不是小孩，因此他们立即讨论了蒙哥马利关于当天在空军掩护下进行攻击的建议。15 时 30 分，他们对蒙哥马利的建议作出答复时指出，由于当地的地形特点，蒙哥马利的计划不宜执行，并提出了他们的三种方案。然后又进一步交换意见，制订出最后的作战计划：先由弗赖伯格军突入，接着布里格斯的第 1 装甲师立即跟进和实施突破。由于布里格斯否定霍罗克斯和弗赖伯格在昼间进行攻击的要求，结果决定弗赖伯格于 16 时开始行动，把部队开到离进攻出发线 4500 码的地方；然后，布里格斯把第 1 装甲师的坦克开到离该点约 3000 码远的地方休息。第 1 装甲师将在这里等待月亮出现，一旦有足够的月光可以利用，该师即向哈迈长驱直入。

左翼的闪电攻击于 3 月 26 日下午 4 时开始。白天，太阳在英军背后，直射敌人的眼睛。当时风沙飞舞，英军处于上风头，风卷沙土直扑敌阵。敌人原来只作好了对付夜间袭击的准备，没料到下午就遭到了猛烈的袭击。在这次攻击中，沙漠空军用“真正的低空闪电攻击”进行支援。沙漠空军出动了 22 个中队的“喷火”式战斗机、“猫”式轰炸机和“飓风”式反坦克飞机，把敌人阵地上的每一辆车辆，所有的可见和移动目标，都炸成了碎片。由于当时的进攻正面很窄，这种攻击产生了毁灭性效果。

这种“低空闪电攻击”是沙漠空军司令哈里·布罗德赫斯特少将设计的，可以说是当时陆空军紧密协同的典范。但战术空军司令部对此举却有过于严重的忧虑。战术空军司令科宁厄姆认为风险太大，还派来一名军官试图劝阻。但布罗德赫斯特决定承担风险，拒绝听从劝告。结果，他以最少的损失（损失了 8 名飞行员）取得了最大的胜利，得到了空军部的祝贺。

蒙哥马利把这次进攻也取名为“增压作战”，但它比阿莱曼战役中的“增压作战”更为成功。弗赖伯格一开始行动就夺得了必要的地盘。接着，第 1 装甲师的坦克按时开到了它们的停驻线。23 时后不久，月亮就升起来了。虽然月亮被云层遮暗了，但在午夜时分，布里格斯还是开动了他的装甲部队。于是，在逐渐明亮起来的月光下，出现了英军和德军肩并肩地向哈迈快速奔驰的奇特景象，有时这两支军队甚至混杂起来了。但是，英军还是被德军超过去了。敌第 164 师指挥官冯·利本斯泰因，费了很大劲才把一些野战炮和反坦克炮集合起来，组成一条薄弱的防线，使逃跑的军队在哈迈村以南几英里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但在那里，战斗也逐渐变弱而最终停止了。总之，敌人已在主动地退却。到 3 月 29 日，新西兰军和第 51 高地师就向加贝斯开进了，蒙哥马利已经获得胜利。

德军第 21 装甲师掩护梅塞的集团军撤退到了加贝斯隘口以北大约 20 英里的阿卡里特干河防线。然而，在 3 月 30 日和 31 日，第 21 装甲师又离开那里去同德军第 10 装甲师和意军森泰罗师会合，以阻止美第 2 军的推进。

隆美尔一直希望把他的军队撤到他所谓的“加贝斯隘口”，实际上，是

撤到沿阿卡里特干河的防线。要是过去他能够从阿盖拉撤退到这里的话，他可能已经获得足够的时间来加固阿卡里特干河的防御工事，把它发展成一条比马雷斯防线更坚固的防线，从而使他能够在这里进行相当长时间的抵抗。这里是一个真正的隘道。防线的一侧依托大海，另一侧位于离海 12 英里的内陆，是根本不能通行的杰里德盐沼泽和盐湖。在离海 5 英里的地方，有一个高约 500 英尺、长一英里的鞍状山脊。该山脊叫做“鲁马纳”，十分险峻，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可惜的是，隆美尔已于 1943 年 3 月 9 日最后离开非洲，而且德军也没有时间来加固这道防线了。

霍罗克斯早在 29 日就派第 1 装甲师和新西兰部队对阿卡里特干河防线进行了侦察。他建议进行另一次闪电攻击，但蒙哥马利拒绝考虑这个建议。到 3 月 31 日，霍罗克斯就不得不承认单凭他的部队是不可能突破这条防线的，蒙哥马利决定先用第 30 军的步兵进行常规攻击，然后由第 10 军的机动部队来扩张战果。进攻发起时刻定在 4 月 4 日深夜至 5 日黎明前。

蒙哥马利的作战计划是：第 51 师将在右翼进攻，打开一个突破口让第 10 军来扩大战果；印第 4 师将在左翼进攻，并向前推进到法特纳萨高地下较低的地带。印第 4 师开进战线后，图克根据巡逻报告和亲自侦察的结果，得出了两点结论：1. 即使第 51 师夺取了鲁马纳，法特纳萨高地上的敌人仍能居高临下地威胁整个战场；2. 印第 4 师能够夺取法特纳萨。当图克发现第 51 师师长温伯利倾向于他的主张后，就向军长利斯交涉并保证说，如果让他的师在黑暗中奇袭法特纳萨，他的师能够在一夜之间夺取这块具有威胁性的高地。利斯被说服后，就向蒙哥马利进行交涉，于是修改了原计划，满足了图克的要求。鉴于敌守军的力量比最初设想的强，就又在图克的右翼增加了第 50 师。

正式进攻于 4 月 6 日 4 时在黑暗中开始，梅塞被打得晕头转向，因为他估计蒙哥马利要等 10 天后月圆时才会发起进攻。在发起进攻前几小时，图克的廓尔喀士兵就向法特纳萨高地上的哨所渗透了。这些廓尔喀士兵在不断增强的后续部队的支援下，非常有效地执行了任务。到早晨，整个法特纳萨高地就全被印第 4 师占领了。但在英军战线的右翼，却是一团混乱。第 50 师在反坦克壕沟上和鲁马纳山脊下面的地雷场上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鲁马纳山脊上，第 51 高地师虽然已经夺得了阵地，但仍然遭到德意军的凶猛反击。该师的情报总结报告说：“毫无疑问，本师在这一天经历了这次战役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但是，该师的英勇作战并没有迫使敌人配置在鲁马纳山脊下的 88 毫米大炮退却。这些大炮把在新西兰师前面摸索前进的第 8 装甲旅的坦克一辆接一辆地击毁，有效地阻挡了蒙哥马利部队的前进。

然而，这场战役还是打赢了。那天下午，非洲军团的高级军官们开始绝望地商量对策。虽然第 15 装甲师和第 90 轻装甲师这些久经沙场的部队仍和往常一样凶猛地作战，但它们的指挥官已丧失一切希望。4 月 7 日，战线突然崩溃，梅塞命令部队向西退却。到 4 月 12 日，与蒙哥马利对抗的这支德意军队已在他们的最后设防地区站稳了脚跟，这是一个名叫昂菲达维尔的小村庄。在这里，突尼斯的主要山脉面海的一侧降低了高度，在海与山之间形成了一个狭窄的平原，平原上有向北通往突尼斯首都的公路和铁路，“打到突尼斯去！”这是马雷斯战役前蒙哥马利向第 8 集团军官兵发布的激动人心的文告的主题，4 月 13 日，新西兰师先头部队向昂菲达维尔的防御工事逼近。

4 月 10 日，第 8 集团军占领了斯法克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比德

尔·史密斯2月间曾在的黎波里与蒙哥马利讨论如何尽快地使第8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在加贝斯北部会师。蒙哥马利说，他将于4月15日前到达斯法克斯。史密斯说，如果他果真能做到这一点，艾森豪威尔将军将满足他提出的任何要求。蒙哥马利说他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希望能得到一架归他个人使用的“空中堡垒”式飞机。史密斯同意了这一要求。

进入斯法克斯后，蒙哥马利给艾森豪威尔发去电报说：“今晨8时30分进入斯法克斯。请派‘空中堡垒’来。”艾森豪威尔弄清情况后，为了搞好关系，就把一架“空中堡垒”连同一个美国空勤组送给了蒙哥马利。4月16日，飞机飞来了，于是，蒙哥马利成了一名完全机动的将军。为了这事，帝国参谋总长后来曾狠狠地责备了蒙哥马利一顿，说他不应为比德尔·史密斯的一句玩笑话而当真，因为艾森豪威尔得知这个消息时会大发雷霆。

当第8集团军推进到突尼斯的大山脚下时，它在军事上已没有重大意义，只能作为一支牵制力量，把冯·阿尼姆的部队尽可能多地牵制在昂菲达维尔。昂菲达维尔这个小村庄座落在离海大约5英里的内陆，它的周围以及通向海的隘道都有防坦克壕加以防护，但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要塞的前哨而已。要塞本身由一排耸立在北面的险峻的小山构成，其中1000英尺高的加西山耸立在村子的西面，而在加西山的北后方则是姆代克尔山。此外还有向东北方向延伸的卜利达山、曼古卜山和泰拜盖山。敌人在这样的地形上建立的防御阵地有两大特点：一是敌人能够看清山下平原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二是设在顶峰线下的敌火器阵地有极好的天然屏障，第8集团军的炮火打不到那里。因此，对昂菲达维尔进行任何攻击都必然要付出极大代价，而只能夺取极小地盘。要突破防线是不可能的，除非在人员和弹药方面付出惨重代价，以至于使昂菲达维尔变成像索姆河或帕森达勒那样的臭名远扬的地名。

为了拖住敌人，蒙哥马利必须不断地向敌人施加压力，使敌人误认为第8集团军将担任主攻。新西兰师的一个营从接敌行进间发起攻击，“突然袭击”了加西山，但马上就失败了。接着又进行了几次其他试探性攻击，结果都一无所获。最后，蒙哥马利在4月19日深夜至20日黎明前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事先部署好的进攻。这次进攻的计划要求印第4师夺取加西山，新西兰师夺取泰克鲁奈及其周围地区，而第50师则在右翼遂行牵制任务，第7装甲师照管左翼，并与第1集团军的法国第19军会合。印第4师把可供使用的6个营中的4个营投入战斗，牺牲了500—600人，却只在加西山上夺得了巴掌大的一块土地。新西兰师虽于4月21日下午占领了泰克鲁奈，但却伤亡了大约500人。蒙哥马利不得不停止攻击，变更部署。

4月23日至26日这段时间，蒙哥马利在开罗参与制定“赫斯基”（进攻西西里的代号）作战计划（他已于2月间被任命为该作战行动的一个特遣部队的指挥官）。在离去之前，他对霍罗斯特说：“现在我要你制订一个计划，通过沿着海岸的强大的进攻来突进到突尼斯。”但血的教训使蒙哥马利认识到，有裂缝的山坡能够吞没进攻者的人力，却使防御者实际上坚不可摧。于是，他最后放弃了进攻的计划。

4月26日蒙哥马利回到昂菲达维尔后，患了重感冒和扁桃腺炎，卧床不起。鉴于第1集团军最初对突尼斯的突破作战并不成功，蒙哥马利急于同亚历山大商量怎样迅速结束在突尼斯的战争，并转而计划西西里战役，于是，请求亚历山大来见他。亚历山大于4月30日来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蒙哥马利对他说：“有必要整编第1和第8集团军，这样才能在最合适的地带使用

最大的力量来进攻突尼斯。”蒙哥马利建议，由霍罗克斯带领印第4师、第7装甲师、第201近卫步兵旅和若干炮兵部队前往第1集团军的战线，并接管那里的第9军，负责突破突尼斯的作战。亚历山大表示完全同意。于是，蒙哥马利和亚历山大一起召见了霍罗克斯，并指示说：“你要突进到突尼斯，结束在北非的这场战争。”

霍罗克斯率领部队前往第1集团军，并于5月6日率军从迈贾兹巴卜北面发动强大的闪电攻击，沿着迈杰尔达河谷一直冲进了突尼斯。5月12日，敌军有组织的抵抗结束，大约有24.8万敌军被俘。

5月13日，继隆美尔负责整个指挥的意军总司令梅塞陆军元帅向第8集团军投降。至此，非洲战争全部结束，德意军队以惨败告终。

第8集团军对北非最后胜利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它把隆美尔和他的军队赶出埃及、昔兰尼加、的黎波里，然后协同第1集团军将他们全歼在突尼斯。从阿拉曼到突尼斯相距大约2000英里，第8集团军却在3个月内拿下的黎波里，6个月内拿下突尼斯，创下了光辉的业绩。

6月初，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蒙哥马利的纪念册上题词：

“敌军在突尼斯全军覆没，最后投降总数达24.8万人。这标志着阿拉曼战役以及进军西北非这个伟大业绩的胜利结束。祝你们在以往的成就和新的努力的基础上，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温斯顿·丘吉尔

1943年6月3日于阿尔及尔”

正是：沙漠转战几千里，屡破敌关创奇迹。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十四章 进军意大利

制定计划贡献大，英军苦战埃特纳；
“贝镇”行动无险阻，桑格罗河徒厮杀。

北非战争于 1943 年 5 月 13 日完全结束之后，蒙哥马利决定在西西里战役里战役开始之前，回英国去作短期休假。5 月 16 日，他乘“空中堡垒”离开的黎波里，17 日到达英国。除前往了解将直接开赴西西里滩头登陆的加拿大第 1 师以外，他同他的儿子在一起度过了十分愉快的时光。6 月 2 日，他返回第 8 集团军，开始集中精力为西西里战役作准备。

英美军进攻西西里的作战代号为“赫斯基”。该战役的作战计划早在 1943 年 1 月就已开始制订。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于 1 月 23 日任命艾森豪威尔为“赫斯基”作战行动的总司令，亚历山大为副总司令，海军上将坎宁安为海军部队指挥官。特德为空军部队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受命成立一个特别参谋部来计划和准备这次作战行动。亚历山大被任命为地面作战总指挥官。2 月 11 日，艾森豪威尔任命了他属下的几个指挥官。两天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同意了这些任命。地面部队指挥官为：蒙哥马利领导东部特遣部队，最初称为 545 特遣部队，实际上就是第 8 集团军，下辖两个军即第 13 和 30 军；巴顿领导西部特遣部队，即第 343 特遣部队，包括美国的第 2 军（由奥马尔·布莱德雷指挥），该军最后升级为美国第 7 集团军。这两支特遣部队将在亚历山大的司令部的指挥下作战。在这次战役的计划阶段该司令部称为第 141 部队，后来则简单地把所辖两个集团军的番号加在一起，称为第 15 集团军群。

蒙哥马利的第 545 特遣部队的参谋部于 2 月 22 日在开罗开始工作。登普西少将被选拔来领导这一参谋部。登普西本来是从英格兰调来接管编余的第 13 军司令部的（该军所属各师在班加西分配给其它部队，而军司令部则保留了下來），现在只好让他先负责第 545 特遣部队的参谋部工作。因此，第 8 集团军最初阶段的“赫斯基”行动作战计划是由登普西负责制订的。他负责这项工作直到 4 月中旬德·甘冈摆脱了西部战场的事务，到开罗来接管他的参谋长职务时为止。然后，他才去专门处理第 13 军的具体问题。登普西是一个从不夸大的人，他认为蒙哥马利在制定“赫斯基”作战行动的最后计划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英国和美国的计划人员并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计划这次战役的。早在 1941 年英军就认真研究能不能在强大的“十字军”进攻作战中扩张战果时进攻西西里。结论是不能。然后，1942 年 11 月，英国的参谋长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进攻西西里的概要计划。该计划可以叫做“港口—机场计划”，它要求美军夺取巴勒莫，蒙哥马利夺取锡拉库萨。空中优势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除了使用盟国的机场提供大量航空兵外，还准备夺取岛上的几个主要机场，这意味着英国的 3 个师将分别沿着 100 英里海岸线登陆，而美军则在英军西面 60 英里远的地方登陆。然后，在进攻开始后两天，美军将再次在岛的西北面登陆以夺取巴勒莫，而英军则再次在 140 英里以外的卡塔尼亚登陆，作为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和美国的空降部队将在不同的机场空降。

可以看出，这个计划的严重缺点是兵力十分分散。亚历山大曾建议对此计划作一些小而重要的改动：除非十分必要，不要分散使用各师；用伞兵夺

取海滩而不是夺取机场。这个计划实际上已在3月13日由艾森豪威尔原则批准，但蒙哥马利却不予批准。登普西提醒蒙哥马利注意这一点，于是蒙哥马利给亚历山大发了下述电报：“我认为伦敦制定的这个计划背离了实际作战的一切常识性规则，完全是理论性的。它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应当重新制定。”接着，他就动手来制定计划了。从这时起到计划制定出来和最后被接受为止，连续进行了许多次曲折复杂的辩论。蒙哥马利始终认为，西西里战役的关键问题是适当地集中兵力，成功地夺取包括卡塔尼亚、锡拉库萨和奥古斯塔等港口在内的西西里岛的东南角。但同时他也认为，如果放弃夺取其他港口和机场，也是错误的。

4月23日，蒙哥马利离开昂菲达维尔到开罗去与德·甘冈及其幕僚人员讨论“赫斯基”计划。这时已经制定出7个计划，但没有一个使蒙哥马利感到满意。4月24日，他给亚历山大发了一份很长的电报，包含3个要点：一、所有的计划都有毛病，因为每一个人都想从自己制订的永远不可能获得成功的计划中获得好处；二、蒙哥马利坚决要求制订他自己的集团军的计划；三、第8集团军必须在锡拉库萨和南部的帕基诺半岛之间登陆。接着，他补充说：“我不能判断这种解决办法会对整个战役产生什么影响。”

4月29日，亚历山大决定在阿尔及尔举行会议，蒙哥马利因卧病在床，便让奥利弗·利斯代他前往。从会议上的审议情况看，蒙哥马利的解决办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德拒绝了蒙哥马利的计划，理由是，按这个计划不能夺取大量机场，并且不能保证获得空中优势。而坎宁安则认为，这个计划不能保护靠近海岸的船只免遭空袭。但亚历山大认为，从陆军的观点来看，这个计划的基本概念是正确的。于是，艾森豪威尔行使他的权力了，他于5月2日召开了一次最高级会议。在会议上蒙哥马利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美国人要放弃在战役初期夺取巴勒莫的主张，改为在南部的杰拉一带海岸登陆。而第8集团军则仍在他原来建议的地方登陆。也许这是进攻西西里的最好计划。蒙哥马利抓住了实质性问题，并且拒绝作出任何让步。结果，他的计划成为最后被采纳的进攻西西里的计划。

虽然蒙哥马利的计划是正确的，在战役初期它却把美国人降低为一个次要角色。巴顿不是一个甘居次要地位的人。因此，这必然会伤害他的感情。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是完全清楚的，但出于对共同事业的忠诚，他还是接受了蒙哥马利的计划。

蒙哥马利的进攻计划被接受之后，英军与美军的地面行动实际上已浑然一体。双方在战斗中都需要相互的直接支援，其后勤也需要相互帮助。显然，协调、指挥与控制需由一位集团军司令和一个联合参谋部负责。蒙哥马利向亚历山大提出了这一看法，亚历山大表示赞同，于是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但艾森豪威尔未表同意。他认为，组织上还是英、美两支军队分开，但归亚历山大统一指挥。

进攻西西里的作战计划的制定者和其他人都专心地考虑在何处登陆，却没有人研究西西里战役应该怎样展开。蒙哥马利认为，为了快速占领西西里岛，防止驻岛敌军逃回意大利，应该制定一个总体计划。因此，他提议：“两支军队并肩在南岸登陆后，应该迅猛地向北挺进，把这个岛屿切成两半。接着组织一个西向的防御翼侧。两支军队集结起来迅速驰往墨西拿，以防止敌军渡越海峡逃跑。海、空军也必须紧密合作，不使任何敌军由海上逃跑。”亚历山大表示同意，但后来仗却不是这样打的。

盟国为保守作战机密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为迷惑敌人，还实施了一次特殊行动。1943年4月30日，盟军故意将一具尸体抛于西班牙海岸附近的海中。尸体身上带有英国皇家海军军官的证件和一个装有重要文件的公文包。这些文件谈到盟国预定实施战役的几种方案：如在地中海东部登陆的地点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的两个地段；而在地中海西部则对西西里岛采取牵制行动，对撒丁岛的部队实施主要突击。西班牙当局于5月7日发现这具尸体后，立即向德国首脑机关报告，德国首脑机关对这些文件信以为真；未能识破盟国的真实意图。它一直认为盟军在地中海西部将把主力指向撒丁岛，而对西西里岛采取牵制性行动，在东部则将进攻伯罗奔尼撒半岛。7月9日，即英美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前夕，凯特尔还通知“南方”集团军群和“东南”集团军群司令官说：预定入侵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的部分英美军已调往地中海东部的几个地域，准备在希腊实施登陆。

登陆前的两个月内，盟国空军对主要机场、港口、潜艇基地以及分布于西西里岛、撒丁岛和亚平宁半岛南部的工业中心实施了连续的空袭。到登陆战役开始时，这些目标已遭到严重破坏，英美空军已取得了绝对空中优势。

7月9日，所有护航运输船队均抵达会合地域：英军船队集中在马耳他岛东南；美国和加拿大船队集中在果佐岛以西。大风巨浪使护航运输船队无法前进。傍晚，大风渐止。在整个航渡和在会合地域停留期间，敌人抵抗微弱。只有德军潜艇曾对英美舰船实施过袭击，击沉了3艘舰船。

7月10日凌晨，第8集团军开始登陆，尽管风和海浪很大，但蒙哥马利的要求还是达到了：第5师的皇家苏格兰炫发枪团于当日傍晚占领了锡拉库萨。在诺托湾登陆的第30军也取得了胜利。英军第一天就攻占了宽100公里，深10—15公里的登陆场。美军的作战要艰难些。他们在南部海岸的登陆受到了风和海浪的很大影响，而且岸上敌人的抵抗也更积极些，还遭到了几次骚扰性空袭。尽管如此，到这一天结束时，美军3个师的突击部队还是上了岸，进占了杰拉和利卡塔，夺占了3处各宽12—15公里、深3—5公里的登陆场。

但是，登陆的成功却包含着若干悲剧性损失。例如，英第1空降师于7月9日夜至10日黎明前离开凯鲁万时，其实力为2075人。飞行途中，有69架滑翔机掉到海里去了，还有56架散落在诺托湾附近25英里的地面上。只有12架降落在正确的地方，因此从7月10日6点30分开始，这87名士兵不得不扼守住蓬蒂格兰德桥，直到向前推进的第5师前来解围时为止。在这次作战中，英第1空降旅有250人被淹死。在杰拉以北地域空降的美第82空降师也发生了类似的悲剧。该师从凯鲁万地区出发时共有3200人，但只有大约3个连投到了目标区。这次空降兵乘用滑翔机在夜空实施机降和伞降是不成功的，有23架运输机被英美军自己的高射炮击落，许多飞机被击伤，空降部队伤亡惨重，实际上未完成预定任务。此外，在夜间让一大群飞机在自己的舰队上空飞行是危险的，即使事先告诫军舰不许开火也是如此。

如果说墨西拿是意大利的大门的话，那么具有许多丘陵和大山群的埃特纳火山就是这扇大门的门槛了。埃特纳火山耸立在卡塔尼亚平原的北面，它俯视着西西里这个三角形岛屿的东南角。如果要从南面或西面接近和占领墨西拿，就必须经过埃特纳。虽然从任何地图上看，这种地理要求都是十分清楚的，但作战计划却没有把一旦登陆成功以后怎样到达墨西拿这个问题讲清楚。

7月12日，蒙哥马利给亚历山大打电报说：“我的作战情况非常好……”

我建议让我的集团军向北进攻，以便将这个岛截成两半。”但是，在蒙哥马利看来，这样做需要把美第7集团军用作一种静止的翼侧警卫部队。巴顿的雄心更大，到7月13日的时候他已经注视着巴勒莫了。那天，亚历山大去看望巴顿时，允许巴顿有限地向前推进。傍晚刚刚回到司令部，亚历山大就接到蒙哥马利的电报。蒙哥马利在电报中说，在断裂多山的西西里岛作战的指挥官，必须拥有可供使用的良好公路，而当时只有两条良好的公路可供第8集团军使用。一条是经过埃特纳火山的东翼侧大致向北延伸的114号公路，蒙哥马利准备让第13军使用这条公路。另一条是向西北方向延伸而经过卡尔塔吉罗内—恩纳—莱昂福泰的124号公路，这条公路将使他的部队能够迂回驻守在卡特尼亚平原上的德军。但是，124号公路位于美军的作战地幅内，而且布莱德雷也像蒙哥马利所打算的那样，准备把这条公路用作第2军的进攻轴线。令人不安的是，英军偷偷地抢先使用了这条公路。美军于7月13日傍晚在124号公路上发现了第51高地师。午夜时分，亚历山大下达了一个“绝对命令”，指示布莱德雷将这条公路移交给蒙哥马利。

这样，亚历山大就好像是用盐来擦巴顿和布莱德雷的伤口。由于蒙哥马利的鼓吹导致了“赫斯基”作战行动计划的修改，从而降低了美第7集团军的作用。现在，在亚历山大的纵容下，蒙哥马利又从他们手中抢走一条宝贵的公路，以便他得意洋洋地进入墨西拿，甚至不允许美军向巴勒莫推进。巴顿是一个军人，他服从了命令。

但是，美军交出124号公路并没有产生预想的结果。无论是蒙哥马利的希望也好，还是美军的担心也好，都没有成为现实。7月13日，希特勒决定迅速赶调两个师到西西里，另外再加上一个由赫布将军领导的军司令部。此外，墨西拿海峡的控制和防御已经完全“德国化”，并且随着战斗的发展，德国人接管了作战指挥，特别重要的是，接管了敌军撤离西西里岛的指挥。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早在6月底就来到了西西里，并把他的观点强加给了意大利地区指挥官古佐尼。结果，蒙哥马利在东南部就面临着由那不勒斯师和里窝那师组成的第16军、若干较小部队、赫尔曼装甲师以及第15装甲师的一个步兵群。

在东部，由于希特勒通过凯塞林进行遥控，德军的抵抗逐渐强硬起来。然而，希特勒的遥控逐渐改变了调子，最初提要求把盟军赶下大海，最后是决定在西西里东北部保持一个桥头堡，以便掩护德军和比较忠诚的意军向意大利本土撤退。防线将由赫布来控制。主要防线是一条曲线，它从东北海岸的圣斯特凡诺经尼科西亚、阿吉拉和卡泰纳诺瓦延伸到东海岸的卡特尼亚以南6英里处。另外还有两条防线，即“旧赫布线”和“新赫布线”，准备在桥头堡不可避免地收缩时用作停留阵地。

敌人已制定出一个明确的计划，并且正在把兵力集中在一个十分适宜于防御的、断裂的和没有道路的地区。在这样的地区，英军的装甲部队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德国坦克部队从7月13日起，将蒙哥马利的部队阻止于奥古斯特以北，英军多次试图向卡特尼亚推进，但均告失败。因此，西西里战役的胜利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由于蒙哥马利的两条进攻轴线都进展缓慢，亚历山大向帝国参谋总长报告说，他打算用第13军经由卡特尼亚向墨西拿进攻，并派埃特纳火山西面的第30军先到圣斯特凡诺海岸，然后再转口来向墨西拿进攻。实际上，亚历山大是想对蒙哥马利施加压力，要他抢在德军继续加强防线以致能够从意大利本土调来增援力量以前拿下墨西拿。7月16日，亚历山

大以指令的形式把上述计划下达给各集团军指挥官。这个指令严重地伤害了美国人的感情。

美第2军军长布莱德雷写道：“它证实了我早先的疑虑，只有蒙哥马利才被允许去进攻墨西拿。”巴顿深信自己也能到达墨西拿，对分配下来的任务十分不满，因为分给他的任务是对付岛上力量较弱一端的敌人。于是他乘飞机去找亚历山大讲理，要求得到向巴勒莫推进的许可。亚历山大权衡形势之后，批准了巴顿的要求。然而，从理论上讲，第8集团军仍然是主要的打击力量，亚历山大希望该集团军所属各师能够通过卡塔尼亚和恩纳两条进攻轴线到达墨西拿海峡。7月16日，蒙哥马利发给亚历山大的电文称，希望“今晚就到达卡塔尼亚”。蒙哥马利发给他的乐观电文，助长了他的这种希望。

7月22日，巴顿的部队抵达西西里岛北岸，进占巴勒莫。而在头一天，蒙哥马利由于命令第13军在卡塔尼亚前面转入防御并决定用第30军在左翼进行主攻而遭到了一次局部失败。7月25日，亚历山大召开了一次协调会议，会上美国第2军受领了向东突进的任务。到7月27日，美军就占领了圣斯特凡诺和尼科西亚，而从南面开上来的第30军加拿大师则占领了阿吉拉。这样，第15集团军群终于到达敌人主要防线的边缘了。但是，从7月26日起，这条防线起了新的变化，因为墨索里尼于7月25日被赶下了台。

从墨索里尼下台起，原来就不积极抵抗的意军更是成批地投降。德军指挥部不得不只靠自己的兵力防守西西里岛。坦克第14军所辖的“戈林”坦克师、摩托化第15师和刚调到岛上的摩托化第29师，奉命扼守西西里岛东北部圣斯特法诺、尼科齐亚、卡塔尼亚一线。可是，德军既无力完成这一任务，又无得到增援的可能。于是，凯塞林于7月27日命令赫布进行撤离准备。因此，德军当时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快地、尽可能安全地撤离西西里。

英美军在增调兵力后，于8月4日对德军防御进行突破。经过长时间的航空火力和炮火准备之后，英军首先发起进攻。到8月5日，第13军推进到埃特纳火山与海之间的狭长地带，而第30军则推进到了火山另一侧的丘陵地带。8月6日，第13军占领卡塔尼亚。但是，蒙哥马利还必须艰苦作战到底，他甚至把已经抽出来准备进入意大利本土的第5师又调回了前线。第8集团军的突击队最后于8月16日傍晚进入了墨西拿，但接待他们的却是美军第3师的第7步兵团。原来巴顿一直让他的部队沿着北面的海岸推进，沿途只遇到一些退却的意大利军队，而没有遇到坚决的抵抗，因此美军比英军早一步进入墨西拿。

在西西里战役中，意军伤亡约13.2万人（主要是战俘）；德军伤亡约3.2万人；盟军伤亡2.28万人，其中伤1.44万人，亡5530人，失踪2870人。毫无疑问，西西里战役是一次胜利的战役，但胜利中隐藏着失败：太多的德国人逃跑了。据德军最高统帅部18日的统计数字，德军大约撤走了60万人，意军大约撤走了75万人。此外，德军还撤走了9605辆车辆，47辆坦克，97门大炮和1.7万吨弹药。

西西里打下来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却没有明确的计划。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曾经提出向欧陆进军，但一旦打到那里之后，战斗该怎么展开，心中无数。直到西西里战役结束那天，即8月17日，我们才把要在意大利登陆的地点大致上决定下来。就第8集团军来说，我必须于8月30日把军队渡过墨西拿海峡，但是‘目标’不明。”

意大利战役的方针和原则缺乏明确性，倒不是因为最高统帅部的指挥出

现失误，而是因为英美两个强有力的派系之间在战略原则上长期存在意见分歧。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同意了进攻西西里。5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巨头会议”把地中海地区的未来事态发展列入了议程，但会议给艾森豪威尔下达的指示也只不过是：“利用‘赫斯基’战役的战果，计划一次足以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并牵制住最大量德军部队的战役。”甚至在8月举行的魁北克会议上，英美一致同意的方针也是用极其含糊的言词表达的，因为以马歇尔为首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罗斯福总统支持的美国派把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陆放在第一位，害怕卷入地中海地区的政治纠纷；而以丘吉尔和布鲁克为首的同样强大的英国派则按照英国的传统方式谋求通过“打垮支持者”来摧毁德国，并且认为，特别是在面对俄国挑战的情况下，沿地中海北岸作战在政治上有很大好处。因此，英国派对进攻欧陆是不热心的。这样，艾森豪威尔就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从这些争论中产生的进攻意大利的方针就成了一种政治上的折衷方案，而政治上的折衷方案对一个军人来说只能提供短期目标，很少能提供长期目标。

因此，艾森豪威尔很难给他属下的指挥官规定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在7月31日到9月8日这段时间里，英美军制定出许多作战计划，其代号分别为“酒杯”、“敲板”、“滑膛枪”、“煽动叛乱者”、“硫磺”、“支柱”、“巨人1”、“巨人2”、“雪崩”和“贝镇”。在这么多的计划中只采纳了最后的两个。“雪崩”是马克·克拉克将军的第5集团军9月9日在萨莱诺突击登陆的代号，以那不勒斯港为作战目标。但在实施“雪崩”计划之前，要实施“贝镇”计划。“贝镇”计划由蒙哥马利负责实施，其目的被亚历山大亲笔写在半张纸上：“你的任务是在意大利半岛的趾部地带获得一个桥头堡，以便我海军部队通过墨西拿海峡作战。如果敌军从意大利南部，即趾部地带撤退，你得全力追击。记住，你愈能把意大利南端之敌拖住，那么你对‘雪崩’，军事行动的贡献就愈大。”

9月3日凌晨4点30分，第30军的炮兵部队开始猛烈轰击墨西拿海峡对岸。由于他们从巴顿的第7集团军借来了80门中型炮和48门重型炮，这次炮击的火力格外猛烈。与此同时，15艘战舰轰击了海峡南端的敌防御部队，驻在内陆的重型轰炸机也赶来助威。在节日般的欢乐气氛中，大约300艘登陆艇和渡船把第13军的第5师和加拿大第1师送往对岸。他们未遇敌军抵抗即登陆成功。上岸以后，他们迅速占领了勒佐加拉勃利亚，并沿狭窄山路开始向北挺进。此时，阻碍部队前进的已不是敌人，而是一处处废墟和难走的路。尽管如此，到9月10日，蒙哥马利的部队还是到达了卡但扎罗一线，在7天之内前进了100英里。

蒙哥马利的部队到达得很及时，因为当时在萨莱诺登陆的克拉克的几个师处境十分危险。当天下午，亚历山大给蒙哥马利发来紧急电报，要求他对德军保持压力以便救援“雪崩”军事行动。蒙哥马利作出了当时情况所允许的最大努力。但他十分缺乏后勤运输能力；作为他的两个师的进攻轴线的道路质量不好；第8集团军对于从西西里运来的供应物资没有优先使用权；他还必须采取步骤夺取并使用克罗托内机场，以便出动更多的战斗机对萨莱诺进行猛烈打击。因此，他尽可能将轻装甲部队推进到最远处，并用加拿大第1师在9月11日夺取了克罗托内，还打算让第5师和加拿大第1师继续向前进攻。同时，他还必须把塔兰托接管过来，因为第1空降师已于9月9日在那里空降并夺取了一个小桥头堡。凭借这个桥头堡，他就可以计划把印第8

师从埃及调来在那里登陆，并且把富有作战经验的第 78 师从西西里开来。

蒙哥马利采用他在趾部地带推进时所用的两栖“夹击”战术，到 9 月 19 日，他的第 5 师就已经到达奥莱塔，加拿大第 1 师就已经到达波但察了。然而，后勤供应十分紧张。第 2 军司令部、第 5 军和印第 8 师司令部要到 10 月 1 日才能报到。在此之前，第 8 集团军要进行大规模进攻看来是不可能的。在此期间，蒙哥马利继续沿着意大利半岛的东侧推进，并在 9 月 27 日使用由第 78 师一部、装甲部队和一些“特种空中勤务部队”组成的“A”集群，将德军伞兵部队赶出了至关重要的福贾机场群。

从那时起，第 8 集团军在意大利的作战过程就是从一条河向另一条河稳步推进的过程。第一个重要障碍是比费尔诺河。一支从海上登陆的突击队顺利地迂回绕过了这个障碍。该突击队于 10 月 2 日夜间至 3 日黎明前夺取了亚得里亚海上的泰尔莫利港，港口及一切设施均完好无损。在离海岸远一些的内陆，第 78 师建立了一个桥头堡。虽然凯塞林曾亲自下令要消灭这个桥头堡，但经过激烈战斗后，该桥头堡还是坚守住了。后来当德军往北撤退到特里尼奥河一线后，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在特里尼奥河第 8 集团军才接触到实际的意大利战线。首先，特里尼奥河的北岸就是伯恩哈特防线的亚得里亚海一端，而在北面 20 英里远的地方则是建立在桑格罗河上的以卡西诺为中心的古斯塔防线。在这两条防线后面还有其他一些防线，其中以大哥特防线最为险要，它是德军在阿尔卑斯山前的最后一个防御堡垒。所有这些防线都有重兵防守并且部署了十分厉害的武器，易守难攻。其次是天气恶劣。杰克逊将军写道：“甚至在夏天，意大利南部的道路网也只勉强够拥有大约 11 个现代化机械化师的两个集团军使用。当时几乎每一座桥梁和涵洞都被破坏了；到处是河里和溪里溢涌出来的流水；河上临时架起的通道上挤满了坦克和重型车辆；原来是道路的地方现在已变成一片沼泽。”蒙哥马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集拢了他的集团军，贮存了供应物资，来进行特里尼奥河战役的。他的各师是在泥泞里、在阴冷浇身的雨水中把河对岸的德军第 76 师赶走的。

当时在第 8 集团军的编制内有第 5 和第 13 两个军。蒙哥马利把第 5 军（包括第 78 师和印第 8 师）部署在右翼，使其翼侧依托亚得里亚海；把经过休整和改编的新西兰第 2 师用作集团军预备队；把第 13 军部署在左翼，使之对伊塞尔尼亚实施迷惑性攻击，以吸引住敌第 26 装甲师的注意力；然后由第 78 师在海军和空军的强大支援下，从濒海的翼侧实施主要突击。当时桑格罗河的两岸已成为一片泥滩，车辆只能在道路上行驶。德军巧妙地和一些独特的山间农村里构筑了防御工事。英军步兵发现在多岩石的土地上挖掘战壕十分困难，因此不得不用石块在地面上构筑掩体，并且越来越多地用毛驴来运送装备和为前沿服务。到 11 月 19 日，第 8 集团军就已经越过了特里尼奥河并占领了桑格罗河南岸。它的下一个障碍就是古斯塔夫防线了。

由于第 8 集团军控制着桑格罗河南岸的斜坡，德军以他们惯常的方式只用少量守备部队据守着北岸三英里左右的稍为平坦的地面，他们的主要防线位于里科里山脊上，从海岸边的福萨切西亚起向内陆延伸，经过莫扎格罗格纳到达圣玛丽亚和卡索利，然后沿着东西走向的 84 号公路延伸至桑格罗堡和艾尔弗雷迪纳。德军在 40 英里的正面上部署了 4 个师，而且占有一切地利。

蒙哥马利用 5 个师发动进攻，其中包括刚调来的新西兰师。但是，他的步兵师都很疲倦，特别是军官的人数远远没有达到定额。例如，第 78 师在近

6 个月中已伤亡近万人，却又不得不再次投入战斗，因为蒙哥马利的计划要点就是由第 5 军的第 78 师和印第 8 师沿海岸进攻。海岸公路是蒙哥马利无论如何必须加以控制的路线，以便调运供应品和弹药来保证预期的进攻。在他们的翼侧大约 15 英里远的地方是与海岸公路平行的 81 号公路，新西兰师将沿这条公路向卡索利和基那蒂进攻。最后，第 13 军应当装出显然要向桑格罗堡—艾尔弗雷迪纳一线进攻的样子。

像往常一样，蒙哥马利早就把战役中应当做些什么提前考虑好了，准备是十分周密细致的。士兵们每夜都在河上不停地巡逻，以弄清敌人阵地的准确位置，勾画出有关部队正面的大型全景图。蒙哥马利还进行了一些欺骗活动。比如，实施了一个旨在表明蒙哥马利的作战指挥所已向西转移到了第 13 军地域的无线电欺骗计划；进行了一次暗示要对佩斯卡拉进行两栖攻击的搭载演习；将第 5 军战线上日益扩大的弹药堆集所隐蔽起来，而在第 13 军战线上假扮了一些弹药堆集所和火炮阵地。同时制定了大规模的空中支援和炮火支援计划。进攻日期定在 11 月 20 日。

但是，在 10 月底，天气迅速恶化了。暴雨常常一下就是两天，接着又是一两天的毛毛细雨或雾，而山里则在下雪。整个地区都变得湿漉漉的，道路泥泞不堪，而桑格罗河在一天内能够涨落 6—7 英尺。蒙哥马利的部队的准备行动就是在这种气候条件下进行的。新西兰师、印度师以及第 78 师全都设法获得了一个牢固的据点。但是，山里有时有洪水冲下来，把经过紧张努力修建起来的桥梁冲垮；或者一个印度旅向前成功地推进后又被在它后面涨起来的洪水截断。因此，要攻下桑格罗河北岸的防线并非易事。直到 29 日夺取了莫扎格罗格纳后，情况才得到了改善。到 30 日傍晚，里科里就完全在第 5 军的控制下了。蒙哥马利重新调整了部队，以便让第 78 师得到休息。然后，他在海岸线上更远一些的地方选择了两个攻击目标——奥托纳和奥尔索尼亚。第 5 军进攻奥托纳，第 13 军进攻奥尔索尼亚。加拿大师于 12 月 20 日向奥托纳派出了巡逻队。奥托纳当时由敌第 1 伞兵师第 3 伞兵团控制，其指挥官是一位巷战老手。因此，加拿大师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的逐屋争夺战才迫使善战的敌人后撤。新西兰师尽管有坦克部队的支援，也只能小心谨慎地进攻奥尔索尼亚。德军防御部队坚守住这个小镇直到战斗的声音逐渐消逝、蒙哥马利实际上承认失败为止。

夺取桑格罗河及河岸后部地区之战是蒙哥马利在意大利进行的最后一次战役，也是他在意大利进行的第一次重要的“蒙哥马利式”战役，但它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这倒不是因为蒙哥马利的指挥有什么过错，而是因为德军的战线已经大大地加强了。但真正破坏了蒙哥马利的整个计划的却是恶劣的天气。

可惜蒙哥马利已不能在那里呆到明媚的春天到来，那时田野里将开满鲜花，道路也会好走。在意大利还有许多荣誉等待着第 8 集团军去夺取，但第 8 集团军已不再由蒙哥马利指挥了。

12 月 24 日，蒙哥马利一早就被唤醒，因为陆军部来了一封电报，命令他返回英国接替佩吉特，指挥第 21 集团军群，一支用来开辟“第二战场”的英国部队。

这个消息使蒙哥马利既有一种解脱感，也有一种兴奋感。使他感到解脱的是，他对英美军在意大利的状况感到不快，“既没有开辟新战场的宏伟设想，又没有总体计划，也没有对作战进行控制，行政后勤搞得乱七八糟”。

使他感到高兴的是，他被挑去承担重大任务：横渡英吉利海峡，向欧陆大举进攻，从而真正为敦刻尔克大撤退报仇雪恨。他想首先与德·甘冈商量，但德·甘冈休假去了，晚上才能返回司令部。于是，他决定马上解决带往英国的新班底问题。他选定了参谋长德·甘冈、总后勤部长格雷厄姆、情报处长威廉斯、坦克部队顾问理查兹和随军总牧师休斯等 5 人，并立即拍电报给陆军部，请求批准。陆军部很快批准了德·甘冈、威廉斯和理查兹，却没有批准格雷厄姆和休斯。

奥利弗·利斯受命接替蒙哥马利任第 8 集团军司令，并将于 12 月 30 日到任，蒙哥马利则定于 12 月 31 日离任。

蒙哥马利于 12 月 27 日先飞往阿尔及尔看望他未来的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和继续留任最高统帅参谋长的比德尔·史密斯。艾森豪威尔告诉蒙哥马利说，最初的地面战斗将由蒙哥马利完全负责，驻英格兰的几个美国军团在进攻欧陆开始日及其以后的作战中也将由他指挥。他们讨论了英美军队在参谋机构一级的合作的必要性。然后，蒙哥马利于 12 月 28 日下午返回在意大利的作战指挥所。

尽管沙漠时期的第 8 集团军已不复存在（因为第 50 师、第 51 师和第 7 装甲师已返回英格兰），但蒙哥马利的业绩、名声和威望却是和第 8 集团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离开这支心爱的部队，他有些恋恋不舍。在 12 月 28 日从阿尔及尔飞回意大利的飞机上，他满怀深情地写好了对第 8 集团军的告别文告，并安排在他离任后于 1944 年 1 月 1 日向全体官兵宣读。

12 月 30 日，蒙哥马利在瓦斯托城举行告别会，向第 8 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官兵们告别。他邀请了军长们到会：登普西和利斯，当然还有新西兰师长弗赖伯格和负责沙漠空军的布罗德赫斯特。正厅里济济一堂，他十分激动地向他们作了告别演讲。然后，在大家的欢呼声中缓步走向敞篷汽车。当天夜里，他向奥利弗·利斯办了移交。

12 月 31 日早上，蒙哥马利乘“达科他”座机从作战指挥所附近的简易机场起飞，飞向马拉喀什。英国首相丘吉尔最近生病，现在正在那里疗养。蒙哥马利于当晚抵达马拉喀什，同首相共度除夕和元旦，然后于 1944 年元旦晚上至 1 月 2 日间飞往英国。正是：依依惜别集团军，匆匆回国挑重任。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十五章 “霸王”计划

反复推敲大计定，精心策划“海王星”；
巧妙欺骗敌上当，检阅拜访信心增。

在除夕之夜，丘吉尔把“霸王”行动计划草案交给蒙哥马利，要他看完后提出自己的看法。“霸王”行动是进攻诺曼底的代号。尽管蒙哥马利不愿意，但丘吉尔还是坚持要他把那个计划草案读一遍，然后谈谈他的初步印象。

艾森豪威尔于12月31日下午先于蒙哥马利到达马拉喀什。他回国路过这里。他准备在就任“霸王”行动的最高统帅之前，回去同罗斯福总统磋商。他对蒙哥马利说，他只知道这个计划的大概，看来不怎么好。他指示蒙哥马利在他回国期间作为他在伦敦的代表，对这个计划进行分析和修订，并在他1944年1月中旬左右返回伦敦时把这个计划准备好交给他。艾森豪威尔只在马拉喀什作了短暂停留。1月1日黎明，他就飞往美国了。

蒙哥马利知道，除夕之夜的宴会将持续很久，因为首相一定要在迎来新年之后才肯离去。于是，他借口要读“霸王”计划，晚宴一结束，便告辞回自己的房间去了。蒙哥马利花了一些时间阅读那个计划，并写了读后的初步印象。第二天早晨，他把一份打字报告送给还没有起床的丘吉尔，蒙哥马利在这份报告中写道：

“最初登陆的正面太窄，局限于过分狭窄的地带。从大举进攻欧陆开始之日算起，12天内总计有16个师在最初登陆的滩头上登陆。这会在滩头上引起可怕的混乱，地面战斗即便可以开展，也会极其严重地影响其顺利进行。

此后，将有更多的师不断向同一些滩头拥来。到大举进攻欧陆开始日后的第24天，在同一些滩头登陆的兵力将达24个师之多。到那时，要管好这些登陆滩头将非常困难。混乱状况不仅不会得到改善，反而会日益恶化。

我的初步印象是：这个计划行不通。”

蒙哥马利断然地拒绝了这个计划。但这个计划已经经过了多次严格审查。在1943年8月中旬的魁北克会议之前，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就通过了这个计划。在魁北克会议上，经过多次讨论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作了这样的记录：“我们已经批准了摩根将军的‘霸王战役’的纲要计划，并授权他继续制定详细计划和进行全面准备。”丘吉尔也同意了这个计划。他宣称：“应当尽一切努力为首次突击至少增加25%的力量。”并建议还应在瑟堡半岛东部科唐但海滩登陆。摩根将军的纲要计划建议：对西欧的这次决定性进攻应当采取“突击巴约附近的诺曼底海滩”的形式，并且最初只用3个师进行突击。用一支规模小于第一次突击西西里海滩和萨莱诺海滩的部队来突破“欧洲堡垒”的防线，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当时谁也没有看出这个建议的问题。

然而，蒙哥马利却一眼就看出了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的计划的主要缺点。因此，丘吉尔对蒙哥马利所提的意见很感兴趣。他说，他总认为拟议的作战计划有些问题，但因三军参谋长赞同，他也没有办法。现在一位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官为他作了分析，提供了他所需要的情况，他很感激。蒙哥马利不愿在上任之前就同伦敦的作战计划者闹矛盾，因此要求首相退还意见书。丘吉尔不肯，但他答应只把它作为背景材料供他个人使用。

那天上午早些时候，蒙哥马利陪丘吉尔夫妇去野外午餐。他与首相同乘一车，一路上又继续谈论“霸王”作战计划。蒙哥马利说，他在战争中学得的教训之一是，必须让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官尽早参加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如果太晚了，军事行动的布局就可能无法变动。

那天晚餐之后，蒙哥马利离开马拉喀什返回英国。由于艾森豪威尔不许他搭乘“达科他”双引擎飞机，而要他改乘美国四引擎的C-54型飞机，他就在原座机里装满了桔子，要飞行员直飞英国。他则于1月2日抵达伦敦。

第21集团军群司令部设在西肯辛敦蒙哥马利的母校圣保罗学校里。他的办公室就是原来的校长办公室。当年他虽然算是个人物，担任过第15橄榄球队、第11板球队和游泳队队长，但从未踏进过这个房间。好像非要成为总司令才能跨进这门槛不可似的。

第21集团军群司令部原由英国本国部队统帅部组成，建立将近四年。它是一个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司令部，从未去过海外，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高级军官大多长期在司令部工作，墨守成规成性。面对有点死板的“参谋气氛”，蒙哥马利认为至关紧要的是注入新鲜血液，补充有战斗经验的高级参谋人员。于是，就让他从意大利带来的高级军官立即接管了一些部门的领导岗位，在德·甘冈领导下开展工作。结果，被撤换的人十分不满。

第21集团军群是英国所能提供的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它属下的部队既经历了战争爆发以来的一切陆上战斗的部队（如第7装甲师、第50和第51高地师、第3师），也有没有经历过战斗的部队（如第43、第15英格兰师和第11装甲师）。为了提高没有打过仗的部队的作战能力，蒙哥马利把一定数量的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调往没有作战经验的部队，以传播作战经验。这是一项棘手但却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1月13日，蒙哥马利把他属下的几个集团军的将军们召到圣保罗学校开会，向他们介绍他的作战原则以及他指挥作战的方法。在讨论中有人提出，为了进行“霸王”行动，需要对师的结构进行一些调整。这件事虽然过去已向陆军部报告过，但陆军部未采取任何行动。于是，蒙哥马利下令立即进行调整。陆军部有几个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立即把蒙哥马利这种“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不合常规的行动报告给他们的主子。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对蒙哥马利不把陆军部放在眼里，意见极大，非常生气。蒙哥马利为此感到十分烦恼，因为没有陆军部的支持，他便无法使军队做好准备。于是，布鲁克建议他们共进午餐。午餐时，蒙哥马利向格里格解释说，要办的事很多，而时间又非常紧迫，请他原谅他操之过急。真是不打不成交，这件事却使蒙哥马利与格里格开始建立起终生的友谊。

蒙哥马利一面整顿他的司令部和调整他的作战部队，一面迅速地调查和分析“霸王”计划。比“用多少兵力登陆”这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何处登陆”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令人满意的答案只能是一系列次要问题的答案的总和，而每个次要问题都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哪些港口可以夺取，以用来保障物资供应？什么地方可以肯定得到至关重要的战斗机的掩护？所建议的登陆滩头是否足够坚固，坡度是否适当？涨潮落潮的时间是否适当？如果你登上了滩头，你能够脱离开吗？海滩有没有出口？海滩后面是什么样的地带？海滩是否适于部队展开，以便扩大滩头堡并为增援部队腾出地方？前沿机场能够迅速建立起来吗？敌人部署在什么地方？敌人在当地可立即投入使用的兵力有多少？有多大的增援能力？只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能得到明确的

答案，才能最后选定登陆地点。

蒙哥马利抵达伦敦后不久，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摩根就向他和德·甘冈汇报了进攻欧陆开始日的最新计划。这次汇报表明，摩根及其参谋班子对上述所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摩根及其参谋班子的研究主要继承了“联合作战指挥官小组”（其组员包括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以前的研究成果“西北欧大规模战役的突击区域的选择”。这份文件驳斥了多点进攻的概念，在对地形进行了仔细考察后，确定诺曼底西部的塞纳湾为最好的主要突击目标。盟军最高司令部就是围绕着这一主要突击目标考虑问题的，交给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的那个计划就是建议用3个步兵师在空降兵的伴随下向塞纳湾的海岸突击。

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详细地向蒙哥马利介绍了这个计划，但蒙哥马利仍对此计划十分不满。他对目标的选择没有异议，但认为进攻正面太窄，突击力量太弱，指挥安排不妥。因此，他下令进一步研究在布列塔尼以及科唐但半岛两侧登陆的可能性。研究结果表明，塞纳湾更为可取。从那以后，塞纳湾就被最后确定下来了。塞纳湾被称为“海王星”区域，因此“海王星”是进攻欧陆开始日的实际突击代号。

蒙哥马利建议扩大进攻欧陆开始日的进攻正面，以便能够从科唐但半岛底部维尔河口以北区域延伸至奥恩河东测。这需要由两个集团军并肩进攻，即第21集团军群在左面以3个师进攻，而美国的第1集团军则在右面以两个师进攻。原计划建议所有登陆部队均由一个军司令部或特遣部队司令部控制。经蒙哥马利修改的计划（包括在奥恩河另一边空降美国的第82和101空降师）则提供了一个更强有力的、更简单的指挥结构。力量增强是显而易见的，而指挥结构更加简单则是因为两个国家的军队都有自己的进攻和扩张战果的区域，因此供应物资和增援部队能够毫不混乱地进入各自的区域。该计划规定，为方便起见，美军应全部在右面登陆，因为美军部队都集结在联合王国的西部，而且直接从美国运来的人员和物资要在瑟堡（估计能在进攻初期夺取）卸载。此外，新计划的进攻方案能保证各个军控制自己的滩头区域，因而能使后续部队和增援部队的流动较为容易。最后，新的进攻方案还意味着，在蒙哥马利同各集团军司令官以及军和师之间有了正常的指挥系统。用蒙哥马利的话来说，就是“海王星”行动变得“干净利落”了。

艾森豪威尔到伦敦正式就任最高统帅后，蒙哥马利于1944年1月21日把修改后的纲要计划呈送给他，并获得了他的批准。接着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认可了艾森豪威尔的批准。于是，“霸王”行动和“海王星”行动开始显得现实化了：有了最高统帅及其司令部；有了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并且都已任命和行使职权；有了切实可行的计划；一切都开始显出很干练、很有希望的样子。

空军总司令利一马洛里曾提出放弃在科唐但半岛底部的泛滥区西面空投空降部队的主张，因为他认为德军在这个地区部署有十分强大的高射炮部队，空降部队的飞机和人员可能会损失75%。蒙哥马利不仅不同意利一马洛里的预测，而且重申了他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他得到了布莱德雷的支持。他们认为，只有投下空降部队，美军才能毫不迟延地夺取至关重要的瑟堡港。艾森豪威尔支持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而反对利一马洛里。这样，空军总司令的主张便被否定了。

蒙哥马利在完成了“霸王”计划的修改工作后就认识到，“霸王”行动

能否成功将取决于能否把另一个代号为“铁砧”的行动降为仅起恫吓作用的行动，从而把节省下来的登陆舰艇用于“霸王”行动。“铁砧”是盟军拟在法国南部的土伦以东地区的登陆行动。盟军中的美法部队将从意大利战场调来。这是美国方面的意见，英国政界和军界对此却不以为然。美国人认为，必须把“霸王”与“铁砧”行动当作一个整体来看，“铁砧”将牵制法国南部的敌军，因而有助于“霸王”行动。法国人喜欢“铁砧”行动，因为戴高乐想要一支由法国总司令统率的法军，以解放法国领土。斯大林也喜欢这个行动，因为这样俄国人便可抢在西方盟军之前，先进入维也纳。蒙哥马利和温斯顿·丘吉尔两人都不喜欢“铁砧”行动，并主张完全放弃它，其理由有二：一是“霸王”行动必须配备足够的登陆舰艇；二是“铁砧”行动会削弱盟军在意大利战场的兵力，而那时正是抢在俄国人之前到达维也纳的良好时机。

由于蒙哥马利扩大了进攻正面，海军总司令拉姆齐上将还需要约 150 艘扫雷艇、24 艘战舰和 1000 艘登陆艇。在 1943 年 12 月的开罗会议上就已经确定（根据未修改的“霸王”计划）：在“霸王”行动中，英国应提供所需的全部军舰，而在所需的 3323 艘登陆艇中，美国只需提供 1024 艘，或者说，只需提供美国 1943 年底登陆艇实力的 5%。英国造船厂长期以来一直在加班加点地工作，再也没有什么潜力可挖了。实际上，为了履行对“霸王”行动所承担的义务，已把建造 1 艘航空母舰、4 艘驱逐舰和 14 艘快速舰的工作往后推迟了 3 个月，以建造额外需要的 75 艘坦克登陆艇。

为了解决登陆舰艇严重短缺的问题，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建议，将“霸王”行动推迟一个月，并将“铁砧”行动降为仅起恫吓作用的军事行动。

1944 年 2 月 1 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了艾森豪威尔的建议，把“霸王”行动的进攻开始日从 5 月 1 日推迟到 5 月 31 日。2 月 25 日又同意推迟“铁砧”行动。

登陆舰艇的问题基本解决之后，蒙哥马利又把注意力转向一旦登陆阵地稳固之后，战事应该怎样展开的问题。他计划，盟军在诺曼底站稳以后，就要在东翼即岗市地区作出向内陆突进的威胁姿态，其目的是为了把敌人的主要后援，特别是装甲师，拖在东翼地带。把敌军牵制在东翼后，就从西翼出击，来个声东击西。出击必须向南推进，然后折向东面，浩浩荡荡地向环绕巴黎的塞纳河前进。4 月 7 日，蒙哥马利在伦敦召集了 4 个野战集团军的全体将领，详细地介绍了他的计划。海、空军总司令也提出了他们的计划纲要。

有了一个一致同意的计划之后，蒙哥马利便把细节问题交给德·甘冈和他的参谋班子去做，自己则集中精力去解决下一个重要问题——使每个人对高级指挥官产生信心，巩固人民对军队的信任。

1944 年春，蒙哥马利乘坐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曾经使用过的“轻剑”号专列，开始不拘形式地访问将要参加“霸王”行动的每一支部队。他每天检阅部队两三次，每次万把人或更多些，计划到 5 月中旬时能够和 100 万以上的官兵讲话。受阅部队整好队，排列成方阵，准备接受检阅。蒙哥马利先同各部队指挥官个别谈话，然后命令队伍面向内，他缓步通过行列，使每个人都能见到他。这时，士兵们“稍息”，可以转动，也可以一直瞧着他。他们相互检阅，花时不多，但对彼此都有好处。蒙哥马利写道：“开始的时候，我得引起他们的好奇心。他们评头品足之后，我便站在吉普车车头上同官兵

们作朴素的、十分简单的讲话，扬声器用不用，视情况而定。我说，我们互相了解很有必要，我们要同心协力地完成面临的任務。我告诉他们德军在作战中是怎样打仗的，我们又怎样去打败他们。假如我们对作战计划有信心，相互信任，就能完成任务。我是他们的总司令，我们已经看清了彼此的面孔。经过这次见面，我对他们有了绝对的信心，我希望他们对我也有同感。”

至5月中旬，蒙哥马利已经视察了在英国各个部队，几乎所有将参加诺曼底作战的官兵都见到了他，并听过他的讲话。被他检阅的人肯定已超过100万，同时他也被100万以上的官兵检阅过。他这样努力地争取所属官兵——英国人、加拿大人、美国人、比利时人、波兰人、自由法国人与荷兰人——对他的信任，是件相当辛苦的事情，但它却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比德尔·史密斯6月22日主动寄给蒙哥马利的一封信，客观地说明了这一点。史密斯写道：

“亲爱的将军：

我刚从一个最可靠和消息灵通人士方面，接到一份关于战斗中的美国部队的态度和思想状况的报告。作者完全是公正的。他的报告有如下的段落，我希望你读后也会同我一样感到高兴：

‘对于最高指挥官的信心，堪称空前。登船待发的大批战士异口同声地把蒙哥马利将军当作英雄来崇拜。他们一致认为，除了他友好、真挚的感情和朴实的作风吸引着全体官兵外，最使他们感动的是（据我所知，这近乎传奇），将军看望了部队的每个战士，告诉他们说，他比谁都急于早日结束战争，让大家回家团聚。这留下了热情而难忘的印象。’

以上是逐字逐句的引语。我同美国士兵相处多年，深知他们天生地对一切外国东西不信任。我较你更能体会到，由于你领导有方，激励了人们的感情与信心。

你忠诚的，

比德尔

1944年6月22日

除了鼓舞军队外，还要鼓舞人民，巩固人民对军队的信任。蒙哥马利坚信，要使他的战士的战斗意志不因大后方人民的淡漠无情或怀疑态度遭到削弱，要使今后战争的供应物资和弹药不因工业人员倦怠而受到限制，就必须对精疲力竭的、对战争感到厌倦的公民进行鼓舞。因此，在军需部的赞助下，蒙哥马利访问了许多工厂，特别是那些加班加点生产‘霸王’行动所急需的装备的工厂。他应邀向每个工厂的工人演讲，但他所讲的内容大体相同：“不论是在前线作战的士兵，还是国内生产战线上的工人，我们都属于一支伟大的军队。我们的共同任务是把工人与士兵连成一个整体，决心摧毁德国统治欧洲和世界的野心。”

1944年2月22日，蒙哥马利在尤斯顿车站向铁路工人的代表发表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说，因为铁路工人的合作极其重要。蒙哥马利写道：“讲完以后，铁路工会干事们表示保证给予全力支持。”3月3日，他到了伦敦港口，向大约16000名码头工人、搬运工人和驳船工人讲话，主题与对铁路工人的讲话一样——为了打败德国同心干。接着是参加全国储蓄委员会主持的“向军人致敬运动”，这次运动于3月24日在曼森大厦举行的午宴上达到了高潮，宴会上的主要演讲人是陆军部长詹姆斯·格里格爵士和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在讲话中号召全国人民鼓励军队为伟大的事业而战。

蒙哥马利在进攻欧陆开始日前几个月里所作的这种“竞选式”旅行，虽然起了相当的作用，但政界却不赞同，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并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这件事。也有一些人暗示他应“停止”这种参观访问。但蒙哥马利不予理睬，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应英国政府某些部的邀请而这样做的。

4月7日和8日，“霸王”行动的宣传教育工作在蒙哥马利司令部举行的为期两天的演习中达到了高潮。盟军各集团军的将领们都参加了这次演习。布鲁克对蒙哥马利的演习的反应是“精彩极了”。一致的意见是，这位总司令向他的高级部属表明，他完全掌握了“霸王”行动。

蒙哥马利解释说，“海王星”区域分成5个独立的登陆点，每个登陆点都用一个代号加以区分，并分配给一个不同的部队。在“海王星”行动完成以后，第二个主要步骤是进一步采取进攻行动以便把这几个部分联成一片，形成一个滩头堡。按从西向东的顺序，这几个登陆区域是：“犹他”区，分配给美第4步兵师（瑟堡半岛，维尔河口以北）；“奥马哈”区，分配给美第1步兵师（从“犹他”区右翼至贝桑港）；“戈尔德”区，分配给英第50步兵师（从“奥马哈”区右翼至普罗旺斯河）；“朱诺”区，分配给加拿大第3师（从“戈尔德”区右翼至梅尔河上的圣欧班）；“斯沃德”区，分配给英第3步兵师（从“朱诺”区至奥恩河）。已经组织了两支海军特遣部队，一支用来保障美军的登陆，一支用来保障英军的登陆。空中支援将采取大规模和多样的形式，在这一天，各类飞机的总数，英军达到5510架，美军达到6080架，总计11590架。这就是蒙哥马利向他麾下的将军们提供的进攻欧陆开始日的概略图景。

但是，怎样扩张登陆后的战果呢？蒙哥马利5月15日第二次呈交联合作战计划时所讲的话很好他说明了这一问题。他说：“隆美尔已于2月间就任荷兰与卢瓦尔之间海岸地区的指挥官。现在很清楚，他的意图是不让我们实现任何突破，要把‘霸王’行动击败于海滩上……我们必须打到岸上，然后抢在敌人能够调来足够的预备队把我们赶走以前，在那里建立一个牢固的滩头占领区……我们必须迅速夺取地盘，向内陆进击……一旦我们能控制住格朗维尔—维尔—阿让唐—法莱斯—卡昂一线敌人的主要翼侧，并把包围住的地区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那么我们就掌握我们所需要的滩头占领区，并可向外扩展。”

蒙哥马利把卡昂城及其邻近区域作为盟军整个战线必须围绕着它旋转的枢轴。德军一定会拼命保卫卡昂，或者在该城被夺后努力恢复它，因为卡昂是诺曼底地区的主要交通中心。如果第21集团军群能够在卡昂周围吸引住和消耗掉大部分德军装甲部队，那就能使盟军战线的其他部分越来越向东弯曲延伸，直到最后加拿大第1集团军突进到鲁昂北面的塞纳河边，英国第2集团军突进到鲁昂与巴黎之间，而美军则突进到巴黎以南。这一战略原则将使英军卷入一场进展缓慢的“激烈战斗”，只能攻占很少地盘；而美军一旦击溃敌人的最初抵抗，就有机会实现引人注目的突破，它的装甲部队可以向东猛冲。

蒙哥马利判断隆美尔在1944年的总方针是：“不打算在他自己选择的阵地上打坦克战，而是把他的坦克部署在前沿来完全避免坦克战。”他的情报处长威廉斯准将对隆美尔的意图的判断则是：“如果隆美尔不能在海滩上‘给我们送行’，那他将设法把我们‘隔离’在海滩上。”他们两人的判断都是正确的，那正是德军指挥部在诺曼底所采用的战术。作为一种抵抗方法，这

种战术对蒙哥马利的进攻十分有利。

但是，令人不安的是隆美尔防御计划的其他方面。自从隆美尔的日集团军群接管“欧洲堡垒”西北海岸的防御以来他就用罕见的精力和才智来改善德军的防线。他使在内陆布设地雷的速度提高了3倍，在盟军进攻开始日前共布设了约500—600万颗地雷，对可能的空降区域的空中侦察照片表明，浑名为“隆美尔桩砦”地区的面积惊人地增大了。所谓“隆美尔桩砦”就是由楔入地面的、彼此相隔很近的许多大木桩构成的森林。这些大木桩能够把滑翔机的底部刮破。然而，最使人烦恼的则是，有迹象表明敌人在海滩上的活动已经加强。

从2月份起，情况就变得很清楚，敌人在每一个可能登陆的海滩上修建了各种形状、各种大小的障碍物：“菱形拒马”，用7英尺长的钢梁捆绑在一起，形成一组尖状物，可将登陆艇扎穿；一吨重的角锥形桩岩；带有一触即炸的地雷和爆破筒的桩子等。障碍物从高潮线开始设置，逐渐向海里延伸，到6月时，已经快设置到半潮线了。这样一来，登陆艇的艇长在登陆的最后几秒钟内可能碰上的问题大大增加了。但这些问题同蒙哥马利及其海军顾问们面临的那个根本问题相比，就不算什么问题了。即使登陆艇已经进入海滩，几千人的登陆行动直至安全上岸的过程中所碰上的事也会使许多年的准备、计划和生产劳动付诸东流。因为，如果登陆不成功，那就不可能有后续部队。如果没有后续部队，那就没有增援。没有“海王星”行动，也就没有“霸王”行动。如果选择高潮线登陆，可以肯定，将有一大部分登陆艇被扎穿洞；如果选择低潮线登陆，同样可以肯定，在步兵通过德军炮火射击的开阔海面时将发生重大伤亡。蒙哥马利权衡了所有的因素（其中包括应争取一个尽可能早的昼间光线时间以便能够观察火力）后，决定在高潮到来前的3时到4时之间，即在“微照”（指太阳低于地平线12度时的光线）以后约40分钟时开始攻击。此外，蒙哥马利决定第二批部队登陆时使用浮水坦克，以便步兵在最无保护时为他们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这一决定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因为使用或不使用水陆两栖坦克，结果大不一样。

要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陆，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从诺曼底进攻，另一种选择是从加来海峡进攻。由于从加来海峡进攻具有海上航程短、登陆艇能迅速周转、得到战斗机掩护的机会多等优点，盟军从此处进攻的可能性最大。海岸上的大量防御工事、德第15集团军的驻扎以及其他种种迹象都表明，德国人一直把加来海峡作为盟军最可能进攻的地点。

为了使希特勒及其指挥官继续把加来海峡看成主要的危险地点，蒙哥马利又开始上演他的拿手好戏——实施欺骗。他专门为“霸王”行动设计了一个叫做“保镖”的欺骗计划。该计划中有一个称为“坚韧”的行动，其目的是让德国人深信盟军的主要进攻将发生在7月份的第三个星期，而在主要进攻之前，盟军还将从苏格兰入侵挪威。与此同时，还设法使德国人认为，对诺曼底的任何攻击都仅仅是一种佯攻。

这一巧妙的诈敌计划是在英格兰东南部制造一个假象，使敌人相信那里存在着一个完整的集团军及辅助的空军部队。蒙哥马利借助于以往各种设施的残余和少量部队，模拟了令人信服的司令部、兵营以及进攻用的装置，同时还把这个地区的无线电通讯增加到与一个集团军相称的程度。蒙哥马利的前线指挥所在4月底迁移到了朴次茅斯地区的索思威克大厦，但为了使“坚韧”行动显得逼真，他将无线电信号通过陆上线路从朴次茅斯传送至肯特，

再从那里播出。这一行动是如此有效，以致于隆美尔在 5 月 21 日这样说道：“盟军的主要突击力量在英格兰南部和东南部集结，此事已再次为蒙哥马利的司令部位于伦敦以南所证实。”德国人认为英军的主要“战斗序列”在英格兰东南部这一事实和下面的 3 个报告，都是这一欺骗计划取得成功的铁证。6 月 4 日，德军西线海军集群司令克朗克海军上将这样写道：他怀疑敌人是否已集结了具有必要实力的进攻舰队；6 月 5 日，B 集团军群记录道：敌人对敦刻尔克—迪那普地区的集中空袭仍然表明，加来海峡是受威胁的海岸；而在同一天，冯·龙德施泰特则在每周报告中写道：“斯凯尔特与诺曼底之间的主要正面仍然是敌人最可能进攻的地点。”

航空部队的活动越发加强了这种欺骗作用。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在直接或间接地全力支援“霸王”行动的战斗活动中，在 4 月 1 日至 6 月 5 日期间，一共损失了 12000 名官兵和 2000 架飞机。他们除了打击战略目标，还打击靠近“海王星”附近的桥梁、铁路、雷达站、机场和海岸炮兵阵地。“海王星”行动从空军的活动中得到了无可估量的好处，作为欺骗计划的一部分，空军的打击活动是按一定的程式进行的：每打击“海王星”区域的一个目标，必须打击加来海峡的两个目标。被打击的铁路目标，大多在“海王星”区域之外。许多人员和飞机是在执行“重复任务”的过程中和打击那些并非重要的目标时损失的。要不是为了欺骗敌人，本来不需要那样做。

在大规模进攻欧陆开始日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首相丘吉尔对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时所需的兵员与车辆的正确比例感到不满。他算了一下，觉得战斗兵员不足，而卡车以及装有无无线电的车辆则又过多。他宣称要到蒙哥马利的司令部向参谋班子进行调查。为此，蒙哥马利请他来共进晚餐，会见他的高级参谋人员。

1944 年 5 月 19 日，丘吉尔来到了蒙哥马利的司令部。在会见参谋人员之前，蒙哥马利把他请到书房，并对他说：

“爵士阁下，据我了解，你要同我的参谋人员商谈先头部队在滩头登陆时士兵与车辆的比例问题，对此，我不能同意。我的参谋人员提出意见，由我作出最后决定，然后他们按我的意见去办。

“我的最后决定已经下达，无论如何我不容许你在这个时刻干扰我的参谋人员，从而动摇他们对我的信任……你可同我争论，但不能同我的参谋人员争论。无论如何，来不及再作任何改变了。我认为，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将在进攻日那天得到证实。假如你认定我的决定错了，这只能意味着你对我失去了信任。”

接着是有点尴尬的沉寂。首相没有立即作答。于是蒙哥马利便站起来说，如果首相愿意到邻室去的话，他可以把他介绍给他的参谋人员。丘吉尔眼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说：“你不是不让我同你们诸位有任何讨论么。”然后，他和蒙哥马利一起走出了房间，从列队静候的一群参谋军官的旁边走了过去。

那天晚上，丘吉尔在蒙哥马利的纪念册上写道：

“最伟大的冒险事业行将开始。在关于最伟大的业绩的这些记录中，谨把我的信心表述于此：

一切必将成功。陆军的组织与装备将无愧于军人们的英勇和他们的首脑的天才。

温斯顿·丘吉尔”

5月23日，蒙哥马利开始作最后的视察。6月5日是大规模进攻欧陆开始日，他必须及早赶回。他决定向中校以上的全体军官演讲，把行将开始的规模巨大的作战行动的主要问题作个交代。他总共花了8天时间视察每个军与师的所在地，每次向500—600名军官讲话。每次讲话，他都“竭尽全力”，结果搞得精疲力尽。

5月底，发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利一马洛里又重新反对在西部空降。在尽早夺取瑟堡港的作战计划中，在西部空降是个关键因素。在5月25日以前，蒙哥马利、布莱德雷和利一马洛里一致同意作出一项安排，为了消除利一马洛里的反对，第一夜的主要空投由第82和101空降师的伞兵实施，接着在第二天拂晓时机降100架滑翔机，黄昏时再机降200架滑翔机。5月24日，有消息说德军的一个师开进到了分配给第82空降师的地域，因此布莱德雷强烈要求第82空降师应当在更东面的一些地方，即靠近第101空降师的地域空降，以便联合起来支援“犹他”区的登陆，否则“犹他”区登陆将不得不放弃。利一马洛里仍然反对空降，虽然蒙哥马利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副手、负责“霸王”行动中空军作战的特德都支持布莱德雷，但利一马洛里还是亲自找艾森豪威尔交涉，并断然说：如果进行空降，那将牺牲掉50%的伞兵以及70%的滑翔机人员。但艾森豪威尔的决断是：整体比部分重要，“海王星”行动迫在眉睫，没有时间作重大改变了。于是，他下令按计划进行空降，从而给自己造成了比决定发动“海王星”行动更大的精神压力。在空降成功之后，利一马洛里给艾森豪威尔写信，十分谦恭地承认了错误。

海上和空中的一切必要条件，比如恰当的涨潮时间和恰当的月光，都只能在6月5—7日三天中实现。在这三天中，蒙哥马利认为，6月5日最好，6日中等，7日勉强可以接受。如果过了6月7日，可以实施登陆的时间就要等到两周以后。

如果推迟行动时间，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因为一些预备行动已经开始进行了，5月31日，供人工港使用的仓库船已从苏格兰的一些港口开始它们的最后一段航行。6月2日，皇家“纳尔逊”号军舰离开斯卡帕湾南航行，一支“炮击舰队”驶离克莱德。6月3日，又有两支“炮击舰队”和“罗德基”号军舰驶离克莱德。然而，到傍晚的时候，气象前景变得如此恶劣，以至于推迟总攻日期看来已不可避免。由于6月5日的气象预报仍然令人泄气，艾森豪威尔在6月4日凌晨开完会后，便打电报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报告说，他已经把进攻欧陆开始日推迟到6月6日。推迟的主要理由是，只有使用势不可挡的空中力量才能保证进攻开始日的登陆获得成功，如果空军因气象条件恶劣而不能出动，进攻开始日就必须推迟。

6月4日傍晚，风暴变得更加猛烈了，这证明推迟行动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6月5日凌晨4时，艾森豪威尔再次召集各指挥官开会，以便就次日是否行动作出最后决定。气象主任斯塔格上校在外面下着大雨、刮着大风的时候闯进会议室向大家报告说，最坏的天气看来就要过去，今后几天会有较好的天气。接着，艾森豪威尔一个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的两手背在后面，头向前倾，陷入沉思。蒙哥马利显出十分不耐烦的洋子，好像是说答案再明显没有了。但答案要由艾森豪威尔作出。艾森豪威尔很快就停止了踱步，说：“好，朋友们，咱们干吧。”正是：计划组织半年整，进攻只待风雨停。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十六章 妙计成功

兵从天降敌震惊，猛攻滩头把岸登；
东翼愿战把敌引，西翼突破功告成。

1944年6月5日，英吉利海峡狂风呼啸，波浪滔天。一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舰队从英国南海岸启航出海了。海军上将拉姆齐率领的这支英美联合舰队，拥有5000艘舰只，要负责在两天内把17.6万人的进攻部队和20000辆军车送上诺曼底海岸。天黑之前，运输船队抵达离英国南海岸50—60海里的调整水域。各登陆部队从这一水域分10路沿事先扫清水雷的航道驶向塞纳湾。

6月5日白天，盟国海军的扫雷舰对登陆地域的航道进行扫雷，未遇到敌人的任何抵抗，由于天气恶劣，德国水面舰艇甚至未进行例行巡逻。轰炸航空兵摧毁了德国的不少雷达站，又对诺曼底沿岸幸存的雷达进行干扰，这使盟军舰队有可能向登陆地域行驶而不被发觉。无论是德军最高统帅部，还是“西线”司令部，无论是隆美尔，还是龙德施泰特，都不知道盟军的5000艘舰只正在越过英吉利海峡，驶向法国北部的登陆地域。

6月5日夜，盟国空军在登陆兵航渡时开始对敌人的炮兵连、独立的抵抗枢纽、司令部、密集的部队和后方机关实施突击。拂晓以后，1000多架轰炸机对塞纳湾海岸防御阵地实施猛烈轰炸。与此同时，航空兵对加来和布伦地域的目标也实施了猛烈突击，以便把德军指挥部的注意力从实际登陆方向引开。

同一天夜里，空降兵开始空降。英美空军的2000多架运输机和近1000架滑翔机，分别将美军第101空降师空降在卡朗但以北，将美军第82空降师空降在圣梅尔埃格利斯以西，将英军第6空降师空降在岗市东北面。这些空降表明，在西西里取得的教训并未被充分吸取和运用。尽管如此，蒙哥马利至少在一点上是感到满意的——利一马洛里所预言的美国空降部队及其运输机可能损失大半的情况并未出现。美军出动的805架运输机，只损失了20架，然而，由于飞行线路复杂，再加风力大，云层厚，空投很不准确，人员、装备过于分散。第101空降师被撒在一个25英里长、15英里宽的地区。天亮时，空降的6600人只有2100人到了预定地区。甚至一天之后，集中在一起的还不到总人数的一半。尽管如此，到傍晚时，他们还是夺取了沼泽地5条堤道的西端。

第82空降师的运气稍好些，其先头伞兵团的大部分人员降落在离正确地点3英里之内，并且没有遇到激烈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卡朗唐至瑟堡公路上的要地圣梅尔埃格利斯。随后又有22架滑翔机到达。不过，在进攻开始日的清晨，这些空降兵还没有与“犹他”滩头登陆的第4师建立起可靠的联系。

由于空投过于分散，第6空降师也遇到了困难，但他们还是摧毁了敌人的抵抗，很快夺取了奥恩河和卡昂至大海之间的运河渡口，占领了梅维尔的海岸炮台。但他们也没有与登陆部队接上头。

在空降部队着陆时，登陆部队已驶近海岸。黎明时分，能见度良好，又值涨潮，使扫雷舰能驶近岸旁，清除那一带的障碍物。

6月6日晨，盟军开始炮火准备。参加炮火准备的有战列舰、重炮舰、巡洋舰和驱逐舰，总共达100多艘。同时，英美空军也对德军的防御实施了

密集突击。

接着，盟军部队开始登陆。大海翻腾起伏，令人头晕眼花，寒风卷起层层浪花，拍打在士兵身上。德军对盟军进攻前的大规模海上炮击和空中轰炸已有所准备，他们觉得自己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异常坚固，完全可以抵挡得住。他们料定，炮击和轰炸之后，盟军士兵将会奋力穿过碎浪，在最易遭到攻击的部位踉跄上岸。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坦克居然会从海面上直接游过来，也没有想到会从登陆艇上发出一排排密集、猛烈的炮弹和火箭，更没想到会遇到向他们冲过来的那样一些装甲战车——它们一面引爆雷区中的地雷，一面作抵近射击，摧毁炮兵阵地和防御据点。登陆部队在德军的大炮、反坦克炮和机关枪还来不及开火还击时，就已迅速地登上了坚实的海滩。

在“犹他”地段，美第4师得利于其登陆滩头的位置：在科唐但半岛的背风处，该师的登陆艇所遇风浪不大，容易靠岸。此外，水位不是很高，滩头障碍物清晰可见。进攻开始前，269架中型轰炸机对德军的岸边防御工事进行了精确的地毯式轰炸。离岸3000码放下水的26辆水陆两用坦克，全部安全地漂浮着向岸边前进。一小时内，爆破分队已为后续登陆艇扫清了道路。由于这些有利因素，再加上面对的敌军较弱，第4师在夺取了桥头堡之后，遇到的障碍是沼泽地和滩头缺乏出口，而不是敌人的顽抗。这天结束后，2.3万人上了岸，并开辟出供机动和增加兵力用的大片地域。

同一天夜里，“奥马哈”滩头的景象和形势却完全不一样。“奥马哈”地段的海岸态势使它成为一个明显攻击点。德军在此重重设防，修建了许多能扫射滩头的坚固支撑点和战壕，在所有可能的出口处都布上了大量地雷。美国人是清楚地知道这种威胁的，但由于部队指挥官指挥不当，预见性不强，使美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波涛汹涌的海上，登陆艇在离岸12英里之遥就下水了。结果，士兵们衣衫湿透，冷得发抖，挤在拥挤狭小的登陆艇中，动弹不得，再加上晕船，弄得无精打采，根本没有精神去应付那极其紧张的登陆作战。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在离岸4英里之遥下水的29辆水陆两用坦克中，上岸的只有两辆。由于天空乌云密布，美第8航空队的轰炸机不能像“犹他”滩头上空的轰炸机那样进行目视瞄准轰炸。虽然采用了导航飞机和仪表轰炸，但几乎没有炸中登陆滩头及其防御设施，却把炸弹扔到了离岸3英里远的内陆地区。这样，冲上滩头的步兵实际处于一种毫无防御手段的状况，面对比他们预料的要强大得多的敌人，一筹莫展。这样，原来预想的一次成功的进攻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求生的搏斗。只是凭着官兵们拼死战斗的坚决意志，这场求生的搏斗才慢慢转化为一个小小的胜利，其代价是3000人的伤亡。

在英、加军队前线，如果算得上是胜利的话，情况也大致差不多。在“戈尔德”海滩登陆的第50师，虽然遇到了敌人顽固据点的激烈抵抗，还是努力在当天下午将其4个旅都送上了岸，并向内陆推进到离巴约不远的地方。

在“朱诺”滩头，加拿大人的登陆也并不顺利。那一天，他们的306艘登陆艇中有90艘受损。但对加拿大人来说，这里没有出现类似迪那普的情况。尽管由于打开通道迟缓而导致海滩上交通拥塞，但加拿大第3师在装甲部队掩护下，终于取得了突破，并向前、向翼侧推进，直到该师的部分装甲部队抵达了当天的部分目标，即卡昂至巴约公路上的布雷特维尔-洛格约斯和卡尔皮克。

由于德军在指挥上陷于瘫痪状态，“斯沃德”滩头没有出现“奥马哈”

滩头那样的情况。英第3师虽曾在滩头上历尽艰辛，在展开时颇费周折，但还是摧毁了几个坚固支撑点，沿着海岸前出到乌伊斯特勒昂，到午夜换下了守卫运河大桥的空降部队。在南面，英军夺取了重要的佩皇那山脊和其他要地、村庄，所有这一切都未曾遇到德军装甲部队的有力抵抗。当天晚上，英第3师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距卡昂不足3英里的地方。

蒙哥马利虽然没有上岸收集详细报告，但第一天战果的粗略情况已使他感到满意。从海上登陆的英国和加拿大部队共有75215人，已在宽24英里的正面上向纵深突入4—6英里。美国部队有57500人登陆，虽然“奥马哈”滩头的登陆行动不顺利，但“犹他”滩头前景乐观。两个空降翼侧正在巩固。盟军掌握着制空制海权。德军的坦克如预计的那样被牢牢地吸在卡昂。

德军指挥部对盟军的登陆反应迟钝。防守塞纳湾海岸的德第84军军司令部，6月5日晚间还在庆祝军长的生日。宴会一直延续到后半夜，直到盟军空降兵开始着陆才中断。防守诺曼底海岸的德第7集团军，到6月6日凌晨2时15分才发出战斗警报。这时，盟军空降兵业已着陆，登陆部队上陆的航空火力准备已在进行。B集团军群司令官隆美尔正在由希特勒大本营返回的途中，于6月6日下午才回到自己的司令部。龙德斯泰特元帅收到空降兵开始着陆的情报后，命令党卫军第12装甲师和勒尔装甲师向塞纳湾开进。但早上5点多他收到最高统帅部司令部的电报说：此刻还很难肯定盟军主力的登陆地点；此外，希特勒还未定下任何决心。于是，这两个装甲师暂停出发。由于这两个师是德军最高统帅部的预备队而由希特勒直接指挥，龙德斯泰特要求火速批准这两个装甲师向登陆地域开进，但到上午10时得到的答复是：党卫军第12装甲师可以向北进发，勒尔装甲师必须原地不动；没有最高统帅部的批准，哪一个师都不得投入作战。到下午2时半，勒尔装甲师和党卫军第12装甲师才获准开上前线，但这时为时已晚，错过了时机。

6月7日早上，蒙哥马利搭乘英国军舰“福尔克诺”号到达登陆滩头附近海面，在去找登普西之前，他先到布莱德雷的指挥舰上去同他见面。布莱德雷很关心“奥马哈”滩头的作战情况，他们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制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蒙哥马利回到英军地区，同登普西和维安海军上将讨论了战况和问题。英军滩头上的一切行动都按计划进行，没有特殊情况。这时，艾森豪威尔乘坐拉姆齐海军上将的旗舰来到英军地区，蒙哥马利当即赶到拉姆齐的旗舰上同艾森豪威尔和拉姆齐会晤。随后，蒙哥马利再次来到布莱德雷舰上，同他一起讨论战况。后来，“奥马哈”滩头传来消息说，那边情况良好，布莱德雷便上了岸。

6月8日上午7时，蒙哥马利也上了岸。他把指挥所设在贝叶以东几英里的克勒利小村庄的一所别墅里。离开朴次茅斯时，蒙哥马利以为他的指挥车里已经是应有尽有，后来才发现还缺一件东西——便壶。蒙哥马利让副官去向房东德·德吕瓦尔夫人借一只来。但副官觉得直接说借便壶很尴尬，于是决定向夫人借一只花瓶给总司令。夫人很高兴，立刻搜集别墅里的花瓶，要副官挑一只他最喜欢的。副官仔细察看了一番，说没有一只适合将军插花的。问她还有别的式样没有？夫人凭她的直觉和幽默感，一下子意识到副官所要的东西——当然是晚上使用的瓶。她对副官说，她可以找到另一种瓶，与一般的不同，也许对军人适用。她离开房间，几分钟后拿来了一只饰有粉红色花卉的白色小夜壶。她得意洋洋地把这只夜壶放在刚刚搜集来的一大堆花瓶中说：“我想这一定是将军乐于插花的！”副官当即表示确是这样，而

且放在将军的指挥车里也很合适。后来德吕瓦尔夫人坚持要将军保留“这只瓶子”，蒙哥马利只好把它留下作纪念。

蒙哥马利的计划是用集结和作战把敌人主力吸引到东翼英国第2集团军正面，以利于美国第1集团军在西边占领阵地，突破德军防线，迅速地占领有利的广大地区。蒙哥马利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后来遭到许多人的误解。

进攻开始后的第二天，东翼所发生的一切与“坚韧”计划紧密相关。“坚韧”是一项巨大的欺骗计划，它使德国人相信诺曼底只不过是一次佯攻，这一假象在希特勒以下的德军高级指挥官的脑子里还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德第7集团军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作战，本来能从第15集团军调过来的五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还在原地未动。甚至第7集团军本身的坦克战略预备队也不能马上派上用场。虽然党卫军第12装甲师和勒尔装甲师已投入战斗，但党卫军第1装甲师、第17师和第2师还远离战场。这样，德军用步兵挡住美军而用装甲部队把英军赶下海去的貌似宏伟的战略，在执行此项任务的党卫军第1装甲军军长迪特里希看来已是纸上谈兵。

实际上，蒙哥马利已经在牵着敌人的鼻子转，德国人随即调来的装甲部队就像预期的那样开往卡昂，像预期的那样零零碎碎地投入作战。蒙哥马利用吸引敌人注意东翼的方法来大大支援西翼，因为“奥马哈”滩头的美军所遭遇的那股敌人并没有什么后备力量。现在，美军正以非凡的反击能力勇猛推进，将其狭窄的桥头堡扩大到敌人所扼守的地域以外。在科唐但半岛的底部，美军也一直保持进攻势头，并夺得了地盘。

6月8日上午，当蒙哥马利第一次坐在前方指挥所里仔细研究今后战斗必须采取什么形式时，他认为战斗发展良好。为了使他计划的战役建立在绝对可靠的基础之上，他需要3个先决条件：一是将各个滩头阵地连成一条连绵不断的战线；二是至今一直在盟军手中的主动权；三是在敌人积聚起足够的力量之前，在狭窄的占领区内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行政后勤系统，当然，蒙哥马利还必须考虑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天气。

6月12日，当盟军终于控制了一个宽50英里、纵深8—12英里的地带时，蒙哥马利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了。6月9日17时30分，隆美尔命令第7集团军“在维尔河至奥恩河之间的地段转入防御……反攻应推迟至一切就绪方可实施”。这一命令默认了党卫军第12装甲师于6月8日在卡尔皮克击退加拿大人的打算已经失败，默认了于同一天到达巴约地区的勒尔装甲师已溃不成军。然而，隆美尔所说的反攻始终未能付诸实施。虽然反攻计划已经到了西线装甲集群司令官盖尔·冯·施韦伯格的手中，但十分不走运的是，他的司令部的位置被盟军发现，并于6月10日晚被精确地炸中。司令部里除盖尔之外，几乎所有人员都被炸死或炸伤。而且，登普西已经得到了敌人可能进攻的警告，他下令采取反措施，对卡昂进行一次空袭，并重新部署了加拿大部队。所有这一切使灰心丧气的德军认识到，他们远不是要发动什么大规模反攻，而是要准备迎击英军的进攻。这表明蒙哥马利已在士气上和战术上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6月11日晚，美军攻陷了卡朗唐，次日上午就进入了离“奥马哈”很远的科蒙，到达了瑟勒河畔蒂伊西南几英里远的地方，即到达了被勒尔装甲师阻滞住了的英军第7装甲师的韦前方。登普西计划让第7装甲师甩开敌人，向西、向南朝科蒙运动，然后猛然折向东，快速通过维莱博卡日，插到德国

人从奥恩河直到蒂伊及其以远地区的防线的后方，因为在这条防线后面根本没有什么防御体系可言。登普西这一设想甚妙的机动，很可能形成后果不可估量的“两面包抄”，但他选错了实现计划的手段——擅长沙漠战的第7装甲师在这小树林地带的羊肠小路和树篱之中毫无用武之地。经过一番激战，该师只好于6月15日撤回到科蒙与蒂伊之间的地段。

虽然这一“挫折”不可避免地使英军感到失望，但比起德军司令部中笼罩的气氛来，这根本算不了什么，蒙哥马利已在士气上彻底压倒了敌人，迫使龙德施泰特和隆美尔把德军装甲师的主要打击力量用来进行防御，并把增援部队也部署在防线上。来自西线的消息促使希特勒于6月17日飞到马吉瓦尔，召集他的司令官们开会。对他的司令官们来说，这次会议毫无成果：不准撤退，不管是战术性的还是战略性的都不行；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允许，一个师都不能动；增援部队即将到达；不能让盟军突破，得把他们赶下海去。会议中的讨论完全是凭空想象，不切实际。会议期间，希特勒还给海军总司令邓尼兹发去一份电报说，挽回陆上局势的唯一办法是“消灭或打垮敌人的海军，特别是其战舰”。

在希特勒会见他的司令官们的第二天，即6月18日，蒙哥马利发出了一项新指示：“我们现在必须占领卡昂和瑟堡，作为全面铺开我们的计划的第一步。”那时美国人已经拓出了一条横跨科唐坦半岛的宽阔走廊。蒙哥马利准备由新到达的第8军从翼侧进行主攻，夺取卡昂南面的高地，控制进出卡昂的道路，同时在奥恩河以东发起支援性进攻，来实现其占领卡昂的意图。

然而，蒙哥马利像其他司令官一样，不得不屈从于暴风雨的威力。6月19日，灾祸从天而降。一场近半个世纪末曾有过的、风力达30节的六月大风暴，在英吉利海峡掀起滔天巨浪，上连3天3夜不停息，事故一个接一个，数不胜数，800艘船只遭毁坏、搁浅；两英里半长的钢制车道在拖曳中沉没；渡船、防波堤、仓库船，毁坏的毁坏，受损的受损；补给物资的供应，尤其是弹药的供应骤然锐减，原计划用于进攻卡昂的部队不能按时到达。于是，蒙哥马利不得不把一场即将开始的进攻推迟，东面的支援性进攻推迟到6月23日，关键的主攻推迟到25日。

6月25日开始的“赛马场”作战是英军在诺曼底实施的第一个大规模战役，刚刚登陆的第8军是攻击的主力。从一开始就参战的第30军在最右侧进行侧翼掩护，先夺取罗雷，占领罗雷—瑞维尼一线，然后向南推进。第8军的任务更重，更引人注目。它要从卡昂公路上布雷特维尔—洛格约斯以西加拿大人早就建立的阵地开始，打开一条通路，经过什窝直到奥东河，然后向东打到奥恩河，强行占领更多的渡口，最后站稳脚跟，控制从南面接近卡昂的道路，在这场艰苦的战斗中，第8军到战斗结束前只努力巩固了奥东河对岸的桥头堡。虽然再向纵深突进肯定会收益更大，但争得地盘不是“赛马场”作战行动的主要目的所在。实际上，“赛马场”作战行动给德军所造成的威胁是：德军不仅用当地的装甲部队来守阵地，而且把远道而来的师也投入防御，这样就必然在防御中把为将来的反攻准备的预备队消耗掉了。在英军第8和第30军所形成的突出部周围是德军第1装甲军（是从布鲁日拼命赶来的）、党卫军第10和第9装甲师（是从俄国赶来的）、党卫军第2装甲师（是从图卢兹长途跋涉而来的）和勒尔装甲师等部队。在英军前线，还有德军第2、第21装甲师。这样，美军就能不受德军装甲部队纠缠，自由地实施机动。结果，美军没有受到德军装甲部队的任何干扰就攻陷了瑟堡。

蒙哥马利按照作战计划，一直在诺曼底有意识地进行机动，把所有的德军装甲部队都吸引到本国部队的对面，从未有在东翼向塞纳河突破的设想。为此，当时和从那以后他受了很多批评。这些批评大多是因为对他那个简单明了而又以具有远见卓识的设想产生误解所引起的。艾森豪威尔于7月13日给英美联合参谋部的报告便是例证，报告的第32页写道：

“尽管如此，我们仍无法在东翼向塞纳河突破，敌在岗市地区集中主力阻止我们攻占这一极其需要获得的地带。不过我们的计划还是异常灵活，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这一反击，当英加部队在东翼顶住敌人时，要美军由西翼的滩头占领区痛击敌军。因此，蒙哥马利元帅指挥的第2集团军在7月应继续不断地向敌施加压力，遏制其前进。”

于是，人们的印象就是，英国和加拿大部队在东翼岗市地区失败了，所以，美军才在西翼采取行动，突破成功。艾森豪威尔对第2集团军持这种看法，便清楚地表明他对自己欣然同意过的这一基本设想并不理解。

但是，有的批评则完全出于恶意。艾森豪威尔的副手特德和英军战术航空队司令科宁厄姆由于没有得到卡昂地区的机场而几乎对蒙哥马利持敌对态度；艾森豪威尔的副参谋长摩根则因为蒙哥马利反对他在东翼的岗市—法莱兹地区进行突破的计划而怀恨在心。他们利用艾森豪威尔的错觉，对蒙哥马利说三道四，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当时，英军和美军已经登陆的部队大致相等，每家16个师。但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在这段时间里，在美军前线，德军装甲师最多时3个，最少时还不到1个；而在英军前线，最多时7个半，最少时4个。美军与之作战的德军步兵营最多时87个，最少时63个；而在英军前线，最多时92个，最少时43个。

比这些数字更有说服力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蒙哥马利的策略已经导致他的两个最高级。最有经验的敌手——冯·龙德施泰特和冯·施韦彭伯格——由于认为蒙哥马利已给他们造成了军事上难以挽救的局面而在战场上被就地免职。

所以，在诺曼底战役这一关键时刻，蒙哥马利要比他的美国同行和英国国内的某些人更为清楚地看到，战斗正沿着正确的方向朝着成功发展；而“赛马场”行动的最后一天结束时，凯特尔和冯·龙德施泰特之间著名的电话对话极好地概括了蒙哥马利的敌手们此刻的精神状态：

凯特尔：“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冯·龙德施泰特：“讲和，你们这些蠢才！难道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

6月末是诺曼底战役的重大转折点。6月30日那天，英国特遣舰队司令维安海军上将和他的美国同行柯克海军上将相继出发返回英国。这标志着“海王星”行动正式结束，“霸王”行动计划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负责海边各个滩头的级别稍低的海军军官也已撤走，在英军地段由“英军突击区海军将官”代替，在美军地段由“西线海军将官”代替，两人都常驻陆上，都是海军少将。这种从两栖作战向陆上作战的转变，标志着盟军对现已扩大了桥头堡充满信心。另外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更加强了这一信心。这实际上表明蒙哥马利6月8日宣布的3个先决条件中的后两个已经实现。

7月1日，由于大风暴雨而推迟到6月25日开始的卡昂南面大钳形攻势“赛马场”作战行动结束，这次作战没能按原先期望的那样夺到足够的地盘，但却达成了更为重要的目标——使德军装甲部队遭到了决定性失败。在此前一

天，美军在科唐坦半岛进行一次大规模进攻，最终攻下了瑟堡的大要塞及其支援炮兵阵地。此后，盟军第一艘船、英国的一艘用来扫雷的汽艇大摇大摆地进了港。这两件事的主要意义在于：第一，“赛马场”作战以后，德军再也不能用密集的装甲部队发动真正的协同进攻（希特勒后来疯狂地发动莫尔但攻势除外）；第二，美军已夺取了瑟堡，从而可以一心一意地转而向南和向西进攻。蒙哥马利的第二个先决条件“保持主动权”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保障。驶进瑟堡港的那条小船，既是7月16日开始在瑟堡港抛锚的大吨位船只的先驱，也顶示着蒙哥马利的第3个要求，即行政后勤的稳定性正在实现之中。

6月30日，蒙哥马利在向两个集团军司令发出的命令中设想，在美军方面，“可以长驱直入，毫不停留地打到科蒙—维尔—莫尔但—富热尔一线，此后继续作战将极少受阻……”英军的任务是“继续在维莱博卡日至卡昂之间牵制住敌人的绝大部分力量……同时确保我东面翼侧阵地的稳固”。

在美军开始挥师东进之前，布莱德雷首先得为他的部队找到一条合适的出击线。然而，他所能找到的任何一条出击线都必须包含圣洛这个十分重要的公路交叉点。于是，他让第7、第8军冲出科唐坦，越过沼泽地带向库唐斯挺进，其目的是将圣洛—库唐斯公路作为他意想中的出击线。但是，从7月3日开始的这一行动犹如爬行：第8军在12天中只向前推进了1.2万码，第7军也进展缓慢。布莱德雷不得不“申请”一顶大帐篷，并弄来一些木板，铺在泥泞地上，然后在帐篷中挂起地图，颇费踌躇地“运筹帷幄”起来。就在这些地图前面，他踱来踱去，整整两天两夜，终于找到了答案：把一条更靠北的公路，即从圣洛经佩里那到海岸边的莱赛这条西北走向的公路，作为出发点。而且，他还在圣洛城外选择了一块宽3.5英里、纵深1.5英里的长方形地带，建议美国空军对这块地方实施饱和轰炸，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将沿着这条能清楚地表明己方阵线的公路飞行。他的主要冲击力量将越过这块被毁灭的土地，迅速向前推进，直至发展成利德尔·哈特所说的“势不可挡的洪流”。于是，“眼镜蛇”作战计划在这顶帐篷中诞生了。经过近3个星期的艰苦鏖战，美军最后以伤亡约40000人的代价，于7月19日占领了圣洛，为“眼镜蛇”计划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7月初，出现了一些不祥之兆：7月3、4日，一些新的德国步兵师出现在前线；而7月7日，美军第83师遭到了党卫军第2装甲师的沉重打击，这个装甲师是从英军地段运动到奥东地区来的。由此可以推论，敌人正准备将其装甲部队撤离前线，重新整编，同时也说明敌人对美国人的兴趣逐渐增加。因此，蒙哥马利决定拿下卡昂，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7月7日21时50分，450架重型轰炸机对卡昂北郊的目标地域进行了一小时的轰炸。翌日清晨4时20分，第1军的步兵开始进攻。尽管实施了轰炸和掩护扫射，德军的反抗还是像预料中的那样凶猛异常，他们的防御火力又猛又准。在清除这些村庄支撑点的过程中，出现了“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粒子弹”的激烈搏斗的场面。然而，第1军终于以死伤5500人的代价于7月9日晨攻入卡昂，受到大约20000居民的欢迎。到当日晚间，除还须扫荡残敌外，该军已全部占领了该城的奥恩河以西部分，进攻到此告一段落。这一仗虽然不能算是百分之百的胜利，但它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也扫除了德国人在奥恩河以西的桥头堡，很好地达到了蒙哥马利的目的。

为了获得一条通往卡昂咽喉地带以南的东西走向的通道，蒙哥马利打算

进行下一次大的作战行动——“古德伍德”行动。此次作战的意图很简单：3个装甲师将越过奥恩河，踏上东岸，然后向南打去。在7月10日的会上，蒙哥马利向登普西和布莱德雷解释了“古德伍德”作战与“眼镜蛇”作战的关系。在7月13日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他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将于下周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第2集团军定于7月16日开始行动，逐步发展为7月18日的大战，届时第8军的3个装甲师将挥师奥恩河以东地区。请注意，日期从17日变至18日。第1集团军将用6个师的兵力于7月19日在圣洛以西约5英里处发起猛攻。需空军全力支援第2集团军（18日）和第1集团军（19日）的行动。已见到科宁厄姆并向他陈述了一切。”应该说这封电报已清楚他说明了蒙哥马利的原始意图，这就是，由美军于19日开始发动一次突破，然后向内陆突进。而英军则于前一天发动一次强大的牵制性进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古德伍德”行动比诺曼底战役的其他行动遭到了更大的误解，使蒙哥马利更加不得人心。

7月18日，盟军出动各种飞机4500架支援由第2师、警卫装甲师和第7装甲师实施的“古德伍德”作战行动。轰炸采用新的方法进行：装甲部队前进路线的两侧翼用重磅炸弹轰击，路线的近旁和前方的选定地域则使用小型高爆炸弹、杀伤弹和燃烧弹，以免形成弹坑。轰炸似乎按计划进行，然而，事态的发展却是，有些目标被灰尘笼罩，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不得不掉转机头，把炸弹原样带回；其他一些选定目标也只部分击中，在未击中的地区往往有敌人的坦克和反坦克炮。美国第8航空队投掷的1.3万枚100磅的炸弹和7.5万枚杀伤弹有一大半东飞西散，投错了地方。尽管如此，当第2装甲师过了桥向前推进时，却发现敌军士气低落，这就出现了一阵虚假的胜利气氛。时隔不久，困难局面的第一个迹象出现了：7月18日上午9时，向前推进的坦克就超出了此时还困在西岸的野战炮的射程。与此同时，出现了此后战斗过程中一直存在的状况：奥恩河和卡昂运河上的3座桥越来越拥挤，而在战斗第一线，特别是在卡尼、埃米维尔、弗雷努维尔这几个村庄中，残存的德军坦克和大炮给英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整个上午和下午，情况更为混乱，第2装甲师和警卫装甲师只有个别单位向前推进。第7装甲师到日过中天还没有离开桥，直到晚上，才有一个团投入战斗。左翼的第1军进展甚微，连特罗阿恩都未越过，直到当晚还未占领该地。右翼的加拿大人的情况似乎好一些，夺取了科龙贝勒那满是瓦砾的工厂郊区，并扫清了敌人，沿着河东岸进发，拓出了一块桥头堡阵地，开始架桥。

7月18日16时30分，蒙哥马利向帝国参谋总长发去一封语调轻松的电报说：“今日上午战斗十分顺利，空中轰炸成效显著……形势十分喜人，目前看来敌人颓势难以挽回。”这说明当时蒙哥马利消息闭塞且欠考虑。那天晚上，他发表了一份特别文告，其中提到部队时用了“突破”字样；文告结束时还说：“蒙哥马利将军对这场战斗第一天的进展感到十分满意。”此后两天中发生的情况是，经过进一步激烈的战斗，英军只夺取了布尔日比山脊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德军的支撑点穿插其间，出击线也缩短了。7月20日下午，天空雷声隆隆，倾盆大雨把战场上由于轰炸和装甲碾压造成的厚厚尘土变成了一片泥潭。这样，进攻的坦克就不能行动了。第二天，加拿大人在其位于奥恩河东岸的阵地上打退了敌人多次凶猛的反扑。实际上，在7月20日这一天，隆美尔所负责设计的防御地带经受住了考验。在同一天，希特勒向其子民们宣布，企图杀害他的阴谋已经失败。隆美尔后来因涉嫌阴谋而奉

希特勒之命服毒自杀。也正是在7月20日这一天，“古德伍德”作战宣告结束。

由于人们对蒙哥马利长远的和近期的意图的误解，也由于他自己急忙地宣布了各盟国人民和领导人所翘首期望的所谓“突破”，蒙哥马利将把柄拱手送到其反对者的手中，使自己的朋友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古德伍德”作战已经失败的消息引起了一片沮丧甚至失望，伴随而来的是蒙哥马利的宿敌们不怀好意的评头品足，说什么“我早就说过会有这种结局”。英国和美国的报刊从蒙哥马利的文告中抽出“突破”、“广阔地域”这样至关重要的词语，以通栏标题刊出，几乎无一例外地用同样戏剧性的语调来报道这场攻势已经终止的战役。在“古德伍德”作战之后、“眼镜蛇”作战计划实施前夕，《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大标题是，“盟军在法国全线受阻”。这典型地说明人们的误解和不顾事实真相已到了何等地步！

“眼镜蛇”作战行动原计划于7月19日开始，但由于通过卡朗唐沼泽地带和圣洛附近的树篱时行动迟缓，代价甚高，再加上狂风暴雨天气，轰炸机不能升空作战，进攻开始日只好往后推。7月24日，天气开始好转，轰炸机方能升空作战。但当轰炸机终于来到时，目标区域上空却又浓云密布，战斗只好再推迟24小时。不幸的是，其中一个空军大队没有收到返回的命令，投下的炸弹离目标足有一英里，落到了美军第30师的头上，尽管如此，布莱德雷还是下决心第二天继续干下去。

为了支援“眼镜蛇”作战，蒙哥马利命令加拿大第2军和第7装甲师、警卫装甲师于7月25日3时30分开始沿通往法莱斯的公路发起攻击。蒙哥马利曾严格规定，不管“眼镜蛇”计划何时开始，也不管天气状况如何，上述进攻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开始。蒙哥马利为过早地在圣洛进行轰炸而感到忧虑，并担心这一轰炸会使德国人警觉起来。他希望加拿大人的这一进攻能使敌人认为在圣洛的轰炸只不过是一次佯动。实际上，敌人正是这样想的，因此在7月24日和25日期间，许多德军装甲部队由西向东朝着奥恩河蜂拥而来，有的还越过了奥恩河。

7月25日9时45分突击开始，3000多架重型、中型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对布莱德雷选定的圣洛以西的长方形地带进行了饱和轰炸，投下的高爆炸弹、杀伤弹和燃烧弹造成了惊人的破坏。勒尔装甲师实际上已被消灭，其司令官拜尔莱因活了下来并当了俘虏。但布莱德雷有些灰心丧气，因为这次轰炸很不准确，第9师被炸，第30师再次遭殃，死伤几百人，其中包括非常能干的麦克奈尔将军。由于部队伤亡和必须重新编组，结果造成了战斗的拖延。在疮痍满目的原野和公路上，到处是“烧焦了的坦克残骸、士兵们断手断臂的尸体和腐烂发胀的死牲口”。但不管怎样，柯林斯的那个军毕竟突破成功了。到当天晚上，该军前进了两英里。7月26日，柯林斯将其两个装甲师投入了战斗，右翼的美国第8军和左翼的第5军开始成梯队向前推进。7月27日，敌人的抵抗全线崩溃。到30日，美军夺取了布列塔尼半岛的大门——阿夫朗什。德军防线一片混乱，连其后方司令员们也乱作一团。冯·克卢格不得不于7月30日亲自挑起德军第7集团军的指挥担子。但他所指挥的部队四分五裂，其幸存者混杂在一起，东奔西散，流落在乡村中，成了法国抵抗运动的猎获物。

与此同时，蒙哥马利一直在检查自己的计划。7月27日，他同布莱德雷和登普西会晤。他为美国人的胜利喝彩叫好，并指出：“其他一切地方的一

切行动都必须为着协助美国人的作战。”因此，他放弃了原先由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向卡昂和奥恩河以东继续进攻的打算。其理由是，这里的作战已达到目的，不大可能有更多的德军师团上钩。蒙哥马利指出，英国人战线上的 3 个德军装甲师都摆在中部和东面，他命令登普西在英国人战线的正西面从科蒙地区全速发动一次 6 个师的攻势。第 2 天，蒙哥马利获悉“眼镜蛇”战役进展的消息后，他告诉登普西“加大油门向维尔挺进”。蒙哥马利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命令是因为他确信，当德国人在美国人的打击下撤退时，他们首先会从科蒙开始向东，然后到达奥恩河的内陆河区，最后在卡昂和法莱斯之间的高地落脚，登普西的进攻叫作“蓝上衣”作战，于 7 月 30 日开始。它具有两个令人感兴趣的肾点：第一，各级指挥都很内行，使这次战役能正常进行。第二，如同在阿拉曼的“增压”作战和在马雷斯的钳形攻势左翼一样，“蓝上衣”作战极好地表明，从战略上说，蒙哥马利显得固执、呆板（一旦他的决心已下）；但从战术上说，一旦有突然出现的机会或遭到意外的挫折时，他却能在战斗中很快地审时度势，重新调整部署。

“蓝上衣”作战所涉及的地域最为不利，称为“小树林”地带，北起科蒙，南至维尔，东到奥恩河畔的蒂里阿库尔。该地带地形起伏，丘壑遍地，最高的是海拔 1200 英尺的潘松山脊。登普西用以发动攻击的第 8 军和第 30 军，对敌装甲优势为 3：1，但步兵所占优势不大。鉴于上述地形，虽然敌人士气低落，要取得右翼那样的引人注目的进展是完全不可能的。好几个星期以来，这一线相对平静，双方都布置了许多地雷场。因此，头两天中这两个军的情况大致相同：艰苦混战，险象环生，而且似乎有点得不偿失。然而，也不乏顺利的进展，一夜之间，第 2 装甲师在科蒙至维尔的中间、在苏勒弗尔河另一侧的贝尼一博卡日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并在这里与向英军右翼运动的第 5 军会合。

蒙哥马利的目的已经达到。德国第 21 装甲师已卷入战斗，冯·克卢格根据埃伯巴赫的建议，调动党卫军第 6 装甲军来对付登普西的主要打击。尽管有 3 个装甲师在手，但他还是怀疑科蒙是否能够守住，因此建议向塞纳河撤退。希特勒似乎也有类似想法，但他却命令：“告诉冯·克卢格元帅，他的眼睛应当盯住前线，盯着敌人，不要往后看。”

8 月 2 日，英军第 2 装甲师几乎进了维尔城，但第 30 军进展甚慢。同一天，遭到反击的第 7 装甲师差不多被迫退回到了 48 小时前据守的阵地上。这样是根本不能取得胜利的。第 30 军军长巴克纳尔曾受到登普西“不成功就滚开”的警告，这时被撤了职；第 7 装甲师师长厄斯金连同他的炮兵司令、装甲旅长一起也被撤了职。巴克纳尔的去职与精悍的霍罗克斯的到来可以说是一个巧合。霍罗克斯在突尼斯负伤刚刚复原，于 8 月 4 日接管了第 30 军的指挥权。不知是由于霍罗克斯的影响还是由于突然的鬼使神差，第 43 师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于 8 月 6 日占领了潘松山脊的各个制高点。同一天，美军终于拿下了维尔。英军第 59 师渡过奥恩河，在蒂里阿库尔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并打退了敌人的激烈反扑，守住了这个桥头堡。蒙哥马利为阻止德军撤退，计划夺取 3 个“关键地点”，现在两个已经到手，正在向第三点顺利前进。但就在这时，美国人和希特勒给他增添了许多心烦的事。

8 月 1 日，在欧洲大陆上的美军的 21 个师重新组建为第 1 和第 3 集团军，第 1 集团军由霍奇斯指挥，第 3 集团军由巴顿指挥，这两个集团军组成美国第 12 集团军群，由布莱德雷统辖。布莱德雷同蒙哥马利和登普西会商

后，于8月3日要求巴顿用“最少量的部队”夺取布列塔尼半岛，而用其余的部队向南、向东突击，扫清卢瓦尔河以北地区，然后按蒙哥马利的指示中所说的，“横扫小树林地带以南地区”。对巴顿来说，这真是梦寐以求之事。他立即着手进行“这一看来不能做但却做成功了的事”。阿夫朗什大桥那边只有一条公路，白天黑夜都处于德国空军的定期攻击之下。巴顿在72小时内已将其7个师通过阿夫朗什和这条公路。这样的前进速度一直保持到他的前卫第15军冲过开阔地带。到8月7日，巴顿的部队差不多进了勒芒。

8月7日凌晨，冯·克卢格根据希特勒的命令，用集中起来的装甲部队，取道莫尔但发动反攻，企图夺回阿夫朗什，切断巴顿的补给线。先冲过来的坦克意外地袭击了正在“休整”之中的疲惫不堪的美军第30师。但该师顽强坚守，连续战斗6昼夜，始终将敌军顶住，直到其他部队赶来增援为止。德军的反攻一刻也没有挡住巴顿的前进。他的第15军现在已从勒芒向北直指阿朗松。这样，希特勒开始担心日集团军的后侧，于是在8月15日允许冯·克卢格从莫尔但作“小小的撤退”。一天以后，巴顿给布莱德雷打电话说：“我的部队已经进入阿让唐，让我前进到法莱斯，我们要把英国佬赶下海去，让他们再尝一次敦刻尔克的滋味！”这当然不是什么开玩笑，而是有意侮辱英军。巴顿这样说的不公道的，因为当他的坦克烧着汽油在宽阔的公路上向前飞奔，掠过防护甚弱的村庄时，在北面的英国人，特别是加拿大人，却一直在困难的地形条件下与凶猛抵抗的敌人作斗争。这是巴顿在梅斯和萨尔碰上防御工事之前所未曾经历过的，在那儿，巴顿才发现了固定防御设施的重要意义，在一个月之中，他的集团军伤亡达4.1万人，相当于整个第21集团军群从进攻欧陆开始日至8月底总伤亡人数的一半。

为了扎起德军莫尔但攻势所形成的口袋口，蒙哥马利必须打通一条走廊，与从南面如潮涌而来的美军会师。于是，蒙哥马利在8月4日把攻下法莱斯的艰巨任务交给了加拿大第1集团军。从8月7日开始的这一作战行动由西蒙兹中将和他的加拿大第2军实施。该军有2个步兵师，1个装甲师，1个装甲旅，再加上英国第51高地师、第33装甲旅和刚来罗诺底的波兰装甲师。尽管在作战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并遭受了不可避免的挫折，但加拿大第2师和英国第51高地师还是在黎明前越过了防线，去夺取他们的目标。

8月14日，西蒙兹加强了对敌人的压力。那天，为了贯彻蒙哥马利拿下法莱斯的命令，西蒙兹把自己原先的计划颠倒过来，在大白天让坦克在浓烟的掩护下成“密集队形”前进，同时像以前一样，用装甲车运送步兵。这种异乎寻常的做法再次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到了晚上，加拿大人已离法莱斯很近了。

8月17日，德军后卫部队仍在顽强抵抗，掩护着溃败的其余部队源源向东后撤。前一段时间，天气恶劣，敌我双方胶着着混战在一起，盟国空军无法参战。后来乌云消散，天空放晴，英美空军便投入了战斗。

德军仍在作垂死挣扎，拼命抵抗着英、美、加、波诸军的进攻。到8月18日，他们还是撑开着一道6英里宽的缺口。可是，这时盟军的作战飞机和大炮发挥了极其强大的威力，实际上已将这道缺口封死。德军被紧紧逼入急剧收缩着的袋形阵地内。他们沿着公路，穿越田野，拼命向东逃窜。在德军力图从缺口处逃命的那6天中，他们大约有10000人惨遭杀戮，此外还有50000人被俘。在从缺口逃出来的2—5万人中，有很多人还没到塞纳河畔就

被打死了。在敌军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同时，被分割包围在其他地区的数千名德军，也缴械投降了。德军有 8 个步兵师和 2 个装甲师的人马，几乎是一个不漏地全部束手就擒。希特勒希望用来粉碎西线盟军的整个军队，已被彻底击溃。正是：面对批评心不惊，计划不变战术灵；待到敌军溃败时，谁对谁错理自明。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十七章 伟人之争

各执一词互不让，盟军锐势受损伤；
“单一冲击”被否定，“宽大正面”遭阻挡。

8月25日，盟军攻克巴黎。蒙哥马利曾因：“小心翼翼”而受到激烈的批评，但现在他发现，正是由于他的总体计划，德国人才垮得比预料的要快得多。在“霸王”计划中他们曾设想，登陆日后的90天内将占领塞纳河左岸地区，此后，在继续向前推进之前，将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停顿。但事实上，在登陆日后的第79天盟军就到达了塞纳河。美军几乎是在行进间渡过河去的，英军也紧随其后。按照原先的计划，预计在登陆日后90天，要为12个美军师提供物资供应，直到登陆日后第120天之前不会再向前推进，在登陆日后第150天才会“向埃纳河以远作一小小的推进”。然而，在9月1日，即登陆日后的第87天，却有16个美军师到了河的右岸，先头部队已在东面150英里之外。9月初，第21集团军群的绝大部分部队也越过了塞纳河。

8月26日，最高统帅部的情况简报说：“两个半月的苦战，最终使嗜血的德军伤亡惨重，支撑不住，因此，欧战结束近在眼前，几乎唾手可得。德国陆军在西线已土崩瓦解，巴黎再次回到法国人的怀抱，盟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朝着第三帝国的疆界挺进。”

但是，后勤供应带来的困难却减慢了盟军前进的速度。按照“霸王”计划的简单预计，支持沿塞纳河摆开处于静止状态的英美部队，也得充分利用布雷顿的一些港口，每天运来1.4万吨物资。然而在当时，一个港口也未到手。结果是所有的供给品都得先通过滩头阵地向诺曼底的后勤供应区输送，然后再从诺曼底通过公路运出去，或者用飞机直接从英国空运，这样，蒙哥马利不得不让他的3个军中的1个军停步不前，而且前方一点物资储备都没有。

然而，比后勤供应更为重要的是，盟军最高统帅部没有一个意见一致的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竭力推行他的全线挺进、全面出击的“宽大正面”战略；蒙哥马利则主张采用“单一冲击”战略，即在单一司令官的指挥下，集中第12和第21两个集团军群的40个师，以压倒优势兵力向北发动大规模进攻，横扫日趋崩溃的德军，从阿登高原的北面侧翼打过去，迅速占领鲁尔区，最终夺取柏林。

在诺曼底战役最后阶段战斗结束之前，蒙哥马利就已拟好了“单一冲击”计划，并于8月17日飞赴布莱德雷的司令部，向他谈自己的计划。布莱德雷当即表示完全同意，8月20日，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指挥所召开参谋人员会议，商讨今后作战设想。蒙哥马利派德·甘冈去出席这次会议。会上主要作出了两项决定：1.从9月1日起，指挥系统有所变更，由艾森豪威尔亲自指挥各集团军群；2.第12集团军群应直捣梅斯和萨尔，在那儿与龙骑兵会师。蒙哥马利不同意这些决定，就让德·甘冈带着他的便条去说服艾森豪威尔。结果，蒙哥马利的意见被否定了。于是，蒙哥马利决定面见艾森豪威尔，就邀他8月23日前来共进午餐。艾森豪威尔欣然同意。

蒙哥马利希望在和艾森豪威尔见面之前，再同布莱德雷谈一次，便于23日一早飞往布莱德雷的司令部，但使蒙哥马利吃惊的是，布莱德雷已改变主意，而全力支持他的集团军群向东往梅斯和萨尔方向挺进，于是，蒙哥马利

马上返回自己的作战指挥所，以便及时与艾森豪威尔会晤。

在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参加会谈之前，蒙哥马利与艾森豪威尔单独谈了1小时。蒙哥马利说：“应该决定主攻方向并在主攻地区保持强大的兵力，以便迅速获得决定性战果……必须把汽油和弹药集中在经过选择的突破线后面，若在全线平均分布，战事无法定局……若采用全线挺进、全面出击的‘宽大正面’战略，那么，挺进就不会有力，最后非停止不可，德军就有喘息的机会，战争将拖到整个冬季，甚至到1945年。”然后，他向艾森豪威尔谈了他提出的、布莱德雷原先已经同意了的计划，并指着地图，详加标述，说明这样做，获胜的可能性很大。

同时，蒙哥马利还告诉艾森豪威尔，作为最高统帅，他不能把自己降为地面部队总司令投入地面战斗。最高统帅应运筹帷幄，对涉及陆海空三军、行政管理、政治问题等整个错综复杂的全局了如指掌。陆地战斗可由别人代替他指挥。他们在诺曼底就是因为有了统一而不分散的地面作战指挥，才打了大胜仗。这一点十分重要。但考虑到美国舆论，可以请布莱德雷负责地面战斗的统一指挥，他本人乐于当他的副手。

但无论蒙哥马利怎么说，艾森豪威尔仍然顽固地坚持一种钳形攻势：一路沿蒙哥马利所竭力推崇的北线冲击，另一路向东，向阿登高原以南冲击，最终目标是由萨尔进入德国。蒙哥马利无法说服艾森豪威尔让美军停下来，以便为北面的40个师的进攻保障物资供应。艾森豪威尔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也只不过是向蒙哥马利提供一点有限的增援部队。此外，艾森豪威尔还拒绝了蒙哥马利要再设地面部队总司令的主张。

蒙哥马利的争辩毫无结果，“宽大正面”战略势在必行。蒙哥马利虽不信服，但照例服从了，还因为他现在仅处于和布莱德雷同样的地位。

正当他陷于这一纠纷并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于8月31日晚收到了首相的一封信。信上写道：“非常高兴地通知阁下，经我提议，英王陛下极为愉快地批准，自9月1日起晋升阁下为陆军元帅。王室对阁下亲临法国指挥这场值得纪念的也许是决定性的一战所建立的卓越功勋，深表嘉奖。”

这是蒙哥马利在战争期间第二次在战场上晋级提升。第二天早上，英国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发布了这个消息。艾森豪威尔立即向蒙哥马利发去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这多少使他心里好受了些。当蒙哥马利越是想到应该动手做些什么时，他就越感到“宽大正面”战略不对头，因为它违反了集中兵力的原则，意味着更多的伤亡和战争的拖延。但英国的经济和人力状况要求盟军在1944年就取得胜利，不能再拖。因此，蒙哥马利决心说服艾森豪威尔接受他的“单一冲击”战略。由于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在“单一冲击”战略还是“宽大正面”战略这两个针锋相对的方针上的争论，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好几个月一直不好。那么，蒙哥马利的“单一冲击”战略究竟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在德国人被赶出诺曼底之后的那些日子里，似乎可以肯定，第三帝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德军第7集团军的人员和装备的损失非常巨大，要在节节胜利的盟军和德国边境之间筑起一道强大的屏障是难以想象的，盟军的40个师一齐出动，可以说是一支无坚不摧的力量。毫无疑问，伦敦对蒙哥马利的战略是完全赞同的。在伊斯梅左右工作的伊恩·雅各布爵士从公正的立场看问题，他认为“当时所有在伦敦的英国人都觉得，正确的战略是在鲁尔的北面进行单一冲击，进入德国北部平原，其他各线停止不动”。

尽管蒙哥马利的设想在军事上百分之百地可行，但在政治上却是绝对地

不可行。8月23日，艾森豪威尔在与蒙哥马利谈话时会一语道破天机。他说：“美国公众对这种做法绝对不会赞成，而舆论足以赢得战争。”不仅美国公众不赞成，也很难想象罗斯福、马歇尔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会同意这种似乎是背叛的行为。虽然艾森豪威尔曾不止一次地提醒蒙哥马利注意，但他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在高层战略中，政治因素有时会与纯军事考虑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因遭到挫折而闷闷不乐的蒙哥马利决心进行一次作战以表明他也能像巴顿一样迅速前进，结果，蒙哥马利的坦克部队在一周之内向东横扫了250英里。在地图上用粗大的箭头表示的冲杀看起来的确很壮观，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大部分进军都是机械化奔驰，同美国人大踏步前进的情况一模一样。当警卫装甲师于9月3日突入布鲁塞尔、第11装甲师于9月4日冲进安特卫普时，在那些对战争厌倦透顶的居民中引起了狂喜。这两个师遇到一些局部抵抗，不过，这已丝毫称不上是一条战线了，德国人已无力建立战线。一切显得轻松愉快，令人振奋。在这些大都市的街道上，酒液飘流，人们热烈拥抱、亲吻解放者。

这是英军及其统帅欣喜若狂的时刻。然而，在一片狂喜之中却有两个人及时看到了此时应该做些什么事。一个是艾森豪威尔的海军上将伯特伦·拉姆齐爵士。就在第11装甲师突入安特卫普并完好无损地夺取了码头的那一天，拉姆齐向盟军最高统帅部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这份电报的抄件马上分送第21集团军群、英国海军部和英国海军总司令诺尔。拉姆齐的电报写道：“一、若要安特卫普和鹿特丹港很快开放，必须阻止敌人：1.进行破坏；2.在斯海尔德河和鹿特丹至荷兰湾之间的新航道中布雷并实施封锁。二、安特卫普和鹿特丹港极易被布上水雷，遭到封锁。若敌人的行动得逞，开通上述两港所需的时间将无法估计。”另一个人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及其参谋部立即觉察到，通往安特卫普的航道与占领这个城市本身同样重要，因此他下令通过布雷、炮击和派兵，使斯海尔德河不能通行。在这一点上，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的反应都非常迟钝。

如果蒙哥马利要使自己北面的集团军群得到所需要的供应，那他就应该立即看到，要是没有安特卫普，就根本不可能将重型武器运到欧洲。从这一点和其他重要方面看，蒙哥马利本应像拉姆齐和希特勒那样认识到斯海尔德河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不能利用安特卫普就意味着胜利无望。然而，他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艾伦·布鲁克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在10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这一次蒙蒂的战略出了毛病，他首先应把安特卫普稳拿在手，而不应首先向阿纳姆方向推进。”

实际上，蒙哥马利本人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其《回忆录》中写到：“我必须承认我铸成了一个大错，我低估了打开通往安特卫普的航道以自由利用该港口的困难。我以为，在我们扑向鲁尔时，加拿大集团军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事实证明我错了。”他确实错了，因为第11装甲师虽然于9月4日完好无损地夺取了安特卫普城和港口，但直到11月28日，盟国的船只才靠上了安特卫普的码头。

9月9日，伦敦通知蒙哥马利说，前一天英国遭到V-2火箭的攻击，估计火箭是从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附近发射的，问他何时能攻下这一地区。由于提出了这个问题，进攻阿纳姆一带就显得十分必要、十分紧迫。9月10日上午，蒙哥马利召集登普西和盟国第1空降军军长布朗宁开会，讨论挺进阿

纳姆的作战计划。但他知道，要发动这次战役，给养是个大问题。

9月10日下午，艾森豪威尔应邀飞到布鲁塞尔会见蒙哥马利。由于他的腿行走不便，蒙哥马利便到他的座机上与他会谈。会谈中他俩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蒙哥马利极力主张在北面搞单一冲击，他说，必须在布莱德雷和他的计划之中选择一个，予以“支持”；若要两者兼得，就不可能迅速取得决定性效果。艾森豪威尔则反复说明，应首先逼近莱茵河，摆开阵势，正面横渡莱茵河，只有到了那时，才能集中兵力于一个进攻方向。蒙哥马利的口气十分急切、激动，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以友好而又合作的语气对他说：“镇静些，蒙蒂，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我是你的上级。”蒙哥马利回答说：“对不起，艾克。”最后，艾森豪威尔同意，第21集团军群应尽早向北朝阿纳姆进军，他承认，这个方向的作战若能成功，将为今后的行动打开局面。

9月11日，蒙哥马利给艾森豪威尔发去电报说，由于目前的给养状况，第2集团军和空降军北向马斯河和莱茵河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最早不可能在9月23日甚至9月26日之前进行。发出电报的第二天，比德尔·史密斯即奉命前来，说艾森豪威尔已决定按蒙哥马利的建议行动，决定停止萨尔方向的挺进，3个美国师的车辆也全部集中，用作担负第21集团军群的物资供应。第12集团军群的大量后勤支援将给予蒙哥马利右翼方面的美国第1集团军，并同意蒙哥马利直接同该集团军指挥官霍奇斯打交道。

得到这些允诺之后，蒙哥马利和登普西重新审订了计划，并把阿纳姆作战行动（其代号为“市场花园”）发动的日期定在9月17日。

“市场花园”行动计划要求空降部队组成“地毯式”进攻，越过五大河流的障碍（这些河流都穿过从埃因霍温到阿纳姆的公路干线）；霍罗克斯指挥的第30军沿着这条“地毯”的轴线进攻，同阿纳姆地区的英第1空降师汇合，在该地以北的下莱茵河对岸建立桥头阵地；然后，第2集团军在阿纳姆至须德海地区向东进击，以便向鲁尔北翼发起进攻；在第30军沿着空降师的“地毯式”进攻轴线北上时，其他两个军，即东边的第8军和西边的第12军，应扩大前进轴线的两侧。

1944年9月17日，“市场花园”行动按时进行。盟军经过短时间的航空火力准备和10分钟的炮火急袭后即发起冲击，突破敌人防御前沿，至当天晚上向纵深推进了10公里。

空降部队于中午降落。第101和第82空降师的部队只遇到敌人微弱的抵抗。日终前，第101空降师在埃因霍温以北地域设防固守，第82空降师在警卫装甲师的协助下，占领格拉维附近的大桥并为夺取奈梅根附近的一个渡口而进行战斗。英军第1空降师在阿纳姆地域遇到德军的顽强抵抗，未能占领下莱茵河上的渡口。

9月18日，从正面进攻的部队向北推进，绕过埃因霍温，和第101空降师会合。9月20日日终前，他们进至奈梅根地域。在两翼进攻的第8和第12军进展缓慢。英军第1空降师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因得不到从正面进攻部队的支援而陷入困境。9月24日晚，蒙哥马利收到第1空降师从阿纳姆发来的电报：

“特向你告急，若9月25日清晨尚不能靠扰我们，我们就无法支持下去。全体官兵已精疲力尽。缺粮缺水，又缺武器弹药，高级军官伤亡惨重，……即使敌人发动轻微攻势，也将一触即溃。如果真出现此种局百，则唯有命令所有部队从桥头阵地突围，以免束手待俘。目前，任

何敌前行动，已均不可能实现。我们已竭尽全力，并将继续奋战，尽力坚持下去。”

由于第 30 军无法靠拢他们，蒙哥马利使命令该师残部于 9 月 25 日晚撤至阿纳姆的下莱茵河，进入英军防地。该师 2000 多名官兵向甫突围成功，于 9 月 26 日与自己的军队汇合。大约 2000 名无法行动的伤员随同医生、护理人员留在那边，后被德军俘虏。全师营长除一名生还外，均告牺牲。全师总共伤亡 3716 人。

9 月底，英军第 2 集团军在下莱茵河南岸阿纳姆以西转入防御。至此，“市场花园”进攻作战遂告结束。

10 天内，英军向纵深推进了 80 公里，并将突破口的正面扩大到 25—40 公里。但是，战役的目的并未达到。

阿纳姆战役没有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艾森豪威尔负有一定责任，因他曾答应保证后勤供应，然而并未实现；他也曾答应以美国第 1 集团军掩护蒙哥马利的右翼，结果也未兑现。这样，蒙哥马利不得不动用他极其宝贵的运输力量来运送第 8 军去填补这个空隙。其次，盟军，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本人，把空降突击从 9 月初推至 9 月中旬，这实际上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一推迟使德国人有时间拼凑起第 1 伞兵集团军，在斯图登特的指挥下，封闭了北面的德军第 15 集团军和甫面力图挡住巴顿的杂七杂八的几个德军师之间的战线。再次，情报出现错误：盟军没有发现，德国最勇猛顽强的将军之一莫德尔此时正好在该作战地区，而在俄国和诺曼底半岛经历过考验的党卫军第 2 装甲军已就地恢复元气。更糟糕的是，在阿纳姆战斗发生前几小时，斯图登特从击落的一名美国军官身上缴获了一份地图，从而掌握了盟军的作战计划。最后，空降部队在阿纳姆的降落点离大桥太远。第 1 空降师师长厄克特原来是一位步兵旅长，根本不懂如何实施空降突击。他向皇家空军请教，结果他被告诉说，由于阿纳姆大桥周围有德军高射炮群，所以不能在那里空降。于是，他把空降地点选择在离第 1 空降师必须降落的大桥好多英里远的地方。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一是空中支援计划的错误，使投入战斗的空降部队得不到战斗机的支援。本来战斗机应该为他们提供保护伞，但由于一个令人遗憾的误会而未做到。空中支援计划中有这样一句话：“凡是空投、空降的地方，战斗机都得与之保持距离。”这句话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二是通讯完全失灵。在关键的开头几天里，无论是同空降作战司令部一起错误地飞到荷兰去的布朗宁，还是第 2 集团军和白厅，都没有收到莱茵河对岸部队的任何消息，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三是第 30 军的冲击线是一条时时遭到翼侧攻击的公路。过了瓦尔河上的大桥，这条公路的路基很高，使警卫装甲师成了敌 88 毫米大炮的靶子。登普西原打算在奈梅根与阿纳姆之间的埃爾斯特空投一个伞兵旅，以便控制这条无遮掩的公路，却没有足够的飞机。四是气候条件不好。行动开始后气候就不好，无法降落很多人员。

尽管有这样一些原因，但蒙哥马利还是认为：“如果这次战役一开始就得到适当的支持，给予必要的飞机、地面部队和后勤给养的话，那么，尽管有我的过错、不利的气候以及在阿纳姆有敌之党卫军第 2 装甲军等等，这次战役还是能够成功的。我将继续为‘市场花园’行动当个顽固的辩护人。”

阿纳姆战役结束之后，艾森豪威尔在 10 月 8 日给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的命令，仍然规定两个集团军群的计划“应在人力许可的情况下，把尽速挺进

到波恩以北的菜茵河一线作为首要任务”。但艾森豪威尔似乎突然认识到了安特卫普的重要性，并于10月9日指示蒙哥马利“把打开安特卫普港当作头等急事”，甚至强调指出，“在北面翼侧再掌握一个大港口是最终攻入德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实际上，蒙哥马利在10月8日便与马歇尔、布莱德雷、霍奇斯进行了协商，并于次日发出了一份重要的但却是小心谨慎的命令。命令一方面强调安特卫普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着重阐述扫清莱茵河西岸敌人的必要性。这项命令发出之后，蒙哥马利于10月15日收到艾森豪威尔10月13日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对他10月10日提出的一份文件以精心的措词进行了坚定的批评。蒙哥马利的文件题为《关于西欧战场指挥问题的一些意见》，其口气一看便知是故意找别扭，不愿服从。文件结尾处再次提出那似乎已被人忘却的问题，即进行“单一冲击”，设置单一地面指挥官：

“十五、我并不认为我们目前的指挥与控制体制是十分完善的。

“十六、很可能是一些政治的和民族的考虑使我们不能有一个健全的体制。如果是这样，我建议我们不妨直言不讳。我们不要装得一切皆好，而实际上差得很远。”

艾森豪威尔的回答是寸步不让（参见《西线的胜利》第2卷，第88页），并强调指出，“这里不再是诺曼底滩头！”蒙哥马利只好这样回答：“我不会再向您提及指挥权的问题。”接着，他给第21集团军群又下了一道关于扫清安特卫普航道的指令，但这时已为时太晚，因为奉命向斯海尔德河进发的加拿大人面临的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一场旷已持久、血肉横飞的战斗。他们不得不一个堤坝、一个堤坝地顽强地向前推进。最后，当英国皇家空军用炸弹炸破瓦尔赫伦岛的水上防御工事，当皇家海军用150艘各种各样的小船和27艘装备有大炮、火箭的轮船在韦斯卡特佩勒把第4特种勤务旅送上岸时，伤亡人数令人毛骨悚然。在死伤的1000人中，仅支援中队就有170人战死，200人受伤，27艘船中有20艘已不能再用。若是早一点动手，代价肯定会小得多。

由于加拿大部队的浴血奋战，盟国第一批船只终于在11月28日靠上了安特卫普的码头。于是艾森豪威尔要求，北面的主要行动应当确保横渡莱茵河，占领鲁尔，深入德国。与此同时，如有可能，应准备从萨尔继续前进，并在盟军右面的战线进行配合作战。然而，“宽大正面”上的进攻始终受挫，最明显的是在美军战线上，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进攻许特根森林的作战尤其如此。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激烈的战斗之一。

9000名美国人患了战壕足病、战斗疲劳症和所谓的“呼吸系统病”，2.4万人战死、被俘或失踪。美官方史学家称这次作战为基本上无成果的战斗，是早就应当避免的。

11月28日那天，艾森豪威尔来到宗霍温蒙哥马利的作战指挥所，与蒙哥马利促膝长谈。蒙哥马利坦率他说，盟军处境不佳，并且认为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在战术行动方面欠“平衡”，于是建议巴顿的一些师往北开去，并取消巴顿在南边发动的攻势，以恢复战术平衡。艾森豪威尔很快将蒙哥马利的意见转告了布莱德雷。

12月3日，布莱德雷写信给蒙哥马利、列举了多种理由，说他不能那样做。

结果，更大的混乱接踵而至。令人费解的是，在这几个星期中，英美军队中的许多情报机构竟然都未曾发现德国人一个新建装甲集团军的踪迹，对

其未来的进攻重点也茫然无知。

到1944年9月，德军最高统帅部已经明白，盟军不能立即突破“齐格菲”防线，而自己则能在这一地区阻止盟军前进。于是，决定在西线实施反攻，企图以出其不意的突击，击溃战线北段的盟军，迫使英美单独媾和。

在盟军战线北段作战的是第21集团军群，共15个师。在中央地段作战的是第12集团军群，共31个师，第9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的10个师集中在亚琛以东。只有第1集团军第8军的4个师在阿登山区宽115公里的地段进行防御。其中有1个师刚从美国抵达，有两个师的人员武器没有完全补足。由于盟军决定由亚琛向北方以及经阿尔萨斯向南方实施强大突击，从而大大地削弱了战线的中段。于是，德军决定利用盟军防御中的薄弱环节，在阿登山脉地段向安特卫普实施突击。

9月25日，希特勒头脑中酝酿已久的“拿破仑式”设想变成具体的紧急作战要求了。他把指挥官和作战参谋叫来开会，告诉他们说，他的新建装甲集团军必须突入阿登高原，跨过默兹河，扑向安特卫普。他说：“如果一切进展顺利，这次进攻将消灭20—30个师的敌人，这将是另一次敦刻尔克。”陆军元帅冯·龙德施泰特取代克鲁格担任了西线总指挥，他对希特勒的计划公开表示怀疑。但希特勒又一次控制了他的将军们，要求他们对这次代号为“守卫莱茵河”的战役进行积极准备，把执行这次作战行动的第6装甲集团军秘密集结起来。

蒙哥马利承认，与盟军最高统帅部一样，他也未能清楚地预见到艾森豪威尔的“宽大正面”战略的这一特殊后果，即为了保持一条宽大正面的战线，就必然要冒在某个地域部署薄弱的风险。不管愿意不愿意，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恰恰就在德国人所要打击的地方承担这种风险了。

12月16日早上，蒙哥马利感到需要休息，就乘他那架迈尔斯小飞机去埃因霍温同著名职业高尔夫球手戴·里斯打高尔夫球。里斯当时在那里作空军大队长的汽车司机。出发前，蒙哥马利请空军大队长准许里斯到球场接他，并陪他打球。当他的飞机在球场降落时，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于是他们开始打球。过了不久来了一封电报说，那天早上，德军向美第1集团军正面发起强攻，情况不明。于是，他停止打球，告别里斯，直飞宗霍温作战指挥所。

德军攻击矛头直指第1集团军正面，即兵力薄弱的第8军守卫的阿登地区，结果在美军防线上顶出了一个相当大的突出部位。

局面迅速恶化，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被一分为二。他的总部在卢森堡，当时他已指挥不了在北面的那一半集团军群了。蒙哥马利通过联络军官组与战况保持联系，并采取了一些措施确保第21集团军群右翼和右后方的安全。

12月20日晚10时30分，艾森豪威尔从总部挂电话命令蒙哥马利立即负责统领突出地带北翼所有的美国部队。这个命令把美国的两个集团军（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和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置于蒙哥马利的指挥之下。

第二天上午，蒙哥马利向前来开会的登普西和克里勒下达命令之后，于中午飞往美国第1集团军总部，并要辛普森前去见他。蒙哥马利发现突出地带北翼情况混乱，于是马上采取措施：把英国部队置于第9集团军统辖之下，和美军共同作战，并要该集团军接管第1集团军的某些阵地；在美军预备队组成之前，把英军配置在第1和第9集团军后面，充当预备梯队。经过这番处置，情况渐趋稳定，最后终于恢复正常。

尽管德军的进攻取得了出敌不意的效果，但它的反攻计划在战役的头几天就开始落空了。

12月18日，希特勒对原先的企图作了重大修改，取消了原定从亚琛以北地域向西实施突击的计划。

12月19日，艾森豪威尔在凡尔登召开会议，决定对敌人进攻集团的两翼实施反突击，集中全部力量粉碎德军在阿登山脉的反攻。

12月21日，盟军转入反攻，巴顿的第3集团军从南面向突出部发起强大进攻。但一开始由于缺乏航空兵支援，进展缓慢，12月23日，天气好转，掌握绝对制空权的盟国空军开始对德军采取积极行动。

12月23日以后，美军部队加速推进。

12月26日，其先头部队同被围困在巴斯托涅的第101空降师会合。

由于盟军指挥部采取了紧急措施，德军已无法向安特卫普发动进攻。

12月28日，希特勒在大本营讨论阿登战役的会议上，承认进攻已经失败。

由于美军在阿登战役的最初几天未进行认真的抵抗就开始毫无秩序地退却，而且在有些地段，这种退却变成了狼狈的溃逃。因此，英国报纸对文森豪威尔大加抨击。这种情况使蒙哥马利非常不安，于是他给首相打报告说，他打算向英美记者谈谈这次战役，以表明盟军如何一致响应号召，如何一致合作共事，扭转了这一颇为棘手的局面。首相认为他的建议很有价值，同意了他的意见。

于是，蒙哥马利于1945年1月7日在战斗中召开记者招待会。对此，报道很多，他在会上的讲话，也被各报广为引用和发表。德国人迅速而又巧妙地辑录了他的讲话内容，把它改写成为一篇带有反美倾向的报道，并由当时掌握在戈培尔手中的阿纳姆电台广播。布莱德雷总部的监听站把它误认为是英国广播公司播送的，于是这篇精心歪曲了的讲话稿便引起了轩然大波，对盟国的团结造成了灾难性影响。

蒙哥马利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的讲话确有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因为在他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接着战局开始恶化。但盟国部队齐心协力对付这一危急局面，大家都把狭隘的国家民族观念撇在一旁，艾森豪威尔将军命令我指挥整个北部战线。我调用了英国集团军群全部可用的力量……最后，英国部队猛地一举投入战斗。目前，英军各师正在美军第1集团军右翼奋勇作战。这样，你们就可以看到英军正在受到沉重打击的美军左右两翼作战。”这些话似乎在暗示：是他把自己的师团投入拦阻阵地，保持镇静而清醒的头脑，在美国人的北侧保持一个坚不可摧的壁垒，在默兹河西岸建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保证了阿登战役的胜利。

令人奇怪的是，蒙哥马利竟会在1月7日自讨苦吃地搞这样一个记者招待会，因为仅仅一个星期以前，由于他不断向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要求实施“单一冲击”战略，任命单一的地面部队指挥官，他自己的军事生涯受到了极其严重的考验。

1944年12月30日，马歇尔电告艾森豪威尔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作出任何性质的让步。你不仅得到我们的完全信任，而且，如果你作出这一让步，将会在国内引起极大的愤慨……”这就是最后的定论，与艾森豪威尔常常力图使蒙哥马利认识到的没有什么两样。此时此刻，文森豪威尔的忍耐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他的一帮顾问们也竭力唆使他和蒙哥马利一刀两断，于

是他在给马歇尔的一份电报中便使用了“有我无他”（指蒙哥马利）的话语。德·甘冈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急忙赶到凡尔赛，求得一点回旋、喘息的时间，然后又冒着漫天大雪飞到他的上司身旁，说服已经茫然不知所措的蒙哥马利给文森豪威尔写了一封语气柔和的信，在一切行将失去的时候挽回了局势。

一切都暂时地平息下去了。然而，随着冬天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愈来愈清楚的是艾森豪威尔的“宽大正面”战略收效甚微，美军和英军沿着莱茵河或在其附近的小规模零星战斗也没有多大进展。盟军参谋机构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最后在1945年1月末在马耳他举行了最高级会议，达成了一项妥协方案。双方都作出了让步，文森豪威尔的意图于2月1日在马耳他得到了批准。他说：“您们请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放心，我将在北面立即夺取莱茵河渡口，这一作战是完全可行的，无须等到封锁整个莱茵河后再进行。而且，在渡过莱茵河之后，我将在北侧用最大力量向前推进，一旦南方局势允许我集结所需的部队，并且不会因此招致过大的风险，我将实施我的决心。”这是蒙哥马利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也许比他应得到的还多一些。这样，就为英联邦军队在西北欧的倒数第二次大规模作战行动——“诚实”作战行动打开了道路。正是：战略不同难协调，盟军北进战果少。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十八章 最后一战

盟军强渡莱茵河，向前挺进困难多；
谈判桌上巧施压，德军投降战幕落。

蒙哥马利在进行欧洲最后一战之前，还进行了“诚实”作战。“诚实”作战是由加拿大集团军从帝国森林向南发动的一次攻势，目标是攻克莱茵河以西的全部地区。

2月8日，蒙哥马利向奈梅根以东的帝国森林发起“诚实”作战行动，加拿大集团军依托莱茵河向南进击，直至克桑滕—芬洛一线。2月23日，美国第9集团军进行“手榴弹”作战行动，夺取了控制罗尔河谷的水坝之后，向北压过去，以实现同加拿大集团军的连接。

“诚实”是一次非常激烈的作战行动，它的另一个名字是“帝国森林”之战。在“诚实”作战行动的1个月中，加拿大集团军虽然遭到1.5万人的伤亡，但蒙哥马利及其部队却达到了目的。希特勒再次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强令其部队背水抵抗。到1945年3月初，“诚实”作战行动和“手榴弹”作战行动打垮了德军19个师，使之伤亡达90000人。莱茵河西岸的德军已被扫清，向东挺进的大道已经打通。

到3月10日，美第9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群已在莱茵河西岸从诺伊斯到奈梅根一线摆开阵势，河上所有桥梁均已被摧毁。与此同时，美第1集团军于3月7日完整地拿下了雷马根的铁路桥，并立即在东岸建立了桥头堡。到3月的第三个星期，盟军已在南起瑞士北至北海这条漫长的战线上，全部逼近莱茵河。

关于“地面部队指挥”的问题，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已在1944年12月31日的通信中达成了谅解，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艾森豪威尔亲自指挥两个集团军群，但将美第9集团军置于蒙哥马利的指挥之下，并把主攻方向放在北线；一旦与布莱德雷就两个集团军群的作战地域线出现分歧，蒙哥马利有最后决定权。

但是，这个问题在1945年2月又再次提出，而且是由首相提出来的。伦敦当时认为，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可以分担艾森豪威尔指挥地面部队的责任，而特德则不能。丘吉尔和布鲁克曾私下征求蒙哥马利的意见，蒙哥马利回答说，如果亚历山大参加最高统帅部，一定会在报界和美国将领间引起一场风波。然而，伦敦方面的意见还是向艾森豪威尔提了出来。

于是，艾森豪威尔要蒙哥马利在他们的两个总部之间的合适地点碰头。2月4日，他们在蒙哥马利过去的作战指挥所宗霍温见面。艾森豪威尔要蒙哥马利谈谈对目前指挥系统的意见。蒙哥马利说，他对目前的指挥体系感到满意。艾森豪威尔听后非常高兴。

3月1日，艾森豪威尔再度访问蒙哥马利，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关于“不要”特德而“要”亚历山大的事，统统告诉了蒙哥马利，并要他谈谈自己的看法，蒙哥马利说：

“一、盟军已渡过了惊涛骇浪的困难时刻。

“二、而今已风平浪静，战争结束的曙光就在眼前。

“三、若目前任命亚历山大为最高副统帅，会使美国方面某些人士牢骚满腹，又会刮起一阵风暴，把原来那些分歧又都重新提出来。

“四、为了把事情办好，应不惜一切代价、堵塞产生分歧的源头。我们快要取得对德作战的胜利了，亚历山大还是留在意大利为好，让特德以最高副统帅的身份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

艾森豪威尔完全同意蒙哥马利的见解。

3月2日，首相丘吉尔来到蒙哥马利的指挥部，于是蒙哥马利向他汇报了他同艾森豪威尔谈话的经过。首相听后不怎么高兴，立即到艾森豪威尔那里去了。3月11日，首相致函蒙哥马利称：“事情已经结束。”

盟军全线逼近莱茵河后，便准备强渡莱茵河。蒙哥马利为第21集团军群强渡莱茵河进行了精心的筹划。在开始制定渡河初步计划时，蒙哥马利就是把渡河作为最终打败德国人的开端来计划的。一向以小心谨慎著称的蒙哥马利，此次尤其如此。其原因是：第一，如果要渡河，他决心做到不仅确有把握渡过去，而且还要大大向前推进。第二，除了他那时时萦回于脑际的从北面直捣柏林的想法外，他还有一些政治因素需要考虑。英国的目标是确立其在德国北部的存在，解放荷兰、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在俄国人向西渗透之前占领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港口。所以，他不仅要确保成功地渡过莱茵河，而且还要保证部队跟得上，站得住，这样才能把英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即其部队）放到棋盘的正确位置上。

为了确保强渡莱茵河万无一失，蒙哥马利把欺骗的技巧运用到无与伦比的境地。他做到了在伪装的掩护下，将大量人员、装备运到暴露的沿河一线而不被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在阿拉曼所用过的办法的重演：让敌人知道进攻点，但看不见进攻者。下述统计数字表明蒙哥马利当时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11.8万吨各种各样的供应物资必须秘密屯集；发起进攻前的第一周中，662辆坦克、4000辆坦克运输车和3.2万辆其他车辆必须大部分在夜间进入阵地；皇家海军的36艘登陆艇也要通过欧洲大陆的公路运来。美国集团军屯集了不少于13.8万吨弹药。除此之外，为了防止在阿纳姆发生过的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在直接支援方面的错误，需要就3月24日上午从英格兰飞来的英国第6空降师和从巴黎地区飞来的美国第17空降师的空降作出复杂的安排。3月23日夜，当3500门大炮向莱茵河对岸轰击以掩护蒙哥马利精心筹划的突击时，上述一切都已顺利完成，其他许多辅助工作也进行得十分协调。当然，如果没有空中优势这一决定性因素，这种协调肯定会遭到破坏。只有引起敌人的注意，才更容易欺骗敌人。

在横渡莱茵河前，蒙哥马利对部队的后勤状况作了一番检查，情况良好。汽油、武器弹药和粮秣供应均极充足。部队健康状况极佳，发病率平均每周每千人不到6.75人。整个冬季战役中，患战壕足病的总共才201起。3月23日，蒙哥马利发布致集团军群全体官兵的信。当天晚上，蒙哥马利以美第9集团军为右翼、英国第2集团军为左翼，在莱茵贝格到雷斯这一宽大正面上强渡莱茵河。加拿大集团军则在雷斯以北的左翼执行重要任务。3月23—24日的强渡莱茵河，是英军最后一次将堆积如山的武器装备和成千上万的士兵投入一个以英军占优势的有限战场作战，是蒙哥马利作为一个统帅的光辉杰作，也是那些在他指挥下忠诚战斗的部队的壮举。不知是出于偶然的机遇，还是出于有意的安排，3月23日夜渡莱茵河的两处主要突击行动都是由第51苏格兰高地师和第15苏格兰师进行的。

3月24日清晨，首相丘吉尔来到蒙哥马利的作战指挥所，观看这最后一

场“大表演”。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圆满的收场，从 1940 年起他就为之奋斗的一切现在在他的眼前实现了。丘吉尔对他的将军们总是毫不留情的，常同他们作对，但蒙哥马利幸存下来了，而且现在能在这里请他登上一条船，将他送到一个他一直梦想着将其毁灭的国度。

3 月 26 日，丘吉尔返回伦敦时，在蒙哥马利的纪念册上留言道：

“莱茵河及其一切要塞的防线已为第 21 集团军群越过。这些防线是屏障德国重重大门的枢纽。它们再次证明，若无据险奋战的手段和精神，一切天险和人为的防御设施，都是可以攻破的。

这支不久前还是主宰欧洲的军队，遭到了打击，在追兵面前溃退了，对于来自远方、战斗出色的士兵说来，在引以为荣和忠于职守的统帅领导之下，目标就在眼前。乘胜前进，夺取最后胜利。

温斯顿·S·丘吉尔”

蒙哥马利这位军事天才，使强渡莱茵河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大量的人力、物力带来了决定性胜利，而且损失极小。物资并没有浪费，兵力得到了合理使用。到 3 月 27 日，他的几个集团军已越过了莱茵河，建立起宽 35 英里，纵深 20 英里的桥头堡。英国第 2 集团军伤亡 3968 人，美军伤亡 2813 人。但是，已建立的立足点异常稳固，俘敌 1.6 万多人。就像在诺曼底一样，蒙哥马利取得了当时条件下所必须取得的胜利，没有出什么差错，现在英军已顺利地越过了莱茵河，美国人也以压倒优势的力量过了河。在东面，俄国人正在迫近柏林的大门，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蒙哥马利根据盟军计划作出的反应是，尽快尽远地向东挺进，第一步，到达易北河，第二步，向柏林推进。因为艾森豪威尔在 1944 年 9 月 15 日写给他的信中就指出：“柏林显然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因此，我认为，应集中全力迅速向柏林发动强攻，这是毫无疑问的。”为此，蒙哥马利于 3 月 27 日给他的集团军司令们发出如下指示：左面第 2 集团军以宽大正面向前运动，其北翼直指汉堡；美国第 9 集团军在右面向前推进，目标是马格德堡，然后准备与美国第 12 集团军群配合，摧毁鲁尔。与此同时，加拿大集团军将扫荡荷兰的残存被占领区，并沿海岸线向易北河冲击。各部队行动不得迟缓，装甲部队和机动部队要全速前进。这是一个简单明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3 月 27 日 6 时 10 分，他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说：“今天我向各集团军司令发出了东进作战的命令，现即将开始行动。”电报在陈述了作战计划细节之后，最后写道：“我的指挥所将移往威塞尔—明斯特—温登布吕克—黑尔福德—汉诺威，然后沿着公路到达柏林，我希望如此。”当丘吉尔收到这封电报的副本时，对于最后几个词的含义当然感到十分振奋。对于丘吉尔来说，头等重要的事是盟军首先攻入德国首都。然而，一个意外的障碍出现了——艾森豪威尔改变了西线战事最后阶段的整个作战方针。在这新的作战方针中，柏林已不再是一个目标。

艾森豪威尔改变西线作战方针的原因有三：第一，艾森豪威尔基本上是在一个政治真空中行使职权，对英美苏“大同盟”正在迅速走向崩溃这件事一无所知，只注意通过军事手段得到军事上的胜利。第二，当时西方盟军还在距德国首都 200 英里以外的地方，而朱可夫已出现在奥得河上，离柏林不到 40 英里（但后来俄国人向柏林的推进停了下来），从军事的角度看，俄国人比英、美军所处的地位优越，只要愿意，他们随时可以夺取柏林，此外，

由于东、西方盟国的战线逐渐向一点会聚，很可能发生意外冲突，导致不幸事件。第三，艾森豪威尔的判断被所谓“民族堡垒”的神话引入了歧途。从许多渠道收集来的证据似乎表明，当时德国人打算在贝希特斯加登周围的山地要塞中进行最后的拼死抵抗。在收到蒙哥马利3月27日电报的同一天，艾森豪威尔收到马歇尔的一封信。这封信要求他注意“防止（敌人）形成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区，南方的崇山峻岭地区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地区之一”。由于这些原因，艾森豪威尔改变了既定作战方针，并于3月28日的下午和晚上，发出了三封至关重要的电报。

第一封电报是发给斯大林的，其目的是要了解俄国人的计划，以便协调盟军与俄国人的行动，防止出现任何混乱。在电报中，艾森豪威尔毫无戒备地向斯大林泄露了自己下一步的打算：包围鲁尔，然后在爱尔福特—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与俄国人会师，如果可能的话，再往南一点在雷根斯堡—林茨附近会师。第二封电报发给马歇尔，报告自己的行动与决心。第三封电报发给蒙哥马利，但没有给伦敦去电报。

艾森豪威尔在给蒙哥马利的电报中写道，“我原则上同意你在鲁尔以东与布莱德雷会师的计划。……一旦你部和布莱德雷部在卡塞尔—帕德博恩地区会师，第9集团军将回归布莱德雷指挥。”在后来的一封信中，艾森豪威尔还说：“你会注意到，在我的意图中我没有提到柏林。对于我来说，那块地方只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我对此从来不感兴趣。我的目标只是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摧毁其抵抗能力。……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要大张旗鼓地尽一切所能毫不拖延地跨过易北河，推进到波罗的海岸边的吕贝克，封锁丹麦半岛。”这意味着蒙哥马利和英国人已被坚决地、毫不含糊地排除在最后一场决战之外了。

蒙哥马利被弄得目瞪口呆。因为过去艾森豪威尔在讲到作战意图时经常提到柏林，蒙哥马利一直对此深信不疑，并且他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现在，面对艾森豪威尔这样的指示，他毫无办法，只得回电说：“从FWD18272号指示中我注意到，您打算改变目前的指挥结构。如果您感到确有必要，我求您在我们到达易北河之前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对目前正在进行的伟大作战毫无益处。”与此同时，蒙哥马利向伦敦报告说，第9集团军将要归还布莱德雷指挥，布莱德雷将向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冲击，参加最后的决战。

这个消息传到白厅只能是火上加油。随后伦敦、华盛顿和兰斯（盟军最高统帅部所在地）之间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艾森豪威尔的新方针并没有发生变化。3月3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可了这件事，说：“德国的战斗正处于这样一种时刻，战场司令官最能断定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最快摧毁德军及其抵抗能力。”毫无疑问，这场蒙哥马利不是主角的争论使他与盟军最高统帅部和最高统帅的关系更加恶化了。

然而，艾森豪威尔的行动产生了一个预想不到的、非常严重的后果。斯大林一收到艾森豪威尔的电报，马上认为这是一个谎言。他推断，这只不过是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隐瞒他们决心独自夺取柏林这一图谋的一个圈套。他立即把朱可夫和科涅夫召回莫斯科开会，并在会上命令他们连夜拿出尽早占领柏林的计划。

根据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会议批准的“日食”计划，战败的德国应分成三部分，分别由英国、美国和俄国占领。像整个德国一样，柏林也将被瓜分为几个区，每个区由一个同盟国占领。但是柏林城本身将在俄国人控制

和支配的区域之内。鉴于这种情况和后来俄国人不得不从柏林的一些区中撤出，英、美军队不得不从他们的一些占领区中撤出这一事实，丘吉尔和蒙哥马利坚持要向柏林挺进的看法就不一定是正确的了。实际上，在对西北欧战役进行总估价的《西线的胜利》一书中，英国官方历史学家是毫无保留地站在艾森豪威尔一边，而不是站在蒙哥马利一边。

渡过莱茵河后，蒙哥马利指挥部队迅速猛烈地向东挺进，但向易北河挺进却并不那么容易。前进路上，河流纵横交错，当英军向前推进 200 英里之后到达易北河畔时，已在身后建造了 200 座桥梁，在易北河上暂停后，蒙哥马利便旧夜兼程前往波罗的海沿岸，以及时赶到那里，防止俄国人抢先进入丹麦从而控制波罗的海的人口。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各师在狭窄的挺进线上，作大纵深的挺进作战。装甲先头突击部队绕过敌军抵抗地区，一直往前开去，把攻击该地区敌军的任务交给后面赶来的部队在翼侧或后方予以完成。沿途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但各师的官兵却尝到了德国的少年和军士、军官训练营手中的“装甲拳头”（一种相当于火箭筒的兵器）的滋味。这些德国人被纠合在一起，沿着盟军的进军路线设置障碍点。在这些最后的日子，登普西在他的第 2 集团军前线部署了大约 1000 辆坦克，其中至少有 125 辆被德国人击毁或重创，而大约 500 多辆受损严重，不能再用。许多优秀军人战死。但英军终于在 5 月 2 日比俄国人早 6 个小时抵达波罗的海的维斯马和卢卑克，封锁了丹麦半岛，阻止了俄国人的渗透。

英军从波罗的海的维斯马到易北河的德米茨筑起一条东向的防线，从卢卑克西向巴特奥尔德斯洛然后南向易北河筑起一条西向的防线，德国军队和老百姓为了逃避俄国人，都拥向英军占领区，结果这两条防线之内拥挤不堪，一片混乱。仅 5 月 2 日和 3 日这两天，第二集团军俘获的战俘就将近 50 万人。

4 月 27 日，蒙哥马利接到陆军部的情况通报，说希姆莱曾通过瑞典红十字会提出投降。这份通报没有引起蒙哥马利的重视，因为他的当务之急是全速前进，抵达波罗的海，建立一条东向的防线，阻止俄国人渗人。后来，时局急转直下。5 月 1 日晚些时候，德国广播电台广播说，希特勒已在柏林他的指挥所里死亡，海军上将邓尼茨将继任元首。

5 月 2 日下午，指挥波罗的海和威悉河之间地区德国地面部队的布卢门特里特将军派人送信给第 2 集团军司令部，说他将于第二天早上代表他的部队前来投降。结果他不会前来，只送来了一封信，说谈判应在更高一级举行。

5 月 3 日，经邓尼茨海军上将同意，凯特尔元帅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蒙哥马利的吕讷堡荒原总部，开始谈判投降。代表团于 11 时 30 分到达，其成员是：德国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冯·弗里德堡，布施元帅的参谋长金策尔将军，海军少将瓦格纳和参谋军官弗里德尔少校。这个四人代表团后来又增加了一名参谋军官波莱克上校。

他们被带到蒙哥马利的指挥车外，在迎风高高飘扬的英国国旗下列队等候。蒙哥马利故意让他们等了几分钟，然后步出车外，以胜利者的姿态向他们走去。“这些是什么人？”他问道。他的翻译告诉了他。“他们来干吗？”他被告诉说，弗里德堡想让德国北部（包括苏军正面）的所有集团军向英军投降。

接着海军上将冯·弗里德堡念了陆军元帅凯特尔的信件，说正从柏林到罗斯托克俄军正面撤退下来的德军 3 个集团军要向蒙哥马利投降。蒙哥马利指出，这些集团军应向俄国人投降，但德国士兵若举起双手来英军阵地，那

将自动被当作俘虏。冯·弗里德堡说，向野蛮的俄国人投降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会把德国士兵直接送往俄国做苦工。蒙哥马利则说，德国人应该在发动战争之前，特别是在1941年6月进攻俄国之前，就想到了今天的下场。

蒙哥马利问他们是否打算讨论英军西翼德军的投降问题，他们表示不能，但非常关心这些地区的老百姓，希望和蒙哥马利作出某些安排，以便在英军部队挺进时，他们可以慢慢后撤。蒙哥马利当即表示拒绝。

蒙哥马利决定压他们一下，迫使他们就范，就对冯·弗里德堡说：“你们是否愿意让在我西翼和北翼包括在荷兰、弗里斯兰及弗里西亚群岛、赫耳果兰岛、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丹麦境内的德国部队，全部向我投降？如愿意的话，我可以把他们当作我当面敌军以及在丹麦支援我当面敌军的敌方部队，向我作一种战术性战场投降而加以接受。”

冯·弗里德堡说，他不能同意，但他非常希望对这些地区的老百姓作出某种安排。蒙哥马利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并指出，如果上述地区和德军拒绝无条件投降，他将命令继续作战。这样，将会有更多的德国士兵被击毙，炮火和空袭也会使老百姓遭受更大的伤亡。然后，蒙哥马利又在地图上向他们指明整个西线战局的实况。对此，他们根本不了解，显得很不安。这时，蒙哥马利估计不难要他们接受他的条件，于是就让他们先吃饭，先考虑一下他的条件。蒙哥马利让一名参谋军官领他们到另一个营帐用餐。用餐时，冯·弗里德堡潜然泪下，其他人很少说话。

饭后，蒙哥马利让他们到他的会议帐篷内进行谈判，桌上放着一张战况图。一开头，蒙哥马利就向他们提出了最后通牒。但他们说，他们无权接受那些条件，不过准备向凯特尔元帅建议让第21集团军群西翼和北翼的全部德军无条件投降。他们之中的两人愿去德军大本营见凯特尔，带回他的同意批示。

然后，蒙哥马利起草了一个文件，概括了这次会议上达成的决定。最后，冯·弗里德堡和弗里德尔两人在蒙哥马利的副官特朗布尔·沃伦中校陪同下，坐车去弗伦斯堡，蒙哥马利指出，他们必须在次日，即5月4日下午6时返回他的作战指挥所复命。金策尔和瓦格纳留在蒙哥马利总部。

蒙哥马利肯定冯·弗里德堡将受全权委托回来签字，于是决定在5月4日下午5时举行记者招待会，谈谈最近几天德国人和英军联系投降的事，同时告诉他们，他所希望当天下午6时出现的是什么情况。

冯·弗里德堡和弗里德尔回到蒙哥马利总部时，记者招待会正在进行。于是，蒙哥马利便请记者们和他一起去会议帐篷内，亲眼目睹这最后一幕。

德国代表团再次在蒙哥马利指挥车外的英国国旗下肃立。蒙哥马利先把冯·弗里德堡叫进指挥车，问他是否愿意在投降书上签字，他答称愿意。蒙哥马利便叫他退出车外。这时已快近下午6时，蒙哥马利下令立即在一座专设的营帐里举行受降仪式，营帐内已安放了各种录音器材。在一群英国士兵、战地记者、摄影人员和其他人士的注视下，德国代表团走进了营帐。在场的人都非常兴奋，因为这意味着战争的结束。

蒙哥马利早就准备好了投降文书。营帐内布置得很简单，一张铺着军毯的粗木会议桌上放着一只墨水瓶，一支花两便士就能买到的普通军用钢笔，还有两只英国广播公司的话筒。当蒙哥马利步入营帐时，德军代表团全体起立，随后便围桌就座。德国人很紧张，其中有个人掏出烟来，打算吸烟镇定自己，蒙哥马利朝他看了一眼，他立即把烟收了起来。

蒙哥马利当众用英语宣读了投降书，并说，除非德军代表团立即签署这份文件，并不再就投降后的种种问题进行争论，不然，他将下令继续作战。然后，蒙哥马利一个个地叫着德军代表团成员的名字，要他们依次在投降书上签名，他们一一遵命照办。接着，蒙哥马利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蒙哥马利签名的日期原来写的是5月5日，当时打算把“5日”改为“4日”，于是把“5”划掉，在上面注明他的名字的缩写，在旁边重新写了个“4”字，原件打在一张普通的陆军公文笺上。最高统帅部要蒙哥马利把原件送去，他却把原件的照片送去，原件留在身边，舍不得送走，因为那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件。德军投降书全文如下：

荷兰、包括一切岛屿在内的德国西北部以及丹麦境内全体德国武装部队的投降书

一、德军最高统帅部同意在荷兰、德国西北部（包括弗里西亚群岛和赫耳果兰岛及其他一切岛屿）、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丹麦境内的全部德国武装部队向第21集团军群总司令投降。上述地区的全部海军舰只均包括在内。上述部队应立即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二、上述地区之德军均应在1945年5月5日（星期六）不列颠夏令时间8时起，停止在陆上、海上与空中的一切敌对行动。

三、德军最高统帅部对今后盟国就任何问题下达之命令，均应立即执行，不得有任何争辩及评论。

四、凡违抗命令或执行不力者，将视为破坏本投降条款，由盟国依照现行法律与战时习惯法论处。

五、本投降书并非盟国签署的适用于全德及德国全体武装部队的总投降书，一俟该总投降书签署后，本投降书当予废止。

六、本投降书分别以英、德两种文字书写，以英文本为准。

七、着对投降条款含义及解释发生疑问或争执，则以盟国的决定为最后之裁定。

伯·劳·蒙哥马利元帅

冯·弗里德堡

1945年5月4日

金策尔

18时30分

瓦格纳

波莱克

弗里德尔

当5月3日德军投降谈判代表团第一次到来时，蒙哥马利便下令停止一切进攻，因为他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不愿部队再有伤亡。德军在投降书上签字后，他立即颁发了于1945年5月5日（星期六）上午8时生效的正式停火令。

在赢得对德战争的最后胜利的时刻，蒙哥马利没有忘记他统率下的指挥官和士兵。首先他给所属的高级指挥官写了一封公开信，接着又给第21集团军群的全体官兵写了一封公开信，对他们跋山涉水、英勇奋战所建立的卓著功勋表示深深的感谢。同时，他也没有忘记皇家空军和海军的宝贵支援，给他们写去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并收到了他们祝贺陆军的辉煌胜利的复函。正是：德军投降盟军胜，蒙蒂急令把战停；发出封封感谢信，字字句句暖人心。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十九章 重建德国

庆功授勋仪式多，战后盟国难配合；
共管德国成泡影，美苏英法各管各。

1945年5月8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签署了军事投降书，欧洲战争正式结束。但这只是军方签署投降，还不是德国政府的正式投降。希特勒在柏林死去时，邓尼茨海军上将声称代表德国政府，但盟国拒绝承认，并在弗伦斯堡逮捕了邓尼茨。虽然英、美、俄同意在柏林建立一个包括英、美、俄、法各1名委员的盟国管制委员会，负责指导德国中央政府管理这个国家，但因为没有一个经盟国承认的德国政府向盟国投降，盟国管制委员会不能自动发挥作用。此外，除美国已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管制委员会的美方委员外，英国、俄国和法国都未派出自己的委员。因此，在西方盟国所占领的区域内，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继续发挥指挥部的作用。

在第21集团军群占领的地区，需要解决的民政问题多得惊人。

100多万难民在俄国人挺进之前就逃到了这个地区。大约有100万德国伤病员住在该地区的医院里，但药品奇缺。150万以上没有受伤的德国士兵在5月5日已向第21集团军群投降，成了战俘，也都需要英军负担。食物即将告罄、燃料短缺，交通电讯已全部停止，工农业生产大部分停顿。人们需要口粮和住房，防止疾病，这些都要在严冬到来之前解决。如果届时人们还得不到口粮、住房，那么饥荒和疾病将在整个德国猖獗，这将使西方盟国处于最严重的窘境。

由于英国政府没有派出英国驻德的首脑，蒙哥马利只好自己为英占区制定管理计划，并毫不拖延地予以贯彻。首先，他下令严禁抢劫和使用德国的运输设施。很多单位用了德军参谋部的车子，还有一两个将军居然驾驶起缴获的德国元帅的座车。蒙哥马利决定煞住这股风，并于5月6日发布了命令：个人或集团的抢劫行为，不论何时都在禁止之列，违反此项命令者，不论当事人军阶如何，均得受军事法庭审判。

接着，蒙哥马利把德国部队划归西北欧德军总司令布施元帅管辖。他的总部设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他的参谋长金策尔将军以及一个小型参谋班子和一组联络官，则住在蒙哥马利总部。这样，蒙哥马利的英占区计划就可以通过德军司令部组织系统来贯彻和执行。

最后，蒙哥马利把英占区分成四个负责占领事务的军区：柏林军区：由莱茵将军负责，指定一部分部队待命，一俟与俄国人达成协议，即开赴柏林。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军区：由E·H·巴克将军负责，指挥第8军、2个师和1个装甲旅。汉诺威军区：由霍罗克斯将军负责，指挥第30军、3个师和1个装甲旅。威斯特伐利亚军区：由克罗克将军负责，指挥第1军、4个师和1个装甲旅。

其他部队由他自己统一管理，组成总预备队，以防万一。蒙哥马利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利用他的军、师、旅、团军事司令部组织，有秩序地在英占区重建地方政府。这些司令部管辖相应的县、镇、乡等地区，一切都通过相应的民政组织进行工作。他对必须解决的人民生活问题，规定了如下轻重缓急顺序：口粮、住房和防止疾病。然后，再解决交通以及其他必须解决的许多问题，为了保证平民用粮，蒙哥马利命令武装部队不得向平民购买或征收粮

食，在蒙哥马利的有效管理下，英占区很快就消除了混乱状态，那年冬天没有出现饥荒和流行病。

4 月间，蒙哥马利曾私下得到通知，说很可能要他负责英占区的长期政务，但这项任命却迟迟没有发表，结果是伦敦的管制工作委员会与他领导下的德国军政府的班子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5 月 14 日，蒙哥马利飞往伦敦，试图说服首相立即作出决定。结果他成功了。丘吉尔任命他为英国占领军司令兼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英方委员。他要求任命陆军部的罗纳德·威克斯中将为他的副手，丘吉尔也同意了，并于 5 月 22 日发表了这两项命令。

然而，在战争刚结束后的几个月里，庆祝胜利的活动占用了蒙哥马利许多时间。盟军互访、出访外国首都、授勋仪式等活动一个接一个，简直使他应接不暇，几乎快成了挂名的英占区行政首脑。

5 月 7 日，与第 21 集团军群接邻的白俄罗斯集团军群指挥官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到维斯马访问蒙哥马利，蒙哥马利设午宴招待他及其随行。罗科索夫斯基随即邀蒙哥马利到他的总部去作客，蒙哥马利同意 5 月 10 日回访。俄国人为了给蒙哥马利留个好印象，派了专人到英军部队了解蒙哥马利喜爱什么娱乐活动，有什么嗜好和习惯。这位军官问蒙哥马利喜欢喝什么酒，人们告诉他，蒙哥马利不喜欢喝酒，也不喜欢喝含酒精的饮料，只爱喝白开水。他又问：“他爱抽雪前吗？”人们又告诉他，蒙哥马利不抽烟。这时，他似乎有点吃惊，但又建议说，他们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姑娘和舞女，打算招待蒙哥马利元帅。人们又告诉他，元帅不喜欢女人。这使他束手无策，大声说：“他不喝酒，不抽烟，又不喜欢女人，那他到底整天搞些什么？”

蒙哥马利按期回访。一顿豪宴之后，俄国人为蒙哥马利及其一行举行了长达 1 小时的歌舞音乐会。蒙哥马利的一个随从参谋，被俄国人灌得烂醉如泥。临行前，他被先行送上飞机，藏在盥洗室里，蒙哥马利上飞机后没有看见这个参谋，便问他到哪里去了，有人说他上厕所去了。于是，蒙哥马利下令起飞，当飞机滑向跑道始端时，俄国人鸣起了 21 响礼炮，藏在盥洗室的这位参谋也拔出左轮枪，向窗后打枪，和俄国人交相呼应。他打了第 6 枪还想再打，但副官说服了他不要再打，他就在盥洗室里睡着了。到达机场时，只好用一辆救护车把他送回作战指挥所去。后来，蒙哥马利解了他的职，让他回团里去当差。但为了不因一次疏忽而毁掉他大有可为的前程，蒙哥马利附去一份尽早让他指挥一个炮兵营的命令。这样，他便可以回复他那临时任命的少校衔。

5 月 13 日，蒙哥马利在哥本哈根被授予勋章和哥本哈根市荣誉市民称号。当他乘车通过欢呼的人群时，一个纳粹分子准备用手榴弹谋杀他。但由于那个纳粹分子惊慌失措，还没有下手就露了马脚，即刻被警察发现抓起来带走了，蒙哥马利幸免于难。

5 月 25 日，蒙哥马利到巴黎为英国军事展览会主持揭幕典礼，巴黎倾城出动欢迎。戴高乐将军在巴黎残老军人院为蒙哥马利举行了五彩缤纷的阅兵典礼，并授予他一级荣誉勋章。那天晚上，蒙哥马利为展览会揭幕，并用英语，间或杂以法语向观众发表演讲，使观众的情绪十分高涨。当晚晚些时候，许多人围在蒙哥马利下榻的英国使馆门外，不断地喊着他的名字。最后，蒙哥马利走到阳台上向他们致谢。他用英语简单他讲了几句，但人们继续欢呼，一点也没有想离开的样子。于是，他再次走上阳台，用法语说：“你们走吧。”人们放声大笑，愉快地离去了。

6月7日，蒙哥马利飞赴安特卫普庆祝该城获得自由。在庆祝仪式上，蒙哥马利被授予安特卫普荣誉市民称号和安特卫普金色短剑。庆祝仪式结束后，又是一顿丰盛的午宴。美味佳肴不知上了多少，但蒙哥马利不习惯于大量的美味佳肴，餐后不久就觉得难受。于是他要求缩减余下的节目，去机场飞回他的总部。主人们马上作了安排，叫来了车子。结果，他还是在车上吐了，把车子弄得一塌糊涂，当他向司机道歉时，那个小伙子挺直了身子，瞧着蒙哥马利说：“哪儿的话，阁下，这是荣幸。”

6月10日，朱可夫元帅在法兰克福的盟军总部代表斯大林授予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胜利勋章，那是苏联从未授予任何外国人的最高荣誉。除荣誉价值外，勋章本身就价值连城，因为它是一颗由许多红宝石和钻石镶成的非常漂亮的五角星。此外，朱可夫还向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其他24名军官授了勋章。

10日那天早上，蒙哥马利到达较早，和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一次简短的私下会谈。其间，艾森豪威尔授予他一枚优异服务勋章。这是美国授予外国军人的最高勋章，并且是蒙哥马利接受的第二枚美国勋章。

1943年艾森豪威尔曾奉总统命令在西西里亲自为蒙哥马利佩上一等功绩勋章。

7月13日，蒙哥马利授予朱可夫元帅巴斯骑士大十字勋章。

这些授勋和访问活动占用了蒙哥马利许多时间，但这只是群山之一角。这个在战争期间把自己禁锢在战术司令部的人，似乎突然间从民众的欢呼声中得到了无限乐趣。他同许多单位和个人保持通信联系：足球俱乐部、慈善事业机构以及每一个愿意给他写信的人。他总是乐意出席英国举行的种种仪式，无论是接受自治城市的荣誉市民称号，还是在盛大的集会上发表演讲，或是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女王的贝尔法斯特大学成为名誉博士，他总是来者不拒，一概参加。随便查一下他的日程安排，便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在10月17日至22日这6天中，他便接受了曼彻斯特、坎特伯雷、梅登黑德和沃里克4个自治城市的荣誉市民称号。而每一个这样的仪式都需要将近一天的时间。由于他还把与在德国的部队保持密切联系看作是他的责任，事情便进一步复杂化了。他尽可能经常地离开他的总部，到莱茵河沿线部队去巡视，主持体育运动和授予勋章。

为了享受偶尔出现的一点和平与宁静，蒙哥马利便去欣德黑德学校度周末，因为他的儿子戴维在搬往温切斯特之前，一直住在那里。他在朴次茅斯的家被炸毁后，就再也没有固定的家，只好住在欣德黑德学校里。战争期间，该校专门为他保留了一间屋子。他的一些奖品，包括陆军元帅权杖，都陈列在那个学校里。他在欣德黑德学校的生活，与在战术司令部的生活几乎完全一样。穆尔黑德写道：“蒙哥马利喜欢同孩子们呆在一起。在食堂的一片吵闹声中，他和孩子们一起吃饭，给他们说谜语、讲笑话。”蒙哥马利的私生活几乎同与他相同年龄和地位的人没有任何联系。

战争的紧张生活和战后的繁忙活动在1945年开始对蒙哥马利产生不利影响，他的健康恶化了。7月间，他患了扁桃体炎。为了健康的缘故，他比任何时候都吃得更简单。8月22日，蒙哥马利乘坐他的轻型飞机“迈尔斯信使”号访问驻德加拿大第3师。当他的座机在机场上空盘旋准备降落时，发动机突然熄火，驾驶员不得不放下襟翼，飞机很快就失去速度。驾驶员无法使飞机抵达机场，只好在机场附近着陆。座机全部撞毁，驾驶员和他的副官

都没有受伤，但他却没有那么幸运，腰椎骨被撞断。蒙哥马利还是坚持向加拿大官兵作了演讲，但因痛得厉害，演讲只好中断。大家建议他坐车回去，但他拒绝了，坚持要乘飞机返回。加拿大人害怕再次失事，非常不安。蒙哥马利说，没有人会在一天之内两次飞机失事，乘飞机回总部是最保险的。

回到总部后，他的医生阿瑟·波里特建议派两个护士去照顾他，但他马上说：“波里特，我已经接受了你的许多建议，但这一条我不能接受。我的司令部里不能有女人。”尽管没有女人照顾，蒙哥马利的伤还是痊愈了，但他比战争期间虚弱了许多。

1945—1946年的冬季，蒙哥马利常患感冒，并于1946年1月并发胸膜炎，病得相当厉害。他住了一段时间的院，出院后去瑞士休养了1个月。蒙哥马利深受瑞士人的喜爱，尤其在伦科，因为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遇见了贝蒂。从1937年起，那里就一直为他保留着一间屋子，屋里放着准备好的滑雪板和滑雪靴，随时都能使用。

这些仅是蒙哥马利在英占区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是并非重要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为重建德国作出了艰苦的努力。

1945年5月底，蒙哥马利发现英占区的德国人普遍变得难以控制起来，于是决定向他们发布一封公开信，以他在战时向部下发表告全体官兵书的方式，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蒙哥马利在5月30日发布的《告英占区德国人民书》中指出：“收割农作物，必须积极进行，交通设施必须重建，邮电服务必须恢复。若干工业必须继续开工。……德国人民应遵守本司令长官之命令，从事生产整个地区的生活必需品，恢复国家的经济生活。”

随着英战区秩序的恢复，蒙哥马利开始注意与德国人的友好往来问题。他认为，要用英国人的自由标准和个人责任观念重新教育德国人，就必须同德国人友好交往。于是，他于6月10日发表了《告英占区德国民众书》，告诉他们为什么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英国士兵不和他们交往。与此同时，蒙哥马利逐步放宽了严禁士兵与德国人交往的规定。刚开始时，蒙哥马利严禁士兵随意同德国人交谈，不准出入他们的住所或同女孩子们跳舞。6月12日，他把这一命令放宽到士兵可以和孩子们谈话、玩耍。7月，他进一步放宽限制，允许士兵在街头和公共场所同德国人谈话，但仍禁止进入德国人的住处。1945年9月，蒙哥马利在管制委员会上提出取消不准同德国人来往的禁令，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但仍保留了两条规定，即武装部队成员不得和德国人住在一起，不得和德国人通婚。

6月5日，关于击败德国和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宣言的正式签字仪式暨管制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在柏林举行。蒙哥马利于下午1时从英占区飞抵滕普勒霍夫机场，受到一批俄国高级官员的迎接。在检阅仪仗队之后，英国代表团驱车前往一组郊区小别墅。到达之后，蒙哥马利要求会见朱可夫元帅，但被告诉说，他很忙。蒙哥马利坚持要见，并说，若见不到朱可夫元帅，他马上就回英占区去。结果，他很快被引到朱可夫元帅的官邸。

蒙哥马利与朱可夫讨论了管制委员会机构建立的步骤以及展开工作的问题，并提议，首先必须在柏林建立秘书处，各国副代表应立即开会研究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委员会的四国正式代表会议作好准备。但朱可夫不同意，他认为，在西方盟国把目前仍然占领的部分俄占区交还俄国人之前，不可能开始做有益的工作。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英美军队超越了雅尔塔会议商定的占领区边

界线。英国政府认为，英美军队占领俄占区大部分地区这一既成事实是重要的讨价还价资本，足以使苏联政府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作出使英美两国满意的让步。丘吉尔对英美军队坚守欧洲胜利日到达的疆界线极为重视。他认为，在即将召开的三国首脑（波茨坦）会议之前，英美军队不应后撤，因为在首脑会议上将讨论这些问题，并加以解决。

但美国政府却持不同态度。他们不打算把波兰和巴尔干等问题和撤军联在一起，也不坚持在三国政府首脑会议之前固守阵地。如果俄国人坚持立即执行分区占领协定，他们会立即撤退。

这种情况使蒙哥马利感到尴尬，但他又不能违背政府的指令。与艾森豪威尔商量后他决定，如果朱可夫提出这个问题，他便回答这应留待双方政府解决。

朱可夫曾提议，四大盟国宣言的签字仪式最好在下午4时举行。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焦急地等待着宣言的签署，对朱可夫拖延签署很是恼火。最后，他们俩联名向朱可夫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四国司令长官不能立即会晤，他们将返回各自的占领区。这一下立即见效，他们被请到附近的俱乐部去开会。会上，俄国人反对英文本上的一个字，说和俄文本的意思有出入。蒙哥马利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字，也不了解它对全局有什么影响，但对俄国人如此地拖泥带水厌烦透了，于是建议干脆去掉这个字。俄国人和其他人立即同意了。

下午4时30分，在强烈的弧光灯下，在一大群记者和摄影人员的包围下，四大国代表签署了宣言。

签字仪式之后，管制委员会的四国委员及其顾问离开会场，到别处举行秘密会谈。艾森豪威尔认为，建立管制委员会机构和西方部队从苏占区撤出可以同时进行，因此建议参谋班子应立即开始研究管制委员会的问题。但朱可夫明确指出，在英美军队撤回各自占领区之前，不能建立管制委员会，在这个先决条件完成之前，四国副代表或其参谋班子甚至连共同的探讨性工作也不能进行。蒙哥马利说，英美军队抵达目前阵地，完全是战争的结果，把他们后撤到各自的地区，需要一段时间。朱可夫问，需要多长时间。蒙哥马利说，至少3个星期。朱可夫马上表示同意，并说，到时候他将不反对管制委员会设在柏林。至此，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除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这一情况和请求新指示外，已无事可做。

下午6时散会后，大家到附近的大房间参加宴会。宴会上，大家纷纷致词，气氛非常热烈。7时以后，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先行离席，返回各自的总部。

由于盟国司令长官第一次会议毫无结果，蒙哥马利便决定把英占区管制工作委员会的主要机构（军事和民事部门）设在汉诺威和奥斯纳布吕克。此外，还决定和美国人一起在法兰克福设立作战指挥所。蒙哥马利的决定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这样，他便既能尽快地在英占区建立秩序井然的管理工作，又能与美国人保持步调一致。

6月19日，蒙哥马利得知斯大林同意在德国和奥地利同时把各自部队撤至业经同意的占领区，同意英、美、法卫戍部队于7月1日前后开始进入柏林。各国政府同意同时撤至各自占领区之后，管制工作委员会的英、美副代表威克斯将军和克莱将军便于6月29日飞赴柏林，与朱可夫商谈撤军的具体细节。这次会议一致决定，7月1日起开始撤军，英军应于一天内撤出维斯

马“靠垫”地区，两天内撤出马格德堡“突出地带”，美军应在6—9天内撤出他们所占的俄占区。英美先遣分队应于7月1日接管在柏林划给他们的地区，主力部队将于7月4日进驻柏林。此外，俄国人还同意划出1条公路和1条铁路给英美以自由通过权，但俄国人负有维修和管制的责任；同意在柏林上空建立宽20英里的空中走廊，允许西方飞机自由使用，但规定飞机在进入俄占区前1小时，应通知俄占区当局。

7月4日，蒙哥马利把维斯马和马格德堡移交给俄国人，同时，由第7装甲师组成的部队开入柏林英管区。

7月13日午夜，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正式解散。这时，四个占领国早已接管了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并建立了军政府。西方盟国占领区之间均可自由来往，但仍然不得进入俄占区。只有在柏林，盟国各管区之间才可自由进出。

在西方盟国占领区内，在一切重大政策问题上，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管制工作委员会的英国组向设在法兰克福的美国总部派出了一个精干的联络组，威克斯将军经常去美国总部开会，协调英美法三国的政策，而同俄国人则没有这种联系。

为了逐步恢复英占区的经济，蒙哥马利有计划有步骤地遣散了一批批德国战俘，以确保有足够的劳力从事田间劳动和收获农作物。同时，还向矿工提供了更多的口粮，使煤产量缓缓上升。此外，公路、铁路运输和沿海的渔业也逐步得到恢复。这样，就为那年冬天避免出饥荒和燃料短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7月15日，首相丘吉尔抵达柏林，出席将于17日在波茨坦举行的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蒙哥马利前往柏林迎接，并于第二天向丘吉尔、安东尼·艾登和布鲁克汇报了德国英占区的管理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7月17日至8月2日的这次三国首脑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立即解决战败后的德国的管理问题、波兰的西部边界问题、奥地利占领问题、俄国在东亚的作用问题、赔偿问题以及对日作战问题。正当会议似乎快就这些问题作出某些决定时，英国代表团为了要知道大选结果，不得不返回英国参加7月26日的开票仪式。会议是按照丘吉尔及其代表团将于7月27日早上返回波茨坦而安排的，可是他们一行到时并没有回来，因为丘吉尔政府在大选中遭到了决定性失败。

新政府的组成使英国代表团抵达波茨坦的日期稍有推迟，但英国政府的更迭并没有影响会议的进程。这次会议最后签订了《波茨坦公告》。该《公告》规定英美俄法四国共同对战败后的德国进行管理。但由于西方盟国同俄国人不和，再加上西方盟国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四国共管德国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为了使德国人沿着正确的道路重新振作起来，蒙哥马利于7月底拟订了一份计划纲要：

“一、允许人们自由地讨论他们本身的问题，并普遍地开始采取一些自助措施。

“二、根除纳粹主义的流毒，如游手好闲、百无聊赖和恐惧未来等，树立正确的思想，使人们充满希望。

“三、特别加强对德国青年一代的工作。”

接着，他便根据这个计划纲要起草了第三封《告英占区德国人民书》，

并于8月6日正式发表。

然后，蒙哥马利着手研究德国人的教育问题，打算尽早开办中小学和大学，但必须使用没有纳粹意识形态的课本，必须在教育机构中清除纳粹的一切教义和思想。他当时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合格的师资。

1945年10月初的伦敦外长会议不欢而散。与此同时，柏林管制委员会的工作也面临严重障碍，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其直接原因是法国反对成立德国中央政府。由于外长们无法就德国问题达成协议，蒙哥马利只好飞往伦敦直接晋见首相艾德礼。他对艾德礼说：“我曾经认为四国共管德国是可能的，但我现在认为根本办不到。在管制委员会内无法达成协议，美国人尤其觉得不耐烦。他们已提出动议，说既然委员会不能全体一致达成协议，各占领区可按自己认为最适当的办法行事。这是第一次出现的不和现象。”

蒙哥马利还坦率地向首相陈明，阻碍四国共管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反对成立德国中央政府，而俄国的“铁幕”政策将成为以后的真正障碍。德国经济正濒于崩溃，必须迅速在货币、税收、贷款等方面作出重大决定，并为此目的建立中央财政机构或地区机构。

因此，蒙哥马利在英占区开始按照自己认为是最合适的办法行事。首先，他决定把军政府变成由文职人员控制的政府。为了实现这种过渡，他采取了两大步骤：管制工作委员会和军政府合并，从英国派来文职官员。这种过渡是逐步的、缓慢的，直到最后彻底完成为止。它将先从基层开始，逐步向上发展，最后军长们撤出行政机构，成为专职的部队司令员。

为了使这个变革能顺利而平稳地进行，蒙哥马利制定了一项分阶段计划。第一阶段，军区司令长官通过其军政府班子已负起了管理军政府的各项责任。第二阶段，应训练一批地区行政委员来替代作为军政府首长的军区司令长官。第三阶段，军区司令长官停止执行军政府首长的职务。第四阶段，军政府派出的人员将逐步让位于文职人员，其人数应大大削减。第四阶段结束时，将由德国人来自行管理，除接受英国人的一般监督外，其行政机关的首脑将是文职官员而不是军人。在这四个阶段中，最重要的是第三和第四个阶段，蒙哥马利希望第三阶段能在1946年4月开始实施。

11月间，正当蒙哥马利准备使英占区的工作走上正轨时，朱可夫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请管制委员会传阅。该备忘录指责英占区存在着从集团军群一级直到陆军和空军军区一级编成的德军司令部，并拥有“作战”参谋部。备忘录还声称，英占区留着两个军群，各10万人，配有坦克部队，而且还在编成单位里保留着相当数量的波罗的海诸国人和匈牙利人。备忘录最后说，管制委员会有必要组织一个委员会去英占区实地调查。

这是管制委员会上一个盟国指责另一盟国的行动的第一个例子。蒙哥马利觉得有必要狠狠回击一下俄国人的挑战。因此，他除了将自己的看法电告伦敦外，还在11月30日的管制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一项声明，对朱可夫元帅直接攻击英国政策的做法表示惊讶。蒙哥马利在声明中对俄国人的指责一一进行了驳斥，并且最后表示：“同意派一个委员会前来视察的建议，但有两个条件：第一，这个委员会一定要视察所有占领区；第二，它应该是调查管制委员会其他事项的先驱。”

朱可夫元帅表示同意委员会应视察所有占领区，但反对第二个条件。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个问题交协调委员会研究，英国将向协调委员会提供详细情况和数字。

从12月10日起，蒙哥马利开始实施“狠揍”行动，该行动的目的是在1月30日前解散德军各级司令部和遣散德国军事人员。此后，英军保留的德国人将只是三军所需要的人员和未经审判不得遣散的分子。

与在战争时期一样，蒙哥马利对自己所掌管的范围内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

1945年12月，他视察英占区的一个难民营。他告诉难民营主管人琅金斯上校说，他想了解进难民营的整个程序，并说：“你必须把我当作新来的难民。”珀金斯告诉他说，接收难民时，第一步是往新来的难民的袖管和裤管里放滴滴涕粉。听到这里，他的热情开始消失了，就说：“你可以省掉第一步，让我们到第二步吧！”他彻底地检查了难民营的工作，并向管理人员和难民问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后来，在讨论难民遣返旅途补助费的问题时，他表明他比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更了解德国马克在战后混乱形势中的价值。

1946年1月26日，蒙哥马利接到通知说，他已被选为帝国参谋总长，并要在6月26日就职。蒙哥马利在桑德赫斯特军校读书时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别人也不曾想到他会如此扶摇直上。

蒙哥马利与旧的政治主子的关系相当好，现在怎样才能与新的政治主子处好关系呢？蒙哥马利已同艾德礼和贝文打过交道，知道他们对自己很信任，但对工党统治集团内的其他人却一无所知。

1945年8月，两位工党议员访问驻德英军，巡视部队各单位。但他们到达第一个单位时竟要军官们离开会议室，以便他们单独和士兵谈话，而且居然这样做了。此外，其中一位议员还向一位将军的勤务兵打听，晚上将军和谁一起过夜，并问他对将军有什么看法。听到这些消息后，蒙哥马利大为恼怒，当即下令在德国的所有部队，禁止此类行动。他虽然知道，部队首长与他们的政治主子之间保持友好关系非常重要，但他决不允许到处游逛的议员大人破坏部队纪律。

由于他将在几个月内离开德国，蒙哥马利便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他认为全局关键的两个问题上来：一是德国人问题，二是英占区政府的发展问题。

蒙哥马利认为，英国在德国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是改变德国人的思想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过去十多年来，德国人接受了纳粹主义和独裁主义的思想，家庭的重要性缩小到最低限度，宗教的影响也大大削弱，而国家权力却极度增加。在这个时期里，德国人曾一度享受充分就业和高标准的生活水平。目前，除了苦难外，一切都荡然无存。因此，人们可能很快就会回首当年，怀念旧政权。在英占区，大约60%的人是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占领区的舆论对英强硬，而且英军还破获了一个颠覆组织。毫无疑问，英国人将来会和他们发生冲突，必须通过某种方法影响他们，不至于在以后制造麻烦。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蒙哥马利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发展经济。必须使德国人对未来抱有希望，使他们意识到，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才能获得美好的未来。也就是说，要确定工业水平，使他们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水平和最低限度的失业。如果这些办不到，德国人就会朝后看，并准备紧跟可能出现的任何坏头头。

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应尽快实现政府的非集权制和文职人员制。蒙哥马利打算鼓励德国人与外部世界接触，使他们学习新的思想意识，以代替纳粹主义那一套。

其次，蒙哥马利再次强调要抓好英占区的教育问题。他指出，应为在校

学童供应课本，提供可靠的、可信赖的教员和适当的校舍。英军部队占用了许多校舍，应立即交还给德国人。同时，应提供好的影片、报刊、图书等，加强对在校和不在校的青年人的教育。此外，他还准备挑选一批德国青年去英国学习他们从不了解的、新的生活方式。

蒙哥马利定于 1946 年 5 月 2 日离开德国，6 月到陆军部就任新职。他决定离职时向英国政府呈递一份对德国局势看法的备忘录，于是便把在德国的最后一天都用在撰写这份备忘录上了。蒙哥马利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前，我们的目标是把西德纳入西方国家大家庭。使西德的领土变得繁荣昌盛，富有吸引力，要使东德人拿他们的悲惨命运与它相比而羡慕不已。”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蒙哥马利在备忘录中呼吁在英占区发展工业，建立健全经济，平衡国家预算，集中控制财政。同时，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四条原则：一、确定“德国”的领土（东界已在波茨坦达成协议，西界尚未达成协议）；二、保证居住在德国境内的人有合理的生活水平；三、使德国人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四、继续向德国人供应粮食。蒙哥马利认为，这四条原则是从旧的废墟上建设新的德国的四大支柱，但最重要的是第四根支柱，即粮食支柱，如果这根支柱断裂，其他支柱也就统统倒塌。当时，这四大支柱一根也没有。因此，蒙哥马利希望英国政府和他的继任者能够尽快地着手建立这四大支柱。正是：重建德国太艰难，离任不忘把计献。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章 参谋总长

艰难时刻来上任，遍访列国情况明；
为强陆军多争吵，据理力争终是赢。

蒙哥马显然完全不适合于做帝国参谋总长那种复杂的政治工作，但他怎么又被选作帝国参谋总长了呢？对于局外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然而，对于了解英国陆军现状的人来说，这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仅仅表明，英国陆军上层可供选择的范围是多么狭小，而一场重要的战争又怎样能在短期内进一步缩小这种范围。布鲁克从 1941 年起任帝国参谋总长，到战争结束时，他已感到“非常非常疲倦”。他非常愿意接替即将退休的阿思隆勋爵，继任加拿大总督。接替他继任帝国参谋总长的，只有一个符合逻辑的人选——亚历山大，但在 1945 年 7 月的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决定让布鲁克再留任一年。于是，亚历山大成为加拿大总督。因此，到 1945 年冬必须另选一个人于 1946 年 6 月接替布鲁克时，却没有一个完全适合的人选。韦维尔太老，现任印度总督；奥金莱克现任印度英军总司令，但他的主要经历又在印度陆军而不在英国陆军。此外，他们俩人都有失败的记录（至少公众认为是失败）。斯利姆在远东进行的战役似乎太遥远，他的部队已经是“被遗忘的部队”。此外，他还有对行政事务不感兴趣的名声，而行政管理却是参谋总长的份内事。比较而言，蒙哥马利却是一个更为可取的人选。至少，他有指挥英国陆军在欧洲作战的丰富经验，是一个受人欢迎的英雄。在欧洲战区，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被提拔到蒙哥马利之上而不意味着是对蒙哥马利的轻视。所以，蒙哥马利作为英国最受人欢迎的将军，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被选来担任帝国参谋总长的工作。

1946 年 5 月 2 日蒙哥马利调离德国后，即去欣德黑德休假。他的好友雷诺兹少校夫妇仍为他照料戴维，戴维当时已 17 岁，仍在温切斯特念书。雷诺兹夫妇允诺他继续在欣德黑德住下去，直到他在别处为戴维和他自己安家为止。蒙哥马利从德国带回了他的指挥车，停在他们的院子里，由于要干的事太多，尽管是休假，他仍整天在指挥车里埋头工作。

为了一就任帝国参谋总长就能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建设英国陆军，蒙哥马利一回到英国就开始起草《战后陆军问题》文件，并准备在出任新职之前访问驻有英国武装部队的东地中海国家和印度，以掌握第一手资料。

6 月 9 日，蒙哥马利离开伦敦前往埃及访问。在埃及，蒙哥马利同埃及国王和首相进行了会谈，表示英国愿意尽早从尼罗河三角洲地带撤军，但希望能在埃及保有军事基地。首相表示同意合作，但国王对此不感兴趣，会谈几乎是毫无结果。

巴勒斯坦是蒙哥马利访问的第二站，这里局势每况愈下，他指示驻巴勒斯坦英军总司令伊夫林·巴克中将控制局势，重建英国的权威。

在去印度前，蒙哥马利飞赴安曼同阿卜杜拉国王共进午餐，交换意见；在去印度途中，他在巴士拉停留一晚，同驻伊拉克的英军司令官讨论了俄国在伊朗和其他地区推行的政策。

在印度，蒙哥马利就印度独立及其对军事的影响，同总督韦维尔和总司令奥金莱克作了长时间的交谈，还就英军撤出印度的问题，同国大党领袖曼拉纳·阿扎德和穆斯林联盟领袖真纳进行了讨论。

接着，蒙哥马利访问希腊，同英国大使克利福德·诺顿爵士和司令官克劳福德将军讨论了希腊的局势，检阅了希腊陆军并被希腊国防部长授予英勇金质勋章。

意大利是蒙哥马利这次访问的最后一站，他只在意大利逗留了18个小时，就在6月26日早上匆匆离开意大利，赶回伦敦就任新职。

蒙哥马利是在一个异常艰难的时刻就任帝国参谋总长的。当时，不仅后殖民时代的问题开始出现，而且苏联同西方盟国的冲突也变得日益尖锐起来。原子弹的出现和工党政府的上台，使得帝国参谋总长的工作更加棘手，因为原子弹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以前对战争的许多看法，而工党政府决定建立福利国家，就将不可避免地大幅度削减军费预算。

蒙哥马利在战争的最后两年中认识到，与同级和顶头上司保持友好交往对于有效地管理军事机构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来到陆军部后，蒙哥马利便努力与白厅的人打成一片，并尽力与其政治主子保持友好关系。在蒙哥马利任职期间，他不得不同他的顶头上司、先后三任陆军大臣打交道。第一任陆军大臣是杰克·劳森，第二任是弗雷德·贝伦格，第三任是伊曼纽尔·欣韦尔。他同三任陆军大臣都相处甚好，与欣韦尔尤其如此。此外，他还同陆军部常务次官埃里克·斯皮德爵士每逢星期一定期共进午餐，以联络感情，便于工作。

刚到陆军部不久，蒙哥马利就顺利地解决了一起潜在的爆炸性事件。一位次官计划去海外巡视，便亲自命令副官长进行安排，并下达了如何款待他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我将随时视察部队，视察时不得有军官在场。

我的工作时间为早上9点到下午6点。

我喜欢同军官和士兵分别共进午餐。

不要为我安排仪仗队，不要为我安排检阅仪式，也不要设宴招待我，应视此为命令。仰各遵行。

我愿及早会晤所视察的部队之司令官……

我愿倾听任何一级官兵诉说有关军事方面的任何问题。……”

这个命令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副官长求见陆军大臣请求辞职，要不就收回这个命令。然后，他来到蒙哥马利办公室，向他诉说整个情况。蒙哥马利听后，又好气又好笑，便亲自去见陆军大臣，告诉他决不允许任何外来人士在强令军官退出的情况下向该军官领导的部队讲话。于是，次官的命令被取消了。接着这位次官又要求总参谋部派一名军官陪同他巡视，并要蒙哥马利就他打算视察的军区，向他作一般的情况汇报。对这两项要求，蒙哥马利都拒绝了。但为了不使陆军部文职和军职双方暗生隔阂和矛盾，蒙哥马利还是为他的巡视作了妥善安排。这样，突然产生的矛盾便被蒙哥马利化解了。

蒙哥马利说：“英国陆军决不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由于没有一种政策或作战理论而毫无目标地漂流。”在他第一次参加的陆军委员会会议上，蒙哥马利提出了他在欣德黑德写成的《战后陆军问题》，要求陆军委员会原则上批准这个文件，以便作为陆军部制订计划的依据。大家同意了他的要求。

这个文件附有关于战争的根本原则的意见书，同时还附有一个关于参谋组织的备忘录。蒙哥马利最后决定，如果英国陆军不采用参谋长制度，他就申请辞职，让首相另请高明。最后，陆军部同意了这一变革，英国陆军采用了参谋长制度。

蒙哥马利就任帝国参谋总长后，首先关心的是官兵的生活问题。在陆军部任职的未婚军官要自行解决膳宿问题，不仅难以找到住处，而且生活十分单调。蒙哥马利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作出安排，把在伍尔维奇的前皇家军事学院作为能容纳 250 名军官的宿舍，并建立了军官食堂，使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

解决了陆军部的问题之后，蒙哥马利开始着手解决部队在生活方面的问题。1946 年 7 月 26 日，他在朴次茅斯说，不能让士兵脱离社会环境，英国陆军必须同国家的发展保持一致。8 月，他又在讲话中强调，应该重新审查某些“小规定”，“熄灯”制度不应该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宿舍不是兵营”。当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他至少建立起由麦克米伦少将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英国士兵在营房里的生活方式和提出在哪些方面更适合时代的要求。

蒙哥马利特别注意提高陆军部工作人员的士气。除了关心他们的生活外，蒙哥马利还租用了附近的一家电影院，开始按他的习惯经常把参谋们和文职人员召去听他演讲。他向他们概要地介绍建设英国陆军的总体规划，号召他们为改进陆军部的工作而共同努力奋斗。

他说，在陆军部工作是一种荣誉，因此建议所有军事人员佩带一种特殊的标志。如果文职人员愿意的话，也应发给。此后陆军部的工作人员都开始佩戴那个标志。他提高士气的另一种做法是对工作人员关怀备至。例如，一个叫温博中士的书记员患了心脏病，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不得不退出现役。蒙哥马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地方上为他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干了几个星期后，蒙哥马利发现陆军部在科研和武器装备定型投产方面没有明确的政策。在研究了有关报告和反复考虑之后，他规定正规军应在 5 年内（到 1951 年）拥有足以对付有可能发生的一切小型纠纷的装备。全体正规军和本土军应在 15 年内（到 1961 年），在装备、人力、弹药、储备等方面作好打一场大仗的准备。此后，必须时刻做好准备。蒙哥马利的决策得到了首相、陆军大臣和参谋长委员会的首肯，艾森豪威尔将军和自治领陆军参谋长也表示赞同。

蒙哥马利还发现，白厅的部一级人员和军界人士对今后如何打一场大规模战争，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概念。陆军部曾把中东列为英国的“主要支援地区”，但首相艾德礼不同意这个提法，并在一次会议上反驳过这一意见。会后，蒙哥马利对海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说，三军参谋长应就大规模战争中的西方战略草拟一个文件，递交首相。但他们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对未来武器的威力还缺乏足够的根据，参谋部没有时间。但蒙哥马利决心草拟这个文件，于是向参谋班子下达了如下几条纲要，作为草拟文件的基础：

“一、我们应作出计划，逐步加强可能与我结盟的欧洲国家的实力，建立一个强大的西方集团，保护西方世界的民族、领土和文化免受来自东方的任何侵略。我们自己应该作好准备，和我们的盟国一起，承担一切义务，在欧洲大陆作战。

二、我们必须确保使用几大海洋的自由。尤其是我们应为北非的海岸线而斗争，从而使我们经由地中海的交通畅通无阻。

三、我们必须为中东而斗争，因为中东和北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地群，使我们可以向来自东方的任何侵略者的领土发动强大的空军攻势。陆军应在中东保持一个军司令部，以便开赴任何地区处理紧张局势。”

文件在一周内拟就，蒙哥马利将副本分送海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虽然他们二位仅对第一点表示不能同意，但还是不愿意把它作为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递呈首相。这是蒙哥马利在白厅为获得大家一致同意的英国战略而进行的斗争的开始，也是参谋长委员会内部摩擦的开端。

当1947年1月首相艾德礼再次反对三军参谋长关于必须固守中东的意见时，蒙哥马利问海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是否准备和他一起辞职也不放弃这个地区，并说，不管他们是否和他一致行动，他都准备这样做。他的两位同僚表示愿意和他一起采取行动。艾德礼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再也不提这件事了。最后，陆军部主张的战略终于被采纳。

蒙哥马利的许多海外之行曾受到广泛批评，但这些访问并不是毫无价值的。

1946年8月19日，蒙哥马利应加拿大政府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邀请，从利物浦乘船前往加拿大和美国访问。

蒙哥马利的加拿大之行访问了每个省的省会和首都渥太华，会见了各省省督、文官、退伍军人组织负责人以及许多未担任公职的加拿大著名人士，受到了各个方面的热情欢迎。在渥太华，蒙哥马利同有关方面讨论了英、加、美三国的武器装备及作战程序的标准化问题，后将讨论结果向伦敦作了汇报，并建议同加、美举行高级会谈，以解决整个问题。当白厅回电表示同意时，蒙哥马利脑子里已有了更为成熟的想法。他认为，现在已到了英、加、美三国在所有防务问题上密切合作的时候了，讨论的问题应不限于标准化，还应该涉及整个合作领域以及一旦战争爆发所应采取的联合行动。如果能和加拿大总理达成协议，他去华盛顿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于是，在英国政府的同意下，蒙哥马利在赴美途中到了渥太华，会见麦肯齐·金总理。麦肯齐·金完全同意蒙哥马利的建议，并授权他转告美国总统。

9月10日，蒙哥马利到达美国。他的美国之行除了要访问几个主要的军事设施外，还要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和美三军参谋长举行会谈。

在访美期间，蒙哥马利给美国新闻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与艾森豪威尔在1944年至1945年间进行的“指挥结构”之争在美国人心中引起的不愉快，已经烟消云散。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受到十分热烈的欢迎。9月11日，他与艾森豪威尔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当记者问起英美盟军在1944年的争论时，他俩轻而易举地就转移了话题。蒙哥马利说：“军人不善于处理政治问题。”听他这样说，艾森豪威尔轻声笑了起来。蒙哥马利被笑得莫名其妙，便问：“您在笑什么，艾克？”结果，引起哄堂大笑。

抵达华盛顿那天，蒙哥马利收到白厅来电。来电极力主张他的会谈对象只限于三军参谋长，要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与美国总统提及他的设想，并说各部大臣都不知道他在美国的活动情况。这盆冷水使蒙哥马利大为扫兴，但并没有浇灭他对此事的热情。当他和艾森豪威尔单独相处时，便立即和他讨论整个事情，并把与麦肯齐·金的谈话内容全部告诉了他。艾森豪威尔同意现在已到了坐下来研究和计划共同行动的时候了。要研究与计划的不仅仅是标准化问题，而且是与防务和战略有关的一切问题，并说陆海空军部长对时下正在暗中酝酿的局面已有充分的认识，现在就可以举行政府首脑级会谈。他希望蒙哥马利在第二天会见总统时当面谈一下。于是，蒙哥马利决定不顾伦敦的坚决反对，要同杜鲁门总统谈这个问题。

次日上午，蒙哥马利在白宫会见杜鲁门总统，当时没有第三者在场。一开始，蒙哥马利就说，艾森豪威尔和他认为讨论整个防务领域的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随后，又把麦肯齐·金的看法全部转告杜鲁门总统。最后，蒙哥马利说，国家首脑只需批准一下，军事参谋人员便可立即办理此事。杜鲁门毫不犹豫他说：“这很好，我同意，就这样办吧。”

离开白宫后，蒙哥马利回到艾森豪威尔那里，把与总统谈话的内容全部告诉了他。艾森豪威尔很高兴，立刻安排蒙哥马利与美三军参谋长见面。蒙哥马利把全部经过向陆军部作了汇报，并请他们转告首相。但他第二次收到了“泼冷水”的复电。接着，首相艾德礼来了电报，说他完全理解所提出的问题有重大的潜在价值，不反对就情况和方法程序进一步同美国人交换意见，但希望蒙哥马利不要承担任何具体义务。

9月16日，蒙哥马利登上“西奎亚”号游艇同美三军参谋长会见。美方的代表是总统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艾森豪威尔将军、尼米兹海军上将和斯帕茨将军。大家一致同意，讨论应尽早开始，内容应包括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的整个战略概念以及解决武器标准化和联合行动的最有效的途径。

大家还一致赞成第一次会议应在华盛顿举行，加拿大的计划参谋也一起参加。蒙哥马利的美国之行虽然是一次私人访问，但却确定了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这个机构继续发挥作用，为英国三军参谋长干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1947年1月6日，蒙哥马利又应邀到莫斯科访问。当蒙哥马利的专机抵达莫斯科机场时，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率领一大批元帅、摄影师和记者拥向机旁。机场上升起了英国国旗和红旗，气氛十分友好。那天晚上，蒙哥马利和华西列夫斯基作了一番长谈，讨论了他在莫斯科的日程。蒙哥马利特别提出希望访问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斯大林机械化部队学院以及伏龙芝军事学院。他的要求一一得到了满足。

在莫斯科，每天都有宴会。午宴、晚宴，每次宴会决不少于12道菜。每道菜之间，都得站起来演讲一通。对于菜肴之丰盛和品种之多，蒙哥马利觉得很难对付，但不久便发现，除非真的想吃，你可原封不动。然而，每道菜上来，必得尝一下，不然就是瞧不起主人。上菜后，过了一段时间，不管你吃了没有，盘子就被收去了。酒杯也是这样。每位客人面前有一排酒杯，斟满了各种酒或饮料，你只需选择你所喜欢的喝。当然，蒙哥马利只喝矿泉水。

蒙哥马利访问的高潮是和斯大林会谈。会谈是在1月10日，即蒙哥马利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在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进行的。蒙哥马利先向斯大林送了一箱威士忌酒和他的两部著作：《从阿拉曼到桑格罗河（第8集团军）》和《从诺曼底到波罗的海（第21集团军群）》。斯大林热情地道谢后说：“你送了我这些礼物，你希望我给你些什么呢？”蒙哥马利说，他不要有形的东西，只希望对他要说的给予帮助。

蒙哥马利同斯大林谈到了英美军队的关系问题，军事同盟问题，英、美、加武器装备的标准化等问题，并建议英俄两国共同作出努力，在两国军队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蒙哥马利说，俄军现在就应该去英国访问英国军队，并告诉斯大林，他已邀请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科涅夫元帅和雷巴尔特科元帅于6月份访问英国。斯大林说，他已批准了这次出访。

蒙哥马利又说，第二步应是英俄各种军事院校军官的交流。语言障碍也许会限制交流人数，但必得开个头，哪怕只交流一两个人也好。今后，随着

信任的建立，发生了兴趣，这个计划就会逐渐发展起来，那就更好了。但斯大林说，他觉得交流军官还不是时候，拒绝了蒙哥马利的建议。

蒙哥马利同斯大林谈了一个多小时，斯大林抬头看了一下钟。蒙哥马利意识到会谈该结束了，于是急忙提出最后一个问题。蒙哥马利说，战时，英国有些军人和文职人员娶了俄国妻子，他们希望把俄国妻子接到英国，但没有得到批准。这种情况在军人中只有7人，如果他把这7个人的名单交出来，不知能否请斯大林过问此事，给予帮助？斯大林说：“当然可以。”并保证他本人将过问此事。蒙哥马利便把名单交给了他。

当晚8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蒙哥马利举行告别宴会。晚会后，蒙哥马利对斯大林说，他愿意穿戴上华西列夫斯基和苏联陆军送给他的礼服和帽子，像俄国元帅那样向大元帅致敬。斯大林非常高兴，一定要和蒙哥马利合影留念。照完相后，斯大林问蒙哥马利下一个节目喜欢什么，要不要听些音乐或在他专用的放映室看电影或到城里剧场去看戏？蒙哥马利说，他想回家睡觉。当时已是晚上10点，第二天一早他要乘专机回伦敦。斯大林说：“很好，让我们都回家睡觉去吧。”

在苏联的耳闻目睹使蒙哥马利得到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所得到的印象是，俄国已精疲力尽……我认为俄国根本不可能进行一场对付盟国联合力量的世界战争，对此，俄国人也是十分了解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以便恢复。我的结论是，它将非常仔细地注视形势，确保不因外交上的疏忽大意似致在任何地区‘越界’而触发一场它所不能对付的战争。我认为，俄国要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有取胜的机会，得在15年到20年之后。”

尽管蒙哥马利得出了苏联不会进行战争的结论，并感到可能与苏联达成某种协议，但他继续坚持建立强大的英国应急部队，以防来自东方的攻击。

1948年1—2月间，面对海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的直接反对，他还是强行通过了他的“大陆战略”，使之成为英国的官方观点。

1947年下半年，蒙哥马利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海外访问活动。6月21日，他应邀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访问。在去澳大利亚途中，蒙哥马利于6月23日至25日顺便访问了印度，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确定了英军从这个次大陆撤走的计划，二是在印度独立后，就继续使用英国陆军中的廓尔喀部队一事达成了原则上的协议。

蒙哥马利于6月25日离开德里，中途在锡兰住了一宿，次日飞抵新加坡。在新加坡，蒙哥马利建议把远东海军司令部从香港移到新加坡，与陆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同处一地，以便于协调。这本来是一个十分合理的建议，但却捅了一个马蜂窝。当蒙哥马利把自己的意见正式报告给伦敦时，当时的海军也把他的看法报告了海军部。海军大臣勃然大怒，结果弄得在伦敦的俱乐部里，海军士兵甚至不同陆军士兵讲话。而在新加坡，陪同蒙哥马利访问的参谋军官也遭到海军总司令夫人的冷嘲热讽。鉴于这种情况，蒙哥马利坚持要把海军司令部设在何处的提法提请首相裁决。最后，蒙哥马利得胜了，远东海军总部终于从香港移到了新加坡。当蒙哥马利的专机在新加坡起飞时，海军总司令说：“我希望这家伙不要再到这里来，他惹起的麻烦真够我们受的。”

6月30日，蒙哥马利抵达达尔文，次日去堪培拉。他的日程包括访问澳

大利亚的每一个州，其中当然有他度过童年的塔斯马尼亚。除了旧地重游和访问老战友外，蒙哥马利与澳大利亚政府的会谈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澳大利亚打算在太平洋地区安全防务问题上承担多大的义务；二是关于英军驻澳大利亚代表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澳大利亚要求首先建立某种合适的机构，然后运用这个机构逐步形成最后承担责任的范围。关于第二个问题，澳大利亚政府认为，英国三军参谋长应派一位三军联合代表，在这位代表下设综合的三军参谋机构，而不应像现在那样三军各派一个代表。蒙哥马利完全同意他们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意见，并向伦敦作了汇报，希望他们采纳澳大利亚的建议。但伦敦的答复是，海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持不同意见，要国防大臣 A·V·亚历山大裁决。但最终这两个问题还是按澳大利亚政府的意见解决了。

1947 年 7 月 16 日，蒙哥马利乘飞机离开澳大利亚，同日晚些时候抵达新西兰，在半个月的访问期间，蒙哥马利访问了自治领南北两岛各大城市，会见了曾同他在埃及沙漠和意大利一起战斗过的许多老战友。关于军事问题，主要讨论了新西兰参与英联邦在这一地区的防务机构的方法。彼得·弗雷泽总理希望在防务上同澳大利亚密切合作，形成一个统一的防务组织。但他强调，在执行政策方面，新西兰政府必须有发言权，而与澳大利亚的防务一体化，则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关于这两点，没有任何困难，于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起了统一的防务组织。

1947 年 11 月中旬，蒙哥马利离开伦敦做非洲之行，访问的地区包括法属摩洛哥、冈比亚、黄金海岸、尼日利亚、比属刚果、南非联邦、南罗得西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埃及。历时一月有余。

蒙哥马利在访问期间同各阶层人士交换过意见，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英属非洲有丰富的原料资源并且完全可以开发，而这种开发足以使英国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进行卓有成效的竞争。但遗憾的是，英国对开发英属非洲似乎没有“总体设想”，因而对殖民地也没有基本规划。在给政府的报告中，蒙哥马利指出，两项紧迫的任务看来应是：第一，尽快以所需的资金、资本货物、人才和人力开发当地的资源；第二，为使英属非洲实现联合，必须冲破现有的许多障碍，制定开发英属非洲的“总体设想”，而不能只在看来有油水可捞的地区进行开发，那样是无济于事的。当得知首相希望把他的报告抄件送给殖民大臣阿瑟·克里奇·琼斯先生和某些其他内阁大臣时，蒙哥马利知道殖民大臣会强烈反对他的报告，于是在报告上加了这样一段话来对付他：

“制定总体设想需要巨大‘干劲’，实际上就是要赶快动作起来。许多人会说这行不通，这种人应毫不留情地予以撤换。说自己肚子痛的人总是把病情说过头，必须不去理睬他。”

殖民大臣的“肚子痛”果然立即来了。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几乎逐条反驳了蒙哥马利的意见，并重申殖民当局既不缺乏计划，也不缺乏干劲。蒙哥马利很快给殖民大臣去了一封冷嘲热讽的复函，他在信中写道：

“我以极大的兴趣拜读了阁下的备忘录。喜悉对开发非洲有一明确而为大众熟知的政策和地区性计划。然鄙人跑遍非洲大陆却未曾发现有此类之物，或许是鄙人愚不可及的缘故！”

在有关殖民地的问题上，巴勒斯坦问题也许给蒙哥马利带来了最大的麻烦。

1946年6—7月间，巴勒斯坦局势恶化，在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暴力活动之后，陆军逮捕了哈格纳和犹太事务局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和一些嫌疑分子。10月底，殖民大臣克里奇·琼斯认为，如果释放被捕的领导人并停止搜查武器，就会创造良好气氛，犹太事务局就会谴责恐怖活动并号召一切正直的犹太人起来反对恐怖主义。于是，到11月初就把被拘留的领导人统统放了，搜查武器的工作也停止进行。与此同时，驻巴勒斯坦部队在维持秩序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而英国士兵和警察却不断遭到杀伤。从10月1日到11月下旬，已伤亡士兵76名，警察23名。谋杀和破坏活动有增无已，铁路交通已全部中断。对于这种状况，蒙哥马利十分不满，于是向首相作了汇报，并说，如果不打算让陆军在巴勒斯坦维持法律和秩序，不如撤走了事，他不能同意大批士兵无谓地惨遭杀害。听了汇报后，首相要求早日对此作出报告。于是，蒙哥马利于1946年11月28日飞赴巴勒斯坦。

11月29日，蒙哥马利同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艾伦·坎宁安爵士和中东司令登普西在那路撒冷举行会议，讨论总的形势。得出的结论是，陆军由于受到禁令之故，不能支援警察部队维持秩序，在巴勒斯坦没有采取恰当的军事措施。当蒙哥马利还在那路撒冷时，一天晚上6点半左右，一群武装的犹太人袭击了一所警察局，并在街道附近埋了许多地雷，封锁了这个地区。市政当局作出的唯一坚决而迅速的決定却是取消那天晚上在政府大厦举行的宴会。蒙哥马利马上发电报向白厅反映意见说：“目下对付巴勒斯坦非法武装组织的办法软弱无力，荒谬之至，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1946年12月29日，犹太人为了报复英军鞭打一名犹太活动分子，绑架和鞭答了1名英国军官和3名士官。这件事使英国群情激愤，并且反映到1月1日专门为巴勒斯坦问题召开的会议上。首相大力支持蒙哥马利，殖民大臣被击垮了。结局是殖民部接到训令要它和陆军部协商，起草一项新的指令给高级专员。散会时殖民大臣让蒙哥马利起草这项新指令。于是，蒙哥马利在指令中写道：“在巴勒斯坦建立和维持法律与秩序，必要时可动用警察和军队。……警察部队应对破坏法律者采取攻势，使英王部队确保主动权。……”这项指令经同意后立即下达给高级专员。

当时巴勒斯坦的斗争正处于高潮，各式各样的组织向英国人和建筑物发动了袭击。一个叫做斯特恩邦的人，甚至派遣一组人去欧洲，炸毁了英国在罗马的使馆。但有一天，蒙哥马利的副官在接电话时，听到对方说：“是陆军部吗？我是斯特恩邦。”

副官回答说：“是的，你有什么事吗？”

对方说：“今晚要请陆军元帅吃颗炸弹。”

副官说：“谢谢，我一定转告他。”

对方说：“你在开玩笑吗？”

副官说：“不，我想是你在开玩笑。”

对方说：“喔，那也请你吃颗炸弹。”说完后，对方挂上了电话。

1947年2月，英政府决定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但不附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

1947年11月底，联合国投票赞成把巴勒斯坦分成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部分，安排了一个委员会来决定这两个部分的疆界。由于这个决议，英国政府12月作出决定：

1948年5月15日结束委任统治，8月1日前完成英军的撤退工作。后来

又把撤军日期提前到 7 月 1 日。

从 1947 年 12 月起，巴勒斯坦形势急转直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打了起来。1948 年 4 月下旬，雅法发生激烈战斗，阿拉伯人处于不利地位。雅法是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唯一港口，英政府要求蒙哥马利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在 5 月 15 日前不使该市易手。蒙哥马利据此下达命令说，如果犹太人攻下雅法，英军应将它重新夺回来。4 月 28 日，中东总司令把部队和坦克送到雅法，在战斗机掩护下，赶走了犹太人，熄灭了该市的战火。蒙哥马利决定，在 5 月 15 日之前要坚守耶路撒冷、雅法和海法三个地区，部队最后从雅法撤走。

但是，有关雅法激战的报道，却在外交大臣厄尼·贝文和蒙哥马利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4 月 22 日晚上 7 点半，蒙哥马利正要去梅逊大厦发表支持陆军军校学员队的演讲，首相派人把他叫了去。首相和贝文对报纸报道有 23000 名阿拉伯人被杀感到很不安，问蒙哥马利打算怎么办。蒙哥马利说，他不相信报纸，只相信将军的报告，不过尚未收到。只有获得确切的报告，才能决定怎么办。于是，他立即奔赴陆军部去获取急需的报告。

次日早上 9 点，蒙哥马利去见首相和贝文。他对他们说，到目前为止，收到的报告表明，整个局势已被大大地夸大了，陆军从来没有失去对局势的控制。贝文则说，陆军本来可以制止雅法的一切胡闹，屠杀阿拉伯人的事，弄得他在阿拉伯国家面前处境困难，他已被“陆军拆了台”，蒙哥马利听后十分生气，要他收回对陆军的侮辱，并把这件事报告了参谋长委员会的同僚，通知了陆军大臣，电告了中东总司令。蒙哥马利为这事同贝文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在首相的调解下才又同贝文言归于好。

蒙哥马利在任帝国参谋总长期间，与政府发生了许多冲突，但最严重的冲突是关于国民兵役制和战后陆军的规模问题。英国政府不能确定他们在战后要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和需要多大规模的陆军。蒙哥马利则坚持认为，政治家应该决定英国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再根据所追求的目标计算陆军的规模。因此，蒙哥马利和政府之间便在国民兵役制和战后陆军规模这两个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拉锯战。

战争结束后，英陆军由于迅速复员而造成兵员严重不足的局面。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和平时期采用国民兵役制。1946 年 10 月，蒙哥马利向参谋长委员会呈递一份综合性报告，说明在和平时期国民兵役制是十分必要的。经过一番争论，报告转给了政府。和平时期国民兵役制究竟有无必要，政府曾为此举行了好几次争得面红耳赤的会议，最后终于同意实施国民兵役制。

1947 年 3 月，政府向议会提出了国民兵役制法案，但遭到许多工党议员的反对。政府发现自己党内出现了分歧，于是决定把 18 个月的服役期减为 12 个月。蒙哥马利指出，18 个月服役期是必需的；若把服役期减为 12 个月，陆军非变更部署不可。不过，陆军可以接受把服役期减为 1 年，但条件是取消海外义务，并保证以后不再增添。1947 年 7 月，服役期为 1 年的国民兵役法被议会通过，获得国王的批准，并将于 1949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

1948 年 6 月 24 日，俄国人开始封锁西柏林，国际局势严重恶化，英国政府的反应是提议三军暂停复员 6 个月。蒙哥马利却对首相说，解决兵员不足的唯一最好办法是从 1949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服役两年的国民兵役制，因此，政府应修改国民兵役法。最后，蒙哥马利发现无法使政府同意服役两年

的建议，于是提出服役 18 个月的建议，并力争通过。10 月 19 日，蒙哥马利召集陆军委员会的军方成员开会，问他们如果政府作出的决定少于 18 个月，他们是否打算在他的带领下集体辞职，他们一致表示同意。蒙哥马利便把此事通知陆军大臣伊曼纽尔·欣韦尔。欣韦尔大吃一惊，立即向首相报告，说他控制不了陆军委员会。后来，政府于 11 月下旬作出决定，同意了 18 个月的服役期，但当时蒙哥马利已离开陆军部出任西方联盟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7 年夏，关于英国整个武装部队兵力问题的讨论，开始引起了严重的反响。蒙哥马利取消了计划中的日本之行，急忙从新西兰赶回英国，支持政府同削减军事预算的压力作斗争。8 月初，国防大臣亚历山大宣布，首相希望削减三军总人数，国防开支总额削减到 6 亿英镑，其中海军 1.6 亿英镑，陆军 2.7 亿英镑，空军 1.7 亿英镑。三军参谋长据理力争，但仍无法阻止政府于 1947 年 10 月初批准这一数字。

10 月 27 日，在下院的一场辩论中，亚历山大就三军发展的优先顺序发表看法说，国防研究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应是维持皇家空军的结构及其最初打击力量，第三位是维持海上交通，“然后尽我们力之所能考虑陆军的战力问题”。蒙哥马利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强烈抗议，要求在估计三军作用时，不要使用“优先”这个词。

1948 年 1 月 14 日，蒙哥马利接到国防部通知，陆军在 6 亿英镑中所占的份额为 2.22 亿英镑，正规军人数为 18.5 万人，国民军人数为 10.5 万人，这使陆军各级组织进一步遭到大削大砍。蒙哥马利拒绝接受正规军为 18.5 万人的方案，说总数应为 20 万人。经过抗争，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由于蒙哥马利与国防大臣亚历山大在战后陆军的规模这个问题上看法相左，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在 1948 年 7 月 15 日的一次令人特别恼怒的会议之后，蒙哥马利对海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说，亚历山大是个“不中用的人”，要他们和他一起请求艾德礼首相罢他的官，理由是他们不信任他。他俩觉得亚历山大的态度不值得同情，便一口答应了。但后来经过考虑，他俩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宪法，而且对参谋长委员会的地位也有不利之处，于是打了退堂鼓。蒙哥马利发现自己已是单枪匹马，只好作罢。

9 月 10 日，亚历山大又和三军参谋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起因是关于征募兵员的问题。特德要求政府给予更多的帮助，亚历山大却说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不能这么做。特德火冒三丈他说，在这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上，政府从未帮过三军的忙，也从不引导全国了解武装部队征募正规军的重要性。亚历山大马上以三军薪饷条例和国民兵役制的例子加以反驳，这时，蒙哥马利在一旁火上加油他说，在陆军中，一提到薪饷条例，人人都要咒骂，它根本不是什么巨大成就，而是头等胡话；至于国民兵役制，谁都知道是他们争来的，政府在最后关头还“摇摆不定”。随后，当特德讽刺亚历山大只做小题而不承认有大事时，蒙哥马利又笑出声来，并且说他完全同意特德的意见。最后，蒙哥马利说，三军居然会被削减到如此危险的地步，“我们已沉到底了”。蒙哥马利与特德一唱一和，把亚历山大气得七窍生烟，有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后来，亚历山大对陆军大臣欣韦尔说，蒙哥马利是个非常难弄的人，他已开始考虑由谁来接替他。

9 月 21 日，三军参谋长提出报告，说明皇家海军、陆军和空军的现状以及影响三军的一些主要因素。三军参谋长的报告最后说，目前部队的状况，引起了“极为严重的不安”。9 月 23 日，亚历山大在下议院发表讲话时宣布，

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已采取步骤，“对三军整个人力和装备问题”予以重新考虑。

蒙哥马利发现参谋长委员会这个机构总是不能协调一致，效率极低，其根本原因是国防大臣不得力，国防部秘书处不中用，三位参谋长互不协调。在人力物力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三军各为自己打算。于是，他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由一个大臣级委员会来审查白厅的防务组织，主张设立总参谋长并由总参谋长担任参谋长委员会的常任主席。但由于海军大臣、空军参谋长和国防大臣的参谋长官都激烈反对此种审查或改变体制的做法，蒙哥马利的建议被打入了冷宫。但 10 年之后，即 1957 年，蒙哥马利的主张终于变成了现实。

蒙哥马利在任参谋总长期间，还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情。据说，有一次在海上旅行时，蒙哥马利和乔治·科尔中将会“伏击”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当时他们在一条船上旅行，但葛罗米柯谢绝会见蒙哥马利。葛罗米柯习惯于清晨起来到甲板上散步，蒙哥马利和科尔就事先藏在通风装置后面。当葛罗米柯走上甲板，科尔引开葛罗米柯的保安人员，蒙哥马利就走上前去同葛罗米柯交谈。在另一次横跨大西洋的旅行中，蒙哥马利做了一个大蛋糕庆祝自己的生日。他每天邀请几个人去喝茶，吃蛋糕。一位富有的美国女商人问，她是否也可以享受这种特权。她被告知说，只要她向蒙哥马利指定的慈善机构捐赠一笔款，她就会受到邀请。第二天，蒙哥马利要求她预先开出支票；于是，女商人退却了，她的财产分毫无损，但蛋糕也没有吃成。当 1946 年 9 月访问加拿大时，蒙哥马利决定收集他签过各种文件的钢笔（通常是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的文件）。有些城市的长者对他们价值昂贵的钢笔以这种方式得到“解放”心存不悦，在哈利法克斯就明显如此。到访问结束时，帝国参谋总长的行李中已经有了 11 支非常漂亮的新钢笔。

当然，蒙哥马利也不可避免地在公众场合制造了一些令人扫兴的尴尬局面。有一次，300 多名军官在伯明翰大饭店举行团聚晚宴。宴会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蒙哥马利站起来要求大家安静：“当乐队演奏的时候，你们大家都聊得非常愉快。现在，我请乐队演奏另一支曲子，但这一次，你们必须保持绝对安静。”结果，整个宴会马上失去了自发的欢声笑语，热烈气氛一扫而光。更令人尴尬的事件发生在斯大林为他举行的宴会上。为了打破席间有点呆板乏味的气氛，蒙哥马利决定跟莫洛托夫开个玩笑。他问起莫洛托夫在纽约的生活，并说：“显而易见，你早上的时间是花在盘算如何在上午挫败对手方面，下午的时间则用在挫败对手的活动中，晚上则跳舞和饮酒。所以，很显然，政治家们并不工作。”这番话使斯大林非常高兴，却使莫洛托夫如坐针毡。

在陆军部工作期间，蒙哥马利在威斯敏斯特有一套间，但他却喜欢住在郊区。经过一番勘查，他在汉普郡看中了韦河旁的伊辛顿磨坊，于是便把这座古老的磨坊及其周围的草地和两侧的田地一并买了下来。磨坊的主要建筑很结实，里面全是机器，从不住人。水、电、煤气等得从远处接过来，最近的电源线也远在 1 英里之外。蒙哥马利决定保持建筑物的外壳，但把内部改装成住家。

战后头几年内，建筑材料和劳力都极为缺乏，一切住房都由卫生大臣严格控制。蒙哥马利向磨坊所在地区办事处申请许可证，但遭到拒绝。蒙哥马利便给卫生大臣安奈林·比万写信，请他出面干预。但比万说，这在法治方

面将使他处于困境，他也是爱莫能助。最后，蒙哥马利向首相呼吁，才领到了许可证。当得知蒙哥马利修建家园有困难时，塔斯马尼亚送来了橡木、山梨木；加拿大政府送来了雪松板；澳大利亚政府送来了一座车库；新西兰政府送来了家具。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自治领的鼎力相助之下，蒙哥马利终于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园。

1948年9月20日中午12点45分，国防大臣亚历山大召见蒙哥马利。他告诉蒙哥马利说，他已提议任命蒙哥马利为西方联盟各国总司令委员会主席。9月27日，西方联盟五国国防大臣（部长）在巴黎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对蒙哥马利的任命。于是蒙哥马利在同国防大臣、其他内阁成员和参谋长委员会的不断争吵声中结束了他的帝国参谋总长的任期。正是：雄心勃勃强陆军，时世艰难志未成；政治主子不中意，卷起铺盖换门庭。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一章 国际战士

主席转任副统帅，主管训练很自在；
来往盟国忙演习，不忘青年新一代。

1948年3月17日，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五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宣告西欧联盟成立。一开始，这个条约仅限于经济事务和促进民主等。苏联于1948年6月封锁西柏林后，西方国家认识到，必须考虑制定西方防务计划。于是，布鲁塞尔条约国的五国国防大臣（部长）和三军首长开始讨论人员和装备问题，并于1948年9月决定建立西欧联盟防务组织，草拟联合行动计划，以对付一旦出现的袭击。蒙哥马利被任命为西欧联盟各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委员会的常任主席。蒙哥马利几乎是不可能拒绝这个任命，因为一方面英国政府迫使他接受，另一方面这也完全符合他的一贯主张：西方国家有必要建立一个互相协调的军事司令部。因此，蒙哥马利说，如果这是政府、参谋长委员会中他的同僚和西方联盟中别的政府的一致愿望，他就接受此项任命。不过，他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他仍是一名英国军官，他的名字仍应留在陆军部的花名册上，不把他的个人事务转给某个国际组织；另一个条件是在另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下，不由他出任最高统帅。他的两个条件都得到了满足。

西欧联盟各国总司令委员会的总部设在法国枫丹白露，联合总部简称：“联总”。蒙哥马利被任命为联盟各国总司令委员会主席后，即去枫丹白露附近住下。他和同僚们走遍西欧，研究各种问题，并制定了对付侵略、保卫西欧的计划，但没有一个计划能够实现，因为这些国家都不愿意提供必要的、经过专门训练的、有健全的指挥机构和可靠的通讯联络系统的部队。更大的困难是，没有真正的团结一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共同利益牺牲任何主权。

蒙哥马利认为，这些国家强调经济复兴，不了解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都是必需的，而且必须平衡得当。只有以军事实力作后盾，政治才能有力量，实力是最重要的。但西方联盟如果不在政治上意见一致，要想实现经济合并和建立军事实力，是十分困难的，外长们在表示友好与团结的宴会之后，围着桌子坐下来签署条约是一码事，回国后要求各个政府根据条约行事又是另一码事。

当了几个月主席之后，蒙哥马利得出结论：如果要在西欧组织防务，防御布局就必须包括西德。但当时的状况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连能否守住莱茵河这条线都靠不住。于是，他于1949年1月去见外交大臣贝文，请他采取措施，使西德加入西欧联盟，并最后使它加入正在讨论中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贝文对蒙哥马利的建议感到十分惊讶。

1949年11月，蒙哥马利又去美国向美国三军参谋长、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宣传这一思想。为了把西德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纳入西方阵营，蒙哥马利不断地作出努力。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蒙哥马利加快了使西德进入西方阵营的步伐，马上向西欧联盟各政府送去有关此事的书面报告。

1950年9月，北约理事会讨论了德国参加西方防务的问题，但遭到法国的激烈反对。随后，北约国家为此争论了4年之久，直至1954年8月30日法国国民议会否决这个计划为止。最后，西德终于在1955年5月9日成为北

约的正式成员国。

1949年4月签订北大西洋公约后，西欧联盟防务组织被吸收进这个由美国人统治的新体系。

1951年4月2日，艾森豪威尔出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统帅，接管了所有北约部队的作战控制权。蒙哥马利成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副统帅，先后在4位美国最高统帅手下工作，一直到1958年9月退休为止。

在国际舞台上的这10年，是蒙哥马利一生中较为轻松愉快的一个时期。在这10年中，由于他那难以改变的个性，蒙哥马利虽然难免同周围的人产生摩擦，但却极少发生大的争吵。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他远离了决策中心的缘故。英国政府让他出任西欧联盟各国总司令委员会常任主席，实际上是对他明升暗降。尽管蒙哥马利有金光闪闪的头衔，但他那个职务并不比一个协调员好多少，真正的权力仍掌握在各国政府手里。当北约成为军事实体时，蒙哥马利又戴上了“最高副统帅”的头衔，但他的作用却更显得无关紧要。艾森豪威尔1951年3月12日给蒙哥马利的指示阐明，艾森豪威尔不在时，由蒙哥马利负责全面指挥。但他作为副统帅的职责却使他的权力受到限制：“你担负的主要日常责任是对打算今后拨归本司令部的各国部队进一步做好编制、装备，训练和战备工作，并通过同下属司令官紧密合作，对已经拨归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部队履行同样的职责。”在履行这些职责时，蒙哥马利的控制是间接的，“为了帮助你做好这件工作，你可通过参谋长支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整个参谋部。当然，给下级指挥官的一切行政命令，应当通过参谋部颁发。”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统帅的真正副统帅是参谋长——一开始是格伦瑟，格伦瑟成为最高统帅后，是斯凯勒。蒙哥马利的角色只不过是一个东奔西走的军事演习组织者。

因此，他再也没有力量去影响决策中心的各种关系，但他发现新的工作比当帝国参谋总长更合他的口味。在西欧联盟各国总司令委员会，他致力于确保盟国部队能有效地进行防御。尽管他承认，不断地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源可能使某些外交部长烦恼，但这些外长们至少没有像亚历山大那样，接到那么多并不需要的忠告。

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副统帅这个职务似乎是专为蒙哥马利设置的，没有任何实权和责任一点儿也不使他着急，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真正追求过半军事领域中那种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权力。对他来说，权力意味着向参谋人员和下级指挥官发布命令的能力。他知道，他不善于处理战后欧洲军人与文职政府那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作为最高副统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人物之一，他依然享有巨大的声誉和很高的威望。由于他现在不处于北约机构的中心位置，他能够对许多事情进行批评而不至于引起太多的怨恨。他主管训练，而训练一直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不得不在欧洲东奔西走，忙于检阅各国部队，而这正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因此，副统帅的位置对他来说是再适合不过了。

蒙哥马利在任“联总”主席时就逐渐认识到，西欧联盟防务组织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常规力量来对付苏联的威胁，原子武器已成为西方防务必不可少的手段。比原子弹的威力大得多的氢弹的问世，更坚定了他的这种信念。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西欧联盟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技术优势。

1950年1月，他在向说英语协会发表演讲时，便把这个观点作为演讲的主题。到50年代中期，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与他任参谋总长时的观点形成

了鲜明的对照。1955 年 10 月，他在向皇家联合军种协会发表演讲时说，未来已显而易见地掌握在科学家手中。早在 7 个月以前，在北约的一次军事演习之后，他对记者们说，核武器将改变战争的节奏。常规力量不会被抛弃，但核武器将决定未来战争的参数。自 1945 年以来，核威慑战略便一直是西方用来阻止苏联使用其优势常规力量的主要手段。后来，蒙哥马利接受了核威慑战略理论。于是，他与北约和盟国大多数防务专家的看法趋向一致。看法的一致使他更易于同与他打交道的人保持和谐的关系。但是，在接受核威慑的思想之后，他却把它推向了极端。他说，在一次全球战争中，只要对军方提出使用核武器的要求哪怕有一点点的迟疑，都会造成敌地面部队席卷北约国家领土的严重后果。一旦发生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使用核武器。他的这番话曾使许多人非常担心。然而，他在 1956 年更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说得明确无误。他说：“如果世界上谁敢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应该对他们使用原子弹和氢弹，应该以我们所拥有的最厉害的武器和所拥有的一切武器，对他们实施打击。”6 月 1 日，丹尼斯·希利在下议院提出质询，问蒙哥马利最近在加拿大的讲话是否反映了北约的方针。

10 月 11 日蒙哥马利在澄清他对政治家控制核武器的态度时说：“就我本人而言，我会首先使用它们，然后再提问题。”

然而，人们对他这些可怕的说法并没有太认真，因为他已没有任何权力把他那多少有些天真的想法付诸行动，他的话可以被看作是北约参谋军官的个人意见而被置之不理。现在，蒙哥马利已不能在英国政坛激起波澜，而只能引起小小的涟漪。他有关北约政治团结的坦率陈言，并没有在下议院引起多大反响，只有他的核威慑观点，才在那里引起了一些表面的惊慌。

可是，在上议院一次小小的争论中，他却成了中心人物。1945 年，工党反对派提议，应该让蒙哥马利交出吕讷堡荒原的投降文件。丘吉尔坚决支持由蒙哥马利保存那份文件，因为是蒙哥马利元帅本人阻止了这份文件落入美国人之手。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持续了好几天，蒙哥马利只好孤零零地坐在那十分显眼的贵族席上。丘吉尔使出浑身解数为他辩护。他辩解说，如果未来的将军每俘虏 200 万敌军就让他们保留投降文件，这对他们将是十分有益的鼓励。最后，这个问题中止讨论，很可能是欣韦尔在暗中进行干预的结果。

北约组织机构臃肿，几个重要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多得远远超过和平时期的需要。文件之多，无以复加，时间都泡在看文件上，军官们大多没有时间思考，影响工作。蒙哥马利对此十分不满。有一次，他收到一份报告，随后便附上一张纸条，派人送给参谋长。他在便条上写道：

“一、您读过这份报告吗？”

如果我们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有大奖，我将给它一等奖和一枚奥林匹克金质奖章，以表彰它如此大量的陈词滥调、陈腐思想、绕来绕去的长句子、许多人不明白的非常用词汇以及冗长和累赘。

二、不用说，为北约委员会写的文件必须表达清晰，语言简洁，紧扣主题。我们必须讲事实，并用事实来说明某种道理。重要的是文件内容的质量，而不是文件的页数。

三、当讨论这份文件时，我希望上帝能出席我们的会议。特别是剩下的 465 页如果也像这 35 页，我们肯定需要他的帮助。

蒙哥马利元帅”

蒙哥马利的方法是，司令官提出一个简单的计划，然后由参谋人员制定出计划的具体细节。他过去作计划时一直使用这种方法，并且非常有效。在朝鲜战争期间，一份评估报告估计，苏联人可以在 5 天内抵达英吉利海峡。于是，参谋部准备了一个“短期计划”，但那个“短期计划”却是厚厚的一本书。蒙哥马利对计划人员说的第一句话是：“它都说了些什么？把它写在一张纸上。”计划人员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蒙哥马利宣布，这份计划毫无用处，必须重新制定。这种刻意追求简单和明了的做法，对于纠正北约参谋部那种冗长、累赘的文风，是十分必要的。

蒙哥马利还认识到，如果西方世界要生存下去，西方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欧洲联盟的大陆国家怀疑英国是否坚定，害怕敌对行动一开始，英国就会尽快撤走它的部队。因此，蒙哥马利经常强调西方的团结和国际主义，这有助于驱散他们的恐惧心理。

蒙哥马利同美国人保持着友好关系，并经常去美国访问。这些访问反过来又加深了他在 1946 年给美国人留下的好印象。在访美期间，他拒绝谈论北约或任何有争议的问题，他总是以“那是政治家谈论的问题”把提问者拒之于千里之外。他坚持要去参观药店和观看垒球比赛，并说他上一次访美时，没有发现美国文化的这两种表现形式。蒙哥马利同他的大多数美国上司相处得很好。艾森豪威尔、李奇微、格伦瑟和诺斯塔德都先后出任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统帅。虽然蒙哥马利与李奇微的个人关系不怎么好，但他俩在工作和策略方面没有发生过类似他与艾森豪威尔在 1944 年发生的那种冲突。实际上，他已不再处于能引发这种冲突的地位。他接受了核威慑战略便意味着他总是能与参谋部的其他人意见一致。在他与美国人的关系中，唯一一次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在 1954 年。那年 12 月，蒙哥马利在美国访问。当时，为运载新一代战斗机而研制的巨型航空母舰“福莱斯特”号刚刚建成下水，蒙哥马利认为，这种大型舰只现在已经过时，由于他说话缺少策略，他的看法很快就被公之于众，结果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但是，当圣诞节过去时，整个事情已被美国人忘得一干二净。

蒙哥马利对北约的主要贡献在训练方面。他是训练部队的杰出大师，凡是他组织的演习，不论是为少数高级军官组织的室内演习，还是为大部队组织的野外演习，都能针对参演人员的问题找出他们的弱点。他对细节问题的关注有时简直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

1956 年 4 月，他举行代号为“CPX6”的军事演习，北约国家 300 多名高级军官参加了演习。在 3 天演习结束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似乎对军事问题不怎么感兴趣。但他却自豪地告诉记者，他已经生产出一种特殊的咳嗽糖，可以减少招待会上的噪音。参加招待会的人吃掉了成千上万的咳嗽糖，蒙哥马利也因此可以顺利地他的活动而无需浪费时间去发布不准咳嗽的命令。

要组织这些演习，蒙哥马利不得不经常东奔西走，访问每一个北约国家。但他喜欢这样忙忙碌碌，习惯于作某种非官方使节，在大多数盟国他都代表北约最高司令部。他总是同被访问国家的总参谋长讨论训练和军事问题，而让与政府有关的重要军事问题的讨论在另一个层次进行。当他每年大约在同一时间访问同一些国家时，他的任务已成为一种例行公事。在 50 年代，北约常用他那种非官方使者的身份推行北约的重要政策。1953 年 9 月和 1954 年 9 月，他两度作为铁托总统个人的客人访问贝尔格莱德。尽管他们声称这些访

问纯属私人性质，但它们明显地有着重要的国际色彩。这两次访问虽然没有讨论任何特别微妙的问题，但却清楚地表明，西方和南斯拉夫正在改善关系。后来，蒙哥马利建议去马德里访问佛朗哥将军，但北约对待西班牙的态度是复杂的，认为最高副统帅的访问不会起什么作用。他的建议遭到拒绝后，蒙哥马利显然有几分恼怒。

虽然他在“联总”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角色对他非常适合，但这并不是说某种职务会对他的性格产生深远的影响。蒙哥马利是个不善于交际的人。频繁的旅行意味着他很少呆在枫丹白露司令部。当他在那里时，他也很少是大家的好伙伴。如果出去吃饭，他只愿意去英国大使馆，并且不常去。

1954年春天，蒙哥马利参加英国大使馆的一次宴会，爱丁堡公爵出席了宴会，法国国防部长勒内·普莱文也应邀参加。当时，奠边府刚刚陷落，普莱文显然比较难过。晚宴安排在8点开始，但这在巴黎是少有的，因为那里的晚宴一般都很晚，普莱文很晚才到，因为他以为宴会是9点开始。大家在等了将近1个小时之后，便开始吃了起来。谁知大家刚开始吃，普莱文便赶到了。在这种庄重的场合迟到，使普莱文十分慌张。每个人对他和他的夫人都非常客气，十分礼貌，一切都十分顺利。突然，大家听见蒙哥马利那细而尖的声音说道：“唉，普莱文先生，成为法国最不受欢迎的人的感觉如何？”顿时，宴会上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难堪得简直透不过气来。

显然，蒙哥马利对自己使别人陷入窘境并不感到内疚。另一次是在玩高尔夫球时，蒙哥马利和乔治·科尔联手对葡萄牙业余冠军。玩球时，蒙哥马利老是嘲笑对方：“想想，你可是个专家！”蒙哥马利的嘲笑使对方不断分心，不能集中精力。结果，被蒙哥马利和科尔远远抛在后面。后来，科尔告诉蒙哥马利他为他感到羞耻。蒙哥马利却回答说：“那有什么，我们不是想赢他吗？”

蒙哥马利在当“联总”主席期间，比后来在北约有更大的权力。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发生了一些最严重的个人冲突。他同欧洲地面部队司令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闹翻了脸。争吵的起因不是很清楚。

1947年8月，德拉特尔为训练组织的“轻型兵营”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印象。当蒙哥马利还是帝国参谋总长时，他们还于1948年7月在一起亲切地谈论西方的团结。在蒙哥马利把“联总”司令部移到白厅的多佛厅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便迅速恶化了。关系恶化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贝尔彻姆误译德拉特尔的一封信引起的。贝尔彻姆把“我强调”译成了“我坚持”，蒙哥马利对这种措词的反应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俩积怨为什么会那样深。在招待会上，德拉特尔拒绝同蒙哥马利说英语，蒙哥马利也绝不用法语同他交谈，这种尴尬局面是非常令人难堪的。

他俩个性都很强，完全不能互相理解。德拉特尔在1950年告诉利德尔·哈特说，他简直不知道怎样对付蒙哥马利。利德尔·哈特的忠告是，不要对他太客气，对他强硬些，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蒙哥马利而言，他总是不知道怎样调整自己，以适应另一个人的性格。他不是和别人相处很好，就是不能同别人相处，没有调和的余地。

德拉特尔去印度支那任职后，他俩保持着亲密的通信关系。当德拉特尔的儿子在印支战场上牺牲后，蒙哥马利给他写去了慰问信。德拉特尔的继任者朱安发现，他同最高副统帅相处也有许多问题，但他们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生个人冲突的机会比在“联总”少得多。所以，朱安与蒙哥马利的争

吵没有德拉特尔与蒙哥马利的争吵那么厉害。

蒙哥马利最后 10 年的军队生涯过得轻松自在，无忧无虑。他不用担心提升，也没有肩负多少重大责任，生活过得舒适、安逸。他的年薪为 5170 英镑，此外，还有 1000 英镑的娱乐补助费。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伊辛顿磨坊的翻修工作已于 50 年代初结束，他现在已有一个舒适的家，并且配有陆军勤务人员。他的生活方式已经定型。他过的是一种公众生活，而不是私人生活。他与家庭成员（他的儿子戴维除外）之间的鸿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他对戴维仍然是保持一种冷淡的父子关系。

蒙哥马利对他的亲属从来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可言，他对他们的疏远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贝蒂去世时，他拒绝让自己的妹妹温莎照顾戴维。在战争期间，他虽然曾答应要参加他弟弟布赖恩的婚礼，但在最后一分钟却决定去看足球比赛而不去参加婚礼。他的母亲仍然是他最不喜欢的人。当纽波特市决定授予帝国参谋总长蒙哥马利荣誉市民称号时，他的母亲决定去参加授称号仪式，于是给纽波特市政会写信，并受到了邀请，但他的儿子却不知道这件事。当蒙哥马利到达并发现他的母亲在场时，他非常生气。可是，他对此已毫无办法。但他却坚决不让他的母亲参加午餐会。他坚持要这样做，也就只好按他的要求办，这使非常好客的纽波特市政会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

1949 年他的母亲去世时，蒙哥马利拒绝参加她的葬礼。很难说他母亲的死对他有多大影响。长期以来，他一直不喜欢他的母亲，当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也许他已经没有多少感觉。那个对形成他的复杂性格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女人，就这样悄悄地走出了他的生活。

蒙哥马利对其他的亲属也保持着距离。当他在多伦多访问时，他的堂侄到他下榻的饭店去看望他。蒙哥马利的反应是：“他想要什么？我不想见他。”他只是敷衍塞责地同堂侄交谈了 5 分钟。他的妹妹们同他的关系比他的兄弟们近乎些。但战争结束后，他认为她们对他感兴趣也仅仅是因为他获得了成功。

他同戴维的关系却要复杂得多。他非常喜爱自己的儿子。当戴维在国民兵役训练中获得“荣誉武装带”时，他为他感到骄傲。但当戴维的第一次婚姻破裂时，他也不问青红皂白，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是他儿子的错。但他对戴维的爱是深厚的，儿子婚姻的破裂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父子关系。后来，戴维成为蒙哥马利在伊辛顿少有的几个探访者之一。

那些在战争期间了解蒙哥马利的人发现，他现在同过去一样，对人际关系十分淡漠。他仍然不能或不愿意同任何人亲近，或建立真正的个人感情。不论是在伊辛顿过简朴的舒适生活，还是周游世界，他都能发挥他那自封的军人政治家的作用。他经常给《泰晤士报》写信：1950 年 2 月，他抱怨现代滑雪运动已经堕落；同年他规劝人们到威斯敏斯特剧院去看戏剧《旅行的终点》；1952 年 1 月，他呼吁举办开放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同年 4 月，他要求对板球进行更多的控制，以使之更具吸引力；1956 年他在一次晚宴上发表有关板球的演讲，把板球说成是一种需要领导、纪律和训练的运动。他经常看各种体育比赛，尤其喜欢看朴次茅斯队的足球比赛。

蒙哥马利还从对青年人的关怀中获得最大的满足。他喜欢青年人给他作伴，对此他毫不掩饰。他非常关心青年人的培养问题，但他所说的青年人仅指男青年，而不包括女青年。1946 年 5 月，他在英国青少年俱乐部协会的一

次会议上发表演讲，演讲的主题是“青年需要引导”。他宣布说，当国家不再需要他的时候，他将致力于训练青年人，在战后那些年的各种集会上，他都反复强调“青年需要引导”这个问题，并说他愿意给予这种帮助。他认为，国民兵役法将使英国青年得到很好的培养。

蒙哥马利总是乐于支持青少年俱乐部和其他青年组织，而且他给予的帮助常常是非常实际的。在任北约副统帅期间，他成为遍及西欧的野营活动“康科迪亚”的主席。他本人并不富有，但却常常为培养青少年的活动慷慨解囊，集资捐款。

然而，蒙哥马利对青年人的关心并不仅仅局限于青少年俱乐部和青年组织，他还同许多青少年保持着个人联系。一个名叫斯图尔特·怀特的10岁小男孩于1957年给他写信说，他想当海军陆战队队员。蒙哥马利当时身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副统帅，却亲笔给他写了一封回信，祝他运气好。蒙哥马利同拉德利划船队的8名队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该队在1952年举行的伊丽莎白女王杯划船比赛的半决赛中，击败了圣保罗队。蒙哥马利来到比赛终点，并让舵手去把发奖了。那年9月，拉德利划船队在挪威参加划船比赛，当时蒙哥马利正在那里指挥一次军事演习。拉德利的领队卢埃林·琼斯问蒙哥马利是否愿意乘坐游艇跟一次他们的划船练习。他回答说愿意，并问那位舵手理过发没有。在土耳其访问时，蒙哥马利给他们寄去一些土耳其礼物，并亲手写好了邮包。他在随邮包寄给卢埃林·琼斯的信中说：“蒂莫西·雷克斯和汤普森（我想他们在比赛中得了第二名）现在在奥斯维斯特里，我已给他们寄去了包裹，你就不用再管他们了。我建议你给每个人一个盒子，给自己留两个。舵手在没有理发以前不能得到他应得的那个盒子！你们在奥斯陆都干得很不错，明年我将以极大的兴趣跟踪你们的情况。”蒙哥马利确实跟踪了他们的情况，当他们8个人中的一个后来成为牛津大学划船队队员时，蒙哥马利马上写信去问他是不是他所见过的那8个人之一，因为他很想向他表示祝贺。

在他喜欢的职位上，蒙哥马利能够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使一些人心存不悦（包括伊辛顿的居民，他们不喜欢他总是拒绝参加村里的活动），但他对此毫不在乎。

1948年以后，他在工作中再也没有与同事们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实际上，他的生活是如此地舒适，以至于他都不愿意退休。也许他已经感到，假如没有经常的工作加以掩饰，他个人生活中的空虚感将难以忍受。

50年代中期，他仍然非常健康，实际上比战争刚刚结束那些年健康多了。他遇到的唯一麻烦是作了几次小手术，除掉背上的痣。1953年12月开始出现他将退休的谣传，但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这些谣传纯属子虚乌有。蒙哥马利一心要服满50年现役，半个世纪的服役期不满（1958年8月期满），他决不肯退休。但他拒绝退休引起了一些问题，理查德·盖尔将军为了能接替蒙哥马利的职务，特意延长了他任英国驻莱茵河军指挥官的任期。但蒙哥马利看起来好像要永远干下去，盖尔眼见无望，便只好在1957年3月先于蒙哥马利退休了。1957年9月，蒙哥马利终于宣布，他将在1年内退休。于是盖尔被从牧场请了回来，被任命为蒙哥马利的继任人。

1958年，蒙哥马利告别了他的军事生涯。在离开部队之前，他仍像以往那样精力充沛地组织军事演习。1958年4月，蒙哥马利为高级军官举行了“CPX8”军事演习。为配合演习，还上演了戏剧《玻璃走廊》。然而，蒙哥

马利退休前的大部分时间是用在向北约各国告别上。5月，他在加拿大作告别访问。6月，他访问西德与荷兰。在西德访问时，他表达了把吕响堡荒原的纪念碑（一块重15吨的石碑）运往英国的愿望，但他的愿望未能实现。7月，他访问葡萄牙；8月访问挪威；9月初，访问南斯拉夫，并受到成千上万人的热烈欢迎。9月14日，他到尼斯参加丘吉尔的金婚纪念活动。9月15日，朱安元帅授予蒙哥马利军功奖章，并在巴黎为他举行了告别宴会。第二天，蒙哥马利飞回英国。英国政府为他举行午餐会，邓肯·桑兹代表政府向他致谢。9月18日，英国陆军委员会在切尔西为他举行了告别宴会。

耳边回响着世界对他的欢呼声，胸前挂满各种奖章，蒙哥马利满身荣耀，衣锦还乡，回到了伊辛顿磨坊。正是：戎马生涯五十载，足迹遍及五大洲；功成名就建大业，心满意足把甲解。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二章 桑榆暮景

为求缓和频出访，研究历史著书忙；
国内政治勤参与，暮年加入保守党。

1958年9月，蒙哥马利退出现役。然而，直到1968年，他过着一种非常奇特的生活。虽然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幅照片：蒙哥马利倚靠在草坪割草机上，旁边写着：“作者晚年在伊辛顿磨坊过得非常愉快”，但他在1958年9月肯定没有打算就在伊辛顿的花园中愉快地度过他的余生。蒙哥马利已经把他的整个一生完全献给英国陆军和军事事业。自从他的妻子去世后，他对军事以外的事情几乎毫无兴趣。除偶尔看看芭蕾舞外，他别无所好。要他呆在伊辛顿这样一个小天地里，整天侍候花草树木，那简直不可想象。他根本就不喜欢种植花草果木之类的事情。他指示花工把花园中的一切都弄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他的弟弟布赖恩写道，那些小溪小沟“被收拾得井井有条，纹丝不乱，凡是看起来有点脏或不雅观的石头都得搬走”。幸运的是，蒙哥马利很快就找到了一种非常适合于他的工作——做一名有真知灼见的政界元老。他健全的常识和局外人的身份，使他对许多问题都能一针见血地洞穿实质，而这对一般当事人来说，却是不易做到的。他能够对他经历过的许多历史事物提供直接的咨询意见。他的主要贡献在外交和防务方面，但他肯定相信，他那直率而符合逻辑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对国内问题也有影响。蒙哥马利离开北约时，对他的赞扬声不绝于耳。有些言过其实的赞扬，听起来有点令人倒胃口。

1958年9月，阿瑟·布赖恩特在《星期天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把蒙哥马利说成是“一个非常和蔼、非常有人情味的人。对那些了解他的人来说，也是非常可亲可爱的”。同年10月，曾在非洲沙漠同蒙哥马利作战的对手冯·梅伦廷说，蒙哥马利一接过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非洲军团就认识到他们的末日来到了。蒙哥马利接受了这些阿谀奉承，并且感到很对自己的胃口。也许正是这些赞扬声使蒙哥马利备受鼓舞，以至于信心百倍地要做一个独立的国际事务评论人。

蒙哥马利退休后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到各国访问，并就国际问题发表见解；二是撰写历史著作和去广播电台与电视台向观众作演讲；三是参与国内政治。由于他常去上议院演讲，上议院已充分感觉到了他的存在。他对国际关系、历史和国内政治的研究情况，大多反映在他撰写的五部著作中：《回忆录》（1958）、《正确判断的方法》（1959）、《领导艺术之路》（1961）、《三个大陆》（1962）和《战争史》（1968）。

对蒙哥马利本人来说，他的新生活最有趣的一个方面是出访世界各国。尽管他年事已高，但却表现出惊人的活力。

1959年4月，他访问苏联；同年11月，他访问南非。1960年，他访问印度、加拿大和中国。

1961年，他再次访问中国，而且时间更长，然后，访问加拿大和中美洲。从1962年到1966年，他每年初都去南非访问。最后，他于1967年5月到埃及访问，故地重游，凭吊旧战场。

蒙哥马利对莫斯科的访问在保守党政府引起一些抱怨。蒙哥马利后来写道，他想到莫斯科去弄清三件事情：俄国人是否已准备冒险发动核战争；他

们是否害怕德国；他们是否害怕中国，他说：“对此事考虑再三之后，我最后决定访问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及其军事顾问商讨欧洲的安全问题。”当然，他曾于1947年1月访问过苏联，但从那时以来，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59年2月，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莫斯科，3月宣布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四国外长将于5月在日内瓦举行会谈。在这种特殊时刻，英国政府显然不愿意让蒙哥马利前去访问，因为蒙哥马利生性乖僻，难以预料，谁知会不会捅出什么娄子来呢。然而，他们根本无法阻止他以平民的身份出国旅行。于是采取种种措施，使蒙哥马利的访问看起来完全是非官方的。英国驻苏联大使帕特里克·赖利准备推迟休假时间，以便与蒙哥马利的访问时间相一致。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马上告诉他不必为此操心，当蒙哥马利访问莫斯科时，他不应该呆在那里。麦克米伦在下议院和政府发言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蒙哥马利的访问纯属私人访问，英国政府对此毫不关心。4月9日，麦克米伦和劳埃德会见蒙哥马利达45分钟，警告他不要涉及敏感问题。这次会见在下议院引发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所有到苏联进行私人访问的人都会同外交大臣会谈45分钟吗？喜剧演员吉米·爱德华兹最近飞往莫斯科以前会见过外交大臣吗？

蒙哥马利的访问进行得很顺利。当他乘坐的飞机降落在莫斯科机场时，他受到了热烈而友好的迎接，见到了老熟人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第二天早上，他会见赫鲁晓夫，向他询问苏联对欧洲局势的看法。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赫鲁晓夫对此守口如瓶。当天下午，蒙哥马利在莫斯科到处闲逛，买了几个玩具。那天晚上，他说他需要时间考虑第二天所要讨论的问题，拒绝去剧院。第二次会见赫鲁晓夫时，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概要地介绍了他要求联合国解决柏林问题的计划和建立核查小组帮助欧洲裁军的计划。赫鲁晓夫礼貌地听他讲解，但却没有发表任何重要意见。

蒙哥马利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毫无结果，至多只标志着缓解东西方关系的一种努力。然而，蒙哥马利却坚信自己一直处于国际大事的中心。他回到英国后对新闻界说，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冥思苦索。“在我深思熟虑之后，你决不会知道我将做什么事情。”他为《星期天泰晤士报》写了两篇文章报道这次访问活动，并在《正确判断的方法》一书中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描述这次访问。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已深入了解苏联政府的最深层想法，他发现赫鲁晓夫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和“现实主义者”，苏联也像西方害怕遭到东方的攻击一样，害怕遭到西方的攻击。他相信，只要西方改变策略，苏联完全有可能成为基督世界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必须停止要摧毁东方集团的威胁，我们必须停止炫耀我们的核力量和我们将如何做。各军种首长发表好战演讲没有任何好处。”这与他3年前发表的核威慑演讲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蒙哥马利对中国进行的两次访问非常有意义。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中国是神秘的。蒙哥马利的访问有助于西方了解中国。

1960年1月，蒙哥马利访问印度，同他心目中的伟人尼赫鲁住在一起。后来，他决定访问中国，于是从新德里向北京发出了这个信息。不出所料，他接到通知说，鉴于中印关系紧张，直接从印度飞往中国将不受欢迎。但是，为他作出了5月份访问中国的安排。5月20日，蒙哥马利到达香港。有人告诉他说，周恩来总理于前几天谈论了澳门和香港的最后前途问题。蒙哥马利反驳说：“如果谁想夺取香港，那将意味着世界大战。”

确定了他在这个复杂问题上的立场之后，蒙哥马利于5月24日后程前往中国访问。24日中午，蒙哥马利元帅在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李达上将的陪同下，乘飞机由广州到达北京。

24日下午，蒙哥马利参观了北京站、民族文化宫和北京的其他新建筑。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接见了蒙哥马利，并举行宴会欢迎蒙哥马利访问中国。

25日，周恩来总理和对外贸易部长叶季壮分别接见了蒙哥马利。此外，蒙哥马利观看了跳伞表演和滑翔机飞行表演，参观了北京第二棉纺织厂。26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表示，中国人民支持蒙哥马利元帅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相信蒙哥马利元帅这次访问，对增进中英两国人民的友好，对改进两国关系，一定会有很好的贡献。蒙哥马利在讲话中表示，他在返回英国后一定马上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大家都应该同新中国保持友好。”他还说，他这次访问使他能够纠正西方世界普遍持有的对新中国的错误印象。

5月27日上午，蒙哥马利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访问，上海副市长曹获秋到机场迎接。中午，上海市市长柯庆施设午宴欢迎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上海。蒙哥马利在讲话中感谢柯庆施市长对他的欢迎。他说，在亚洲来说，一个大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作为一个有理智的军人，他一贯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政府在北京，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下午，蒙哥马利参观了上海近郊的马桥人民公社。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了蒙哥马利并共进晚餐。

28日早晨，蒙哥马利元帅在李达上将和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广州。抵达广州后，转乘火车经深圳取道香港回国。

蒙哥马利在北京访问时，过得非常愉快，因此邀请周恩来总理到伊辛顿访问，但被婉言谢绝。然而，蒙哥马利却非常高兴地接受了1961年9月再次访问中国的邀请。

1961年9月6日，蒙哥马利再次来到中国访问。在这次访问中，蒙哥马利访问了更多的地方，会见了更多的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有了更多了解。9月9日，蒙哥马利离开北京前往包头、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等地访问，参观了许多工厂、农村和学校，游览了一些著名风景区，于9月20日回到北京。在访问期间，蒙哥马利不仅受到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会见，而且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陈毅副总理为他举行欢迎宴会并陪同他参观故宫；周恩来总理两次接见他；国家主席刘少奇于22日接见了他；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于23和24两日在武汉两次接见了。通过这些访问与会见，蒙哥马利对中国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在周总理为他举行的饯别宴会上，蒙哥马利说，中国人民的命运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全中国人民是坚强团结的，他们12年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

蒙哥马利第二次访问中国时，提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这就是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有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我说的中国是指政府设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从来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台湾那一套机构，我一向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蒙哥马利关于中国的见解，大多阐述在为报纸写的文章和他的《三个大陆》那本书中，比他要把苏联吸收进基督世界的看法要有趣得多。从1960

年起，他一贯坚持认为，承认台湾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实在是荒谬之至。他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引起台湾报纸的一场反击，把他的看法说成是“一个遭到挫折而又被完全遗忘的人的悲嚎”。在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分析中，蒙哥马利明显表现出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他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同残酷无情、侵略成性的蒋介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人物。蒙哥马利承认，毛泽东可能对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死负有责任，但他说，中国的权力之争总是与这种屠杀紧密相连的，而受西方国家庇护的蒋介石则可能负有更大的责任。通过访问中国和对某些问题的思考，蒙哥马利得出的结论在现在看来好像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在当时却是超时代的。

蒙哥马利最常访问的国家是南非，他喜欢那里的天气和那里的人。他赞同白人的种族隔离制度，并且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结果，下议院不可避免地对他提出质询。每次他从南非回来，总是逢人便讲不要干预南非的事情，让它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1961 年他在德班对听众说：“如果这个国家北部的黑人联合起来，如果他们能找到领袖人物，并威胁南非白人的安全，我本人将前来拔刀相助。”

蒙哥马利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相信只有遍布全球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联合起来，才能拯救这个世界。他在《三个大陆》中描绘了这种梦想。这种梦想的基础，是他过低地估计了其他民族的能力。他认为，班图人生性懒惰，黑人太落后，没有白人的帮助他们难以生存。由于他如此地贬低黑人的能力，他在南非白人中间颇得人心便不足为奇了。

1965 年 11 月，南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但他去那里访问并没有引起什么使人为难的事情。他只喜欢那里的气候和南非的朋友。他在 1954 年给朋友 T·E·B·豪沃思的信中写道：“我总是在想，为了适当而有效地治理这个世界，有必要造就一批杰出人物……”显然，他认为南非白人社会满足了这一简单的要求。

1962 年，蒙哥马利在加拿大乘火车到处旅游，并且还访问了一些中美洲国家。他对在加拿大的旅行没什么评论，后来的评论也不过是“加拿大的男孩太胖，他们需要更多的锻炼”之类的东西。在中美洲，倒发生了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危地马拉和英国就英属洪都拉斯的部分领土发生了争执。蒙哥马利在危地马拉深受欢迎。危地马拉报纸把蒙哥马利说成是“访问我们国家的第一个英国绅士”。在他离开后，伊迪戈拉斯总统宣布说，蒙哥马利已经表示要在危地马拉和英国政府之间进行调解。在英国大使在场的情况下，蒙哥马利和伊迪戈拉斯讨论了争议中的领土问题。伊迪戈拉斯请蒙哥马利（而不是英国大使）把他们的讨论报告转送给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勋爵，遭到了蒙哥马利的拒绝。实际上，英国不愿意就争议领土的前景进行讨论，蒙哥马利引发了一个外交部在当时不愿意提起的问题。简直是帮了倒忙。

蒙哥马利最后一次重要的海外之行是 1967 年去埃及，当时他已 79 岁。这次访问是 1966 年 12 月宣布的，翌年 5 月进行。英国政府对此不怎么高兴，因为中东的政治形势非常微妙。蒙哥马利私下安排了这次访问，他想旧地重游。这次访问显然具有历史意义，《星期天泰晤士报》派来了随行摄影师，并负责支付蒙哥马利的开销。当蒙哥马利一行到达海利奥波利斯时，机场上彩旗飞舞，管乐齐鸣，蒙哥马利受到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他同埃及总统纳赛尔及其总参谋长举行了会谈。同往常一样，他相信这样就能使他对正在发生

的事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他甚至让英国代办用密码向伦敦发了一份电报，说明埃及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并说纳赛尔总统只准备同工党政府的某位大臣进行谈判。

他在埃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沙漠中游览旧战场度过的。他的时间表安排得非常紧，每天早上6点起床，随后就爬上直升飞机，观看那片土地最美丽的景色。随后，直升机在预定的地点降落。他们一行站在沙漠中，蒙哥马利一边对照他过去用过的地图和作战计划，一边把在场的人员用作标记，分布在沙漠中。他在埃及深受欢迎，部分原因是他毫不含糊地谴责了苏伊士作战行动。尽管他在这次访问中进行了这些充满生气的活动，但他的态度再也无法掩盖。他自己就说，这次旅行缩短了他一年的寿命。实际上，这是他进行的最后一次访问，这使英国外交部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蒙哥马利喜欢这些毫无害处的短途游览。他坚信他能以提供意见的方式为国家作出一些贡献。在很少得到英国政府鼓励时情况下，他非常乐意地就许多国际关系问题向英国政府提供了咨询意见。作为一个非常关心西方团结的人，他却奇怪地反对与欧洲结成任何联盟。在60年代初期，他是阻挠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知名人士。

1959年他甚至在普利茅斯说，在英吉利海峡修建海底隧道是危险的，不符合英国的战略需要。

随着他的著作的出版，许多人对他的战略思想的尊重开始烟消云散。读者很快就发现，他的思想前后不一致，充满自相矛盾。1961年2月9日，《泰晤士报》发表对《领导艺术之路》一书的评论。评论者写道：“这本书不过是一堆陈词滥调和高级将领鼓舞士气的老生常谈。”这种评论典型地反映了读者对他的著作的批评性意见。

蒙哥马利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尽管常常是混乱的和自相矛盾的，但其基础却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必须接受冲突和战争，但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减轻其影响。从这种实用主义观点出发，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总是着眼于从实际上缓和紧张局势，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道德价值观念。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考察国际事务的基础，它使蒙哥马利得出了一些相当有价值的见解。他很早就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重要性，便是他严格的实用主义方法带来的直接结果，同样，这种方法也使他确信，虽然美国是欧洲的保护伞，但北美洲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可能引发世界大战。蒙哥马利强烈地谴责杜勒斯和肯尼迪时代的讨伐政治。他认为，美国人的态度总是很可能引起问题。如果美国不能正视并承认中国的存在，那就更可能引起问题。他还担心美国许多外交政策中固有的“珍珠港”情结。他认为，美国人非常害怕突然袭击，因为他们不能想象在一种长期互相敌对的形势下，这种威胁总有一天可能会消除。由于这种原因，美国人便把战略思想建立在对任何攻击都立即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基础之上。这种推理使蒙哥马利比许多观察家更早地谴责美国在越南的行动。

1965年，他告诉《每日快讯》的勒内·麦克科尔说，美国应该撤出东南亚，因为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不能停止在一个小国的边界上。“世界有一半的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他（指林顿·约翰逊）打算同所有这些人作斗争吗？”1968年7月，他以略微不同的理由再次谴责美国的越南政策。他写道：“美国违反了战争的第二条规则，即不要用陆军在亚洲大陆作战。第一条规则是不要向莫斯科进军。这两条规则是我自己制定的。”这种说法似乎有些过分

自信，但不失为一种远见卓识。

他的一些公开评论却没有那么深刻。

1958年10月，在正式退休后不到一个月，蒙哥马利对北约进行了一次猛烈攻击。在向皇家联合军种协会作演讲时，他把北约说成是一个“复杂、笨重、人浮于事”的机构，并以其特有的形象化语言指出，世界可能出现一场“全面核竞赛”。英国政府和北约组织中反对蒙哥马利的人马上抓住他的这些话大做文章，结果引起很大的政治反响。国防大臣邓肯·桑迪兹把整个11月份的时间都花在了平息这个事件上。

1962年还发生了另一次引人注目的争吵。那年3月，蒙哥马利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谈论德国问题。他的态度非常鲜明，与他分析国际关系的实用主义方法完全一致。由于苏联和西方国家都不允许一个统一的德国属于另一个阵营，在东西方紧张关系解决以前，就不可能考虑德国的统一问题。因此，蒙哥马利坚持认为，西方国家应该承认东德。但问题是，西德政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于是，不受任何约束的蒙哥马利说：“阿登纳博士需要一剂除草剂。他已是风烛残年，过分敏感。很小的剂量就能解决问题。”他告诉参加会议的军官对他的讲话保密，但他却不能担保这种话不传出去。他这番话的结果之一，是他收到德国右翼极端分子给他的一封信。除了惯常的咒骂外，那封信还说，“你是英国最可怜的家伙。必须尽快把你干掉，你将很快被干掉。”政治家的反应不那么强烈，但同样持反对态度。

退休后的清闲生活，使蒙哥马利对历史产生了兴趣。不过，他对历史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撰写《回忆录》、《战争史》和一些广播、电视演讲稿上。

1958年底，蒙哥马利开始为英国广播公司录制回忆二战战役的系列节目。从一开始，他就非常喜欢在看不见的观众面前演讲。节日导演布里斯多尔发现他是一个“天生”的演讲家，一点儿不紧张，一点儿不结巴，语言简明、精练。实际上，每次录音结束后，他总是尽可能久地坐在闷热的录音室里，聊天、喝茶。他对整个录音制作过程十分感兴趣，到第一套系列节目结束时，他已成为录制广播节目的大师。对于一个决心在公共事务中度过余生的人来说，广播电视自然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舞台。蒙哥马利对自己的进步感到非常高兴，他对他的第一套系列节目评论说，那是“我是这个行业的新手时”制作的。此外，蒙哥马利还录制了1959年同爱德·默罗的讲话和1966年伯纳德·莱文对他的采访。

蒙哥马利的《战争史》是对军事历史的一般性介绍，而且大部分是由他的助手写的，因此并不深刻，也不鼓舞人心。他私下对这本书的评论是：“读头两章和最后四章，那是我自己写的。”在公众场合下，他却没有那么谦虚。他在一个名为“荒岛探胜”的节目中说，除《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外，《战争史》是唯一一本他愿意带往荒岛的书。

1958年，蒙哥马利出版了完全由他自己亲笔写成的《回忆录》。他只用了3章来描写他1939年以前的生活，并且没有提到他声名显赫的祖先——父系的罗伯特·蒙哥马利勋爵和母系的法勒大主教。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他只想记录他曾参与过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40年代和50年代，蒙哥马利常拿《从阿拉曼到桑格罗河》和《从诺曼底到波罗的海》这两本书送人。这两本书按时间顺序详细地记叙了蒙哥马利所指挥的历次重大战役，是由蒙哥马利及其参谋军官在1945年编写的。但战争结束后不久，曾在第21集团军群任参谋军官的R·F·贝尔彻姆少将却

在写给爱德华·巴德少校的信中声称，他是《从阿拉曼到桑格罗河》和《从诺曼底到波罗的海》这两本书的唯一原作者。蒙哥马利认为，这两本书的最大优点是准确，而他的《回忆录》则主要是阐明一些重大问题的真相。

但是，许多人认为，蒙哥马利在其《回忆录》中记述的某些历史事件不够真实。阿伦·查尔方特写道，“他常常承认他可能错了，给人一种他在进行自我批评的表面印象……实际上，他在用这样一种方法暗示他很少有错，他有一种改写或重新编造历史的高超本领。”

蒙哥马利后来与艾森豪威尔失去了联系也许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早在1959年1月，蒙哥马利便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说，他曾送给艾森豪威尔一本他的《回忆录》，但反应一直是“沉默，沉默。我给他寄去一张圣诞贺卡，所用语言比我给任何人的语言都更为热烈，结果仍然是沉默……如果我已经失去了这个伟大而善良的人的友谊，我将感到非常痛苦”。

艾森豪威尔虽然在公众场合非常有节制，但在私下却并不那么和蔼可亲，他在去世前不久曾对科尼厄斯·瑞安说：“他（指蒙哥马利）为了突出自己，就说美国人，特别是我，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与那场战争毫无关系，我只好同他断绝联系，我对同不讲真话的人保持联系不感兴趣。”

蒙哥马利不仅对国际关系和历史研究比较感兴趣，而且希望对国内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他相信，他分析问题的严密逻辑和他的军事知识，会使他在国内政治中发挥宝贵作用。然而，他有关国内问题的意见，特别是他在上议院的演讲，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上议员，蒙哥马利首先是同保守党结盟。这也许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从当帝国参谋总长时起，就明显地不同情工党。蒙哥马利非常敬慕麦克米伦，并深受其影响。蒙哥马利认为，麦克米伦是处理国际事务的大师，应该给他整顿欧洲秩序的权力。麦克米伦的实用主义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认为他已找到一个用他本人的方法分析国际形势的人。

蒙哥马利以过分强调的方式表现了他对保守党的忠诚，结果很快引起一场风波。

1958年10月5日，蒙哥马利宣布他决定成为保守党人，并说，考虑到英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和麦克米伦首相已经得到证实的处理国际问题的能力，任何投票支持工党的人“绝对是愚蠢的，完全是疯了”，应该把他们看作是国家的威胁而放到疯人院里锁起来。他那样说完全是出于他本人的经验，因为工党政府没有凝聚力，根本不能推行某种坚定的政策。

赫尔萨姆勋爵对保守党又增加了一名新兵感到十分高兴，并说，蒙哥马利以不同的方式得出了与他相同的结论。赫伯特·莫里森和贝伦格则说，工党对蒙哥马利元帅在当代政治辩论中使用“真实性值得怀疑的启示”作为弹药，感到震惊。

10月11日，蒙哥马利就他的评论发表声明说，他对大家“没有把他的话说当作一种玩笑而感到遗憾”。但他的声明既没能阻止波尔顿郡委员会的48名工党委员联合抵制会见蒙哥马利，也没能阻止伊曼纽尔·欣韦尔说蒙哥马利在政治上“完全是个孩子”。

蒙哥马利讲话不受约束，在上议院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这使他非常高兴。1968年，蒙哥马利给他的弟弟布赖恩邮去一份英国议会议事记录，并在上面附了一张条子：

“亲爱的布赖恩：

你也许愿意读一读上周三我在上议院国防辩论中的发言。上议院挤得满满的；下议院的议员们挤在他们的特殊席位上，王位的阶梯上挤满了枢密顾问官！

祝

好！

伯纳德”

显然，蒙哥马利没有意识到，在严肃的政治事务方面，人们已把他看作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不是一个有份量的国际事务评论家。

蒙哥马利的私生活相对平静，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伊辛顿度过的。1968年，他在当地找了一户人家照顾他，他几乎没有什么来访者，但却有大量信件从世界各地寄来。有两件事打断了他的平静生活。1960年10月，洪水淹没了他的住宅的一楼，到第二天洪水才退去。由于地毯和家具已被搬走，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更为严重的事件是，他的住宅于1967年11月17日晚被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蒙哥马利离开伊辛顿去参加切尔西皇家医院院长为他举行的生日晚宴。蒙哥马利家中所有的金、银饰品和钻石被盗贼偷得一千二净。他的丹麦大象勋章和陆军元帅权杖也不见了。幸运的是，吕讷堡荒原投降文件原封未动。后来，蒙哥马利把它赠给了大英帝国军事博物馆。

在蒙哥马利的家人和亲近的朋友看来，高龄似乎使他变得和蔼可亲。快到70岁的时候、每年年初他不再去瑞士，而是去伯恩茅斯的卡尔顿饭店过新年。利德尔·哈特常常同他在那里聚会。

1965年他曾主动帮助巴兹尔·利德尔·哈特一个多小时。当然，他也一定注意到了凯思琳·利德尔·哈特穿的是什么。但对一个上了年纪的厌恶女人的人来说，这绝没有下流的意思。

上了60岁以后，蒙哥马利也许开始感到需要更为亲密的人际关系。他似乎比在50多岁时对家人更亲近了一些。但有一个明显的例外——他的儿子戴维。最后，就连戴维也得到了他的原谅，使他与全家人的关系得到了弥补。1969年，蒙哥马利参加了布赖恩·蒙哥马利的银婚纪念活动，弥补了没有参加他的新婚仪式的遗憾。1971年，蒙哥马利离开伊辛顿进行最后一次长途旅行，到埃克塞特去参加他的妹妹温莎的第二次婚礼。可是，他的个人生活仍然像军事行动一样受到严格控制，没有多少可以随意的地方，一切都根据仔细制定的计划进行。

1968年圣诞节前10天，阿瑟·波里特（蒙哥马利以前的随军医生）收到蒙哥马利发来的一封长电报，邀请他和他的夫人到伊辛顿去同他一起过圣诞节。波里特夫妇非常着急，因为时间很快就要到了。他们又把电报读了一遍，才发现蒙哥马利指的是1969年圣诞节。

虽然蒙哥马利的性格已不像过去那样古怪，但他的自信却丝毫未减。

1961年，当他驾车误入单行道时，发生了撞车事故。他在向警察报告事故时说：“单行道上没有标志，我非常肯定这一点。我带了一个乘客，他可以作证。”这种固执己见的声明毫无用处，但他却感到有必要那么做。如果他不能按自己的意见行事，就很容易生气。1967年在琅斯的第51高地师联欢会上，蒙哥马利刚要开始向新闻界发表演讲，一个播音员通过公用讲话系统进行介绍。蒙哥马利大声叫道：“我连自己讲的话都听不见了。在外面说

话的那个人是谁？把他弄走。”几个军官出去叫那个播音员赶快停下来。但对蒙哥马利来说，他们的动作不够快。他怒气冲冲地问：“撵走捣乱分子的人到哪里去了？”这个小小的插曲弄得他十分不愉快，演讲结束时，他不让新闻记者提问题。他说：“我把一切都讲得非常清楚了，因此，不再回答任何问题。”

即使像蒙哥马利这样出奇地健康的人，也不能永生不老。1967年他的住宅被盗时，他度过了他的80大寿。1968年，他已经开始显现出老年的痕迹。1964年做的背部手术使他变得虚弱，但他在南非得到了很好的恢复。然而，1965年他却只好不去参加阿拉曼联欢会，因为他感到不舒服。1965年以后，而易见地摇晃起来。随后，那个身穿元帅服的瘦小身材也跟着摇晃起来，几乎跌倒在地。女王那有节奏的讲话略带关切地顿了一下。王室司库特赖恩勋爵冲上前去，接过国剑。人们轻轻地把蒙哥马利扶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几分钟后，蒙哥马利几乎在没有人察觉的情况下，慢慢地走出了上议院，走出了公共生活。

1976年3月25日，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对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世界看了最后一眼，便慢慢地闭上了眼睛，走完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正是：

圣职之家一少年，立志从军把功建；
出生人死一二战，指挥若定把敌歼。
战后重建多磨难，联盟防务保国安；
贡献毕生建伟业，流芳百世美名传。

